

学术研究

郭沫若題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萍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459 期

出版日期：2 月 20 日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建构

沈江平 1

学术聚焦

· 阐释学研究 ·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吴小安 9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魏传光 19

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富裕对正义的彰显

吴昊天 袁洪亮 28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

——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毛朝晖 34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清初丹霞遗民舍山缘起

杨 权 41

政 法 社会学

· 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 ·

“被围观的私语”：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能动性书写、叙事治疗与意义生产

陈 刚 王 卿 51

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战略动因与实施路径

胡文涛 陈佳怡 58

文化嵌入性：平台型企业跨国经营模式的改变

——基于 A 平台的质性研究 王 樱洁 香 玥 63

家暴网络新闻的叙事呈现与性别偏向

——基于网络媒体“杀妻”案件报道的样本分析 商 瀑 68

新《证券法》下市场操纵行为规制的实证检视与完善

汪青松 张汉成 73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哲学 gzphil@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政法 gzpol@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经济学 管理学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理论逻辑、国际借鉴与实践路径探究

郭跃文 刘佳宁 李 霞 **80**

高铁开通、市场可达性与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

卢昂荻 花泽苏 **87**

人工智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与机制识别

——基于中国“机器换人”的实证检验

韩永辉 刘 洋 王贤彬 **97**

央行“降准”能释放流动性吗

——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

刘新华 常 银 **105**

历史学

“建国干部”之困：抗战胜利后赣籍青年军复员问题探析

何文平 肖 敏 **112**

·环境史·

英国军事环境史研究管窥

贾 琨 **123**

从监督调查到协同治理：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史演进

施 雾 **133**

文 学 语言学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

——兼论文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戴伟华 **143**

金锁的隐喻：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张爱玲的《怨女》

康保成 **152**

现代文学家世研究的可能与方法

李超杰 **161**

共同体的跨域嵌合：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旨归

许栋梁 陈开举 **169**

英文摘要

177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2, 2023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hen Jiangping	(1)
On Humean Supervenience As an Imposed Interpretation	Wu Xiaoan	(9)
Data Exploitation and Justice Criticism of Platform Capitalism	Wei Chuanguang	(19)
The Demonst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u Haotian and Yuan Hongliang	(28)
On Xunzi's Hierarchical Theory of King-Hegemony Discourse	Mao Zhaohui	(34)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bandoned the Mount Danxia and Establishment of Biechuan Temple in Early Qing Dynasty	Yang Quan	(41)
"The Personal Narration Watched from the Crowd": The Dynamic Writing, Narrative Therapy and Meaning Production of Cancer Experience on Network	Chen Gang and Wang Qing	(51)
American "Democracy Assistance" to Mongoli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trategic Motivation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Hu Wentao and Chen Jiayi	(58)
Cultural Embeddedness: Platform Type Enterpris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Model		
—Qual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Platform A	Wang Yingjie and Xiang Yue	(63)
Narrative Presentation and Gender Bias of 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 News Sampl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port of Uxoricide Cases in Internet Media	Shang Pu	(68)
Empirical 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Market Manipulation Regulation under the New Securities Law	Wang Qingsong and Zhang Hancheng	(73)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and Practice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o Yuewen, Liu Jianing and Li Xia	(80)
Market Access a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Higher-Quality Products	Lu Angdi and Hua Zesu	(87)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Identification of Mechanism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Data of "Machine Replacing Human" in China	Han Yonghui, Liu Yang and Wang Xianbin	(97)
Can Central Bank Release Liquidity by Using RRR Cuts: A View of Modern Monetary Theory	Liu Xinhua and Chang Yin	(105)
Dilemma of the Cadres Expectant to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Jiangxi Young Men Army's Retirement from Military Service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Wenping and Xiao Min	(112)
A Glance to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K	Jia Jun	(123)
From Surveillance Investigation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Antibiotic Feed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i Pang	(133)
A New Perspective on Liu Yu Xi's <i>Yi Jiang Nan</i> and Its Qu Pai as Sentence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Meaning about Chang He in the Occurrence Period of Literati Ci	Dai Weihua	(143)
Metaphor of Golden Cangue: From <i>The Injustice Done to Tou Ngo</i> by Guan Hanqing to <i>The Rouge of the North</i> by Zhang Ailing	Kang Baocheng	(152)
The Possibility and Method of Extraction Research in Modern Literature	Li Chaojie	(161)
The Translocal Articulation of Communities: Spatial Meaning of th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s Aesthetic Cultures in the 20 th Century	Xu Dongliang and Chen Kaiju	(169)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77)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美好生活建构^{*}

沈江平

[摘要]作为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议题，“美好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空间中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苏格拉底揭开了探索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之幕，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现了政治制度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内在耦合，美好生活日益成为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的关注焦点。美好生活的建构与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密切关联，日渐被学者们所洞悉和探求。随着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人类开始向现代社会迈进，政治哲学孕育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条理路，由此产生两种迥然相异的构建美好生活的路径。科学社会主义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美好生活描绘宏观定向。中国共产党秉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初心并通过制度化践行使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生活发展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美好生活蓝图已经筑就。

[关键词]美好生活 政治哲学 现代性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01-08

中国的发展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成为现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①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取得的辉煌成就生动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美好生活”^②理念的引领意义，也为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建构中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提供了现实可能。当前学术界对“美好生活”的理论探讨，有从整体层面将其视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状态，即美好政治、美好经济、美好社会、美好生态、美好文化生活的“五位一体”；也有从个体层面将其视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状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内在契合。这两种研究构成解读“美好生活”的科学社会主义规范，体现为同人类生存发展相向而行的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1JD710015)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共建重点项目(21BJZD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② 鲁克俭认为，美国学者布鲁德尼最早明确以“美好生活”(good life)来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一思想包含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等。鲁克俭：《马克思的“美好生活”理念及其证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将“美好生活”英译为“better life”。从构词学来看，better作为good的比较级形式，与其语义相同而程度不同，意为“更加美好的”。故新时代“美好生活”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美好生活观的继承与发展，更加强调生活达至“美好”的目标与追求。整体理解“美好生活”范畴，是涵盖未来目标与现实手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生活”走向“美好”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观念引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余年民族复兴实践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与实践证成。

学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从历时性维度比较梳理不同时期政治哲学对美好生活思想聚焦，凸显现代性危机下美好生活的科学社会主义路径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实践。

一、从德性美好生活到美好生活的现代性危机

哲学研究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由自然转向人自身。真理、美德与善是人理所应有的东西，不断追求知识与智慧的生活才能真正使人快乐。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成为思想家们理论研究中的美好生活图绘。“美好生活”的追寻因古典政治哲学所宣称的政治本体论承诺而日益清晰。在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这种本体论承诺往往与城邦政治交织在一起。现有研究表明，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对美好生活“何为”和“何以可能”的哲学思考。^①

解答美好生活何以可能是古典政治哲学要追求的主题。公元前8世纪，城邦民主政治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推动着希腊政治哲学的形成和繁荣。对于古典政治哲学而言，涉及政治问题的哲学反思总是融汇在哲人对伦理问题的无尽探索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普遍相信，“国家之目的既在求其人民之良善生活，于是国家之职务乃在造成道德高尚之人”。^②良善政治的合法性必定矗立在纯粹的、绝对的、最高的道德法则基石上，至善本体是来自“神”或“逻格斯”的最高的善。理想的生活逐渐与理想的人格或某种完善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种善能为人们的生活或道德、政治秩序寻求或确立最高的准则或意义旨趣。幸福并非生来有之，需要人的德性来塑造，充分激发内在于人的诸多潜能，使其更加健全与完备。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度走向衰落时期的柏拉图，力图建构一个理想的、贵族式的政治共同体，从而拯救当时的希腊社会。他认为，“为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是不是首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什么是国家制度的至善，什么是立法者立法所追求的至善”，^③其出发点显然是一种纯粹的、普遍的道德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④具有对美好有着选择的意愿及能力并持之以恒遵循的属性。

美好生活的认知在对美德、德性的解析中摸索前进。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在于“美德即知识”，他的政治思想也由此展开。在他看来，雅典和雅典人所为之骄傲的闻名于希腊世界的智慧和力量是迷途，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智慧与真理，对于好的生活而言，灵魂才是照看的首要对象。鉴于城邦对个人智慧认识不足之弊，他将政治改革的方案落在个体灵魂的自我完善上。这种政治对灵魂的关照以及哲学在政治中的作用，被柏拉图传承并成为其政治理论的核心部分。柏拉图描绘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认为现存的所有城邦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败之中，而且难以扭转和改善。社会动乱分裂往往预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柏拉图为此提出了“哲学王”政治设计。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知道什么是善，也只有哲学家可以整顿和治理城邦，哲学家的幸福生活不是靠政治生活得来的，也就不会拿政治权力谋求名利，这从统治者层面消除了城邦分裂的可能性。柏拉图更进一步构建了由哲学王、辅助者和生产者三部分组成的统一共同体。最好的政体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公民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在探索实现统一共同体的过程中，城邦必须把重点放在功名德性的培养上。

城邦政治孕育了美好生活建构新道路的制度底蘊。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充满浪漫情怀不同，亚里士多德被后人看作是清醒的务实者和共同体的践行者。他更加关心人的利益，认为城邦是共享某些东西的一群人之间的联合体或共同体，是一种合作关系。城邦的利益显然是比个人利益更为广泛、更为完善的利益，在关心个人利益时必然会涉及对于城邦的考虑。所以，个人的和政治共同体的利益或有益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主题。在此前提下，亚里士多德提出城邦生活，认为只有城邦全面地关心人的广泛利益，才能开掘与释放美德生活的内在潜能。“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

① 沈湘平、刘志洪：《正确理解和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8期。

② 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5页。

③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9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页。

而存在。”^①亚里士多德基于城邦设置的前提，进一步探讨了人和政体的问题。政体是公民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的产物，一个好公民必然维护这一关系，公民美德和政体有其天然的互动，最好的政体应该是一种贵族制。在提出最佳政体之后，他将人类生活分为快乐的生活、政治生活、哲学的生活，并论述了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好生活是幸福同一于美德的生活，或者说是同一于美德和明智以及按照美德和明智行事的生活。亚里士多德重视美德，认为美德对于政治统治的作用极为重大，由此得出结论：城邦和个人两者最佳的生活方式都是有赖于实践或积极地进行生活，生活背后真正意义的幸福不在工作而在闲暇。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把美德、政体、生活三者整体串联起来，最好的政体依赖于人的美德，最好的生活就是幸福统一于美德的生活，最好的政体带来最好的生活。

由是观之，有着师承关系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不同层面呈现出了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设计。三位学者基本上代表了古希腊雅典文明下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实践的发展脉络。伴随历史的更迭和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使人类脱离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再次释放出人类期待美好生活的迫切情怀。人类进入近代社会，基于理性和经验来阐发有关国家自然行进规律有了新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得出社会制度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状态的结论，问题也接踵而至。

二、现代性危机下美好生活的迷失

柏拉图政治哲学和伊斯兰—犹太哲学构成了古典政治哲学两大悠久传统。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不断媾和，迫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戛然而止，在马基雅维利把古典政治哲学堕落为一种摆弄权力的政治术后，就再也无法摆脱工具理性的纠缠。以往政治哲学中的哲学与律法关系据此由理性与信仰关系所置换，西方现代“技术时代”紧随而来，最终在其蕴含的技术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双重作用下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即现代性危机。

现代政治哲学在侵蚀古典政治哲学塑造自身的同时又形成内在冲突。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城邦衰落、国家崛起，古典希腊时代宣告结束，进入了希腊化罗马时代。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开始着眼于国家，政治观念以公民和法权为主要内涵，法权观念同其宗教信仰内在相关。在欧洲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古典政治哲学同宗教神学的媾和程度进一步加深。试图从政治哲学来探求美好生活路径的逻辑通道毫无疑问被阻塞。为了反抗宗教文化，欧洲掀起了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文艺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看似是对古典思想的复归，实则是在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经济因素的推动下，当时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做着铺垫。马基雅维利作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现实主义开启了晚期文艺复兴对于国家理性主义的思考，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大幕也由此缓缓拉开。但从这时起，现代政治的冷漠也渐渐显现出来。马基雅维利关心人类，关心人类如何生活，但他的目的却是要通过这样的知识来教导君主如何统治。“这种政治学理论唯一考虑的是权术，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严酷的抑或恶毒的。”^②现代政治概念、语言不断发展完善，现代政治哲学逐渐体系化，其又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而发展的，然而支撑现代性危机的却俨然是其衍生的副产品。

自然科学的出现和进步驱使政治哲学不断关注人本身及其现实利益。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提升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人的理性取代以往的神、上帝而占据统治地位，人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人的价值被理性凸显出来，人的利益越来越被重视。现代政治哲学聚焦现实层面，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灵魂和德性的圆满即是美好生活，而在于实现人的当下利益。或者例如霍布斯则更直白地提出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肉体保存，他把幸福定义为欲望的不断发展，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掩盖了对德性的关注。而社会秩序、规则等也仅仅只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一切人攻击一切人以保全自己生命所采取的方案。高扬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0页。

^② [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

人的理性、鼓吹人的价值，最终导致世间万物都成为了人实现自己欲望的工具和手段，甚至人也异化成了他人的工具。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对于取得新进步和对时刻增加的期望的满足的无限制的追求：所有的东西必须越来越大，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增长、利润。”^①人的理性和自由被欲望所绑架，生活的幸福、美好无处可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问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向善这一特性也不再是人所能拥有的行为，对政治良序的探究退化为对个体信仰问题的沉迷。

美好生活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私人原始欲望的自然状态下不受国家管控的面相。节制美德被放纵和堕落行为所置换。由现代性带来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侵蚀公共领域和困扰大众生活。这种生活状态促使政治与哲学、政治与宗教的鸿沟日渐增长。政治的工具属性强迫专注现实生活的政治从现实境况中退场，致使美好生活与政治舞台渐行渐远。哲学蜕变为政治的垫脚石和跟屁虫，工具理性信仰不断侵蚀着伦理、道德和美的存在空间。即使有人试图用“权利政治学”和“公益政治学”来扭转，但根植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工具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在这种状态之下，由现代性发展造成的人与自身之间的疏离，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虚无主义危机，使人们由于普遍缺失信仰而处于一种漫无目的的生存状态。

施特劳斯从政治与宗教构成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视域这个界定出发，发出“何谓值得拥有的生活”的反思，构成哲学基本任务的宣言。他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进行重新定义。一方面，“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意见的尝试”。^②在严格意义上，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的哲学理解，要同政治理论、政治神学、政治科学等相区别。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也是基于对政治事物本性的真正了解展开“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的构建尝试。政治哲学理应属于哲学领域，其终极目标自然是缔造一种更好的政治生活。但是，现代政治哲学没能将人们引向美好的政治生活和完善的政治社会，反而威胁到了政治社会的构成基础。施特劳斯致力于从西方古典哲学视域对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开展批判和审思。古典政治哲学有关理想社会的最佳制度设计，可以说“不仅是最可欲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或有可能的，亦就是说，在尘世成为可能。它之所以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合于自然”。^③人只要保持对这一标准的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就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社会必须向古典政治哲学回归，以消除西方现代哲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返回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步在于以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前科学的眼光”即公民和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政治，而不是以现代社会和现代哲学所谓“中立的观察家的政治科学的眼光”观察政治。

现代政治哲学放弃了古典政治哲学在德性层面有关价值至善的金科玉律，落入奉德性的功利技术为圭臬的窠臼，哲学成为纯粹服务于“现实”的政治工具。美好的标准不再具有先在尺度，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凸显当下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当性，“人为自然立法”取代物之自然的必然性法则。一种超越历史主义的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标准就这样被现代政治哲学所遮蔽甚至消解了。

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揭示

除了施特劳斯提出向古典主义复归的方案，美好生活建构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线索。16世纪，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莫尔写出了《乌托邦》一书，通过聚焦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民政治参与、分配制度等政治生活实践，揭示了美好生活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联动关系，第一次完整地描绘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生活图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开始出现并随之壮大，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对立关系的政治哲学也不断深入发展。这说明如果不从社会制度层面进行革命性变革，孵化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彻底解放，社会主义难以从理论变为现实。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美好生活确立了理论分析的基本建制。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样态更迭的亲历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虽然未对“美好生活”作出正式的理论诠释，但通过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

① [德] 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赵强、孙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 [美]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详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③ [美]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0页。

国家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危及人民生活现实的考察，对饱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起义屡遭镇压的原因揭露，可以看出其已经对依靠谁建立何种制度和何种生活产生了思考，显示出了独到的批判视角和浓厚的现实关怀。基于唯物史观以及《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究了社会制度及其内在更替，第一次将实现美好生活置于科学的理论基础上，也第一次将美好生活的达成与真正的科学社会制度关联起来。从宏观视角看，唯物史观立足现代社会的科学分析将蕴含其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基本矛盾运动呈现出来，为人类界定了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历史运行基本规律的方法，确立了美好生活的达成路径、理论基石和未来走向。从微观视角看，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货币、资本对人的奴役，为人类透析现代性危机实质和统筹规划未来图景提供了形象比照。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视域中，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将资本逻辑导致的异化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两者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暴露在大众面前，凸显现代社会中过渡的、历史的、对立的一面遮蔽了永恒的、自然的、和谐的一面的悖论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依托唯物史观破解西方政治哲学家鼓吹的永恒“理性”神话，确立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普遍历史”范式。他们承认一切事物运动的普遍性，运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要素所形成的矛盾，矛盾又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被马克思认为是自然、历史和思想的普遍规律和发展模式。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物质生产方式更替引起的辩证发展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的更替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不断激化中出现。根据以往存在的历史事实，人类历史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或言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成为支配社会的主导力量。历史依循规律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其越发展，矛盾就愈加尖锐，两个对立阶级冲突的不断恶化，为新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条件。无产阶级将开辟消除阶级、消灭压迫的人类新纪元。

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更将彻底达成全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通过革命获得政权后，将逐步消灭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分化，最终用自由人联合体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状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种社会样态中，人作为一种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存在，其物质生活因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得到充分满足，精神生活也在对科学文化的不断追求中彰显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完美社会以“各尽其能、按需分配”为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忠诚、智慧、廉洁、彼此无私奉献的朋友间的关系，社会是亿万朋友的社会，所有人都温暖、和睦地相处。可见，世俗的欲望、秩序、正义等在美好社会中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可以说这是针对普罗大众所提出的设想。

科学社会主义为美好生活的践行提供了科学论证。究其缘由，关键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永恒的历史普遍规律”的理论呈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实践样态。马克思恩格斯从最早聚焦于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和各国内部或各国之间革命路径的预测，转向对现实的具体的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异化现实的深切关注。这种由宏观叙事到关注现实的人的思维转换，是一种从过去单纯的政治关切转向一种普遍的政治哲学思考。在对经济史料、政治史料和文化史料等文献资料的梳理中，马克思依托商品这个特殊媒介展开了对现代性危机的研究，关注个人生存体验和美好生活，最终给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社会生活图景的历史解读。可见，马克思始终不渝致力于追求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生命原则，从不同视角、不同基础、不同实践中呈现出他未完成的政治哲学革命事业的延续。正是在持续追寻持久普遍的美好生活图景中，在持续批判现实生活实践中，在持续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在发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中寻找美好生活的建构路径，进而得出“两个必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的科学论断。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向人类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人类必然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不断推进建构和夯实美好生活的进程。

在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美好生活政治实践中，曲折与成功并存。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一次向人类证明了美好生活建构的可能性。然而，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也证明，建构美好生活的基础即社会制度建设不能采用固定模式，而应扎根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更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敢于开展革命，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要建构真正属于全人类的美好生活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四、美好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生活作为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深刻汲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首要之义，彰显党以人民性立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成功开辟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源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完善与创新，为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构筑了全面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尽管促使中国不断改革创新的因素很多，比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等，但最根本、最核心的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转换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精神动能，推动中国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兼具世界意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不断完善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制度与人民美好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视为其理论展开的重要线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他们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美好生活与相应的制度设置连接在一起，构架起人的发展逻辑、美好生活建构逻辑、社会制度演进逻辑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呈现了社会制度保障下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①让我们把视野拉回中国现实。现代中国制度建构历程与小康社会的建成历程以及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一种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百余年历程，内含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探索，呈现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就是不断回应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组织动员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现实执行能力等的集成，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换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同建设人民美好生活是同向的。制度供给是改善民生、满足人民多样需求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构筑并非一蹴而就，目前在一些领域还面临着内部供给不足甚至失衡的局面。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要在完善分配制度、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没有公平、公正、有效的制度，就不可能切实保障人民美好生活。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激发和释放制度体系动力，使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有益保障。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时代新征程建构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前提。更加美好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不懈奋斗与探索的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取决于能够带领人民群众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引领中国人民前进和民族进步。历史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从谋求独立、到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建设更加美好生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2页。

卷和实践图景。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就有了领导主体，就有了带领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人民追求更好生活的领导力量。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视为“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实现美好生活。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写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过去百年中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为了建设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决定的，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和价值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③是改革开放 40 余年成功的经验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与人民永葆密切联系的历史脉络做出了深切回顾。他发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④的伟大号召。党的二十大更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提出“三个务必”，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把握时代特征的政治清醒，把“自我革命”作为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指明了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新时代新征程人民建设美好生活提供了根本途径。现代化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特有的历史现象，而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建设更加美好的必经之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 [XX—1262] 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⑤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⑥可见，现代化最初依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但资本主义不可与现代化相等同，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现代化的历史性载体。资本逻辑使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实现，而资本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目标、价值和结果之间的悖论，形成了国强必霸和人为物制的困境。与西方现代化的发起者依赖剥削和压迫、对外依赖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现代化坚持人本逻辑，践行“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⑦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做了系统阐述。^⑧从中国特色来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难题，也蕴藏着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⑨超越资本主义少数人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大力发展战略先进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旨在破解“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⑩的霸权模式，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设全体人民美好的根本途径，人的解放是其终极目标。从本质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我们对内始终坚持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181 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2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82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5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03 页。

⑦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94 页。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2-24 页。

⑨ 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5 页。

人民至上，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对外不走霸权主义和扩张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承载着社会主义的命运，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它的成功有助于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推动世界走向共同发展，朝着建设更加合理、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迈进。

“美好生活”业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要件。“美好生活”契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中国人民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积极主动联动世界各国，重视建设美好世界的责任与担当。总之，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和政治智慧，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中，在世界舞台生动诠释百年大党胸怀天下的国际形象与大党风范。

五、结语

美好生活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其理论之旅也呈现出一幅生动多彩的思想图景。从美好生活建构史解码人类生存与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在实践中逐步勾勒美好生活蓝图，实现美好生活目标，提升自身美好品行，从而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就当下而言，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构建美好生活，相比施特劳斯提出的回到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似乎更具实用性。实践证明，我们还需立足实情，依靠自身奋斗去开辟通向美好生活的具体路径。站在跨越百年的交汇点上，面对时代叩问和命运考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实际行动中实现对现实矛盾的解决和超越，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汇聚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蓬勃力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从而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美好生活的建构不断变成现实。

责任编辑：王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7页。

学术聚焦

·阐释学研究·

论休谟式随附之为一种强制阐释^{*}

吴小安

[摘要]形而上学家试图对于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之为何提供一种“形而上学解释”，在力求其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相拟合的同时，也会援引科学实践与科学结论来作为自己的预设或者佐证自己的立场。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强制阐释的框架内来审视，休谟式随附是一种强制（动机）阐释，其错误根源在于认为一种好的理论必须是“还原”的。通过因果功能主义径路的指引，人们可以探寻哲学研究的另一种可能。

[关键词]强制阐释 休谟式随附 最佳系统解释 还原

〔中图分类号〕B089.2；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009-10

一、导论

我们要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对于这个冲动的呼应。在哲学家们看来，尽管在细节上理解和解决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是重要的，比如，发现吸烟导致肺癌的发生，货币供给过多导致通货膨胀，但给出一个对于这个世界的总体的理解与宏观的刻画同样也是必需的。比如，黑格尔以辩证逻辑（方法）为基础，并以“万物皆备于我”的豪情，把艺术、宗教、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自然哲学一体纳入其框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当代哲学家已经很少有这样体系化的冲动了，除了知识爆炸所带来的“生也有涯而知无涯”的无奈，更多是体会到在这样一个多样的世界，一种哲学的万有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工程之庞大和实现之渺茫。而本文所讨论的休谟式随附工程则是对体系化哲学的一次勇敢复归和尝试。

张江教授有感于当代西方文论和文本批评中，“对文学文本的强制阐释极为普遍，甚至为常态”，提出了强制阐释问题。他讨论了强制阐释的理论源起、根本动力、具体表现和基础性错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理性阐释的新思考。这个问题“在人文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同样普遍存在”，在哲学领域，以哲学家自我立场强制阐释经典，譬如，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存在论阐释。^①形而上学要理解实在（reality），力图构建一种与科学解释并驾齐驱的形而上学解释。作为一名形而上学的研究者，通过阅读对强制阐释问题的诊断，认识到其所指出的强制阐释的诸征象与弊病，在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并不鲜见。为什么一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实际因果的结构方程径路研究”（21FZXB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实际因果前沿问题研究”（21XJC720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逻辑哲学重大前沿问题研究”（17ZDA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小安，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北工业大学陕西省舆情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西安，710072）。

①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形而上学的解释有沦为强制阐释的隐忧？它有哪些方面和强制阐释的症状契合呢？本文将以形而上学的休谟式随附（Humean Supervenience）工程为例来做系统的讨论。

二、休谟式随附

休谟式随附是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毕生所致力捍卫与完成的一个形而上学工程，他主张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真都随附于局部性质的时空分布。但如刘易斯自己所说，他并不是先知先觉奠定了这个框架，而是后见之明认识到，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休谟式随附”这个工程来进行的。^①毫不夸张地说，休谟式随附工程是整个20世纪下半叶最具野心也最具影响力的形而上学工程。在21世纪初，刘易斯本人去世之后，其学说的影响力不减反增。^②在他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很多领域都发展成了一个哲学“产业”，比如关于实际因果、自然律、几率的讨论。

刘易斯在1980年首次提出休谟式随附，^③相关文章后来重印于他1986年的《哲学论文集II》中。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潜在的形而上学问题。一个宽泛的休谟主义学说（如果可能的话，我非常愿意相信这一点）认为关于世界的所有事实都是特定的事实或者它们的组合。这不必被视为一个可分析性学说，因为特定事实的某些组合无法以任何有穷的方式被刻画。最好更把它看作是一个随附性的学说。^④

首先，“随附”是这样一种关系：“随附性论题是对独立变化的一种否认。……说这个东西随附于那个东西就是说：没有那个东西的相关差异，就没有这个东西的相关差异。”^⑤如果有两个可能世界，在所有关于具体事实方面它们完美一致，那么在所有其他方面，包括模态性质、自然律、因果联系、几率等等，它们也完美一致。即如果这两个可能世界，它们在模态的事实上有差别，那么必然是因为它们在具体事实上有差别。有时，休谟式随附被认为是一种本体论依赖关系，揭示非基础事实和基础事实之间的依赖关系，非基础的事实可以被基础的事实完备地解释，或者非基础事实之为真是凭借（in virtue of）基础事实的真。

其次，可以通过像素网格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随附关系：“想象一个由百万个小点——这些小点可以理解为像素——组成的网格，每个点都可以变亮或变暗。当有些是亮的，有些是暗的，它们形成了一幅充满了有趣且内在的格式塔属性的图像。”^⑥在还原主义者看来，图像的确真实存在，而且也确实具有这些格式塔属性。图像和属性可以还原为明暗像素的排列组合，它们并没有超越于像素之上，它们也不会确定任何像素并不确定为真的东西。

最后，刘易斯关于“休谟式随附”最为具体且经典的表述如下：

休谟式随附是以否定必然性联系的那个伟大人物命名，这个学说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定域的具体事实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马赛克图像（但是并不认为这些定域事实是心灵事实）。我们有几何学：它是点之间时空距离这一外在关系的一个系统。这些点或许就是时空点（points of spacetime）本身，或许是点状大小的物质（point-sized bits of matter），或许是以太（aether），或许是某种场，或者两

①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3.

②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梅剑华教授告诉笔者，他们在2008年邀请当时已经是分析哲学领域的顶尖哲学家，纽约大学的大卫·查尔莫斯教授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学。在交流中，查尔莫斯告诉梅老师，他自己就是通过反复地阅读刘易斯的著作来获得工作的灵感（inspiration），刘易斯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哲学家。

③ David Lewis, “A Subjectivist’s Guide to Objective Chance”, IFS: Conditionals, Belief, Decision, Chance and Time, W. L. Harper, G. A. Pearce, R. Stalnaker, ed., Dordrecht: D. Reidel, 1980, pp.267-297.

④ David Lewis, “A Subjectivist’s Guide to Objective Chance”, David Lewis, e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1.

⑤ David Lewis, “New Work for a Theory of Universals”, David Lewis, ed., *Papers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9.

⑥ David Lewis, “Reduction of Mind”, David Lewis, ed., *Papers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94.

者都有。在这些点上我们有定域性质 (local qualities): 完美自然的 (perfectly natural) 内在属性 (intrinsic properties), 且它们不需要比点更大就可以被例示。总之: 我们有一个性质的排列组合 (arrangement), 仅此而已。没有性质排列组合上的差异就不存在差异。所有其他一切都随附于它。^① 刘易斯把世界设想为一个由事件所组成的大马赛克, 也称为“休谟式马赛克” (Humean Mosaic), 事件之间只是出于偶然而并置在一起, 它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性联系。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休谟式随附”要假“休谟”之名, 因为休谟同样否认因果观念是一种必然性观念, 而把它还原为事件的规则性。

但两者之间又有许多不同。一方面, 休谟所支持的“随附性”立场在形式上和支持理由上都和刘易斯不一样。^② 对于休谟而言, 基础属性是例示在知觉感官中的那类印象, 所有真判断都随附于这类属性的分布。因此, 关于一类印象与另一类印象在律则上彼此联系的判断, 要么严格为假, 要么必须被解释为随附于基础属性的分布。刘易斯捍卫休谟式随附的理由却不一样。他是为了捍卫一种物理主义的立场, 认为对于任何精神上的东西, 都有足以使其存在的物理条件, 以及足以使其不存在的物理条件。但有些哲学主张认为, “天上地下存在着比物理学梦想更多的东西”, 而刘易斯试图通过休谟式随附来反驳上述立场。另一方面, 休谟式随附是一个哲学工程, 它不只涵盖因果, 还试图一体地把自然律、几率、反事实依赖、倾向这些模态概念也还原为“休谟式马赛克”。

关于休谟式随附, 还有两点需要澄清。第一, “这些点或许就是时空点本身, 或许是点状大小的物质, 或许是以太, 或许是某种场, 或者两者都有”这句话中的点,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物理学的基本粒子, 比如电子或者夸克, 它们没有空间上的外延。哪怕是今天的物理学, 对于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到底是什么, 也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是刘易斯所认为的点状的物质, 或是坍缩的波函数, 或是量子比特海的变形, 或是场的量子激发? 物理学家对此各执一词, 又莫衷一是。

第二, 什么是内在属性 (intrinsic properties)? 什么是完美自然属性 (perfectly natural properties)? 什么叫完美自然的内在属性? 完美就意味着有不完美, 这就不得不提到刘易斯所持有的一种形而上学预设: 属性和关系有形而上学的等级差别, 一个属性和关系处于哪一个层级取决于其“自然的” (natural) 程度。所以, 某些属性比其他属性更自然, 且存在一类优等的属性, 它们在自然的关节上切分自然。它们使拥有它们的对象之间具有客观的相似性, 并且使拥有它们与缺乏它们的事物之间存在客观的差异:

共有 (完美自然属性) 产生定性的相似性, 它们对自然做庖丁式切分 (carve at the joints), 它们是内在的, 它们是高度具体的, 且就事实本身而言, 它们例示的集合并不完全是驳杂的, 恰好就存在足够多的它们, 于是可以完备地且非一冗余地刻画事物。物理学有它一个关于“根本物理属性”的不长清单: 粒子的电荷和质量, 还有它们所谓的“自旋”“颜色”和“味”, 也许还有更多的一些基础属性未被发现。^③

至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究竟有哪些完美自然属性 (完美自然属性和关系就是基础物理属性和关系), 那就是物理学的工作了。刘易斯乐观地指出, 尽管不能先验地确定, 但“当今的物理学已经朝着完整和正确的清单走了很长一段路”。^④ 随着科学的进步, 它将会把我们这个世界中所有这些属性都罗列出来, 也许正如之前所猜测的那样, 它们就是质量、电荷、电磁场值、引力场值等等。

总体上, 休谟式随附可以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论题: 第一个论题, 真随附于存在 (truth supervenes on being), 即任一个世界中的所有真都随附于那个世界中的完美自然属性和关系的分布; 第二个论题, 我们这个世界中的完美自然属性和关系是点状对象 (point-sized objects) 的内在属性和时空关系。在刘易

^① David 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ix-x.

^② Barry Loewer, “Humean Supervenience”, John W. Carroll, ed., *Readings on Laws of Natur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pp.176-206.

^③ David Lewis,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86, p.60.

^④ David Lewis, “Reduction of Mind”, David Lewis, ed., *Papers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92.

斯看来，第一个问题是必然的和先验的，第二个问题就算为真也是偶然的，即也许存在一个非一休谟式的可能世界，它所包含的事实并不随附于那个世界中休谟式属性例示的马赛克。例如，在一个非一休谟式世界中，意识也许被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所例示，而且不会被任何小于这个复杂有机体的东西所例示，并且在这个世界，休谟式属性例示的整体性在形而上学上并不足以实现上述意识的例示。于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意识就是一种涌现的且非休谟式的属性。休谟式随附则主张，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中并不包含上述这样的属性。

既然这个世界是由事实所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偶然的马赛克，即这些事实并置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其背后有任何深刻的、必然的联系，那么怎么来解释自然律呢？刘易斯主张，如果真的存在自然律，那么这些自然律只是事实的马赛克中那些偶然且幸运的规则罢了。至于哪些规则是自然律，则由完美自然属性所例示的总体模式来决定。他提出自然律的最佳一系统分析。

自然律的最佳系统解释可以追溯到拉姆齐（Ramsey）和穆勒（Mill）的一些零星论述。比如，拉姆齐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一切，并在一个演绎系统中尽可能简洁地把它组织起来，那么在这个演绎系统中，那些被我们看作公理的命题，它们的后承就是自然律。”^①

刘易斯并没有专篇讨论过自然律的最佳系统解释，其立场主要散布于一些文章和书中。^{②③④}要很好地理解自然律最佳系统解释，首先得要理解什么是一个演绎系统，而这就需要一点谓词逻辑的准备才行。^⑤首先，假设有一个语言 \mathcal{L} ，它由两部分组成： \mathcal{L} - 符号和 \mathcal{L} - 公式。 \mathcal{L} - 符号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逻辑符号，比如个体变量、命题连接词、左右括号和量词符号；一部分是非逻辑符号，比如个体常量、 n 元的函数符号和关系符号。前者必不可少，而后者则可有可无，由具体的表征对象来决定。在刘易斯最佳系统的设想中，则至少需要两类关系符号（即谓词），不妨将其设为： P 和 Q 。根据 \mathcal{L} - 符号就可以定义 \mathcal{L} - 项，即由个体变量、个体常项以及 n 元的函数符号来递归构建，并在 \mathcal{L} - 项的基础上递归地定义 \mathcal{L} - 公式。

其次，上述所得到的只是符合一定规则的符号串，其本身没有意义和真值。为了让 \mathcal{L} - 公式有确定真值，我们需要对应于 \mathcal{L} - 语言的一个模型，来给其中的非逻辑符号一个解释。比如，给 P 一个解释，让它表示“完美自然属性”的原子谓词；给 Q 一个解释，让它成为表示点之间距离的时空谓词。这个模型可以形式化地表达为一个有序对 $\mathfrak{A} = \langle A, I \rangle$ ， A 为论域，而 I 为解释函数。

最后，为了确定所有 \mathcal{L} - 项和 \mathcal{L} - 公式的值，还需要确定个体变量在论域 A 中的取值，即要在模型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个体变量的取值，所以引入赋值 $\sigma = \langle \mathfrak{A}, J \rangle$ ，其中 J 是从个体变量集到论域 A 的函数。在赋值的基础上，就可以确定所有 \mathcal{L} - 公式（也称为合式公式）的真值（给公式一个赋值，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真值的句子，不妨把那些为真的句子称为 \mathcal{L} - 真句子）。

在刘易斯看来，所有 \mathcal{L} - 真句子合在一起，就确切说明了时空的几何结构和在每一个点所例示的基础属性。根据休谟式随附，所有的真都随附于 \mathcal{L} - 真句子所构成的总体性。 \mathcal{L} - 中的一个演绎系统，由公理和推演规则构成，其中公理由 \mathcal{L} - 真句子构成。不同的演绎系统有不同的“力度”（strength），它们可以是等价的，也可以是不等价的，以及有不同的蕴涵关系。一个有力度的演绎系统可以涵盖更多其他的系统，但演绎系统本身的力量也受制于其语言。

首先，不同的语言意味着对于这个世界不同的表征和切分，它们有优劣之别，因为语言之间的主要差别来自非逻辑符号，所以它们的孰优孰劣也由非逻辑符号的数量，以及模型对于非逻辑符号的解释来

^① Frank Plumpton Ramsey,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0.

^② David Lewis,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③ David Lewis, “New Work for a Theory of Universals”, David Lewis, ed., *Papers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⑤ 徐明编：《符号逻辑讲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决定。其次，同一语言中不同的真句子集合构成了不同的公理集，但是公理集之间也有优劣之别，有些公理集可以推导出其他公理集，或者两个等价的公理集中，一个相较于另一个有更少的 L -公式。最后，我们靠什么来判定演绎系统的优劣呢？刘易斯给出了自己的简洁性（simplicity）标准和力度的标准：

取定理为真的所有演绎系统。某些系统相较于其他系统更简洁更系统化，某些系统相较于其他更强，信息更丰富。这些优点之间相互竞争：一个信息量不丰富的系统可能是非常简洁的，多样特征的信息的一个非系统化的聚合也可以是信息非常丰富的。而最佳系统就是允许在简洁性和力度方面达到真所允许的一个好的平衡。一个规则是一个自然律当且仅当它是最佳系统的一个定理。^①

其中简洁性是对应于一个语言的，是这个语言中的一个句子所表达命题的客观属性。刘易斯主张测度一个真的简洁性方法：通过测度这个真在一个所有谓词都表示的是完美自然属性的语言中有多容易表述。比如，某些数学命题客观上就比其他命题简洁。那么怎么来测度简洁性呢？这要通过微分方程的阶数、参数的数目，以及公理合取起来的长度等等。一个句子力度的测度则基于这个句子的信息丰富性，而一个句子的信息丰富性又取决于它所排除的可能性的数目。

考虑万有引力定律，“两个对象之间的引力，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真就相当简洁且力度很大，告诉了我们不同对象之间力的关系，既能解释苹果的下落，也能解释天体的运行。自然律就是这些简洁且有力度的真。比如，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前者从观测到的非连续性的原子谱线出发，引入矩阵这个数学工具而建立起来；而后者则是强调电子作为一种波所具有的连续性，通过波动方程刻画其运动而建立起来。尽管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和直觉大相径庭，但是最终证明，它们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即在“力度”上它们是一样的。但是相较于神秘难解的“矩阵”，那上接古典理论又颇具形象化且简洁易懂的波动力学更广为人们所接受。另外，并不是获胜集合（或最佳系统）中的所有真，而只是其概括（generalisations）才是自然律。因此，即使最好的系统包含有关于大爆炸或其直接后果的特定事实，如早期宇宙是低熵状态，但在刘易斯看来，这些事实并不是自然律。

对自然律最佳系统解释有很多批评。首先，简洁性和力度这样的概念都不能是真正客观的。其次，这些规则并不能解释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系统同等“最佳”的情形。简洁性、力度和平衡的标准来自我们自身的标准，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旨趣和意图相关，但显然不足以确定这些标准本身的合法性。比如，鉴于主观标准本身的多样性，我们对“美”的标准众口难调。完全可以设想一些理念论者对主观标准的一种反驳：如果不喜欢某些自然律，可以通过积极思想（positive thinking）来强行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以此，总是可以让所得到的自然律不同于现在的自然律。

刘易斯认为，可以固化的思维和行为（rigidification）来解决上述责难：“当考虑设使改变我们的思维，自然律将会是什么时，我们并没有使用那些假定性的，关于简洁性、力度和平衡的新标准，使用的就是实际的当前标准”。^②即当你在设想另一种简洁性标准的时候，你还是以当前这个标准为基础来修正的，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跳脱这个标准。后来刘易斯并不满足于这个标准，上述的反驳并没有去正面地回应问题，而只是质疑了提出这个问题的合法性。

在刘易斯看来，只要设定自然对我们足够友善（nature is kind to us），那么就可以回应上述理念论者的责难了。因为关于简洁性、力度和平衡的标准，只部分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也许在简洁性的某些方面，它们之间的兑换率（exchange rate）就是心理学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③认为一个真比另一个真更简洁，不只是因为我们恰巧这么认为，而是因为自然就是这么设定的，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一个线性函数比一个四阶函数或者阶梯函数更简洁。以此，刘易斯最终也回应了多个演绎系统同等最佳的情形。在自然是友善的前提之下，最佳系统将会是鲁棒地最佳（robustly best），这意味着它必然

①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8.

②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9.

③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9.

是最佳，不管在任何简洁性、力度和平衡的标准之下。

当然，上述所有的回答和论证都建立在“自然是友善的”预设之上。为了让这个论证有意义，需要给这个预设以坚实的佐证，就像要证明没有一个“很糟糕的钟表匠”，以及“预定和谐”背后有一个上帝一样，那又是另外一个困难的问题了。显然，刘易斯给不出充足的论证，他只能辩解说：“我们并不能确保自然以此方式友善，但也没有证据说它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合理的期望”，而且既然目前为止，这些标准通行可用，且效果显然，那么“我的建议是，直到问题实际发生之前，我们都不要担心它之为问题”。^①

有了上述准备，即这个世界是由定域的具体事实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的马赛克，以及自然律和几率还原为休漠式马赛克，接下来刘易斯用数十年的时间把休漠式随附工程逐渐搭建和完善起来。他把反事实还原为自然律和具体事实；把事件还原为时空域的一个属性；把因果还原为事件之间反事实依赖的传递闭包；把倾向还原为反事实依赖；把知觉还原为倾向和因果；还提出因果的决策理论，即一个潜在的行动者通过判定他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结果来判定他的行动，以此把行动还原为因果和几率；把历时间持存（*persistence through time*）和解释还原为因果；把心灵内容还原为倾向和因果；把语言内容还原为心灵内容；把价值还原为心灵状态；甚至关于数学哲学的讨论，在其《集合的部分》（“*Parts of Classes*”）^②一文中，也把集合论还原为整分论（即关于“整体—部分”关系的理论）。休漠式随附的大厦就这样慢慢建立了起来（参见图1）。

休谟式随附自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在反驳和自我辩护中循环。作为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工程，它自有其哲学的魅力，对此，有人信心不移地奉持，有人斩钉截铁地反对，^④也有人在为着理论的自治做苦心的修补。接下来我们将在“强制阐释”的框架之内来重新审视它，但在此之前，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强制阐释？

三、强制阐释之为“强制”

一般而言，我们会把阐释学局限为在文论和文本批评中所广为讨论的一种解释研究，对经典典籍的考订、疏证以及义理的剖析等。但强制阐释作为一种阐释方式或方法，却不仅仅存在于人文学科中，在社会科学诸领域甚至也并不鲜见。张江教授指出，强制阐释的表现在于“背离确定对象，言说与对象无关的话语，由此及彼，几无关联，不过是借对象上手，顾左右而言他，完全失去对此对象阐释的价值与意义”。^⑤他特别举了海德格尔对梵高名作《一双鞋子》的阐释来说明，海德格尔并不是真要阐释梵高的画作，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及“借鞋子阐释自我，阐释他存在主义的哲学”。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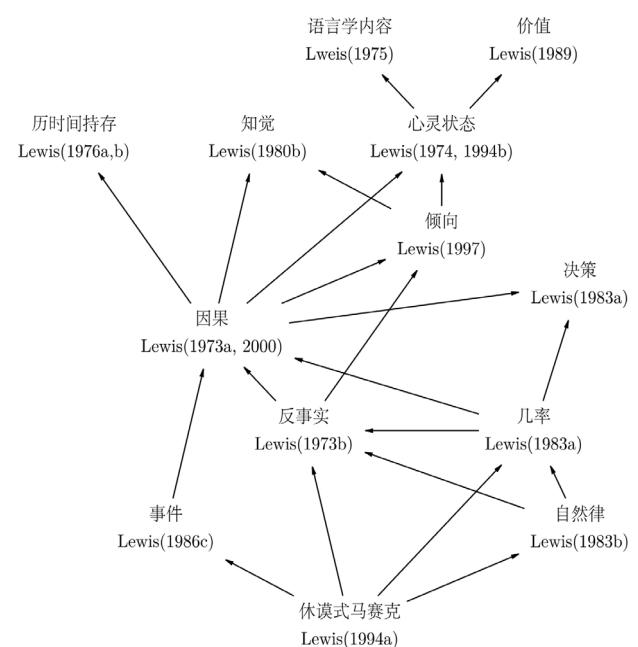


图 1 休谟式随附工程图 (参考了希区柯克的图, 略有修改)^③

①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9.

② David Lewis, "Parts of Classes", *Mind*, vol.100, no.3, 1991, pp.394-397.

^③ Christopher Hitchcock, "Lewis on Causation", *A Companion to David Lewis*, Barry Loewer, J inathan Schaffer, eds.,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2015, p.298.

^④ Jonathan Schaffer, "Is There a Fundamental Level?", *Nous*, vol.37, no.3, 2003, pp.498-517.

⑤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自己的阐释，海德格尔自有其辩护，他区分了解释和阐释，主张解释是“固守于文本”，阐释则“超越文本”，强制阐释即是“以阐释者的前置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作符合论者意图的阐释”。而任何的阐述都是一个阐释者的阐释，任何阐释者都必然受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境遇和教化影响，导致其必然具有“前置立场”，必然会“迁移了确定对象，并将一己之意强加于对象”。^①比如，白居易在创作《琵琶行》的时候，有其主观的情怀和寄托，合法阐释也许应该是除了对长安倡女个人际遇的同情，更多是对个人“转徙江湖”命运的感喟。但后世之人也许会进一步将其强制阐释为对封建吏治腐败的愤懑，对皇权体制埋没人才的控诉。至少在海德格尔看来，后一种阐释自然不可避免，甚至“旧瓶新酒”，自有其“创造性”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张江教授认为，哪怕是文本，亦有其客观的“话语”。他以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来解释何为“前见”（前结构，先入之见），以及其如何影响理解和阐释，并最终产生“客观结果”。具体而言，他区分了“期望”和“动机”。他认为“期望”对应着前件，“是一种可变化的心理状态，是在有关经验或内在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结果的预测性认识”，会“隐蔽地、非意识地、自动地发生作用”，它更多是一种结果寄托，有“转移和变化的可能”；但是“动机”就不同，它对应着海德格尔所谓的“前设”或者“前把握”，有其“指向性目标”，为了实现和达到这个目标“可以蔑视一切规则和约束，可以毁灭以至重塑对象，使无关对象成为目标对象”，^②由“虚假相关”的“寻求”变成了“制造”。海德格尔对梵高鞋子的阐释就是一种动机阐述，即强制阐释。张江教授所反对的是以动机作为其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动机阐释”，而不是“期望阐释”。

在《再论强制阐释》的第三部分，张江教授指出了强制阐释的基础性根源：“偏好部分，肢解整体”。尽管在阐释学的理论中，大家都不否认整体性原则，海德格尔的诗歌理论同样认同整体对于部分的统辖，但阐释的过程本身却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这是一种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小循环。而在张江教授看来则不止于此，它更是“当下语境、历史传统和阐释主体”之间的大循环（参见图2）。正是在这样一种彼此激荡之下，“做出为阐释共同体能够一致接受的整体性阐释，经由公共理性的考验和确证，铸造新的经典，进入人类知识体系”。^③在此意义上，一种“客观的”阐释才成为了可能。

四、休谟式随附之为“强制阐释”

阐释尽管是个循环，但亦有其起点。作为意义承载者的“文本”即是其起点。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文本”，是对其理解和阐释的起点。同样地，形而上学的起点是客观的实在本身，要对它给出一个形而上学的解释。正如张江教授提到的阐释循环三要素：历史传统、当下语境、阐释主体，^④形而上学的解释同样有其对应的三要素：还原论、基础物理学、科学实践和日常直觉。哲学家是“自然”的读者，试图从其有“辉煌历史的”工具箱里找到工具来“庖丁式切分”自然[如还原、奠基（grounding）]，给自然一个解释。但是，哲学的解释也不能无视科学的正统和典范地位，毕竟科学是经过“公共理性的考验和确证”的，也不能与科学的认识论和日常的直觉偏离太多。休谟式随附也正是在这三种要素的对流激荡之中产生的。它显然没有实现三个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而是为了贯彻“还原”的执念，“违反阐释逻辑规则和阐释伦理”，对“基础物理学、科学实践和日常直觉”都有所悖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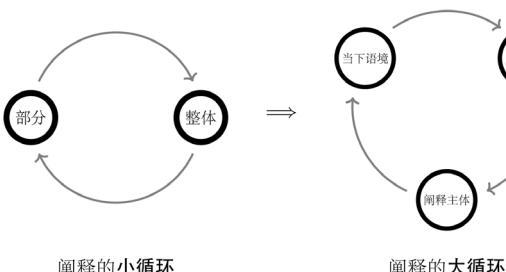


图2 从阐释的小循环到大循环

①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②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③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④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首先，休谟式随附的合法性奠基于要和基础物理学相互拟合，至少是不冲突的。刘易斯相信，物理学并没有承认有非一休谟式的自然律和因果，尽管也没有确凿无疑否定，但物理学家们会谈到某些规则性，比如薛定谔方程，表达了自然律，或者声称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休谟式随附工程就是要证明这些模态概念随附于休谟式马赛克。所以刘易斯主张一种还原论，并认为这种还原论至少和基础物理学的结论是不冲突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实恰恰相反。

休谟式随附是受经典物理学的启发而发展出来的，^① 但经典物理学的很多性质在量子力学中是不成立的，比如“定域性”，那么经典的非一定域性的例子，比如量子纠缠，就构成了对休谟式随附的挑战。一方面，因为量子力学的理论和实验都违反贝尔不等式，所以微观世界的“隐变量”不存在，两个自旋粒子构成的“纠缠态”说明了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这意味着，一对粒子的纠缠态并不随附于任一粒子的内在属性，即每个粒子各自的定域属性不能决定完整的量子态，更具体地说，不能决定两个粒子的演化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在量子力学看来，纠缠关系，而不是时空关系，是更为基础的关系。既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休谟式随附是错误的。刘易斯显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起初他给出了如下辩护：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当代量子力学对本体论的指导。首先，我必须看看它，当被荡涤了工具主义的浮华之后，并且敢于说一些不仅仅是关于指针读数的事情，而是关于世界的构成之后；当它被荡涤了双重思想的异常逻辑之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当它被荡涤了关于敏锐的头脑具有使事物跳跃的力量的超自然故事之后，它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在所有这些之后，它仍然主张非定域性，那么我将心甘情愿地服从这最佳的权威。^②

但量子理论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形成了我们对于微观世界理解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创造出高效的晶体管、微处理器、激光和光纤电缆。刘易斯最终也认识到从工具主义出发否定量子力学的本体论意义是不明智的，因此提出要重述休谟式随附，以拟合量子力学的必要：

但是如果我们将重心放在物理学上，我们显然知道，当代物理学早就已经不是经典物理学；比如，一个针锋相对的、受状态—空间中的波（waves in state-space）启发的图景也许会说，许多基本属性并不是在点上被例示，而是在点—元组（point-tuples）上被例示。^③

后来刘易斯又认识到，甚至休谟式随附和经典的物理学都并不相容：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甚至经典的电磁学都指出了休谟式随附的一个问题。

Robinson (1989) 问道：“向量场是局部性质的一个排列组合吗？”我曾说，性质是内在的（intrinsic）；这意味着在复制物之间永远不会有不同。我将会不假思索地说，两个东西可以是复制品，即使它们指向不同的方向。也许这最后一个看法需要再考虑，以使得以向量为值的量（vector-valued magnitudes）可以被看作内在属性。它们可以是其他什么东西呢？任何试图把它们重新理解为关系属性（relational properties）的努力似乎都相当地人为刻意。^④

为此，刘易斯进一步辩解，其理论更多是为了捍卫“休谟式随附（哲学上）的韧性（tenability），而不是它的真”，如果物理学证明休谟式随附是错的，他将不会感到难过。即刘易斯所要挑战的真正对象是这样一种非一休谟式的哲学立场，他认为像自然律、因果、几率这些模态概念并不随附于休谟式马赛克，而是决定这些休谟式事实。他主张自然律统摄着事件的演化，因果关系是宇宙的黏合剂或者水泥（cement）。^⑤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随之而来：一个已经被证明是错了的理论，我们还需要关心在哲学

①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4.

② David Lewi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xi.

③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4.

④ David Lewis, “Humean Supervenience Debugged”, *Mind*, vol.103, no.412, 1994, p.474.

⑤ John Leslie Mackie, *The Cement of the Universe: A Study of Cau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上对于它的那些反驳吗？

其次，休谟式随附讨论的关键一环是对自然律的刻画。刘易斯提出，自然律的最佳系统解释至少有两重目的：第一个目的，对在科学实践中自然律是如何产生的有所说明，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做选择时，实际使用了这些标准；第二个目的，本质上也是为休谟式随附的总体框架服务的，自然律可以还原为休谟式的马赛克。如果他对于自然律的刻画无法满足第一个目的，而又把还原视作一种“绝对命令”，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以“还原”为指向性目标的强制阐释？

对于第一个目的，尽管刘易斯给出了简洁性、力度和它们之间平衡的标准，但这并不能真正为科学家们实际上是如何推理出自然律作奠基，而只是满足了其理论的还原诉求和热望。一方面，自然律最佳系统理论是针对整个休谟式马赛克的一个系统化，即要求知晓在整个宇宙的生命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但显然“终有一死的”人只能认知到非常有限的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再构建其理论。另一方面，科学家推导出自然律的过程并不纯粹是从非模态事实到模态事实或者模态事实到非模态事实的推导。比如，考察一下薛定谔是如何推导出薛定谔方程的：他先是根据德布罗意物质波的启示，即物质粒子既然是波，那就应该有一个波动方程；然后，利用了经典力学的哈密顿—雅克比方程（这个方程不但可以描述粒子的运动，也可以描述光波的传播）；接着，再利用变分法和德布罗意—爱因斯坦公式，就可以推广它，建立起大名鼎鼎的“薛定谔方程”。薛定谔首先有其先验的模态预设（如哈密顿—雅克比方程、德布罗意—爱因斯坦公式），再结合物质粒子是波的事实，推出了一个模态事实，即薛定谔方程。

最后，契合直觉与满足休谟式随附之间存在着悖谬。刘易斯在因果理论中特别指出：“当我们的（关于实际因果的）判断是清晰的时候，一个因果的分析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是一种责任”。^①这意味着，如果他要给出一个因果分析，那么当把这个因果分析应用于日常情境时，得出拟合日常因果判断的结论才是这个因果分析的重中之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因果理论更多是满足其还原主义的热望。一方面，刘易斯通过反事实来定义因果。他先定义了实际事件之间的因果依赖，比如 c 和 e 是两个不同的可能事件，且 c 和 e 实际发生了， e 因果依赖于 c 当且仅当反事实“设使 c 不发生，那么 e 将不发生”为真。于是给出实际因果的定义，事件 c 是事件 e 的实际原因当且仅当 c 和 e 之间存在一条因果依赖链。总之，因果是反事实依赖的传递闭包。上述定义建立在事件基础之上，刘易斯把事件理解为可能时空域的类（classes of possible spatiotemporal regions）。另一方面，刘易斯给出了反事实的可能世界语义，^② 这种语义根据“可能世界之间的总体相似性”来陈述反事实的真值条件，而在自然律是决定论的世界中，其他世界相较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由自然律和具体事实的加权来判定。

上述关于因果定义和反事实语义的工作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通过自然律和具体事实之间的加权来判定世界之间的相似性，进而决定世界之间的接近性，并最终决定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是很奇怪的一种理论，从心理上来说不可信，同时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就算把因果还原为反事实是对的，我们日常的因果判断也不是这么来判定反事实的真值的，上述两个相似性标准的加权完全是哲学家的“奇思妙想”。另一方面，因果概念是刘易斯休谟式随附的枢纽概念，但是其所给出的因果定义并没有在后来对其他概念的分析中被提及和使用，比如决策理论和解释理论。并且，把因果还原为反事实也不符合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断的实践，比如在随机对照实验中，反事实情境的构建本身就包含着在先的、要去混杂（deconfounding）的因果设想。

总之，休谟式随附就是一种动机先行的强制阐述，它“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且将此意强加于文本”，不符合“冲撞、选择、共融、建构”的阐释大循环设想。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哲学家们笃定了还原的必要性，一切构建都是为了满足这个目标。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彻底的还原，才会给出对因

^① David Lewis, “Causation as Influence. Expanded Version”, John Collins, Ned Hall, Laurie Ann Paul, eds., *Causation and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p.80.

^② David Lewis, *Counterfactua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果、反事实和事件那么让人倍感费解的“形而上学解释”。在笔者看来，形而上学家们（包括刘易斯）对还原的意义和价值的强调可能建立在如下一种误解之上：为了让科学探索避免循环和倒退，获得可理解性，避免不清晰，必须得提供一种还原理论才行。

五、形而上学研究之再展望

哲学家们胸怀“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心，希望能够给出一个一体的框架再解释这个世界，但大多总是难免理想有余，而解释力不足，反例此起彼伏。为了捍卫框架本身，又要对理论做进一步的修正。而且就算解决了决定论情境下的问题，非决定论的问题又随之而起，陷入了“堑壕战”中，直到辩论双方都觉得意兴阑珊，也没有争出个定论。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构建一个还原理论不是哲学家们的使命，那么形而上学要何去何从？在笔者看来，詹姆斯·伍德沃德（James Woodward）因果研究的功能主义径路的主张，^{①②} 至少为哲学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工作范式。所谓功能主义的因果径路，就是探究人们使用因果和因果推理是服务于我们的哪些目的和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满足和实现了这些目的和目标，并以此作为判定和理解因果和因果推理的基础。比如，要探究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因果概念的合法性何在。在伍德沃德看来，概念分析不是探究这些问题的可行径路，一种颇具启发式的思路是，通过考察因果这个概念是与哪个概念相对照着使用来回答上述问题，基于这种对照研究，才能探究到这个概念要意图把哪些内容排除在外，以及当使用它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什么差异。比如，在特殊科学和常识语境中，因果概念是和仅仅相关（mere correlation）概念对照着使用的。当观测到两个变元 X 和 Y 之间的相关关系时，我们会探求这个关系是否可以用于操纵和控制的目的，如果可以，则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如果不可以，则它们之间是一种非因果的，以及仅仅相关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奠定了我们的能行策略（effective strategies），相关关系则不行。比如，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个药物是能治愈癌症，还是仅仅因为混杂因素而与康复相关，知道了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就可以让身患癌症的病人服药，而仅仅有相关关系则让患者服药不具有可行性。由此及彼，在哲学的讨论中，还原不应该成为根本目的，一种卓有成效的讨论应该是哲学问题与科学探究之间的砥砺循环才对。

当然，功能主义必然不会得到很多哲学家的认同，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投降主义”，是对人文主义光辉传统的一种背弃，是对霸权的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臣服。哲学亦有其自身之对象、方法和效用，相较于科学，有其方法论上的连续性，亦有其自主性。^③ 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哲学的自主性，只是认为一个宏观抽象且有意义的哲学讨论是不应该放弃对成功科学的细节理解的，否则总是难免落入强制阐释的窠臼。真正成功的学科都是海纳百川的，正如阐释学中对“前设”和“前见”的区分给予心理学的佐证，使得阐释问题的讨论和理解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

责任编辑：罗 莹

^① James Woodward, “A Functional Account of Causation; or, a Defense of the Legitimacy of Causal Thinking by Reference to the Only Standard That Matters—Usefulness (as Opposed to Metaphysics or Agreement with Intuitive Judgment)”,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81, no.5, 2014, pp.691-713.

^② James Woodward, *Causation with a Human Face: Normative Theory and Descriptive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③ 陈波：《哲学作为一项认知事业》，《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

哲 学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魏传光

[摘要]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值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

[关键词]平台资本主义 数据剥削 数据正义 数据共享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019-09

当美国哲学教授林奇在2006年提出“谁控制了信息和知识，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来加以扭曲”^①之后，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技术、资本与数据三股力量合流，凭借绝对统治权和压倒性资本优势创造出平台资本主义，并借助于同侪生产机制、数据自生长机制和生产性控制机制建构数据再生产体系。这使得比信息扭曲问题更需要警惕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平台资本主义化身“数据利维坦”，利用数据强权主宰着政治、经济、社会中的“数据他者”，人们不得不与数据同构，与资本同态。当数据不再被视为副产品，而是成为资本竭尽全力收集、存储与使用的关键资源，不仅具有统计性还具有生产性时，人类文明数据化变迁中悄然衍生出了数据剥削问题。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对劳动的剥削，交往资本主义依赖于对交往的剥削”，^②那么平台资本主义则依赖于对数据的剥削。

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生产技术革新，更要关注技术革新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数据剥削实质上是一种隐匿性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关涉到个体的合法权利和社会正义。因而，澄清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问题并在社会文明公共性建构中给予其正义批判，则成为时代新课题。这个课题的研究需要回应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说平台资本主义隐匿着数据剥削？二是数据剥削在何种意义上是非正义的？三是数据正义如何建构？本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从资本逻辑的视域对数据价值化进程中的生产组织形态、劳动方式进行研究，希冀透过数据剥削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魏传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① [美]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失控的真相》，赵亚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VII页。

② Jodi Dean, *Blog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p.4.

深层，对数据剥削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

一、平台资本主义隐匿性的数据剥削

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是最早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的学者，其目的就是用之探讨21世纪出现的数据生产、数据资本积累等数据价值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形态和劳动方式变迁，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新支点是如何进行资本运行和增殖的。简单来讲，平台资本主义是巨量数据存储、云计算、精进智能搜索算法等数字技术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产物，是资本通过数字平台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进行“提取和控制”，以实现数据增殖的经济模式。显而易见，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形态巨大发展，以及数字平台业务井喷出现为基础的。平台资本主义的一般性生产模式是数字平台通过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生成或收集大量原始数据，然后进行数据的分析、分类、清理，以及数据的一般化或标准化处理，形成可以直接被使用的数据产品或数字化服务。

与一些学者认为平台资本主义是“共享经济”“自营经济”，甚至是“数据共同体”“信息共同体”的判断不同，斯尔尼塞克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具有隐性剥削的特征；英国学者福克斯也同样认为，平台的物质生产性在于受众的劳动被剥削并用作为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安德烈亚斯·维特尔认为平台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剥削2.0”版。那么，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增殖是通过数据剥削完成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首先需要确定一种“剥削规范理论”。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依然有效，仍然可以作为大数据时代剥削问题的研究规范。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统治与剥削的制度加以理解的，资本是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之间以物的形式建立的社会关系，当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以及使用雇佣劳动，为了利润而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包含剥削的社会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就在于剥削——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既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概念，即指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是否是剥削性的，取决于导致该比率之出现的基本结构的性质以及那些控制着剩余劳动的人。”^①在马克思那里，剥削是否成立，不仅要看有无剩余价值，还要看是否具备以下三个要素。(a)占有：资本家对各生产要素的绝对控制和工人缺乏生产资料，形成了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b)强迫：工人为了维系自身以及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被迫同意资本家的霸权和控制，劳动力自愿交换工资仅是“现象”，是形式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不在于低工资，而在于强迫劳动。(c)异化：工人被迫把剩余产品转让给他人。剥削不在于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在于劳动异化。

毫无疑问，平台资本主义仍然是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价值建构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工生产、输出与创造数据，驱动着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商业增殖。除此之外，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增殖过程中，上述的三个要素是否存在呢？

第一，平台资本主义中平台资本是共享还是独占数据资源？斯尔尼塞克认为，“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②也就是说，数据是“石油”，这是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不断深入推进，数据构成数字时代经济活动基础要素的根本原因。但“数据石油”只有在“提取”“精炼”之后才能体现价值，这就要求对具体数据进行加工，其中首先要进行的加工就是数据资源化或“大数据化”。蓝江教授对此解释道：“数字化时代或者数字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将一切都数字化，转化为一个可以进入到云计算界面的数据”。^③可见，数据的资源化是数据资本化的前提，对于数据平台来讲，占

① [美] 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

② [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③ 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有的数据越多，用途越多，数据积累叠加产生的交叉联动效应越强。故此，具体数据聚集为大数据，数据才有可能成为有效资源和生产资料。数字劳工生产出来的数据进入平台，经过加工生产变成流量数据之后就会产生可观的利润。“只有数据平台在处理大量流动的数据、数据在快速流动时，利润和效率才最高。”^① 正是如此，在数据资本化的推动下，当前正在出现“新圈地运动”——“数字圈地运动”，各类资本平台对原始数据进行隐蔽的、悄无声息的掠夺。这点很像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②

由于平台价值体现在它收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上，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思维必然是垄断和排他逻辑，不仅要大规模地收集数据，而且要在平台竞争中进行独家数据垄断，形成赢家通吃的寡占市场。事实上，2010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以平台为中心实现数据垄断和快速增殖的现象，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母公司、脸书等平台公司利用数据优势、技术标准、专利法案构筑行业壁垒，锁定市场优势，不断扩大垄断规模。^③ 与此同时，最初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数字劳工和社会公众被排除在数据所有权之外，资本控制的平台既没有蜕变成社会基础设施，更没有成为“共享数据平台”，数字劳工的数据平权诉求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第二，平台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是强迫的还是自由的？我们知道，数字劳动逐渐替代传统劳动形态，成为维持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形式。与传统劳动形态不同，数字劳动是在数字生产方式下，一种囿于社交媒体或互联网领域的数据信息劳动范式，劳动主体主要是数字用户，劳动形式主要是生产数据—流量。^④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购买“劳动力”从而获得实际“劳动”；而在平台资本主义中，由于数字劳工是加入平台出卖劳动给需求用户的自由员工，资本直接购买“劳动”，因此平台资本主义并不承认与其具有雇佣关系，而认为他们是“自营劳工”。这样，平台与员工之间的劳动隶属关系被悬置，容易形成“自营劳工”与平台的关系是临时性的平台—用户关系的观念。

如果说具体数据是原材料，平台则是加工生产数据的工厂。海量的具体数据必须要借助一定的算力和算法，才能形成数据生产力。而数字平台尤其是资本雄厚的平台在规则、标准、算法、技术和流量分配等方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能够凭借技术及场景优势形成和积聚平台权力，实现大规模、高速度和高敏捷度的数据流动，使静态数据变成动态流量，并不断地在各种平台上流动和交换。所以，“自营劳工”仅仅具有选择加入或退出平台的自由，却没有脱离平台的自由。这一点与马克思所提出的雇佣劳动现象非常相似，那就是强迫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即产生数据的“自由”。如果说在传统资本主义中，雇佣劳动是被物质性身体暴力的威胁所胁迫的，那么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数字劳动是被平台垄断所胁迫的。事实上，随着巨型垄断平台的出现，劳动者的平台选择自由度在不断缩小，单向依存度却不断增长，所以有学者把平台用户称作“网络奴隶”。^⑤

从表象上看，“自营劳工”好像是在自主工作、劳动自治、自主自产，但实际上平台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结构化的阶级空间，包括内在阶级关系和分层模式。劳动隶属关系的悬置并没有改变强迫劳动的性质，平台资本主义仍然属于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平台与“自营劳工”的关系是强迫劳动的当代表现形态。所谓“自营劳工”反映的只是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社会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在劳动的整个社会化外溢过程之中，平台甩掉了对劳动者长期稳定雇佣的义务，使得劳动者福利日益丧失，

① David W. Hill, “Trajectories in Platform Capitalism”, *Mobilities*, vol.16, no.4, 2021, pp.569-58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③ 焦佩：《论平台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兼评左翼的解决策略》，《探索》2021年第2期。

④ 余斌教授区分了五种类型的数字劳动，包括：在互联网和手机上通过数字技术软件进行的购物、社交和游戏等方面的活动；运用数字技术开发软件、设计制造硬件、收集和加工数字信息产品，以及进行其他生产的劳动；生产信息通信设备和开发相关软件、提供数字内容以及铺设信息通信网络等方面的劳动；劳动对象为数字化对象的劳动；与信息通信相关但本身并不使用数字技术也不生产数字产品的劳动。参见余斌：《“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本文认为，与传统劳动形态相对应的数字劳动主要是第一种类型。

⑤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1页。

数字劳工在数据生产资料分配中不断边缘化，以及与平台抗衡的实力日益减弱。

第三，平台资本主义中的数字劳动是异化劳动吗？在网络中更新个人资料、上传视频、点赞、评论、转发、聊天、浏览网页等数字劳动看上去是自愿、自由且愉悦的，根本原因在于数字劳动可以在闲暇领域进行，劳动者在这里是消费与生产合一的产消者，“玩乐”也成了劳动。^①我们要看到，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大多数人的非睡眠时间是工作时间；而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是，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重叠并成为工作时间，一天24小时都可以成为工作时间。很多人在浏览文件与数据、与他人网络互动、加入或创建网络社区时就是在为平台工作，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所以说，“脸书”和“推特”为用户提供的交往手段并不是简单的生活工具，而是能够创造价值和利润的生产手段。可见，数字劳动创造数据商品，劳动者的在线工作时间被对象化，在线活动成了生产性活动，或者说一种抽象的、产生价值的活动。由于平台用户是“产消者”，他们在消费时也产生了行为数据、社交网络数据和个人数据，这些都为平台带来了利润。而为数字资本增殖的数字劳动往往是无酬劳的，是完全免费的。数字劳工无法控制和拥有他们的数据，创造数据商品的劳动被剥削了，同时，数字劳工创造数据价值的过程也被平台所拥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劳动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劳工是商品化的双重对象，不仅其本身是商品，而且其意识也是暴露在商品逻辑之中的。

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对劳动的异化仍在进行，只不过由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以物为中介的劳动异化转变成了以数据为中介的劳动异化。在传统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异化主要发生在雇佣劳动中，但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异化已经推翻了雇佣劳动的围墙，延伸到非雇佣劳动的地方。把工作外包给消费者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常用方式，这也导致了平台资本主义演变成了无处不在的生产受众商品的工厂和领域，可以说整个地球都变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工厂。资本具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利益，即使零散化的语言、文字、行为也能够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原料，用于数据增殖，因此平台资本主义必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利用各种方式把人们所有休闲的或自由时间的活动融合进数据积累过程中，通过创造社会工厂把生活消费转化为“生产性消费”。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引诱下，“长时间点击鼠标的手指已经略微变形，深夜里盯着屏幕的双眼已经日渐模糊，高度运转的大脑已经倍感疲惫”^②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常见景象。数字劳工的剩余价值生产表现得就像“玩乐”，但由于缺乏对数据资本的所有权，实际却服务于平台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资本积累模式，其基础就是大量的数字劳工被用于从事数据增殖的劳动，数字劳工的无酬劳动被剥削，数字劳动被纳入资本剥削的生产体系之中。可以说，平台资本主义中的数据剥削包含着数据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平台与数字劳工之间的实质性不平等分配、剩余价值的强制性单向转移等现象，实质是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的过程。较之传统资本主义时期，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范围扩大了，剥削深度和广度加剧了。可以说，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不是“共享经济”或“自营经济”，更不是通往减少剥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非正义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伍德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中提出，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工人进行了系统剥削，但剥削不等于不正义。显然伍德认为，人们不应该武断地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剥削都是不正义的。虽然伍德误判了马克思对剥削的非正义性认识，但在思想逻辑上却推动了我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剥削在何种意义上是非正义的？在平台资本主义批判中，实际上也需要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规范？这样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剥削问题给予一定的规范性解释，更重要的是可以深化对数据剥削的批判。

^① 尤里安·库克里奇提出的概念，是指为了获取乐趣在网络上进行的系列娱乐活动，或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活动。

^② 赵林林：《数字化时代的劳动与正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诚如前述，剥削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事实性的描述，还包含着规范性评价，剥削概念本身就为正义问题留有空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资本本质上就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绝对的权利关系和剥削关系。那么，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是不是也仅仅是对剩余价值从数字劳工转移到平台这样的客观社会事实的澄清，还包含着道德谴责或正义批判的意蕴呢？这首先要看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性质。如同金里卡所言：“如果（工人——引者注）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给他人，就不存在不正义的问题”。^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代表人物佩弗认为，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剥削是一种强迫的、剥夺的剥削，即“强迫的，无酬的，剩余的劳动，其产品无法被直接生产者所控制”，^②这种剥削是非正义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根源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对数字劳工的抽象强制和约束，这同样反映了数据生产中存在着强迫性和剥夺性，数字劳工的劳动不仅是无酬的，而且是强迫的。因而，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深刻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数据剥削存在的强迫和剥夺关系使得其失去了正义性。

当然，仅仅指出数据剥削的非正义性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就是深入资本领域思考正义问题，基于资本逻辑阐释正义观念。所以，数据剥削的非正义性批判还必须进一步在“资本逻辑”范畴内展开，包括对平台资本逻辑的实体形态、关系形态、观念形态进行正义批判。

平台资本对数据所有权的独占，以及数字劳工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三个方面的贫困，共同构成了当前资本逻辑的实体形态。这个实体形态本身（数据所有权结构）控制了数据生产条件，衍生出了具有垄断、威胁和宰制性质的经济模式，否定了不同生产生活主体对数据的平等使用权，造成了“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对立，限制了劳动主体活动与活动成果之间可能生成的正义关系。数据剥削的正义问题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平台资本强迫剥削得以形成的基础和载体就在于它通过自身营造的网络生态系统，占据市场绝对地位、吸引绝对流量、汇聚海量信息，达到对数据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利用数据掌控者的垄断优势，以“自由”的表象强迫没有数据生产资料的数字劳工出让数据的所有权，进而实现对市场和人的控制，实现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数据是平台最重要的资产，用户作为原始数据的生产者，却不拥有数据的知情权与所有权。可以说，平台资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权利的拥有者。数字劳工作为网络贫民，由于缺乏对数字平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无法在数字平台上独立于资本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也导致了他们无法拥有自己所创造的数据商品的所有权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

所以说，平台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平等的自由交换的新世界，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与表面的自由平等关系不同的剥削与强迫关系。平台资本一跃成为“塑造”和“改变”世界的力量，并拥有了权力与渠道。平台资本利用数据操纵着数字劳工成为推动庞大数字机器得以运转的奴隶，平台资本家成为时代的王者，数字劳工成为时代的雇佣工人。可见，“平台所扮演的不再仅仅是笑脸迎人的多边中介角色，而是市场中具有决定性的生态系统的搭建者，是去中心化的匀质节点上的枢纽中控。”^③而平台资本的数据垄断必然导致数据鸿沟的出现，数据使用群体对数据的掌控呈现“贫富分化”的状况，人们无法公正平等地享用先进技术成果，数字技术领域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马太效应定会出现。

数据剥削中的生产关系也是非正义的。平台资本主义给人们的直接印象是“逆向拜物教”，即是一个分享和共赢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利润组织。但实际上平台与用户之间存在着阶级关系，数字劳工仍然是马克思所形容的“薪资奴隶”，而“平等共享关系”和“自由平等交换关系”只是假象。平台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对数字劳工的控制权力，数字平台作为数据要素的拥有者，与没有生产资料的数字劳工之间的权力不平等越发严重。传统资本主义的工人对雇主的从属关系在平台上转变为工

①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② [美]R. G. 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③ 吴静：《总体吸纳：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新特征》，《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

人对平台的从属关系，并形成了“自动剥削”（auto-exploitation）——这是劳动剥削在当下的变形形式。平台资本主义表面上没有强制数字劳工生产数据，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余地。在平台打造的新秩序中，用户“自由选择”只是一种假象，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人被迫把剩余产品转让给他人，以及“活劳动”的劳动产品成为“他人的财产”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剩余产品的性质从物质产品演变为数据产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平台相当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它通过资本渗透和逐利模式推动平台的资本积累与流通，是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新的逐利场。不仅如此，平台资本主义上演的网络技术和商业资本的合谋大戏，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更加隐蔽，并将一切个体都卷入其中。

平台资本与数字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是非正义的，其中的社会关系并不是自由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平台在收集大数据后，除了通过控制个体的网络身份将个体束缚在大数据牢笼之外，为了便于定向推送广告，往往会对“用户画像”，即根据用户生产的数据给用户分类和赋值。也就是说，在数字平台中，用户的身份并不是自我定义的，用户并没有定义和阐释身份范畴的自主权。可见，主体在数字平台面前不是变得更强了，而是更容易为平台中的大数据产品所支配。正如哈特、奈格里等描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资本的统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控制，将整个生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①在微软、苹果、Facebook等平台的全景敞视之下，所有的平台用户都变成了赤裸生命。在全景敞视下，正如罗萨所描述的那样，人们的“社会亲近性和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②

平台资本与用户之间的分配关系也是非正义的。数字时代的数据分配非常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数据直接与资源、机会、财富、权力等相联系，谁占据了数据，谁就处于经济利益的顶端。所以，从分配逻辑的角度看，数据分配正义涉及数据的所有权问题和数据共享问题，要求每个数据主体都能平等参与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并公正分配数据生产资料、数据利润、数据权益、数据风险等。毫无疑问，数据是平台与用户合作的结果，从分配正义的角度上讲，数据生产资料应当由全民共同占有，并且由全民共享数字劳动成果，但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明显违背了公平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数据的正义价值观。在大数据的知识建构过程中，少数资本独占数据，形成“数字垄断”，平台资本将收集的数据视为垄断性的私有财产，使其成为牟利的工具，从而形成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到投入、生产、分配各环节的控制，牢牢掌握了剩余价值分配的话语权。数字劳工在数据资源的分配上既不占有数据，也不占有利润。虽然资本垄断平台在云计算、数据收集和整理方面付出了成本，但这不足以构成独占数据资源的理由。

资本与形而上学共谋制造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把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赤裸裸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和剥削关系“表现为一种恩慈和博爱”，^③这一点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同样存在。在平台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人们表面上被带入了一个自由、美好的美丽新世界，这一经济模式被鼓吹成全新的服务、经济民主和参与式文化的兴起，被打扮成“民主化的生产”及“人们在生产以及消费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平台资本主义被宣传成资本主义新精神的出现。而且通过意识形态包装，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剥削被隐藏于“玩”（play）的结构之中，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任何举动，如搜索、美食评价、社交服务等，都有可能为相应平台背后的资本做出贡献。^④平台资本鼓励人们享乐、娱乐、快乐，甚至激励人们及时将享乐融合到劳动中，实际上是将人们的享乐归入资本，通过剥削用户的享乐劳动来积累利润。不仅如此，平台资本主义还蛊惑人们使用平台交流、共享和创造社会关系，宣传“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生活就没有意义”此类观念。总之，平台资本主义有意制造出数据拜物教的意识形态。

^①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② [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③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78页。

^④ 杨慧民、宋路飞：《数字资本主义能否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厄运——“生产—消费”认知模式下的误区与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事实上，平等参与者的民主空间、参与式经济平台只是资本制造的意识形态烟雾弹，民主空间的实质是权利结构不平衡的资本主导空间。正如奥地利学者舍恩伯格教授在《大数据时代》中指出的那样，“超级巨星公司（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公司——引者注）正在变成聚敛利润增长的合法容器，而不是协调人类活动的大型组织单位”。^①而由于“玩”也被商品化了，没有被资本剥削的空间和自由的时间几乎没有不存在了，人的自由和能力被全方位削弱，人的感性生活也成为虚假的景观产品机械投放地，彻底沦为数字化的附庸，数字平台用户几乎都成了“免费替大平台和广告商运输商品意识形态的工人”。^②

三、数据共享：数据正义的建构

数据正义的建构需要明晰一种前提性的立场：数据是客观性的现象，本身没有价值立场。在平台资本主义那里，数据成为奴役工具，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全面拒绝数字化，抛弃所有的智能设备，退回到前信息时代，返回到一个虚幻的田园诗歌的生活之中，相反，要看到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肯定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积极价值一样，今天我们也应当肯定“大数据”作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生产要素，在驱动着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迭代及至升级换代，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财富及组织形态的巨大跃迁。

因而，数据剥削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数字化”本身，而在于数据被资本平台垄断并从中榨取剩余价值。所以，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须是摧毁由所有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这样的现象，使大数据生产要素以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共享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数字经济时所强调的那样，“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③一种革命性的数据正义所首先要求的一定是消除平台资本对数据的私人占有和数据剥削，这就决定了数据正义建构的方向必定是数字平台的数据由全民共享，在“被称为‘数字公地’的平台上开展纯粹的赠予性交换”，^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数据正义的建构方向。

我们知道，批判私有制前提，拷问私有制本身的正义性是马克思思考正义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直接导致了劳动者不得不用生产能力与资本进行平等交换，进而资本家获得了雇佣劳动者劳动活动的支配权及其所创造价值的占有权，这当然包括其所创造的超过工资所体现的价值的价值，而剩余价值又为资本的增殖服务，进一步强化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正是这样的思考决定了马克思沿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批判的内在逻辑阐释其正义立场。今天我们思考数据正义的建构，也应遵循这样的思想逻辑，即如何消除数据生产要素被资本平台垄断性占有，解决资本平台将从用户那里提取的大数据“私有化”的问题。

平台资本主义使数据商品化垄断化，这虽然没有导致数据内容与生产者完全分离，但却导致了数字劳工与数据所有权以及利用这种权利获得的利润分离。所以，解决资本平台对数据要素的垄断性占有问题，目的就是建构不受资本逻辑和私人营利性控制的数据平台，通过数据的共同生产实现数据的共同所有、共同控制并惠及所有用户，使数据不具有商品特性，而是作为用来满足人们相互交流与合作等生产生活需要的工具，数字平台同时也成为非商业、非营利的组织。总之，以增加全体人民福利为原则，使数据的生产、分配、使用由资本逻辑转向共享逻辑和社会公有，数据平台由整个社会控制，不再为积累资本的私人所占有，确保每个人都能受益于数字平台并共享其创造的社会财富，奠定数据正义得以

① [奥]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李晓霞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95页。

②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8页。

④ [日]森健、日户浩之：《数字资本主义》，此本臣吾主编，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实现的根基。实际上，由于数据作为特殊的商品可以被循环复制，从而被多人多次使用，而不会被消耗殆尽，这也使得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数据更容易转化为公共商品，保证数据共享和数据正义的实现得以可能。

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要发展商业化和商品化的资本平台，还是要发展由日常用户共同创造和控制的公有平台？资本平台必将嵌入资本主义的对抗之中并形成数据剥削，从而导致非正义状态；公有平台则是真正的社会媒介，是由人们共同生产、再生产和共同控制的。也就是说，为了消解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地位，政府有义务投入资源建立一些以非商业和非营利为导向的公共平台，或通过建立合作平台来打击平台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公有数字平台以使用价值和共享价值为核心价值，由直接用户集体拥有和控制，是所有人的社交媒体，在这样的数字平台上的活动不是剥削性的数字劳动，而是数字工作。“打破数字媒体的商品地位和商品拜物教意味着构建基于数字工作所创造的公有逻辑的工人阶级数字或社交媒体。”^①作为公共事业发展依托的公共平台也可以收集数据，但只是用来更合理公平地分配资源，实现民主参与。

当然，以上仅是数据正义建构的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要（或就能）彻底达到这种正义状态。实际上，由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正义程度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认为公平正义具有历史性，它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我们要承认在当前时期，平台资本还是带动数据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平台数据垄断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限制私人资本与数字平台的结合来解决，只能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在数字平台的融合方面实现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在这样的前提下，创造条件鼓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积极参与数字平台建设，必要时完成控股，主动建立公平公正的数据收集、使用和存储体系，增强数据要素产权的国有属性和公共属性，从而消解不同数据主体之间数据占有、使用的不平等，创造“劳资两利”的数据平台财富创造与分享机制，将大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置于数字正义的框架下。

当前时期完全限制利润激励，就会阻碍平台资本的发明和创新功能。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促进平台资本良性发展，充分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充分彰显劳动者在数据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利用其增进社会福利以实现社会大多数成员福利最大化。

在规范和引导平台资本健康发展的前提下“促进数据的平等化”，为那些“无数据历史”的个体或组织创造条件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平台资本的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用数据交税不失为一种创造性方法。所谓的“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就是规约资本平台的市场份额一旦达到规定的阈值，就要共享其拥有的数据的一部分，威胁市场竞争的数据集中度越高，就会有更强大的数据共享授权生效。数据交税即是用数据支付部分税款，实质上是让平台资本开放部分数据资源以实现数据共享，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资源改善服务。诸如可以利用汽车制造商的传感器数据改善交通安全，利用网络零售平台的消费数据改善食品安全，利用在线教育平台的学习数据帮助教育部门改善决策，利用交易平台的商品数据进行经济安全预测，等等。当然，数据交税的方式还能够引导平台资本把掌控的数据提供给非营利性组织或研究人员，让更多的人从数据利润中获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正义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能力密切相关，“资强劳弱”是关键性影响因素。由于工人只拥有自己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他的活动与生存所需要的客观生产条件都属于资本，因此劳动这种使人致富的活动属于资本家而并不属于工人。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资强劳弱”所带来的非平等关系甚至是支配关系严重影响了数字劳工合理的劳动报酬的实现。平台资本的扩张虽然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技术和产业变革朝向信息化、数字化、智

^①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1页。

能化方向加速演进，但同时也提升了资本的议价能力，使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恶化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所以，破除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垄断和数据剥削，建构数据正义，除了“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思路之外，将数据产权赋予数字劳工，由数字用户拥有和控制数据，使之自主决定数据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必然是实现数据正义制度安排的重要基点。通过赋予数字劳工数据产权，可以强力拆解数据垄断权威，消解资本平台的平台使用算法权力。数字劳工拥有数据产权，就能提升议价能力和定价权，提高数据授权的自主性，获取与资本平台相对平等的市场地位，从数字劳动中受益。

四、结语

随着平台、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兴起，新兴技术政治用“共享经济”“开放经济”“零工经济”等术语描绘着企业活力和企业弹性的诱人形象，甚至认为数字劳动代表了工人与资本之间传统关系的终结。事实上，平台和数据等生产工具传播中介的技术属性是无法掩盖平台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从深层结构看，平台资本主义涉及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剥削等政治经济学以及数据正义等政治哲学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我们必须关注资本平台的数据正义问题，澄清平台资本主义中隐匿的以数据剥削为核心的新式剥削逻辑和微观奴役机制，并从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中寻找数据正义建构的基本原则和路径。毫无疑问，数据共享是解决数据剥削、构建数据正义的基本方向，这就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强大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强化数据的公共属性，同时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所有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总之，数字经济建设要以公平正义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塑造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

责任编辑：罗 莹

唯物史观视域中共同富裕对正义的彰显^{*}

吴昊天 袁洪亮

[摘要]正义是人类社会的至高目标，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正义目标。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实现共同富裕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目标指向，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的重构，而且是社会正义的追求，彰显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正义等社会价值。其中，生产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基底价值，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核心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正义是共同富裕内蕴的正义终极价值。

[关键词]唯物史观 共同富裕 正义意蕴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028-06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从生产方式运动、人民历史主体视角理解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共同富裕内涵三重意义：共同富裕在生产力层面表现为物质富有并延伸到精神丰富，在生产关系层面表现为经济地位的平等，在历史主体层面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推进和个性日益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突出的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②

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价值问题。“共同”意味着大众社会权益享有的平等与公正；“富裕”表明社会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人们自由幸福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历史前提。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的重构，而且是社会正义的追求，彰显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正义、分配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正义等社会价值。生产正义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和构成基底；分配正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发展正义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指向。

一、共同富裕彰显生产正义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正义既不是道德正义，也不是法权正义，而是生产正义。生产正义将正义建立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超越了把正义仅仅视为价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实现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22YJC710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昊天，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袁洪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值理想并表述为“在一种态度、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一种关系之中，每个人能得到他应得之物”^①的传统解读，正义被理解为历史客观性与价值主体性的统一范畴，实现了正义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所谓生产正义，即生产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由于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所以，社会生产正义又表现为生产方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即生产方式的正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②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它内蕴两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产正义呈现出两个基本维度，即生产力意义上的效率正义和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制度正义。共同富裕是效率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整体性确证，因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必须通过劳动效率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来表征，生产关系的制度正义必须通过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并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来证明。

效率首先是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计量用词使用的，表示投入（物）与产出（物）间的比例关系。投入小、产出大，效率就高，反之则低，它是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的直接确证。如果从经济伦理学或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效率在本质上与利益、福利、功利、幸福及快乐等价值关系密切相关，宽泛为投入（价值）与产出（价值）间的一种比例状况。在此意义上，效率不仅具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的规定性，也具有人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数量和质量的规定性。在社会生活总体中，共同富裕是这两种规定性的现实统一。因此，共同富裕中的效率追求不仅直接表征物质性意义，而且蕴涵价值性目标，导向效率正义。

所谓效率正义，即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实现生产要素使用过程中的最大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体而言，效率正义应该包括如下要义。首先，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生产力是唯物史观观察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范畴，生产效率是生产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运行和变化具体影响的现实镜像。任何生产力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都要表现某种效率，长期缺乏效率的生产在排除经济社会体制问题的前提下，就表明生产力存在问题，如生产工具落后或劳动者素质低等。所以，效率既是生产力的客观性和适宜性表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一个正义的社会，或者一个被认为是正义的社会，其制度框架若不包含着对‘效率’的关注，或者用流行的语言来说，若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很难被人们认同为‘正义的’社会”。^③其次，效率是充分利用资源、节约创富的重要机制。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长期低下，既会带来生产资源的实际浪费，又会造成社会的贫困。资源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是有限的，而“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对正义的要求绝不能独立于这种要求所应付出的代价”。^④一个长期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的社会一定不会贫困，而更可能实现相对的富裕，而“一个使其财富达到最可能大的程度的社会便可能是一个正义的社会”。^⑤最后，它可以为公平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着收入分配的价值内容、规模和具体方式。按照效率原则调节分配关系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为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实现公平的分配创造前提条件。因此，“‘效率’是‘正义’所内含的价值内容之一，也是法所追求的‘正义’的具体价值名目

① [美] 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③ 张恒山：《论正义和法律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

④ [美] 里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⑤ [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选择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91页。

之一”。^①

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正义程度“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②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影响效率最为显著且最为深刻的是一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制度正义指社会制度的正义，具体是指社会财富、资源、责任、义务分配的公平和正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决定了任何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的改革和调整都无法触动其不正义性的根源，不能实现社会正义；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制度革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马克思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③如果说，生产力不断发展并通过效率机制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彰显效率正义提供了可能性的物质基础，那么，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保障，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④“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⑤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不断向共产主义制度的推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推动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幸福的制度基础，它构成了唯物史观视域中制度正义的基本内涵。早在创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就“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一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中就说道：人们都呼吁正义，但实现正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⑥生产正义的制度指向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目标指向和分配正义的实现

分配制度表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它既是一个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机制。共同富裕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占有状况，只有蕴涵正义价值的分配体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没有分配正义，共同富裕将无法实现；同时，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必然结果和目标指向，一个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分配正义的社会。如果说生产正义中的共同富裕特别关注财富的生成，那么分配正义中的共同富裕则更侧重于基于一定规则。吴忠民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认为社会公正包括四个方面基本规则：“一是基础性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底线的规则；二是机会平等的规则；三是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四是社会调剂的规则”，^⑦包括平等、需要原则和矫正等相互协调下的财富共享，以防止财富占有过程中的贫富悬殊和平均主义，从而彰显分配的公平正义和矫正正义。

分配正义意味着应得。“应得”不仅关乎每个社会成员平等享有社会的资源和权利，而且同时也关乎每个人的劳动实现得其所得，达成分配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劳动就业和劳动保障等基本权利和机会的获得平等，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途径，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构建公正的劳动保障体系和通过劳动获得财富的规则环境，确保社会大众拥有进入各个社会领域创造财富的平等机会和权利，能够根据自身的能力在公平的规则下自主选择劳动职业，并在劳

① 张恒山：《论正义和法律正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9-7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1页。

⑦ 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公正问题》，《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动中平等地取得同工同酬的权利和享有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护、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这是人们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二是按照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付出和贡献获取相应的收入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它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机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激励机制。所谓按劳分配，即“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①劳动者的劳动实际所得，达成“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②的劳动者财富占有状态，实现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的直接统一，凸显分配中的公平正义。不仅如此，由于“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即使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最终也“必须同个人利益结合”，因此，作为公平分配基本机制的按劳分配也是激励人们勤奋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利益机制。以按劳动分配为基础的“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④由此促使人们努力通过劳动去构建美好的社会和美好的个人生活。

但是，按劳分配只能为构建共同富裕提供基本框架机制，要真正建成共同富裕且充满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关照。因为在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社会资源和财富相对于全体社会成员追求美满幸福生活的理想都是有限的，同时，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因市场竞争淘汰，如较长时间失业，自然条件差异如生理缺陷，突发事件如天灾、重大疾病等造成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存在困难的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社会和公平正义原则都要求对他们有专门的保障规定和保障实现机制。有着天下为公理想追求的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构建大同世界提出了“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愿景；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公平的正义，在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安排时必须奉行“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原则。2000多年前孔子大同世界的愿景和2000多年后罗尔斯的利益“最小最大原则”都澄明，共同富裕的正义社会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必须以需要原则作为补救或矫正，彰显矫正正义，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⑤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⑥当代中国共同富裕倡行的分配需要原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是“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⑦而共同富裕的分配需要原则是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保底机制。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践行分配正义的需要原则，彰显矫正正义，需要关注如下方面的情况：一是社会分配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必须覆盖全社会，普惠每一个社会成员；二是对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力满足基本需要的人群实行免责供养；三是对社会生活中因经济社会转型的代价和政府的政策偏向而造成的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四是不断推进先富群体和地区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并强化先富群体和地区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实现富裕的共同化为其先富的合理依据的观念。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从而在最终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彰显社会正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④[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胡长明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共中央党校网站：https://www.ccdp.gov.cn/zt/sjdtbz/t20181210_115738.shtml，2017年10月25日。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0页。

三、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目的正义的时代彰显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现实的人”，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问题，这就要求人在物质利益上的占有和分配的公正，以及“道义上、法理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①方面的正义。但是，“现实的人”创造历史的最根本、最终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在此意义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最高理论目标和历史目的正义，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因为共同富裕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②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彰显社会历史正义的实质性基础和现实前提。

首先，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个性”逐步形成和丰富。唯物史观认为，人的内在本性一定要通过不同时代人的外在需要来表现和确证。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论述道：“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来阐释人的本性，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人之所以优越于或高于其他动物，就是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⑤人不仅在衣、食、住、行等自然、物质方面的需求远丰富于其他存在物，而且作为社会存在物，人还拥有社会性的需求，包括社会交往、精神文化和自我实现等方面。这些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的具体体现，它们的满足表现在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层面就是自由个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虽然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但其结果却是大多数劳动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少数资本家“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⑥的两极分化。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其根本价值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广大劳动者则为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而挣扎，整个社会人的需要被异化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以及“粗陋的实际的需要”，这使人变得“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⑦人的本性被物化，人的自由个性表现为对物的无节制的占有和消费追求。因此，要消除人的“物化性”异化，必须构建共同富裕的财富形态。共同富裕消解了广大劳动者为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而挣扎的物质贫困，结束了“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⑧它“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⑨最大可能地压缩了商品市场经济中“资本权力”下的“物的依赖”和物化性效应，克服了生产中以追求资本利润为根本目的的“物的依赖”和生活中追求无节制消费的“物的依赖”，促成了社会由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化，使生产和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同时，共同富裕意味着需要满足的全面性、多样性，即不仅要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上的富裕，还要追求文化、娱乐、发展以及自我价值等精神上的富裕，从而不断地丰富、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张，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提高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系文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⑩

① 王学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运用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9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页。

⑩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52页。

其次，共同富裕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总是在特定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构成的历史结构中通过人的实践实现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②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形成自由、全面、丰富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关系为空间条件。共同富裕为自由、全面、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关系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共同富裕表明社会生产力发达，社会生活丰富，社会交往途径多样，社会实践方式多元，“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内容共同组成、协调发展的完备的社会有机体”。^③它意味着社会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广泛接触新事物的途径信息，克服了经济贫穷、信息贫乏、通讯交通限制、职业区域限定等约束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瓶颈，从而在社会层面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娱乐、发展等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着个人独立性和交往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工作发展和社会交往拓宽奠定了能力素质基础，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④的状态。而职业选择自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独立为形成人的独立人格、平等独立自由的社会交往关系、丰富的自我个性和积极向上的人格提供生活基础，从而不断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由于“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⑤因而共同富裕能够不断催生人的更高级需要，如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为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开辟了新的空间和发展平台。

最后，共同富裕推动了人的能力提升，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人的能力提升是人发展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⑥因此，人的能力的提升和拓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依据，这些能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能力，还包括审美、批判、选择、创新等更加体现主体性的能力。

共同富裕既是生产劳动创造的财富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表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价值由服务于资本、着重于物本向服务于人、着重于人本转向的标志。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经济发展是嵌入整个社会发展之中的，是以人的能力的普遍提升为目标指向的。共同富裕中的“物”，无论是处于生产阶段还是消费阶段，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在生产阶段，共同富裕是人人努力参与物的使用过程，是人的能力和价值的发挥和创造过程；在消费阶段，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共同富裕是所有人在消费物中获得素质能力的提升过程，也是人力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人的素质能力的普遍的全面提升又会不断地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必须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⑦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5、515页。

③钟明华：《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国家治理》2021年第45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页。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4页。

荀子的政治境界论

——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初探^{*}

毛朝晖

[摘要]孟、荀的王霸论述都旨在回应孔子王霸论述留下的一个理论缺口，即霸道是否可以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正一反的答案，这是因为二人采纳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孟子的判准是政治家的心术，而荀子的判准则是政治功效。基于政治功效的判准，荀子认为，礼乐、政事、赏罚是王道的“三要素”，因此，王道实际上包含了霸道的要求。同时，荀子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亡、存、霸、王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政治功效，另一方面构成了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由此，荀子王霸论述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境界论。荀子的政治境界论化解了孟子以来王、霸的对立，守住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辩护了王道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荀子 儒家 王霸论述 境界论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34-07

王、霸相提并论是后起之事，而“王道”概念则起源甚早。《尚书·洪范》记载了箕子向周武王传授九条治国之道，即“洪范九畴”，其中第五“皇建其有极”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伪孔传：“动必循先王之道路。”^①由此可知，“王道”的本义是先王的治道。孔子在《论语》中屡屡推崇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代圣王。^②孟子提出著名的“王霸之辨”论述，言必称尧舜，大力宣扬王道，并进一步确定其内涵。此后，王道政治遂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标志，《汉书·艺文志》对“儒家者流”的界定之一便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③而所谓尧舜、文武之道，即是儒家王道。唐宋以来，孔孟被树为先秦儒学的正统，孟子的“王霸之辨”也被视为儒家王道的经典论述。此种观念的影响甚至波及当代海外学者。例如，韩国学者 Sungmoon Kim (김성문, 金圣文) 认为，“王道是指榜古代圣王治民之道的政治模式，它与以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为目标的霸道相对”，^④这种理解将王道与霸道截然对立，

^{*} 本文系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美德伦理学视阈中的先秦儒家伦理”(22SKBS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毛朝晖，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福建 厦门，361021）。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0页。

② 关于“圣王”在历史上存在的真实性，古史辨派对此曾提出过许多大胆质疑，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也提出过“尧舜禹抹杀论”。但是，现代考古发现却为古史传说提供了不少新的佐证，尹达认为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参见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0页。

③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81页。

④ Sungmoon Kim,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ism: Mencius and Xunzi on Virtue, Ritual, and Royal Transmissio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73, no.3, p.375.

明显便是基于孟子“王霸之辨”的理论框架的；干春松在《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中指出：“孟子的仁政思想落实到政治实践之中，就是王道政治”，^①显然也是以孟子的王霸论述作为儒家王道论述的典型并以此来界定“王道”的内涵的。

然而，这种用王霸对立的方式来界定王道的做法只是孟子“王霸之辨”论述框架的特色，并不能代表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的全貌。作为战国后期最重要的大儒，荀子在《王制》《王霸》等篇中提出了大量王霸论述。与孟子拒斥霸道不同，荀子则是接受霸道。近年来，王天海、杨秀岚对荀子的王霸论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荀子的王霸思想“上承管仲、孔子”，并“首开儒家崇王用霸、王霸杂用的先河”。^②严格而言，王道与霸道在荀子那里并不是对等关系，因此，他并非如汉宣帝所谓的“王霸杂用”，而是崇王不贱霸。更重要的问题是，孔子并没有明确主张“崇王用霸”，孟子更是明确反对霸道，那么，荀子的王霸论述为什么能够受容霸道？其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上承孔子”的呢？本文旨在解答这两个问题，从而在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厘清荀子王霸论述的理论形态与哲学贡献。

一、孔子对儒家王道的奠基及其王霸论述的一个理论缺口

儒家的“王道”概念虽然可以上溯到《尚书》，但其奠基者则是孔子。孔子首先确立了儒家的“政治”定义。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谁得到了什么”以及“谁说了算”，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权力与利益的分配的。^③儒家则不如此。孔子提出：“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这不是说儒家不讲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正义，而是说就其对于“政治”的理解而言，儒家认为政治的根本意义是“正”，即正其不正而归于正。所谓“正”，就是《孟子》所谓的“正己”、《大学》所谓的“正心”。这个规定强调了政治家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凸显了政治家的“德”。因此，紧接着这个定义，孔子对鲁国政治家季康子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重视政治家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

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孔子一再强调政治家的自我修养。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这一章在孔子的王道论述中十分典型。在这里，孔子指出尧、舜的王道政治是建立在“修己”功夫的基础上的。“修己”的基本要求是造成“君子”，而造成君子的根本条件是“修己以敬”。儒家政治哲学便基于这种“修己”功夫的不断推扩，由“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君子自我修养的不同层次。圣王并没有什么特异，只不过是能够不断推扩“修己”功夫而臻于极致。就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修己以敬”是儒家君子的共同要求；就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开展而言，则“尧、舜其犹病诸”。换言之，政治事功只是道德修养的开展，对于儒家君子而言，道德与政治二者密不可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便是道德与政治的一体不分。梁漱溟指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是根据关系伦理推广发挥来组织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④基于这种伦理本位的思想，政治与伦理道德自然密不可分。^⑤正如仲崇亲所说的：“儒家政治思想，乃以人类自身之力来解决人类自身问题作为起点。因而儒家所探讨的问题，总不外乎‘修己’与‘治人’。此二者在儒家看来为一体之两面，亦可谓一事之‘终始’或‘本末’。”^⑥可见，儒家王

^① 干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② 王天海、杨秀岚：《荀子王霸思想解析》，《现代哲学》2017年第1期。

^③ Jonathan Wolff,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1.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111页。

^⑤ 本文中“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取一般的宽泛用法，可通用。对这两个概念的严格辨析可参见王仕杰：《“伦理”与“道德”辨析》，《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6期。

^⑥ 仲崇亲：《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台北：华冈出版公司，1977年，第180页。其他一些类似的说法参见[日]五来欣造：《儒教政治哲学》，胡朴安、郑啸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李宗定：《先秦儒家政治

道的政治主体是注重自我修养的“君子”，而君子的修养及其开展的极致便是圣王。^①换言之，王道的起点是政治家的自我修养，王道的终点则是政治家自我修养的推扩，亦即“修己以安百姓”的王道理想的最高实现。在这一点上，孔子的王道论不仅确立了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也奠定了儒家的“王道”政治哲学的基础。

在现实中，王道往往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最高理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儒家王道常常被批评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②那么，在王道与不良政治之间是否存在儒家的次好政治？这就触及“霸道”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一来它是儒家政治哲学在实践中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二来它也是孟、荀王道思想的重要分歧所在。但是，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孔子没有明确界定“王”“霸”的关系。事实上，《论语》中并没有将“王”“霸”直接相提并论，即便提到“霸道”，也没有将其视为一种与王道相当的政治形态。这说明，“霸道”问题在当时的实践中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至少，霸道还不足以撼动长期以来的王道信仰，而构成一个必须回应的理论挑战。

其次，孔子对霸道的看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孔子赞赏管仲和齐桓公的霸业。他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又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另一方面，孔子对管仲和晋文公的霸业又有所批评。他批评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宪问》）。

很明显，孔子的上述两个观点并不一致，前一种观点似乎是对“霸道”进行了肯定。他是从实际的事功上肯定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及“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观点的。这意味着，如果单从结果上看，霸政同样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政同功。如此，则王、霸并无本质区别。后一种观点则从道德着眼，针对晋文公和管仲的自我修养提出批评，指责晋文公心术不正、管仲不知礼。这意味着，如果从道德方面来看，则王、霸截然不同，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那么，儒家到底是能够接受霸道，还是应该摒弃霸道呢？根据上文的分析，孔子对于霸道的观点显得模棱两可。换言之，孔子并没有明确回答霸道在现实中能否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的问题，这为先秦儒家王霸论述留下了一个理论缺口。

二、孟、荀王霸论述的分歧

霸道是否能够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孟、荀在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分歧，这充分体现在他们的王霸论述中。

孟子的王霸论述是在“王霸之辨”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孟子有关“王霸之辨”的集中论述共有四章，分别见于《公孙丑上》《告子下》《尽心上》《尽心下》四篇。在这四篇中，王、霸都被对立地加以论述。综合四章，孟子对王、霸的区辨主要运用了两个判准。第一个判准是政治家运用的手段。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而“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以德”教化和“以力”征服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手段，这构成王、霸的一大区别。第二个判准是政治家的动机。孟子认为，“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尽心上》）朱注：“尧舜天性浑全，不假修习。汤武修身体道，

理论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45-46页；Xuezhi Guo, *The Ideal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p.46。

① Xuezhi Guo, *The Ideal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pp.3-53.

② 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是“明明德于天下”，即由“修己”推广到“治人”，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矛盾。第一，儒家一方面在理想上承认任何个人都可以“明明德”，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上又承认社会现实使得普通人不能自明明德。由于儒家很少考虑“群体美德”（associate the common people, viewed as a group, with virtue），这使得“明明德于天下”事实上成为不可能。第二，在现实政治中推广的美德事实上往往是“社会秩序的素质”（qualities worthy of an orderly society），而不是儒家所说的“明德”。参见 Loubna El Amine, *Classical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A New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0-37。

以复其性。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①这即是说，由于王、霸的动机或心术不同，这决定了他们使用的政治手段也有“性之”“身之”与“假之”的不同。这说明，动机或心术的不同才是王、霸的根本区别。

然而，孟子接着提出疑问：“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尽心上》）这是否意味着王、霸并没有本质区别，霸道只要持久地“假仁”，其实与王道并无分别呢？答案是否定的。焦循注：“五霸假借仁义之名，旋复不仁不义，不能久也。”^②朱熹更特别指出：“旧说，久假不归，即为真有，则误矣。”^③为什么“久假不归”仍然不算“真有”呢？朱熹指出：“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晏也。且如兴灭继绝，诛残禁暴，怀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无恻怛之诚心。”^④根据朱熹的理解，没有“恻怛之诚心”，就永远不是真正的王道。这种阐释与孟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孟子特别强调，心术对于政治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他说：“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倘如政治家心术不正，就必然会影响到他的行事，最终会危害政治。同理，由于霸道只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假仁”，心术先已不正，一旦达成利益目标，其必然要放弃或背离王道，这就是为什么“久假不归”仍然不算“真有”。

明乎此义，我们就能了解孟子为什么要将王、霸置于对立地位，并对霸道表示贬斥。孟子一则批评霸者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公孙丑上》）；再则批评五霸是“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其着眼点正是霸道的心术。孟子之所以用心术来分辨王、霸，是因为王道与霸道虽并非在行事上截然相反，但在心术上却迥然有别。用孟子自己的话说，王者行仁是出于真心，而霸者则是“以力假仁”。换言之，王、霸的分辨，在孟子看来是非真即假的本质区别，而不仅仅是高下层级之别而已。在孟子的政治哲学中，王、霸不是处于一个层级或序列关系中的，他基于分辨心术的立场将霸道立于王道的对立面，进而对其加以拒斥。因此，霸道并不真正构成孟子政治理想的一个备选项。从孟子的立场看，儒家政治必须以王道作为唯一目标或原则，霸道不是儒家的次好政治。

荀子则不然。荀子认为，王、霸并非彼此对立的政治类型，而是高下相形的政治层级。荀子关于王霸的论述很多，主要见于《王制》《王霸》《强国》《天论》《君子》《尧问》等篇。例如，“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以下只注篇名）“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王霸》）“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强国》）在这些例子中，荀子都将霸道视为王道与存、亡等不良政治的中间状态。换言之，霸道与王道只是程度或层级的区别。对于这种程度或层级差异，荀子用“巨”“小”“纯”“驳”等程度副词来描述。例如，荀子认为：“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王霸》）杨倞注：“巨者，大之极也。”^⑤可见，国家的政治良窳完全在于为政者如何“用之”，王道是善于“用之”的极致，灭亡则是不善“用之”的极致。在同一篇中，荀子又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王霸》）在这个政治序列里，荀子用程度副词“粹”“驳”“无一焉”来区分王道、霸道与亡道，更是明确肯定了王道、霸道与亡道只是程度上的纯驳之别。

三、荀子论政治层级

既然王道与霸道只存在程度或层级之别，那么，所谓的程度或层级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呢？荀子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8页。

② [清]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24页。

③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8页。

④ [宋]朱熹：《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49页。

⑤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9页。

(《性恶》)由此可知,荀子的“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包括了礼义、法正、刑罚三个方面的要求。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确定礼义、法正、刑罚三者的义界。

这里涉及荀子对于“礼”与“法”的区分。在《荀子》中,“礼”与“法”有时连用,例如《王霸》《修身》篇称“礼法”,《性恶》篇称“礼义法度”,便是这样;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有所区分,例如《天论》《强国》两篇“礼义”与“法正”分用,便是这样。在分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礼”“法”含义的两种区分。第一,二者适用的对象不同。《儒效》:“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又,《富国》:“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可见,“礼”适用的对象是朝中的士大夫,而“法”适用的对象是官僚辖治的百姓。第二,二者功能不同。《王制》:“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可见,“礼乐”的政治功能是通过提升修养与推广教化以改良风俗,“法正”的政治功能则是通过制度与赏罚以增加功效。

“刑罚”的含义非常明白,毋须另行界定,需要界定的是“礼义”与“法正”。“礼义”是“礼”与“义”两个概念的组合。《致士》:“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可见,“王者之事”包括“礼”与“义”两个部分。其中,“礼”的作用是“及身而行修”,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礼乐”的修养与教化功能;“义”的作用是“政明”“令行禁止”,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法正”的制度与赏罚功能。由此可知,“礼义”实质上就是“礼乐”与“法正”两项内容的组合。这也说明,“礼义”实质上包含了“法正”的政治要求。至于“法正”一词,本节开头所述《性恶》引文杨柳桥注:“法正,犹法政也,法制也。”^①照此理解,“法正”就是“法政”,是“法”与“政”的组合词,其内容包含“法度”与“政事”两个方面。其中,“法度”的内容包括“刑罚”等各种硬性的法律或赏罚的规定,而“政事”则包括有才能的政治家对于制度的损益与其在具体事务上的权变。如此,“法政”实质上包含了“政事”与“刑罚”的政治要求。由此可知,礼义、法正、刑罚三者是层层包含的关系。礼义是在法正之外增加礼乐,法正是在刑罚之外增加政事。由刑罚到法正再到礼义,在为政的要求上是层层递进的。

刑罚之外为什么要增加政事呢?荀子指出: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

荀子认为,光依靠刑罚等硬性规定不足以治国,原因在于各种刑罚或法规总要依靠人去实施,而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有一个缓急先后的问题,而且一个国家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临时的事变。在这些情况下,只有洞达“法之义”的政治家才能够守常知变、应对裕如。这就是为什么在刑罚之外需要增加政事。

那么,法正之外为什么还要增加礼乐呢?这牵涉到荀子对于政治的整体观念。《王霸》:“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在荀子看来,政治的对象一共有三个,即贤士、能士和一般好利的众庶百姓。施政的关键就在于安顿这三种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政治功能。荀子认为,安顿贤士的措施是礼乐,即“等位爵服”之类;安顿能人的措施是政事,即“官职事业”之类;安顿众庶百姓的措施是法度,即“循其旧法”之类。赏罚有度,则能够调动众庶百姓的生产力和战斗力;能者在位,则足以守法施政、应对事变。这在前文业已阐明。现在的疑问是:贤士有什么用?《哀公》:“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可见,贤士是

^① [战国]荀况:《荀子校释》,王天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48页。

就修养和德行而言的。那么，我们仍然要继续追问：修养与德性有什么用？荀子以孔子为例，说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效》）可见，有修养的大儒有两种政治功能，即提高政治功效和改良社会风俗，即上文所说的“法正”与“礼乐”的政治功能。穷根究底，我们还要继续追问：改良社会风俗有什么用？秦国吸纳能士，更张法政，以致富强，这是举世皆知的。然而，荀子指出：“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謔謔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也”（《强国》）。光靠任用能士、更张法政，固然可以发挥能士的才智，调动众庶百姓的生产力与战斗力，而达致富强的政治功效，但由于不重视修养与教化，社会风俗令人恐怖和反感，这将造成“謔謔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已”，随时都有激发内乱外患的风险。如果不能让其他国家甚至自己的臣民心服，那么，即使再富强，这样的政治终究是不稳定和不持久的。通过秦国的政治实践，荀子论证了社会风俗的政治功能，从而也论证了贤士及由贤士兴起的“礼乐”的政治功能。

荀子所说的政治层级可以由上述三个方面获得解释。《强国》《天论》两篇都指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所谓“隆礼尊贤”，是指尊崇贤士、兴起礼义；所谓“重法爱民”，是指遵守法正、取信于民；所谓“好利多诈”，是指贪利使诈，仅存刑罚；至于“权谋倾覆幽险”，是指一切礼义、法正、刑罚等制度都荡然无存，全凭玩弄权术来进行政治运作。对荀子而言，王道的标志在于礼义，而礼义中包含了礼乐、政事、刑罚三个方面的内容；霸道的标志在于法正，包括政事、刑罚两个方面的内容；危道是只凭借刑罚来控制人民；亡道则是礼乐、政事、刑罚的全面丧失。

四、荀子王霸论述的境界论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所说的政治层级与政治家自身的精神修养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换言之，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精神境界，政治层级论述是一种境界论形态。

所谓“境界”，一般是指个人内在的精神觉悟与修养。例如，冯友兰便认为：“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①唐君毅对于“境界”概念有更精确的词源学说明，他指出：“此‘境界’一名，初出自庄子之言境，佛家唯识宗以所缘为境界义。所缘即心之所对、所知，则境界即心之所对、所知。”^②

儒家很早就对精神境界做出了区分，最著名的例子是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显然是孔子对他本人修养境界的一个简要自述。再如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在这里，孟子明确将君子的修养由低到高依次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境界，并判断乐正子当时大致尚处于前两个境界中，还达不到后四个境界。尽管如此，孔子、孟子所区分的精神境界只是针对自我修养而言的，还未涉及政治领域。直到荀子建立政治层级论述，才将个人领域的境界论应用到政治领域。

如前所述，孔子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重视政治家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顺着这个基本原则，儒家原本很容易就能推出，在政治领域，根据政治家自我修养的高低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境界。但是，孔子尚未充分关注“霸道”问题，而孟子“言必称尧舜”，将王、霸截然对立，不愿意退而求其次，刻意回避了政治领域也存在政治境界之分的问题。荀子则更加务实，他不但接受霸道，而且承认其他政治形态存在的事实。基于这种现实主义观点，荀子区分了上文所述的各种政治层级，然后将这些政治层级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挂钩，这便成为一种政治境界论。

与孔、孟一样，荀子也极为强调政治家的自我修养。他指出：“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①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3页。

^②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道》）这意味着，为国完全取决于修身，政治层级完全取决于国君的修养境界。事实上，荀子曾明确表示：“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王霸》）这是明确将政治层级归结为国君的自我修养。就这一基本观念而言，荀子守住了儒家立场。但与孟子不同，荀子指出，不但王者需要政治修养，霸者乃至其他政治层级也都各有其政治修养。而且，政治家的政治修养、政治功效与政治层级存在对应关系。^①从表面上看，政治层级的判准似乎只在于礼乐、政事、刑罚三个方面的功效，这看似只是一个政治功效问题；但是，荀子认为，政治家能否真正理解并落实礼乐、政事、刑罚三个方面的政治功效，有赖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这便又成了一个政治修养问题。与孟子偏重心术不同，荀子的政治层级论具有一个二合一的结构：从客观的政治功效着眼，荀子重视礼乐、政事、刑罚三方面的制度建设；从主体的精神境界着眼，荀子重视政治家的自我修养。政治功效与精神境界密不可分。正是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判定荀子的政治层级论述是一种境界论形态。

五、结语

霸道是否能够成为儒家的次好政治？这是孔子王霸论述留下一个理论缺口。针对这个理论缺口，孟、荀各自进行了思考，建构了不同的王霸论述。简言之，孟子王霸论述的基本立场是严格区分“王霸之辨”，荀子的核心主张则是崇王不贱霸。

孟、荀王霸论述的分歧源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判准。在孟子的“王霸之辨”论述中，王、霸被置于对立的地位，王、霸的对立是由于二者存在心术上的本质差异。孟子的政治哲学是以心术作为根本判准的，用孟子的话说，王、霸是“行仁”与“假仁”，或“性之/身之”与“假之”的差别，质言之，是真假之别。在荀子的王霸论述中，霸道被接受为仅次于王道的次好政治，这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是以政治功效作为判准的，而衡量政治功效的判准则是礼乐、政事、刑罚三项指标。王道是礼乐、政事、刑罚的全面实现，霸道则在礼乐上有所不足，仅存之国只靠刑罚维系，而灭亡之国则是礼乐、政事、刑罚三者都荡然无存。这意味着，王、霸、存、亡是依次递降的政治层级，王道其实包含了霸道的要求。荀子基于儒家立场，强调政治层级取决于政治家的自我修养。这样，存、霸、王从政治制度上看是层层递进的政治层级，从政治家的修养上看则是层层递进的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的王霸论述是一种境界论形态。

荀子的王霸论述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其基本旨趣是试图将孟子的王、霸对立论述转换为一种境界论述。至少从孟子以来，儒家王道就面临着“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批评，荀子的政治境界论旨在重新论证王道的现实价值。这一框架的特色在于，第一，荀子肯定了霸道重法治、信赏罚的正面价值，同时指出，儒家王道政治的根本特征“礼义”中包含礼乐、政事、赏罚三个要素，因而可以融摄霸道重法治、信赏罚的正面价值。第二，王、霸、存、亡是不同的政治境界，只有层级之分，并无本质差异。这样，荀子在理论上完成了儒家王道对霸道的受容，从而化解了王、霸之间的紧张。第三，荀子基于其“三要素”的客观判准，论证了王道是优于霸道的最高政治境界。第四，荀子以政治功效作为评估现实政治的判准，扭转了孟子以心术作为政治判准的主观性。根据荀子重新设定的判准，实施王道不只是一个主观的道德修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客观的制度建设和政治功效问题。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荀子的这种政治主张植根于他的美德与功利相统一的伦理学。参见毛朝晖：《荀子礼论中规则与美德统一性的宇宙论论证》，《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6期。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清初丹霞遗民舍山缘起

杨 权

[摘要]清初名僧澹归今释创建别传寺推动了曹洞宗中兴，改变了粤北的佛门格局，也塑造了今释本身；而该道场的开辟，与托迹于丹霞的明遗民舍山息息相关。清初，曾为南赣巡抚的明遗臣李永茂与从弟李充茂因归乡路断而买下此山，并命名为“丹霞”。其后山上聚集了一个为数可观的遗民群体。顺治十八年（1661），今释以供养师祖宗宝道和尚为由以偈乞山，而亦若居士姚继舜则以山酬偈。同年底，信仰佛教的山主李充茂在姚继舜等人的游说下写下《舍山牒》，把整个丹霞山都施予了佛门。遗民们之所以会放弃丹霞，是由于复明无望，而归路已通。而道德质量、文化修养、政治立场获遗民们认同，且在永历朝与李充茂曾为同僚，是今释成为丹霞山受施者的原因。

[关键词]丹霞山 别传寺 明遗民 澄归今释禅师

[中图分类号] G05；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41-10

本文所讨论的课题，涉及清初名僧澹归今释与明遗民在岭南的互动问题。今释是一位在俗僧两界都享有大名的传奇人物。他出家前是南明永历朝的臣子，出家后则成为曹洞宗的名僧，其事迹因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温睿临的《南疆绎史》等多种历史著作的记述而广为人知，在清修《浙江通志》《江西通志》《韶州府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番禺县志》与《丹霞山志》等志书中也有他的传记。他俗名金堡，字道隐，号卫公，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崇祯十三年（1640）成为进士，曾知山东临清直隶州。甲申鼎革后投身反清复明斗争，以斗士与诤臣的面目活跃于永历的政治舞台，是朝中的“五虎”之一，有“虎牙”之号。顺治七年（1650）他因上《时政八失疏》而遭政敌陷害，几毙命于锦衣卫狱，后因大臣鸣冤而得免死，被流放到贵州清浪卫。在赴戍所途中遇清兵南下，解卒弃押，乃得脱。在强烈的人生挫折感的支配下，他在广西桂林茅坪庵落发为僧，法名性因。两年后东下羊城，参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曹洞宗三十四世高僧天然函呈于番禺雷峰（海云寺），受具足戒，改法名今释，字澹归，从此成为曹洞宗博山系华首台一海云派的骨干人物。^①康熙七年（1668）元旦受函呈大法，为第四法嗣。康熙十七年（1678）以请藏出岭，事毕后病发，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九日示寂于吴门，世寿六十七，僧腊二十九。其骨灰被门人带回岭南，塔于丹霞山海螺岩，内阁学士徐乾学为其撰《丹霞澹归今释禅师塔铭》。^②今释的传世著作有《岭海焚余》三卷（均为出家前之作）、《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续集》十六卷（均为出家后之作），以及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日记》一册（残）。乾隆四十年（1775）

作者简介 杨权，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① 华首台一海云派由宗宝道独开派，按“道函今古传心法，默契相应达本宗。森罗敷演谈妙谛，祖印亲承永绍隆”的法偈演代，其领袖为天然函呈。

^② 文入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三十二，但在《续修四库全书》本中被删去。

闰十月，清高宗以其著述“语多悖谬”，诏军机大臣等在全国查禁之。

今释出家后的最重要贡献，是作为开山之祖，于康熙初年在韶州丹霞山开辟了粤北名刹——别传寺。这个道场的开辟，一方面壮大了以函是为核心的华首台—海云派的势力，推动了曹洞宗的中兴，同时也改变了粤北的佛门格局，使韶州形成了曲江南华寺、乳源云门寺与仁化别传寺三刹鼎立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今释本身，使他在后半辈子中有了人生寄托，并在经营此弘法修行基地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外僧内儒”到“亦僧亦儒”的转变。而丹霞山道场的开辟，与当时生活于山中的明朝遗民们的活动息息相关，是遗民舍山为寺的结果。本文即聚焦于这一历史事件，希冀通过翔实的材料与细密的考证，揭示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遗民李氏兄弟对丹霞山的经营

丹霞山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明清时由广东省韶州府仁化县（今属韶关）管辖，原是一座人迹罕见的荒山。山初无名，“一直以来，丹霞群峰都是各自为名。譬如双阙石、白寨、金龟岩、五马寨、人面石、巴寨、平头寨、燕岩、扁寨。”^①因有韶石峰位于古代南北交通的水道——浈江之滨，因此常被人总称为“韶石”。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八《溱水》载：“东江又西与利水合，水出县之韶石北山，南流径韶石下，其高百仞，广圆五里，两石对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双阙，名曰韶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五《岭南道》载：“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东衡州为韶州，取州北韶石为名。”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岭南道》引唐《十道志》：“隋平陈，为韶州，以韶石为名。”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九《岭南道三》载：“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东衡州为韶州，以州北八十里韶石为名。”至于山之主峰，则有“锦岩”“锦石岩”“长老寨”等称。丹霞山原本无名的事实，在清人的议论中也可获得印证。例如康熙时臧兴祖在《丹霞山志序》中谓：“考其初，此岩名者仅曰‘锦石’，而关名者仅曰‘梦觉’，未尝有‘丹霞’之称也。”^②广东布政使鲁超在《丹霞山志序》中谓：“丹霞者，韶阳仁化县之山也，初未尝名。”^③清初吴江名士潘耒在《丹霞山志序》中谓：“丹霞山在韶州仁化县境，……自明以前，山初无名，人迹罕到。”^④《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云：“自有山川以来，而兹山具在，乃其毓于浈阳者，历汉唐以迄于元明，皆未尝以丹霞显。”^⑤在明嘉靖诗人伦以谅的《锦石岩》诗里曾出现“丹霞”一词——“水尽岩崖见，丹霞碧汉间”，^⑥但那只是形容岩崖奇丽。

对连山名都付诸阙如的丹霞山的人文历史，人们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学者们只是从《丹霞山志》中得知，这座山在清初是明遗民李永茂、李充茂兄弟的私产。

对李永茂的生平，王夫之《永历实录》^⑦卷五《李文方列传》有如下记载。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阳人。中天启乙丑（1625）进士，历官中外，有能名。崇祯末擢金都御史。丁艰家居。李自成陷南阳，永茂与前布政使贺自镜携家避寇，南奔襄阳。……弘光立，永茂服阙诣阙见，仍以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州。^⑧贼阉王猪婆营据帘子洞寇掠汀赣，永茂会福建巡抚张肯堂讨平之。隆武中，万元吉受命督师江楚，守赣，永茂以母丧解官，侨寓岭南。及丁魁楚、瞿式耜定策戴土于肇庆，迎永茂协策。永茂至，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茂以终丧固请，式耜

① 侯荣丰：《丹霞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序第3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1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4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4页。

⑥ [明]胡居安：《[嘉靖]仁化县志》卷五，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六]，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⑦ 有湘乡曾氏同治四年（1865）金陵刊本。

⑧ 南赣巡抚全称“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驻跸之地在赣州（治今江西省赣州市），因古称虔州，故也称“虔抚”。明弘治十年（1497）始置，驻辖境屡有增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制，辖江西的南安、赣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清康熙三年（1664，一作四年）废。

奏：“永茂即欲终制、不予阁务者，皇上以冲龄嗣服，非耆旧之臣，孰与劝学，臣等捐躯，只办闻政，请命永茂专侍经筵，不及庶务，亦可令忠孝两存也。”永茂犹固辞，不得，乃受命。永茂因进讲，请召用人才，退而疏荐十五人，直省各举一人，御史刘湘客与焉。湘客忤内监王坤，坤方秉笔以朱斥之。永茂抚赣时，湘客客于赣，悉其才品，与相厚善。至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国势如此，而犹唯内竖意掣辱大臣，吾宁死草间，不能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拜表乞返苦次，即日解舟溯浈江，入仁化山中，郁郁以疾卒。

不过王夫之《永历实录》所载李永茂事迹，与《丹霞山志》卷六《嵩道人传》的所记有若干出入。

嵩道人者，故相李文定公别号也。公讳永茂，字孝源，籍河南邓州。登崇祯丁丑（1637）榜进士，知黎阳，有“神君”之颂。壬午（1642）擢给事中，号能直言极谏。奉使留都，闻燕京之变，一恸呕血斗余，誓以身殉匡复。乙酉（1645）迁虔抚。金陵再陷，章贡以下，在在失守，公控制上游，隐若敌国，湖东之师席卷抚、建，湖西之师电扫吉、临，盖有击楫鄱阳之望。旋值外艰，遂以全疆委杨公廷麟，而身治丧岭表。未几，天兴复陷，公决策拥桂王监国，宣麻入辅，屡奉墨衰之制，公执义固辞。戊子（1648），服阙趋朝。七月病于苍梧，属纩之际，犹谆谆作“驻跸虔州”之语。……公在谏垣，一击周廷儒，论求熊开元、姜采等；再忤马士英，皆批龙鳞、履虎尾，气不少慑。当国变家忧，两难自致之势，裁度忠孝，进退所宜，无尺寸自诡于矩彟；哀愤忧劳，歿而犹视，岂可不谓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哉！^①

同书卷六《外护传》并说永茂“历官至虔州开府，丁外艰，守制岭南。时值鼎沸，买山于仁化之丹霞，扶柩奉母避乱于此。后奉诏出山，拜大学士，卒于苍梧，谥‘文定’”。^②同书卷八李充茂《丹霞山记》又有“伯子讳永茂，字孝源，丁丑进士。仕明，官大学士，谥文定”与“伯子抚军虔州”^③等记载。比较《永历实录》与《丹霞山志》两书对李永茂生平事迹的介绍，在科举时间（一为天启乙丑进士，一为崇祯丁丑进士）、所任官职（一为金都御史，一为给事中）与辞世地点（一为仁化，一为苍梧）上有出入；而对传主曾在弘光朝为南赣（古称虔州）巡抚一事，记述则基本一致。无论如何，关于李永茂，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一，他是明朝的臣子，社稷倾覆后，他曾为明朝的匡复而奔走；第二，为避乱，他在清初曾托迹于粤北仁化县的山野中。

又，今释《徧行堂续集》卷八《一超道人墓志铭》序载：“丙戌（1646）秋，八闽陷，永历以桂藩正位号端州，文定用推戴功大拜，辞不入直，读《礼》于容。是冬趋北流，转徙于鬱林、博白，穷山深谷间，道人竭手足之力，全肤发，分荼苦。戊子（1648）夏，仅得麻鞋赴行在所。未至，文定卒于苍梧，力疾营丧，归葬仁化。”^④此为李永茂事迹的补充。

李永茂弟李充茂，字泛生，号鉴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据《徧行堂集》卷五《李鉴湖祠部六十寿序》），性情倜傥，好读书而不务章句，十八补弟子员。曾结客讲武，御寇于中原。弘光改元，预选贡，授推官，未赴调。从兄大学士李永茂抚虔，侍亲就医于广东南雄。清顺治元年（1644）冬，与李永茂在韶州府仁化县以百缗金买山卜隐。顺治六年（1649）在明永历朝中“以堵督师胤锡荐，授祠曹”。乱定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扶父、母、兄、嫂四丧北归，临行前撰《丹霞山记》，述经营丹霞始末，文载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八。因对丹霞感情极深，他在记中发誓：“倘得修途无阻，就窆先陇，两侄子获有宁宇，岁时伏腊，余不肖，期以一瓢一衲，重赋《归来》，与丹霞相始终。”^⑤而今释在《一超道人墓志铭》之序中提及，李充茂与他有“把臂入林，不越三年”之约，文载《徧行堂续集》卷八。

①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 61-62 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 61 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 116 页。

④ [明] 释今释：《徧行堂集》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 年，第 175 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 116 页。

后来李充茂果如诺入岭，只是“壬子（1672）始至”，在时间上晚了八年。再入岭后李充茂仍居于丹霞山的竹坡旧隐。后礼天然和尚剃染，法名今地（一作今池），字一超。复诣庐山栖贤受菩萨戒。最后示寂于丹霞山策竹岩。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有传。

关于李永茂买山仁化的缘起与经过，李充茂在《丹霞山记》中有如下记述。

物之遇合有时，是不能不重忆我先文定伯子矣。伯子抚军虔州，时于乙酉（1645）仲冬，闻先大夫讣，奔号逾岭，扶榇南徙，抵仁化界上，怆然曰：“兵燹载道，时变靡穷，当早厝吾父于万全。吾自庾岭至此，蜿蜒不绝，其有可以深藏者乎？余一家其奉先灵而止于是焉。”^①

也就是说，在天下兵燹、归乡路断的情况下，李永茂不得不在岭南寻一块地方来暂时安放亡父的灵柩。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兄弟二人来到仁化，他们从当地文士的口中获悉县东二十里有山峻拔奇丽无比，遂乘舴艋前往，攀藤木以登。经实地考察，李永茂对这座荒山大为赞赏，认为“是山也，有险足固，有岩足屋，有樵可采，有泉可汲，其亦避世之奥区乎！倘得牛眠之处，先人安厝，吾烟霞之癖，快足于是矣”！^② 于是以一百二十缗金（一说用一百两银子）买下了这座无名的荒山。

李永茂的家乡是河南邓州，古称“穰”，地属南阳府，其地有山名丹霞，是唐代禅门的传奇人物、曾在洛阳慧林寺烧木佛御寒的天然和尚的驻锡之地。满怀家国之思的李氏兄弟买下这座山后，见山岩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与家乡的丹霞山十分相似，故也把山名定为“丹霞”。鲁超《丹霞山志序》记其事：“公，南阳人也。南阳古有丹霞，为烧木佛胜地，公以此名山，其不忘故之心为可知矣。”^③ 在康熙年间曾捐资修建丹霞山御风亭的榷使蔡琦在《募修丹霞山别传寺磴道疏》中谓：“仁化之有丹霞，自李文定始也。”^④ 而《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亦载：“盖李公南阳邓州人也，古丹霞即其故居，公避乱于此，而又以忧去，取丹霞示不忘本也。”^⑤ 上述记录都把丹霞山的定名者归为清初的山主、南明遗臣李永茂。侯荣丰先生认为“丹霞山得名之谜已经难以考证”，^⑥ 这一说法与事实不合。

因北归无望，李永茂兄弟二人在买下丹霞山后，把它视为“避世之奥区”，为此不惜血本、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来经营之。他们披荆斩棘，辟山开道，“从入之路，石可凿者凿而梯之，不可凿者梯之以木，盖升天之无阶而有阶矣”；^⑦ 又在山上的宜居之地筑墙修屋、引泉挖井。经过一番努力，原本荒芜不堪的丹霞面貌一新，名声鹊起，引来了四方的许多志同道合者，其风头在当时甚至盖过了不少名山。李充茂曾感慨：“平日所称名胜，于中原、吴会之区者，正恐名公卿大夫冠盖渐稀，才子骚客吟咏亦歇，而幽人贞士高蹈远引者，亦不敢过而问焉。则终南、崆峒、姑射、匡庐、天门、姑苏，今日以与丹霞较，其不逮抑又远矣！”^⑧ “嗟乎，丹霞之山不自今日而始也，乃阒乎无人，寂寞者数千百岁矣。自伯子之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人丹霞是依赖焉，是岂不有天者存乎其间哉！”^⑨ 其言论反映了丹霞山名气的飙升。

二、《舍山牒》与《乞山偈》的冲突

从清顺治三年（1646）买山仁化，到顺治五年（1648）服阙趋朝觐见永历帝后病逝，李永茂在丹霞山实际上只住了两年，此后经营管理丹霞的责任便全部落到了其从弟李充茂身上。而李充茂作为继任山主在桃花源般的丹霞山上生活了十五年，直至顺治末年把山捐献。

①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4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1-2页。有趣的是，后来在韶州仁化丹霞山开法的祖师函显禅师亦号天然。于是禅门便有了“南北丹霞”与“前后天然”的互对。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0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5页。

⑥ 侯荣丰：《丹霞山》，第13页。

⑦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

⑧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

⑨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

李充茂舍山为寺的信息，见于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首所载《舍山牒》，其文如下。

匡岳名蓝，右军舍宅攸建；舒灝山麓，志公飞锡而栖。古今胜事同条，人境奇缘罕覩。恭惟澹归大禅师，道高德厚，性湛心虚，激浊扬清，有功名教，遗荣入道，直印心宗，为一代之全人，存两间之正气。充茂宿仰高踪，素承雅度，睽违多载，寤寐靡忘。比来重晤珠江，不啻亲游竺土。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充茂昔年同先兄永茂挂冠神武，买山而隐，用价百二十金，置仁化丹霞山一座。雄峰峭壁，势自凌霄，怪石奇岩，局堪建刹。群峦环峙，清江抱流，松韵吟风，竹阴弄月。不减桃源幽胜，犹倍罗浮高深。新置草堂，既足上佛；旧存茅舍，尚可栖真。悉举奉施，庄严最胜道场；向后圆成，遍注无边法雨。庶不负愚兄弟买山一片苦衷。祈择吉早临，俯慰宿愿，不胜瞻依引领之至！

顺治十八年（1661）小阳月，古穰法弟子李充茂稽首具。^①

《丹霞山志》卷八有一封今释撰写的《答李鉴湖居士启》，显然是对李充茂舍山一事的回应。

恭惟鉴湖山主才钟闲气，道出凡情。人伦作楷，名流之砥柱千寻；梵辅乘时，法苑之长城万里。今释囊廁同朝，幸邀未契；十年遥想，一旦重逢。念其迂拙，不宜久在廊中；有此高深，方便送还物外。未蒙紫玉之记，先获丹霞之净檀。金昆玉友，缔构千秋；跛象疲龙，逍遙半世。盖空老人望而未见，亦慙大师取之不能。敢意虚羸，遽兹忝窃。维持周币，曾看勒石之文；启请殷勤，便捧到山之券。猗与解脱，藉甚庄严。从前愿力，结成宝树金沙；此后心光，散作香云花雨。实古今之盛事，真宾主之荣观。川岩迥绝，即携清众以同归；钟鼓交参，总为高门而回响。感不能尽，词非所宣。^②

以上述两文为主要依据，现今许多关于丹霞山的文字资料与讨论别传寺创建过程的文章，都注意到了李充茂舍山为寺的史实。

但是《丹霞山志》在李充茂的《舍山牒》前面，还有一篇同样出自今释之手的《乞山偈》（有引），其文如下。

亦若居士所居长老寨、海螺岩山水佳绝，空隐老汉闻之四十余年矣。一日走海幢，无端谈及，忽遇莽澹归，冲口便道：“居士须将此山供养老和尚。”亦若唯唯，临别谓澹归道：“有甚偈颂，写纸与我珍藏。”澹归道：“我便有乞山之偈。”亦若道：“我即有酬偈之山。”今日漫书此，了昨日公案。成不成，倾一瓶，青原白家酒三盏，难道未沾唇。南山可移，此判不改。

是大长老，吹大法螺。有名无实，浩劫蹉跎。空隐老汉，亦若居士，一个下来，一个上去。全宾是主，全主是宾。澹归于中，充个牙人。这场买卖，如意自在。地涌金莲，天垂宝盖。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钟敲，莫将铜讨。谁其见闻，文武两行。葵轩总戎，园长侍郎。（亦若时客张镇台幕中，园长适在空老人坐次）^③

两篇文字所说，都是丹霞舍山之事，且受施者均为今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丹霞山的捐献者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舍山牒》与《乞山偈》两篇不同的文字？出现在《乞山偈》中的“亦若居士”是谁？他与丹霞山主李充茂是什么关系？

今释《答李鉴湖居士启》提到的“空老人”与《乞山偈》之引所说的“老和尚”“空隐老汉”是同一个人，他就是今释的师祖——岭南洞宗高僧宗宝道独。释道独，字宗宝，号空隐，广东南海（今广州）陆氏子。幼显慧，情钟三宝，闻梵呗音往往过耳成诵。自从老僧处知“见性成佛”之说，益向慕佛门。因读《六祖坛经》而初悟禅旨。十六岁结茅于归龙山，一住十载。二十九岁往博山谒无忌元来，获印可，遂接法，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世、博山二世。明崇祯三年（1630）离博山往匡庐。其后曾住博罗

①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3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页。

罗浮山华首台寺、福州长庆寺、广州海幢寺、东莞芥庵。清顺治十八年（1661）示寂，世寿六十二，法腊三十三。门徒以嗣法弟子函呈及函可最为著名，前者是今释之师天然和尚，后者是因在金陵“私携逆书”而被清廷流放到辽阳的千山剩人和尚。道独的传世之作有《长庆宗宝道独禅师语录》（收入《卍新纂续藏经》册七二，No.1443）六卷，书后所附函呈《长庆老和尚行状》与钱谦益《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对其生平事迹有介绍。

从《乞山偈》及引可悉，今释是以“供养老和尚”为由向亦若居士乞山的。二人的谈话地点是在位于广州河南的海幢寺；谈话时间在引中未明载，但根据相关资料可推定事情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前——很可能是年初，因为附在道独《宗宝道独禅师语录》书后的钱谦益《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载，道独于此年四月“由海幢返芥庵，自克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今释既然与亦若讨论供养道独的问题，说明其时道独尚在世。而偈注有“园长适在空老人坐次”之语，今释后来在《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一诗中也有“空隐老人坐海幢”“乞山酬偈一错愕”^①之句，更证明道独其时正驻锡海幢寺。

要弄清《舍山牒》与《乞山偈》的关系，须先辨明以“酬偈”方式对今释许诺献山的亦若居士的身份。从事理分析，一个人敢承诺将某物产施予他人，必须具有相应的物权。亦若既然敢对今释说自己有“酬偈之山”，那么他若不是该山的主人，便一定是获得了山主授权的代理人。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曾推测他可能是李充茂派来的朋友，而别传寺现任方丈顿林大和尚则怀疑他就是李充茂本人。^②顿林法师的推断很显然不正确，因为在李充茂的《舍山牒》中有“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之语。而下面的讨论证明，笔者之前的推测也不对。那么亦若到底是谁呢？查《丹霞山志》卷八，有一篇《晚秀岩记》，作者署“姚继舜亦若”，据此可知亦若姓姚，名继舜。在文中，作者说自己“于丙戌（1646）官江右湖西藩参，因与虔抚李君道同志合，谋一丘以自老”，遂至仁阳凿丹霞而居。^③而《丹霞山志》卷六《外护》介绍：“姚继舜，字亦若，海阳人。官至太仆寺正卿。携家避乱晚秀岩。”^④根据《丹霞山志》的这些材料，可悉亦若是当时与李氏兄弟一同卜隐于丹霞山的遗民，他是山东海阳人，曾在南明任官职。因与李氏兄弟志同道合，故一同来山隐迹。

顿林法师与笔者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认识偏差，是因为以为丹霞山只居住着山主李氏兄弟及家人——这也是很多人的理解。事实是，当时山中除李氏兄弟之外，还隐居着一大批不愿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丹霞山志》卷六《外护》便列有流寓十四人，并说他们“皆与李文定公兄弟同辟此山以避乱者”。^⑤而李充茂《丹霞山记》记述，李永茂在买下丹霞后，曾邀约大批志同道合的庄臣节士及梓里乡亲来山寄住。《丹霞山记》写道：“凡我故旧，风雨飘摇，伯子胥与居处于山中焉”，^⑥“自伯子至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人丹霞是依赖焉”，^⑦“韶郡丹霞山在仁化治中，绵亘逶迤，高数千百仞，即余与梓里诸君子今所托迹处也”。^⑧这些话，都是丹霞山上隐居着大量遗民的实录。《丹霞山记》还提到，当年追随李永茂“先后同志来处此者，如两岐贺君、亦若姚君、丹鸣朱君、羽明王君、若耶李君、美生韩君、樵谷张君、厚吾宁君、二酉陈君、文梦许君、经宇李君，暨余小子充茂，两侄灏、鸿，甥唐运泰，皆有室家仆婢，无虑千百辈，咸邀灵此山，以胎然于劫灰煨烬之外”。^⑨“无虑千百辈”一语，反映了当

① [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二，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② 释顿林：《丹霞纵横》：“……如此这般，亦若居士（俗名疑是李充茂）即将丹霞山作了奉献。”钟东：《悲智传响——海云寺与别传寺历史文化旅游集》，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序文第1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70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70页。

⑥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

⑦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

⑧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4页。

⑨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116页。

时山上人口的众多。这些隐迹于山的政治立场相同或相近的“同志”，就包括了“亦若姚君”——姚继舜。住山者除遗民外，还包括他们的家眷。《丹霞山志》卷八贺康平《水帘岩记》载，被贺康平带上山的家人共有三十二人；《晚秀岩记》载，姚继舜的儿子姚弘曾在山中参加土木营造；而《丹霞山记》也说，山中诸君，“暨余小子充茂，两侄灏、鸿，甥唐运泰，皆有室家仆婢”。《丹霞山记》还记述：“买山修筑，既竭余家之力，而同志诸君居此者，皆费结构焉。”^①这条材料说明，买山虽是李氏独家的行为，营造却有众人参与。李充茂曾在《丹霞山记》中还列出了一份买山与营造房子的钱财消耗清单，计共费银二千零一十两二钱三分。其中特别提到“晚秀岩，姚亦若住，创修共费银二百五十三两四钱”。^②而姚继舜则在《晚秀岩记》中如下谓。

戊子秋，余始从孝源复安堵此山。李居中山，余蹑迹而上。随余上者，则有侍御贺两岐，卜居水帘岩；分守苍梧道朱君丹鸣，卜居草悬岩；太行张君起一暨贡士韩美生，共居海螺岩。迤西过云度山下，则有处士孙、侯、李诸人，各为筑室。至于面南为雪岩，李经宇、周锡甫开基，而处有乳泉，经宇建阁于其上，奉龙王神而祀之。余乃卜晚秀岩而居焉。^③

这段文字细化了遗民们在山上开基筑室的事迹。亦若在《晚秀岩记》中还说到，他在经营晚秀岩的过程中，曾与后来故去的侍御黄基固、职方周瑚四“分辇金近百两买此山砦”。^④上面文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顺治时期的丹霞山上，隐居着一个颇具规模的遗民群体。正如李充茂《丹霞山记》附文、《芳泉记》、姚继舜《晚秀岩记》、贺康平《水帘岩记》，及胡学盘《大明岩龙王阁记》所记，这些遗民们对经营丹霞各有程度不同的贡献，因此对丹霞山也拥有分量不等的物权。亦若居士姚继舜作为他们中的一人所要捐给佛门的，实际上是丹霞山中由他经营的那部分区域，即海螺岩、晚秀岩、长老寨周边地方。

从《乞山偈》还可了解到，在姚继舜表示以山酬偈时，有一文一武两位见证者：^⑤武官“张总戎”是北直隶宣武人张国勋，号葵轩，曾在广东为左路总兵，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绪)广州府志》卷一〇及舒懋官修、王崇熙纂《(嘉庆)新安县志》卷一四下有传。文官“园长侍郎”则是东莞人王应华。王应华，字崇闇，号园长，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进士，历官嘉庆府教授、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浙江督学、右参政、光禄寺正卿、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曾与苏观生拥立绍武帝于广州，兵败后降清，后又出辅永历帝，拜东阁大学士。晚礼道独，法名函诸。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卷三二六、民国《东莞县志》卷六四有传。

姚继舜以海螺岩、晚秀岩及长老寨周边区域来酬今释的乞山之偈，是丹霞山与佛门结缘之始，同时也是后来李充茂等遗民舍山的前奏，这件事对丹霞山的发展走向与粤北的宗门格局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今释曾对姚继舜高度评价：“丹霞道场缘起出于亦若，即以此偈请生位入檀越堂中，故可百世不祧也。”^⑥

姚继舜的捐献在丹霞山导致了连锁反应，其他遗民纷纷步其后尘。在姚继舜与今释谋定“以山酬偈”后不久，深思熟虑而后定的丹霞山主李永茂也于同年十月到穗城与今释进行了接触。二人商谈的结果，是李充茂决定把整座丹霞山都施予佛门，供今释开辟道场。此事见载于《丹霞山志》卷二今释《丹霞营建图略》：“故虔抚孝源李公辟地于此(指丹霞山——引者)。辛丑十月，令弟鉴湖君来穗城以施余，严事三宝。”^⑦在其他文献中也被提及，例如《徧行堂集》卷九《募造锦石岩疏》载：“古穰鉴湖李子方以属

①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

⑤ 前引今释《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诗说“乞山酬偈一错愕，左右文武皆荒唐”，“左右文武”指的也是他们。

⑥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页。

⑦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6页。

余创别传寺，为静修之所。”^①当然，李充茂把丹霞山施予今释的更直接的证据，是上文所引述的《舍山牒》与《答李鉴湖居士启》。

在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往往把丹霞的舍山者李充茂混为李永茂。例如清鲁超在其《丹霞山志序》中说：“而（李文定公）适与澹公遇，相与有禾黍之悲。久之，遂舍宅为寺，而丹霞归之澹公，始为刹灵之图矣。”^②《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说：“夫文定公以乱去官，澹公以乱出世，文公贻之，澹公受之，遂若渊源接而衣钵传也，……是丹霞之待二公以传也，夫岂偶然耶。”^③清吴寿潜《游丹霞纪事》诗注说：“丹霞旧为李文定公孝源避世之所，后舍为丛林，因同朝而复同志，延澹师主之。”^④当代学者姜伯勤先生说：“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李孝源（永茂）、鉴湖（充茂）兄弟，以仁化丹霞舍与禅师辟建别传寺。”^⑤这些说法都不正确。须知顺治十八年今释受施丹霞时，李永茂谢世已超过十三年！

三、李充茂等为何施山于今释

李充茂在《舍山牒》中曾提到：“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⑥此语透露了一个信息：李充茂在舍山前，亦若、汉翀曾就献山问题做过他的工作。汉翀即汪起蛟，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卷四五《职官表三十六》与同治《番禺县志》卷九均载他为河南南阳人，贡生，清顺治三年（1646）任永历朝的番禺令。《丹霞山志》卷六《外护·法社姓氏》载：“水部汪讳起蛟，字汉翀，号磧石（与鉴湖同来同官，开丹霞因之）。”^⑦今释《澹归日记》曾多次提到他；《徧行堂集》卷八有文《汪磧石隐君七十初度序》，《续集》卷五有《祭汪汉翀水部文》、卷七有偈《寄汪汉翀》。根据上述材料，可知汪起蛟像亦若居士姚继舜一样，也是托迹于丹霞山的胜朝遗民。事实上正是汪起蛟与姚继舜的鼓动游说，才使李充茂形成并逐渐强化了舍山的念头。对汪起蛟与姚继舜二人在劝导李充茂舍山一事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今释曾给予高度肯定。他在其诗《喜得丹霞山赠李鉴湖山主》开头曾提及他与姚继舜之间“乞山酬偈一错愕”之事，而在此诗的结尾则说“论功若叙魏无知，大书莫漏汪磧石（自注：汉翀别号。吾由汉翀始知此山本末）”。^⑧魏无知是秦汉时人，在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陈平背楚，就是通过他与刘邦建立联系的，事载《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今释把汪起蛟比作魏无知，是强调他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李充茂舍山，汪、姚二人的鼓动游说作用是不能不注意到的。

李充茂献山佛门，内在原因则与他越来越坚定地信仰佛教有关。从今释《丹霞营建图略》可以判断，李充茂在来广州与今释会商之初尚非三宝弟子，因为今释对他的称呼是“鉴湖君”而不是居士，不过李充茂当时已表示将“严事三宝”。而在李充茂一个月后所作的《舍山牒》中，我们已见他自称“法弟子”，且牒文有“新置草堂，既足上佛；旧存茅舍，尚可栖真。悉举奉施，庄严最胜道场；向后圆成，遍注无边法雨”^⑨等语，说明他已皈依佛教。是以在《丹霞山志》卷八，今释在回应李充茂的入山之请时，称他为“鉴湖居士”。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今释的行书七言联拓本：“风过竹林犹见寺，云生锦水更藏山。癸丑初春为鉴湖道兄题。”把李充茂称为“道兄”，说明二人信仰是相同的。事实上李充茂不止是居士，通过《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进一步了解到他在“归穰州安厝丘陇”时就已“慨然有出家之志”，后

① [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一，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5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45页。

⑤ 姜伯勤：《澳门普济禅院藏澹归金堡日记研究》，《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8期，澳门：文化司署，1999年，第14页。

⑥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⑦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8页。又陈子升《中州草堂遗集》卷十三《酒酣赠汪汉翀工部》自注云：“曾为番禺令。”（香港何氏至乐楼丛书第十五）

⑧ [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二，第364页。

⑨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来果然于康熙十一年（1671）重入丹霞，礼天然和尚剃染，成了今释的同门法弟，法名今地，^①字一超。后来他还曾“诣栖贤受菩萨戒”，最后示寂于丹霞山簾竹岩。作为一名信仰愈来愈坚定的佛教徒，他自然要考虑如何“种福田”的问题，而舍山为寺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上乘的功德。

虽然《舍山牒》是李充茂所作，但是必须认识到，丹霞捐山并不是李充茂的个人行为，也是当时托迹于山的胜朝遗民们的一致心愿。上文已指出，清初在丹霞山隐居的人，除李氏兄弟外，还有一大批明朝的庄臣节士与李氏的梓里乡亲，因此李充茂不仅是丹霞山的山主，而且也是这些卜隐于山的遗民们的代言人。他在到广州与今释洽谈舍山的事宜之前，想必是与他们协调好了立场的。因为如果居住在丹霞的遗民们无意或不愿献山，李充茂就不可能成其事——哪怕他是山主；反过来，事情既已顺利推进，便说明山中遗民们对舍山一事并无异议。问题是，这些遗民们为何愿意舍山？山献给佛门之后他们将如何安身立命？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舍山的时间——清顺治十八年（1661）。这一年是清世祖在位的最后一年，也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彻底逆转的一年。此时反清复明运动虽还没有完全平息，但社会局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顺治十六年，走投无路的永历帝从云南遁入缅甸，南明在与清朝的抗争中愈来愈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顺治十八年，缅人发动政变，尽杀永历帝身边的大臣；年底又把永历帝及太后、王后、太子、公主等悉数交给了吴三桂。到这个时候，永历朝行将谢幕，反清复明运动所用以号召士民的旗帜眼见不再存在。入清之后，岭南所以麇集着众多像李永茂的追随者这样的胜朝遗民，一方面是因为天下战乱，北归路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遗民们一直想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等待“光复”。而一旦大势已定、复明无望，他们便会放弃幻想，把出岭回乡提到议事日程上。笔者注意到，正是在这个时候，岭南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遗民北归潮。这个事实可在《丹霞山志》中获得印证。在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间，因世乱已止，李充茂遂决定“奉先大夫遗嘱，扶榇北归”。^②《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也有他“乱后归里”的记录。因为不知自己此去之后是否还会有机会南来，为了让后人了解丹霞山的开发史，他在临行前写下了著名的《丹霞山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记述了山中的形胜及李永茂买山卜隐的始末。由于对自己曾经营了多年的丹霞山怀有很深的情感，李充茂返乡数年后又重返岭南。虽然许多遗民也像李充茂一样对丹霞山抱有情感，但正所谓“落叶归根”，当归回家乡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之后，大多数人就一去不返了。顺治十八年，姚继舜曾写下《晚秀岩记》，自述其卜居丹霞的经过，在文中他伤感地说：“他乡之客，谁无故土之思？余将归里，安得再有此山可买而为隐潜之计，如凤阙之高蹈而远举乎？”^③正因为已确定回乡安度余生，他才把晚秀岩、海螺岩及长老寨一带地方赠给“莽澹归”。而李充茂的同乡、曾把一家32口人带到山上的贺康平则记道：“忽辛卯（丑）（1661）春三，仆自河南来迎，屈指衡阳雁断已十年矣！主仆相顾骇讶，虽乡音未改，而鬓发殊斑斑白也。遂束装归里，曩之偕行者，今仅存九人。”^④这些文字都反映了当时山中遗民们的心情与动态。遗民们北归之后，丹霞山作为“避世之奥区”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这座将被废弃的大山，便成为了摆在遗民面前的现实问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它施予佛门，显然是最好的安排。潘耒《丹霞山志序》“乱定（遗民）还故里，而故给谏金道隐弃官为僧号‘澹归’者居之”^⑤之记，所述说的便是这种情况。

至于遗民们的施山对象是今释而不是其他和尚，则与今释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政治态度与社会角色等有关。首先，今释作为一代名僧，具有比一般的出家人高得多的道德品质与文化修养。他出家前曾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人耿直敢言、富有正义感，且吃苦耐劳，做事具有献身精神，因

① 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作“今池”。

②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

③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0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1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4页。

此在僧俗两界早享有大名。李充茂曾在《舍山牒》里说他“道高德厚，性湛心虚，激浊扬清，有功名教，遗荣入道，直印心宗，为一代之全人，存两间之正气”，并坦言正是由于“宿仰高踪，素承雅度”，才让他做出了把整个丹霞山都赠给今释的决定。^①其次，今释本为明朝的进士，出家前是永历的臣子，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不遗余力地为反清复明事业奔走；出家后虽不再与闻现实的政治事务，但在内心深处其实依旧是向着明朝的。这一点从他后来与李充茂共谋在丹霞山的策竹岩建祀明朝殉难烈士的“正气阁”一事即可获得证明，^②他在当时与身后都被人视为“遗民僧”道理亦在此。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同的政治立场使他天然地具有与隐迹于丹霞的遗民对话的基础，而思想情感的投契也使双方很容易沟通。因此，在丹霞遗民们的心目中，他是受施的不二人选。最后，在今释与李充茂之间，还存在着一层非常特殊的关系。据今释《一超道人墓志铭》(有序)记载，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李充茂“以堵督师胤锡荐，授祠曹”，^③曾在永历朝任官，与今释为同僚。故在《丹霞山志》卷八今释《答李鉴湖居士启》中，有“今释曩厕同朝，幸邀未契；十年遥想，一旦重逢”^④之语；在《丹霞山志》卷九今释《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一诗中，又有“十三年前与君别，多少披离得相见”^⑤之句；《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载，今地(即李充茂)曾“与澹归和尚同事，称声气之雅”；^⑥而李充茂在《舍山牒》中也说到他与今释“睽违多载，寤寐靡忘”。^⑦这层特殊的关系，是我们在研究李充茂舍山与今释受献的原因时所不能不注意的。

李充茂等的慷慨施山，使今释在出家多年后终于将结束行脚僧生活，有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弘法修行基地，因此他异常兴奋，曾作长篇七古《喜得丹霞山赠李鉴湖山主》志其事。诗中有“今朝真见吾山主，未曾下口心先与。果然一诺重千金，回首红尘在何许”^⑧等句，对李充茂赞扬备至；并谈到了自己从出家到受山的种种经历与感受。

清浪军汉时出家，芒鞋踏破天之涯。金轮峰上才然头，扬子江心罢试茶。贯清堂捧栖贤令，脚挂风筝难自定。万年持钵了残经，梅岭扶筇发归兴。粥饭参苓且信缘，山林城市长奔命。雷峰无客助新工，宝水有人修旧恨。旃檀荆棘各丛林，珠玉泥沙同破甌。世上薪抽世外炉，霜朝面改花朝镜。自惭薄德暗低头，毕竟由人不自由。何时一曲理孤影，双眼看云万事休。不谓此山落吾手，恰好全身藏北斗。四岭天王俱现形，一林师子皆开口。蒲团坐地百花新，琉璃照夜孤峰走。独磬萧然散白云，五刑狂煞悲黄狗。狂歌为拜主人翁，片片烟霞手自封。敢信入廊犹有事，从来挂角更无踪。他年欢喜思今日，峰顶月华连海碧。同侪笑指翠苔文，一寸孤心千里结。^⑨

在正式收到李充茂代表丹霞山遗民写下的《舍山牒》之后，今释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三月二十四日从广州飞锡韶州，从此躬披蒙茸，剪荆棘，筑殿宇，建寮舍，募常住，开始了其在丹霞山开辟别传寺的长达18年的艰苦经营。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② 《徧行堂续集》卷五《募建正气阁疏》明确说建阁“盖取文文山作歌之指奉诸死忠于明者”。而清陈玉猷《蓬亭偶存诗草》卷二诗《晚登正气阁》有注：“闻澹大师建阁时，欲以祀明殉难诸人。传以人言中止，改祀关侯”。

③ [明]释今释：《徧行堂集》四，第175页。

④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3页。

⑤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6页。

⑥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0页。

⑦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⑧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6页。

⑨ 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7页。

政 法 社会学

·健康中国与社会发展·

“被围观的私语”: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能动性书写、叙事治疗与意义生产*

陈 刚 王 卿

[摘要]以豆瓣小组中的“癌症日记—2017”和知乎的“癌症日记”为研究对象,以“能动性”概念为视角,聚焦癌症患者及家属在网络社区中的疾病经验的能动性书写和自我叙事,有助于分析其具有的个体自主性和社会交互性特征,以及意义生产和自我认同的建构。面对癌症疾病和身体风险,病患透过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叙事思考疾病与身体、生命及社会的关系,以能动性叙事重建自我认同,并以自我叙事为媒介在网络社群中获得社会支持,进一步凸显网络对病人或家属的赋权效果。

[关键词]癌症经验 能动性 叙事治疗 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64;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051-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350万,死亡病例超200万,肺癌、乳腺癌、胃癌等是最常见的癌症。癌症防治难度大、疾病负担重,已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①因此,癌症患者及家属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而传统社会网络所提供支持的有限性则无法有效疏解患者及家属的困境。从社会层面看,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癌症也不只具有生理疾病这一单一意义,它与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历程有密切关系,由社会所建构。作为疾病的癌症也是与社会、文化、心理等紧密关联的一种隐喻和成见,“不把癌症仅仅作为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一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不仅使癌症被看作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②这也使癌症患者及家属还遭遇身心压力之外的社会压力。

当下互联网在健康领域的渗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健康传播与沟通的环境。丹麦学者夏瓦(Stig Hjarvard)指出,在日益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现实中,新的媒介技术作用于日常实践,从而影响制度惯例的重构、社会规范和文化惯习的重建。^③互联网与健康的密切关联,以及病患及家属运用新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争议性议题传播的共识焦虑与沟通机制研究”(21AX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刚,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王卿,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讲师(江苏徐州,221009)。

① Lancet Global Health:《中国癌症12年大数据,癌症生存率变化大》,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80510/content-503170.html>, 2022年4月15日。

②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75、53页。

③ [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35页。

介参与的交流实践则是“健康媒介化”的重要表现。健康“媒介化”体现了新媒体对健康领域各种现象的影响，也改变了交流与互动的方式。一方面，网络时代的传统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日渐由现实社会向虚拟空间转移。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使得它既是人们接触健康及医疗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又是有相似疾病经历的人分享自我经验的工具和空间。^①另一方面，互联网也赋予病人新的命名和意义，有学者提出“e—病人”（e-patients）的概念，强调慢性病患者转向网络空间来寻求帮助。^②有学者提出“网络化病人”的概念，意指“通过互联网搜索、分享疾病经验而获得疾病认同的病人身份”，强调因健康认同而形成彼此间的联系。^③由此，互联网的生产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开拓了健康行为和患病经验分享的新空间，成为癌症患者和家属自我表达、获取支持的重要途径和互动平台。

互联网时代患者或家属潜入网络空间书写和分享疾病体验与心理困惑，及寻求社会支持等交往行为，既是将私人癌症经验网络公共化，也是将自我体验、感受、想法转变为现实行动的一种能动性行为。在疾病与健康传播领域，“能动性”（agency）是一个重要概念。按照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研究，病人“能动性”指的是病人的主观意识不断凸显，并调整自我来解释并适应疾病发展，疾病叙事结构可以连接身份与主体性。^④病患的疾病叙事被认为是病人“能动性”的体现，它在医疗社会学和医疗心理学中都占据重要地位。^⑤病患的能动性叙事过程融入了个体对待疾病方式的变化以及重新认识疾病本身，促进个体主动改变自我认知和行为。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发，选取有代表性的癌症经验分享的网络社群，探讨能动性叙事如何透过网络空间中的叙事建构自我及意义生产问题。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网络社群中的癌症患者或家属关于疾病经验的自我书写及评论。通常，普通人最为普遍的自我书写形式是日记，因此，本文的文本搜集聚焦在病人或家属的“癌症日记”，文本挖掘和采集过程如下。首先，根据国内网络社区网站的影响和排名情况，选取了影响大的排名前2位的具有网络社群性质的豆瓣和知乎作为考察对象。其中，豆瓣创办于2005年，作为国内目前最大的社交和知识社区网站，其内容都是由用户提供（UGC），是综合了blog、交友、小组、收藏等多种服务的新型社区网络，其服务功能包括豆瓣读书、阅读、电影、音乐、小组和同城等，其中豆瓣小组定位于“对同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人的聚集地”和话题广场，内容包括文化、娱乐、时尚、科技和旅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户可以发布内容和浏览互动。知乎创办于2011年，是互联网问答社区和创作者聚集的原创内容平台。2021年知乎发布的用户数据报告显示，成立10年以来，知乎已经积累了超过4400万个问题和2.4亿个回答。^⑥在这两个社区网站上以“癌症日记”“癌症记录”“抗癌日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豆瓣上搜索到相关度最高的为豆瓣小组“癌症日记—2017”。这也是豆瓣小组同类主题中成员最多，也最活跃的癌症经验讨论小组。在小组内筛选病人或家属关于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文本，去除广告软文和不相关的内容，以单个用户为单位共搜集到有效日记文本252个。在知乎上，先搜索到与主题相关的文本，剔除商业营销性文本和不相关文本，然后从相关文章中追溯癌症患者或家属用户，进入主页搜集“癌症日记”（包括“癌症记录”“抗癌日记”“陪伴日记”等）及其他用户的反馈，以单个用户为单位共搜集到有效日记文本386个。总体而言，知乎的“癌症日记”参与用户较多，互动活跃性高，但相对于豆瓣的小组形式，知乎的癌症日记则无固定的形式，主要集中在“话题”栏目中。豆瓣小组的“癌症日记—

^① B. Kim and D. M. Gillham, “The Experience of Young Adult Cancer Patients Described through Online Narratives”, *Cancer Nursing*, vol.36, no.5, 2013.

^② Tom Ferguson and W. J. Kelly, *E-patients prefer E-groups to Doctors for Ten of Twelve Aspects of Health Care*, Ferguson Report, 1999, p.1.

^③ 苏春艳、吴玥：《“网络化病人”：互联网对患病行为的影响研究》，《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

^④ David Armstrong, “Actors, Patients and Agency: A Recent History”, *Sociology of Health Illness*, vol.36, no.2, 2014.

^⑤ 何雪松、候慧：《“过坎”：终末期肾病患者的疾病体验》，《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⑥ 《“我的知乎十年历”用户数据报告》，知乎网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40730790>，2020年12月18日。

2017”和知乎的“癌症日记”有效用户总计638个，日记超过5万篇。日记的叙事主体主要为癌症患者或家属，其中以家属居多。在内容上主要记录患病过程和治疗经验，以及家属的陪伴抗癌体验等，这些癌症经验的网络书写具有鲜明而特殊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叙事特征。

三、能动性叙事与“被围观的私语”：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社会性

(一) 能动性叙事：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个体性与叙事治疗

癌症经验的网络书写是癌症患者或家属自我体验的一种个体叙事。通过对癌症经验网络叙事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叙事与自我之间的意义关系。因为叙事与自我之间存在着强烈关联，即自我是一个叙事的统一体。人是能动者，而人的能动性源自一种叙事的努力。叙事是理解自我的基本方法，将自我看成一个叙述者，意味着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反过来又影响了我的生活。叙事不仅是我们在回顾往事时讲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们活出来的东西。^①

叙事是生活和经历的一种表征，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中患者或家属主要讲述的是个体患病的经历、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或是患者家属陪伴抗癌的经历与体会、感悟等。这些故事的书写和讲述既体现了叙事者自身的能动性，也反映了自我叙事的个体性和反思性特征。古德森（Ivor Goodson）等认为“能动性”在叙事中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人的内在对话是一个人界定个人思想和行动轨迹的所在，也是创造他们个人故事和生活使命的所在，而这个“所在”位于一个人学习和理解自己身份认同的布局图中心。^②癌症经验的网络自我能动性叙事带有强烈的自主性、同一性和本真性。患者或家属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以自我经验为视角，自发自主讲述个体的故事，阐释和重构个体的经历和行为，这些叙事者也具有同一人格和相似经历，从而使故事具备了可理解的基础和可能性。“自从确诊癌症以来，我就坚持每天写日记，我希望把这一段人生经历记录下来。”（知乎用户，“Serman”）同时，患者或家属讲述的都是特殊情境下亲身经历的故事，也使癌症经验的网络叙事具有沉重的本真性和反思性。戈尔迪（Peter Goldie）认为，叙事不仅包含了事件也包括参与事件的人，同时还具有特定的视角，从而使这些要素呈现出一种叙事的结构—连贯、富有意义，带有评价性和情感性的输入。^③癌症经验的网络自我叙事包含和体现了讲述者真情实感和“苦痛”，以及对自我与疾病、健康、社会之间关系的体悟。

另一方面，从个体心理角度理解，患者和家属的自我叙事具有潜在的心理治疗的效果和作用。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摆脱了传统上将“患者”视为问题的治疗观念，透过“故事叙说”“问题外化”“由薄到厚”等方法，使人变得更自主更有积极性。其中，“患者”的故事叙说是治疗过程的中心，透过与治疗师之间的自主互动，让叙事者重新认知、叙述和建构自我的人生经历，从而获得心理的疏导和治愈，开始新的生活。在叙事疗法的创始人怀特（Michael White）等看来，在“患者”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的过程中，书写传统是很重要的机制，叙事中那些用白纸黑字写下的经过筛选的事件与意义，用于治疗的信件与证书等很具体地促成人重新去创造新的、令人得以脱困的叙事，从而使相关者的生活大大解脱、有变化。而作为心理治疗的问题外化具有减少无益的人际冲突，降低失败感，让人互相合作，共同面对问题，打开新的可能，促使改用较轻松、没有压力的方法看待问题，提供对话的可能等作用。^④因此，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中网络空间的故事叙说，“人不等于问题”的心理外化暗示与治疗，有利于释放和缓解叙事者的身心压力，消除污名化和减少自责，帮助叙事者重新生活。这方面，作为问答社区的知乎上的“癌症日记”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叙事者通过提问和互动的方式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中，“围观者”在一定意义上就是

^① 张容南：《叙事的自我：我们如何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24页。

^② [英]艾沃·古德森等：《叙事学习》，方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页。

^③ Peter Goldie, *The Mess Inside: Narrative, Emotion and the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

^④ [澳]迈克尔·怀特等：《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廖世德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治疗师，故事叙说和评论互动则是治疗过程。“说出来，写出来，虽然有点像流水账，但感觉轻松多了，身上仿佛也不那么疼了！”（知乎用户，“夏陌”）简而言之，叙事者透过癌症经验的书写和故事讲述将内在的情感、心理感受等转化为外在的、可以被感知的符号文本，在被“围观”和互动中寻求情感共鸣和心理的抚慰与理解，从而使自我叙事具有疗愈的特殊意义。

（二）“被围观的私语”与自我叙事的社会性：书写即交流，围观即力量

进入网络公共空间的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文本”性质，其个体自我的叙事成为“被围观的私语”，具有社会性。网络的社交可供性在促成症状认知、病痛体验以及疾病认同方面，发挥了群体聚合、共同经验乃至集体行动的重要功能。^①同时，网络 blog 是用户书写并处理疾病的空间，是健康议题资讯来源之一；用户的自我书写具有获取社会支持、更好地面对疾病及处理疾病带来的苦痛等功能。^②另一方面，新媒体赋予病人的健康话语权，打破了传统医患之间的权力关系，普通病人甚至可以成为“外行专家”。^③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叙事，既是表达和建构自我的途径，也是与其他网络成员连接和进行社会性生产的中介。

第一，“更新即活着”。对患者而言，网络社群自主化的内容生产，书写自我的生命痕迹，以叙说存在和保留记忆。鲍曼认为，现代社会处于“流动”状态，变化成为常态，个体常常感知到事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自我反思成为一种日常行为。^④癌症的不确定性带来患者对死亡的感知越来越近，患者对癌症经验的书写既是一种反思式的自我交流，也是面对风险应对死亡的一种策略。死亡是焦虑的原始来源，患者在书写疾病经验的同时，也在重新审视生命价值，个体在自我书写过程中表达压抑的情感，努力营造有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自我，从而直面生存的焦虑。“自从癌症确诊后，每天总想写点东西，记录一下，也是想告诉朋友们我一直在。”（豆瓣用户，“星河”）因此，癌症经验自我叙事的过程是与心理互动获得意义的过程，也是书写者萌发自我意识和追求主体性的外在表现。病患个体叙事文本的每次“更新”具有强烈的生命仪式感，并与社会保持连接。

第二，“我们都是陌生人”。网络的匿名属性能够扩展自我披露的边界，增强自在感。一方面，它为用户提供了卸载现实社会交往中“前台”表演的外衣，呈现更多“后台”真我的技术基础，即面对虚拟化的陌生人无需伪装坚强，也可表露脆弱的自我；另一方面，这种“我们都是陌生人”的心理同一性，也建构了相互之间的弱社会关系。这也是患者和家属选择知乎或豆瓣等网络社区书写患病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别人面前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指引者，在这里，我想软弱，因为我们都是陌生人！”（知乎用户，“从头再来”）可见，在遭遇癌症时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往往需要“表演”，目的是维持正常参与日常生活的形象，而面对网络中的陌生人则无需如此。癌症经验的自我书写成功将个体化的疾病经历引入开放的网络交流空间。同时，网络匿名性为病友用户带来了安全的“弱关系”。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中提出弱关系理论，强调弱关系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可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和交往互动。^⑤通常，面对压力或威胁时，个体往往倾向于将强关系作为重要寄托，但当强关系成员缺乏相似经历或与之讨论引发不适时，弱关系就成为强关系的替代品。网络匿名性则使患者和家属通过网络虚拟空间构建弱关系，降低人际风险和回避社会复杂性，从而提高了交互安全性和人际舒适度，也增加了网络社群的活跃度和持续性。

第三，“分享经验，共同抗癌”。网络的交互性使得自我叙事文本转化为书写者和观看者的交流中介，自我叙事激发了书写者及成员间的社会支持，重建社交关系和群体认同。有学者提出社会支持行为编码

① 苏春艳、吴玥：《“网络化病人”：互联网对患病行为的影响研究》，《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

② 陈忆宁：《“我”即是来源：癌症部落客的书写研究》，《新闻学研究》2011年第106期。

③ Hoybye, Christoffer Johansen and Tine Tiornhoj-Thomsen, “Onlin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Storytelling in an Internet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 *Psychooncology*, vol.14, no.3, 2005.

④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81页。

⑤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 no.5, 1973.

模型 (SSBC)，将社会支持分为 5 类：信息支持、现实支持、情感支持、尊重及团体性。^①许多书写者明确表示，通过分享疾病经验帮助其他病友是自我叙事的动机之一，主要为其提供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叙事文本呈现治疗细节与过程，对“围观者”来说是一种信息参照；表现出的不屈服、不放弃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情感鼓励。取得抗癌成效的书写者具有更为显著的亲社会行为特征，他们往往能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信息，例如，豆瓣用户“denko”发布“作为家属不得不知道的 N 个癌症知识点”，豆瓣用户“203200575”发布并翻译了治疗癌症的学术论文，其话语在医学专业术语和个人表达之间来回穿梭，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行专家”。同时，“围观者”对书写者的信息性建议和情感性鼓励，或直接评论、或发送私信、或点赞，对于书写者也具有重要意义。书写者渴望得到反馈，这种反馈互动是个体保持自我书写连续性的动力。书写者和“围观者”的身份在癌症社群中不断切换，在交互中形成了新的社交关系。“我们相互鼓励、传授治疗经验和应对方法，慢慢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因为我们比身边人更懂彼此的心情，更珍惜彼此。”(知乎用户，“healer”)

总体而言，网络社群为患者或家属提供了一个获取各方面支持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健康的潜能。病患在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叙事和交流互动是形成网络社交关系和社会支持的关键要素。信息和知识交流是基础，情感是纽带。患者或家属基于同一性的目的参与其中，透过相似的能共情的故事经历，以自我书写与反馈的形式，建立彼此间的信任、理解和认同感。

四、意义生产：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中的身体、生命与认同建构

(一) 作为“主显节”的癌症确诊：出乎意料的患病与生命的不确定性

患癌往往成为个体甚至家属生命中的“主显节”(epiphany)，并且还包含诸多二级“主显节”，例如癌症确诊这种关键节点。“主显节”来自爱尔兰作家乔伊斯 (James Joyce) 的小说，它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异教徒面前现身。邓金则进一步拓展“主显节”意涵，意指那些可能彻底扭转当事人生命的危机时刻或生命中的转折点。^②每个用户在书写诊断过程经历时，都会凸显癌症确诊事件，这类事件和节点的凸显也是一种“主显节”叙事。癌症经验书写中的“主显节”叙事，将患癌建构为打破个体或家庭正常感的事件，即异常的身体诊断结果撕裂了原有正常的生活世界，使生命面临不确定的情境。面对这种“主显节”事件，病人和家属的心理和日常生活往往会遭遇冲击、断裂或危机：“看到报告的时候来不及震惊，眼泪就磅礴而出，晴天霹雳一般爆在头顶。”(豆瓣用户，“lcxandcxl”)“主显节”叙事一般具有明确的时间定位，使用具有营造戏剧性紧张氛围的词汇。上文用“爆”“晴天霹雳”等表示冲击性和断裂性的词汇来营造冲突性的紧张氛围，并且投入了深度的情感参与：“震惊”“眼泪”等。同时，个体在书写癌症确诊这种“主显节”事件时，还表达了癌症风险对未来、生命等的威胁，即疾病引发自我不确定感，自我不确定就是对自身和自己的知觉、态度和价值的不确定。^③

“主显节”事件作为生活和人生的关键节点，使患者及其家庭生活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个体原有的生活脉络发生断裂，原有的基本生活信念也破碎，不可控制感和不确定感突增，更为沉重的是由此面临因人生和生命的不确定而产生的焦虑、不安和恐惧。自我不确定的状态让个体产生不适感，从而驱使个体寻求方法来降低这种感觉，也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自我书写疾病经验这一行为本身，就有助于释放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因自我不确定状态带来的不适感，一方面，可以成为负面情绪的出口；另一方面，利他型的书写，对人生和生命的理解与反思，以及明确表示分享自我经验为其他病友或家属提供患病参考等连接社会的支持，也是个体重新挖掘患病后自我价值的表现。

(二) 身心苦痛与身体“残缺”：常识性现实的瓦解与自我认同的危机

^① Carolyn E. Carolyn and Julie A. Suhr, “Controllability of Stressful Events and Satisfaction with Spouse Support Behavio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19, no.2, 1992.

^② [美] 诺曼·K. 邓金：《解释互动论》，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③ 权珊珊、晏碧华等：《自我不确定性、认同复杂性对群体认同影响的实验研究》，《心理研究》2015年第1期。

患者对自我“身体”的体验与审视也是癌症经验自我叙事中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能动性书写现象。依据身体社会学中的身体观，“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同时具备意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维度，社会结构和实践调节且形塑着慢性病人的身体以及生活世界的摧毁。^①美国学者古德（Byron Good）运用现象学的理论通过对病人的身体经验考察，将健康人经历与体验的生活世界概括为“常识性现实”，而癌症等慢性病苦痛则导致这种常识性现实的全面瓦解。^②

其一，身体疏离于能动的自我。在医疗空间中手术、化疗等癌症医学治疗过程，使身体与自我的分离感增强，迫使病患发生自我认识的改变。福柯则将医院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规训机器，医疗器械规训着患病的身体，身体和自我的脆弱凸显：“躺倒这么些天，各种机器往身上上，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成了废人”。（豆瓣用户，“已注销”）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对患者身体的检查等“监视”，打破了个体的隐私边界，“被监视者”不得不调整自我认知来接受这种“注视”。“没想到更羞涩的还在后面，换药的时候居然要把上衣脱掉一半！我不断对自己说：‘不要把自己想成一个人，一个女人，你就是一坨肉！’”（知乎用户，“美好兔”）其二，作为身体和心灵的“诉说”，癌症经验的自我书写是一种或隐或显的个人生活史的叙事，传达出个人、家庭和社会关系等众多信息。^③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癌症患者对“正常社会人”身份的认同危机。一方面，自我感知到“残缺”或“不完整”的身体，将个体推向自我否定的深渊。“残缺”的身体不仅是一种生理性身体和感受，还涉及身体形象的呈现，它与社会规范建构之下“正常”的身体标准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关系到主体的自我认同，即将现有的身体与正常的身体做比较，对是否还是一个“正常人”的认同。^④病患的自我书写中常提及的身体“残缺”主要包括手术器官切除和疤痕、化疗头发脱落和肤色改变（变黑）。掉发和肤色改变是影响身体形象呈现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它们作为癌症治疗的后果并不会带来疼痛，却作为一种标识“不健康”的重要符号。病患主体的“不正常感”被唤醒，“正常人”身份则丧失。另一方面，外界的社会性因素则进一步加固了癌症患者的“不正常”身份。“昨天去了社保局，弄了特殊病种，这四个字真的好刺眼啊！”（知乎用户，“抗癌少女”）。这种来自社会管理机构对癌症的认证“标签”，强化了患者“不正常社会人”的自我感知。同时，癌症本身被污名化的疾病被人为地加上了诸多隐喻，这些隐喻成为患者治疗的障碍，甚至成了负担，^⑤同时在社会交往中与原有社会关系发生脱节。出现这种状况的因素不仅包含社会排斥，还有患者本身的不情愿。即使是来自家庭的关心关爱也会让“癌症患者”身份在人际互动中更加凸显。“这几天身体好了，特别能感受家人畸形的关心……他们不懂，同情和怜悯比疾病本身的疼痛更可怕！”（知乎用户，“13611704340”）因此，自我、家庭、社会等因素共同建构了患者的“不正常社会人”身份，也导致患者自我认同的危机。

（三）后创伤性成长：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与自我认同的重建

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提出“马赛克化”的比喻，来形容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因为危机和剧变作为个体的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同时创造了外在与内在压力，这激励个体需要选择性变革，寻找解决路径应对危机，以适应余下的自己。^⑥这种状态适用于描述饱受癌症苦难的患者和家属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重新审视自我，历经疾病后的新身份和患病前的旧自我“马赛克化”地共存，从而重新评估生活的世界，以确保生活和人生的延续。“这一年，失去了曾经的秀发，永远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失去了对新生活的自信和健康；收获了癌症病人的终身标签，收获了崭新的

① 吕文江：《病患何以能被看作审美对象：读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② [美]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吕文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③ 王静：《叙述、型塑与纾解：末期癌症患者的疼痛研究——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华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④ 黄盈盈、鲍雨：《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社会》2013年第2期。

⑤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2页。

⑥ [美]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页。

寸头，收获了朋友同事的关心，收获了更好更稳的心态，收获了惜命的自己。”（知乎用户，“活得不如一只猫”）

尽管有研究者指出，与疾病共存有多种方式：忽视它、将之最小化、与之抗争、与之调解适应、与之拥抱。^①前两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在网络中主动书写患病体验的用户群体，正是因为无法忽视癌症对生活的影响才转向网络空间寻求解决之道，更不用说拥抱癌症了。面对疾病，他们经历着恐惧与抗争，但最终状态是与之适应或协商，“与癌症妥协”是最终的生活写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癌症产生的后果是陆续出场的，个体对它的适应具有往复性。慢性病对个体的生理威胁和社会影响可以称之为“创伤”，涉及个体生活世界的崩塌，解体后的人生处于一种“后创伤状态”，它并不一定导致身心异常，具有正向成长与意义赋予的可能性。^②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中患者的自我认同和意义赋予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经历苦难和创伤之后对生活和生命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和认识，他们改变了对情境的解释方式，或理解人生道路的曲折，或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二是患者将疾病的创伤经验理解为一种动力，本身的信仰或人生目标被改变，曾经追求的社会价值让位于个体的生命价值。三是一些病患结合自身的抗癌经验，通过实施利他行为而成为施为者和帮助者，在自我书写中整理癌症攻略和抗癌经验，为其他“战友”提供信息支持，是患者用户最为常见的利他性社会行为，透过这些重新启动自我价值和建构自我认同。

五、结语

互联网的虚拟性和社交可供性为病患和家属提供了自我叙事分享患病经验和信息交往的新空间。网络空间和社区中“被围观的私语”既是病患和家属能动性的自我建构，也是获取社会交往和支持的重要途径，癌症患者和家属在开放或半开放的网络社区中自我能动性叙事及其意义生产，能够帮助他们面对苦痛，应对死亡危机和重建自我。癌症经验的自我叙事不断形成对疾病、身体、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并发掘自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故事碎片加以整合成为个体的生命故事地图，在苦难与自我认同的张力中寻找新的生活。同时，透过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叙事来重建自我认同，并以自我叙事为媒介在网络社群中获得社会支持，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对患者和家属的赋权效果。另一方面，尽管病患和家属最初进入网络社区中是为了寻求应对癌症的信息支持，病友写的患病日记和经历能够带来一些治疗参考，后续通过互动和共情感知又获得了一些情感支持，感受到这是一个“共同家园”，彼此相互取暖。但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是病患或家属在网络社区中往往是一种临时性驻足，当亲人去世或书写者去世后，他们就与网络社区越来越远。如何通过吸纳志愿者调动内部用户的积极性，重塑“共同家园”进行自我健康促进，从而获得社会支持的生命力是值得考虑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王冰

^① Kathy Charmaz, “The Body, Identity and Self: Adapting to Impair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36, no.4, 1995.

^② 林耀盛：《时间与意义：疾病、创伤及叙说之交叠构面》，《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第15期。

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 战略动因与实施路径

胡文涛 陈佳怡

[摘要]冷战刚结束，美国抓住蒙古国社会转型的时机，运用政策工具试图加强与蒙古国的双边关系、有效介入蒙古国意识形态的重塑、拓展本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民主援助”便是其中的重要工具，美国以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国家机构建设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为主要实施路径，以项目支持、人员和技术培训、公民教育等形式提供西方民主经验和模式。“民主援助”加快了蒙古国转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步伐，支持其在大国间实施“软平衡战略”，为美蒙“第三邻国”关系的确立构筑了“价值基础”，拓展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价值观联盟”，但同时对该区域内安全和合作增添了复杂性和风险点。

[关键词]民主援助 第三邻国 意识形态 地缘战略 软平衡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58-05

“民主援助”(Democracy Assistance)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蒙古国在苏联解体后，选择西方宪政民主模式，受到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其中美国在促成蒙古国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特殊和重要的角色。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愈加坚定地对外进行民主输出，蒙古国^①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在美国以“民主同盟”力量打压自己所谓“战略竞争者”的特殊时期，揭示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国进行“民主援助”的行动逻辑和路径走势，对认识美国“民主援助”的本质特征、战略意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于预防美国推行“民主援助”可能在区域内“外溢”负面影响，具有现实紧迫性。

一、研究状况及问题的缘起

“民主援助”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较新的概念，虽然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已经逐步呈现，但是对于“民主援助”的概念界定仍未明晰，主流观点是将“民主援助”划定为对外援助的范畴，是对外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②有学者进一步对此做出划分，认为“民主援助”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援助，针对的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不一致甚至是敌对的国家。^③然而，该定义并未对政治援助的内涵、特征做出清晰的阐释。

作者简介 胡文涛，肇庆学院教授（广东 肇庆，526061）；陈佳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006）。

^①根据1992年1月13日通过的《蒙古国宪法》规定，自1992年2月12日起，原“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故本文采用蒙古国的称呼进行研究。

^②赵绪生：《试析民主援助》，《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

^③刘国柱：《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美国研究》2010年第3期。

“民主”在对外援助中，既可看作手段也可视作目标。从目的上看，“民主推广”（Democracy Promotion）问题研究学者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在拉丁美洲和东欧，民主援助作为一种政治利益，以建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规范……在非洲和亚洲，民主援助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①从手段上看，“民主援助是政府和非政府行为者为加强民主规则和准则提供货币和技术支持的一套外交政策工具”。^②在本文中，民主援助是指西方国家针对民主转型国家的政治领域建设的援助行为，通过对政治行为主体（如公民、政党、政治社团）、政治机构（如选举委员会、司法机构）对其政治行为（如选举行为、立法行为、司法行为等）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培训、策略咨询等援助手段，从而推动受援国进行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政治体制演变。相较于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领域的援助，“民主援助”最大区别是以选举援助、政党援助、政府机构建设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为实施路径，聚焦受援国的政治环境塑造。此外，学界对“民主援助”的缘起已有探讨。“民主援助”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末人权、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密不可分。^③此外，学界不乏针对美国在海外开展“民主援助”的具体案例研究，然而均没有辅之以一个清晰完整的案例。

美国对蒙古国的民主援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民主援助”活动扩展到东欧、前苏联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90年代中期已遍及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尽管蒙古国是欧亚大陆内陆小国，但由于跟随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政治制度转型，因此受到了美国的关注和支持。“9·11”事件后，“民主援助”与反恐战争紧密联系，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反恐战争成为蒙美关系不断升温的契机，美国对蒙古国“民主援助”的外延不断扩大。作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的“回报”，蒙古国获得了“千年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简称MCA）援助的资格。表面上这是促进受援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实则是将援助的标准与“民主人权”挂钩，以对受援国植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标准。

二、美蒙间“民主援助”动因：相互借重、各取所需

（一）美方动因：寻找欧亚大陆纵深立足点，渗透软实力

1. 重塑蒙古国意识形态，拓展价值观联盟。20世纪90年代，在“历史终结论”引导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民主推广”理念变得更为自信坚定。这一时期西方社会雄心勃勃地对“民主推广”进行概念建构，试图使之成为“普世性”“永恒性”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一“元叙事”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后来成为西方社会向“后共产主义国家”开展包括“民主援助”在内的公共政策议题之一。克林顿政府把“民主推广”做为其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并称其为“接触与扩张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其中包括“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A New Pacific Community），美国据此推进亚太地区民主化计划。蒙古国曾于2006年加入由美国与波兰共同倡议下成立的“民主国家共同体”（COD），并成为2011—2013年的轮值主席国，主要负责管理该组织在亚太和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蒙古国这些“积极作为”的外交行动增添了其成为美国对亚太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支点分量。

2. 培植“民主典范”，抗衡中国影响力。美国不仅希望在政治、军事领域上发挥作为“第三邻国”在东北亚、亚太地区的作用，更希望在意识形态领域上发挥其在此区域的影响力，服务其战略利益。除中东欧之外，蒙古国被西方认为是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唯一的“巩固型民主国家”（consolidated democracy），^④若蒙古国能成为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伙伴，那便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民主岗哨”。

① Thomas Carothers, “Democracy Assistance: The Question of Strategy”, *Democratization*, vol.4, no.3, 1997.

② L. C. Russell Hsiao, “Democracy Assistance in Asia and The Rol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65, no.3, 2010.

③ 赵绪生：《试析民主援助》，《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

④ Verena Fritz, “Mongolia: Dependent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8, no.4, 2002.

1995年时任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蒙古国期间，在赞赏蒙古国的民主进步的同时，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此举无疑是美国借着蒙古国“民主样板”的旗号，起到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作用。近年来美国倾力打造“印太战略”，其中也有对蒙古国的“角色”安排。此前，特朗普政府的原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提前公布了一份“印太战略”秘密文件，该文件中明确提及“让蒙古国和其他地区的民主伙伴展示民主的成功和益处”，从而“推动美国价值观和影响力来抗衡中国”。^①上述诸多行动，均显示着美国重视蒙古国对中国的“窗口作用”。

（二）蒙方动因：稳定社会发展，突破地缘外交困境

1. 保证国家生存，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蒙古国接受西方“民主援助”，表明了蒙古国向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变的“决心”，而这将让西方重拾对其的信任感，认为蒙古国民主化将有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而积极援助民主化的蒙古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蒙古国一直努力寻求第三大国的援助。1999—2002年，蒙古国连续3年遭遇极端自然灾害，美国向蒙古国提供价值超过13.6万美元的小麦和2.5万美元捐款金额。^②2007年和2018年蒙古国依次获得了美国千年挑战公司两项援助计划，获得援助金额共计约达6.3亿美元，^③用于集中改善国内铁路运输、职业教育和医疗保健、能源环境来减少贫困和解决供水危机。此外，美国还力促日本与蒙古国之间“价值观外交”。2013—2014年，日本共资助蒙古国490万美元，对蒙古国官僚体系进行行政培训以巩固民主转型，继续支持蒙古国民主化。^④而这些资金正好能够给蒙古国提供所急需的经济援助和社会救济，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蒙古国脱离苏联后贫困人口剧增、民众生活困苦、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

2. 打破地缘政治困境，推进政治制度转型。摆脱贫前苏联控制下获得真正独立后的蒙古国，需要面临地缘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蒙古国与中俄两大邻国国力对比悬殊，为平衡与中俄两国的关系，以“第三邻国”外交政策为基点，接受美国的“民主援助”，意味着有更多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尽管蒙古国对第三大国的依赖受到其地理隔离和彼此缺乏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限制，但其仍采取“软平衡战略”（soft-balancing strategy），与遥远的大国，即美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密切接触。^⑤美国学者瓦赫曼在研究蒙古国内部文件“外交政策构想”（The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中发现，乌兰巴托有意“与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西方和东方高度发达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促进与印度、大韩民国、泰国、新加坡、土耳其、瑞士等国家的友好关系的政策，创造机会将它们在蒙古的经济和其他利益推进到适当的水平。”^⑥

三、美蒙间“民主援助”的运作：主体多元、路径多样

美国对蒙古国“民主援助”的运作由多元主体构成，主要牵头组织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二者相互配合，负责政策制定、项目规划与资金拨款。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简称为IRI）等，是援助项目的具体执行者与合作伙伴，与当地民间社

^① “Statement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Robert C. O'Brien”，<https://campaignzee.us20.list-manage.com/track/click?u=7a3dfd47f448eaf2236f28925&id=f5226dde62&e=e0eb1b4c42>，2021年10月7日。

^②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Appeal for Mongolia ‘DZUD 2000’: An Evolving Disaster”，<https://reliefweb.int/report/mongolia/united-nations-inter-agency-appeal-mongolia-dzud-2000-evolving-disaster>，2021年12月10日。

^③ Kerry Dumbaugh and Wayne M. Morrison, “Mongolia and US Polic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2007.

^④ “Supporting Democracy Abroad Japan”，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497f82a9.html#_ftn7，2021年10月8日。

^⑤ Mendeep Singh Jargalsaikhan, “Mongolia’s Dilemma: A Politically Linked, Economically Isolated Small Power”，<https://theasianforum.org/mongolias-dilemma-a-politically-linked-economically-isolated-small-power/>，2022年7月20日。

^⑥ Allen Wagner, “Growth, Democracy, and Two Wary Neighbors Interview with Alan M. Wachman”，<https://www nbr.org/publication/mongolia-growth-democracy-and-two-wary-neighbors/Mongolia>，2022年7月20日。

会机构进行密切配合，共同开展对蒙古国政治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援助活动。

(一) 援助主体及资金来源

在“民主援助”过程中，美国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基金会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自 1990 年以来，亚洲基金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便积极介入蒙古国政党选举、政党组建、选民投票选举等活动之中。虽然这些私人基金会对外声称自己是无党派、非盈利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但实际上其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民主援助”资金拨款占比最大的对外援助机构，占美国对外“民主援助”资金的 95% 至 99%。^① 201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成立民主、人权和治理中心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vernance，简称 DRG)，作为其促进民主的枢纽。其中，针对从 2006—2021 年的“民主援助”具体金额作如右统计 (表 1)。

表 1 对蒙“民主援助”的拨款金额 (万美元)

2006 年	265	2014 年	100
2007 年	170	2015 年	255
2008 年	22	2016 年	50
2009 年	60	2017 年	650
2010 年	100	2018 年	0
2011 年	168	2019 年	350
2012 年	255	2020 年	200
2013 年	230	2021 年	200

数据来源：<https://foreignassistance.gov/>，2021 年 7 月 7 日。其中对蒙的民主援助金额参考来自于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Governance 中的 Appropriated and Planned 数据。(注：2006 年之前的数据，官网未纳入)

(二) “民主援助”的主要路径

1. 政治选举援助。美国对蒙古国的选举援助主要以美国国际开发署为主要拨款对象，以非政府组织为运作主体，联合公民个体，通过选举前期对各地进行党派选举观察员培训、开展选民教育；选举期间进行选举观察、监督等活动；选举后进行民意调查、发表选举研究报告等方式，建立一整套可操作化的援助机制。以 2000 年议会选举为例，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国际共和研究所派遣了一支选举观察团，对当年 7 月份议会选举，尤其对全国投票站的选举计票等整个选举过程进行观察，并提出管理建议。此外，国际共和研究所与蒙古国大选委员会合作制定选举监督员的规则和条例，大力支持选举监督机构的制度与能力建设，并开展深入、细致的民意调查。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密切联系下，选举和政治进程加强联盟 (CEPPS)、国家民主研究所 (NDI) 等非政府组织在蒙古国选举期间也呈积极介入态势，与民间社会组织、政府官员和换届选举委员会合作，为缺少类似经验的蒙古国提供经验指导。

2. 政党援助。政党援助往往能够帮助受援国的各个政党采取更有效的竞选方法，从而增大受援政党获得议会多数党地位的机率。美国对蒙古国的政党援助往往围绕着大选展开，在 20 世纪 90 年代蒙古国的三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中，美国积极为蒙古国执政党的反对党——民主党助选。1992—1996 年，亚洲民主基金会共向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拨款逾 48 万美元，仅 1996 年就有近 16 万美元用于资助蒙古国反对党联盟胜选。^② 1992 年议会选举民主党惨败于人民革命党之后，国际共和研究所开始重视对蒙古国内八个民主党派竞选方法的技术支持：如开展关于选举等相关知识和经验培训，建议民主党将多个民主党派合并为民主联盟，以此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并向其民主党派介绍“与美国签订契约” (Contract with America) 的概念，建议采取“与蒙古国签订契约”的竞选口号，以赢得选民信任。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援助已开始产生效益，1996 年，蒙古民族民主党和蒙古社会民主党等共四个民主党派组成“蒙古社会民主党民主联盟”(简称民主联盟)，最终以获得 50 个议会席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该次选举，结束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75 年的连续执政历史。

3. 国家机构建设援助。国家机构建设援助主要侧重司法、立法部门及地方政府等相关领域的建设和改革。美国亚洲基金会在援助蒙古国司法建设和改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亚洲基金会首先为蒙古国司法

^① Luiza Rodrigues Mateo, “The Changing Nature and Architecture of U.S. Democracy Assistance”, *Brazi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3, no.1, 2020.

^② 《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s://www.mfa.gov.cn/zyxw/202205/t20220507_10683088.shtml，2022 年 9 月 9 日。

部门提供一系列法律教育和培训项目，加强法律专业人才的能力建设以解决司法部门效率总体偏低、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等问题。在国务院资助下，美国亚洲基金会与蒙古律师协会（MBA）、总检察长办公室（GPO）和司法总理理事会（JGC）进行一个长达 4 年的项目合作，^① 为蒙古国提供法律教育和培训。在立法领域，亚洲基金会向蒙古国立法机构提供长期且全面的技术咨询，包括为起草《1992 年宪法》《非政府组织法》以及《媒体自由法》提供咨询意见。在对蒙古国国家司法和立法机构援助的同时，美国也通过对其地方政府官员和机构的培训与技术援助、鼓励其公民与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促进对其地方政府援助。2014 年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下，国际共和研究所还为蒙古国地方行政区官员和政府撰写《改善公民参与和反馈：市政厅手册》（Improv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Feedback in Your Bagh: a Manual on Town Halls），^② 提供关于选民外联的实际指导，提高蒙古国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

4. 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非政府组织发展援助，通常是指为受援国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培训和咨询或提供资金、设备等援助，援助领域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反腐败、妇女权利、人权、环境保护等，旨在强调积极的民间社会力量对于促进、巩固民主的作用。据统计，蒙古国在转型后国内非政治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到 2000 年已超过 1800 个非政府组织正式登记注册，^③ 其中，妇女非政府组织在蒙古国公民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④ 其数量和活跃度远超过其他非政府组织。

亚洲基金会和全国民主基金会不仅向蒙古国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援助，也通过各种形式促进妇女参与政治进程，达到推动蒙古国民主化目的。例如，在亚洲基金会支持下，妇女律师协会（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制定了一项司法宣传方案，通过提供一系列反歧视领域的关键性案例提高妇女权益。同时，亚洲基金会的妇女经济赋权项目（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还与民间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简称 CSOs）合作，为女性全面参与蒙古国经济建设提供培训和指导机会。^⑤ 此外，美国通过与蒙古国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公民教育培训、圆桌论坛等活动，致力于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四、美国对蒙古国实施“民主援助”的成效与走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瞄准蒙古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契机，借助与蒙古国“第三邻国”关系，对其进行立体式渗透，蒙美保持稳定良好的双边关系并上升战略伙伴关系。“民主援助”是美国颇具“亮点”的手段和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视对蒙“民主援助”为其对外开展“民主推广”的“得意之作”，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育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价值认同，加快蒙古国政治制度转型。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通过培养个体领导者成为积极的变革推动者，能够推动集体层面对民主、善治原则和价值观认同。^⑥ LEAD Mongolia 是一项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国际非盈利性组织 World Learning 实施并运行的国际化项目。在该项目的运作下，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蒙古国青年频繁开展双边、多边国际交流活动，此举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蒙古国人民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感，使得西方式民主政治理念逐渐占据蒙古国国内政治主流思想地位。经过美国培训过的政治精英以美国的民主制度为标准，加速了蒙古国政治制度转型，将“促进民主”形成一套制度化、可操作化的援助框架。二是“以小博大”，增添

（下转第 72 页）

^① “Strengthening Mongolia's Justice System”，https://asia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Strengthening-Mongolias-Justice-System_2021.pdf，2021 年 7 月 12 日。

^② “New IRI Manual Helps Local Officials in Mongolia Engage Citizens”，<https://www.iri.org/web-story/new-iri-manual-helps-local-officials-mongolia-engage-citizens>，2021 年 7 月 12 日。

^③ Todd Landman, et al., *State of Democracy in Mongolia: A Desk Study*, Ulaan Baatar: UNDP Press, 2006, p.38.

^④ Tsetsegjargal Tseden, “Women's NGOs in Mongolia and Their Role in Democratization”, *VNU Journal of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28, no.5E, 2012.

^⑤ “Economically Empowering Women in Mongolia”，<https://asiafoundation.org/publication/economically-empowering-women-in-mongolia/>，2021 年 10 月 10 日。

^⑥ “Request for Quotation LEAD Mongolia.LPW”，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quest_for_Quotation-LEAD_Mongolia.LPW_.pdf，2022 年 9 月 16 日。

文化嵌入性：平台型企业跨国经营模式的改变

——基于 A 平台的质性研究^{*}

王樱洁 香 玥

[摘要]新兴平台型企业的出现重塑了传统市场的跨国经营模式。平台型企业在异文化情境中的模式改变集中体现在 Airbnb 这一住房共享平台中。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的经营漏洞源于其原有经营行为和异文化情境的不耦合效应，只有在全新的文化情境调适下，平台行为进行逐步转变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再嵌入。经营模式的改变程度取决于文化变量约束力和刚性的强弱程度。

[关键词]文化嵌入性 跨国经营 共享经济 文化情境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 (2023) 02-0063-05

一、跨国平台经营模式选择：问题与文献

本文聚焦平台型企业跨国经营时的策略选择机制。20世纪90年代起，如何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展开业务已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重要议题。^①其经营模式可分为标准化策略、^②本土化策略、^③在前两者间寻求平衡。^④企业组织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都对策略选择机制进行过讨论。前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组织架构只有变柔性，才能在面临双重压力时快速回应市场需求。^⑤后者聚焦情境作用，认为跨国企业的策略会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而调整，制度压力会影响跨国企业最初进入新兴经济体的模式。^⑥现有研究忽视了宏观层面压力对平台企业的影响，也没有对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分析，无法对企业行为的动态变迁提供过程解释。

本文以共享住宿平台 A (2008年成立于美国，2015年进入中国)为个案，研究资料源自2016—2020年进行的网络民族志调查、33份深度访谈和二手文本资料。^⑦ A 平台最初进入中国后遇到房源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度青年项目“嵌入性视角下平台经济的隐私边界与保护研究”(GD21YSH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樱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635)；香玥，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

① 毛蕴诗、李敏等：《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Louis Turner, “Triad Power: The Coming Shape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2, no.4, 1986.

③ 杨勇：《跨国企业的中国本土化策略及启示》，《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④ Marios Theodosiou and Leonidas C. Leonidou, “Standardization Versus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y: An Integ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vol.12, no.2, 2003.

⑤ 毛蕴诗、李敏等：《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策略》，第25-27页。

⑥ Daphne Yiu and Shige Makino, “The Choice Between Joint Venture and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13, no.6, 2002.

⑦ 本文选取三种身份的受访者访谈：房东、房客和从业者按受访顺序1-33编号。所有受访者均已匿名。

数量少、用户投诉多、客服体验差等问题，同时本文发现一些房东“钻漏洞”的行为：如15号房东虽然将房源上传至多平台出租，但会为规避平台收取服务费，仅在A平台暗示房客跳开平台交易；同为从业者的22号房东曾经通过一些方式删除了用户本无法操控的差评。平台在跨国经营中为何会出现策略漏洞？而之后的经营又是否会填补漏洞？平台在进入异文化情境后会如何受到文化的影响进而调整跨国经营策略？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二、分析框架：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的文化嵌入性

制度被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本文将文化视为支撑正式制度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①市场行为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的制度中，^②文化嵌入性是指共同信念、价值观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同时文化能通过行动者运用市场逻辑发挥作用，^③也可以理解为非正式制度嵌入性。本文运用文化嵌入性的框架来呈现平台跨国经营行为的动态变迁过程。该过程中，当跨国平台进入异文化情境后，原属地和异文化情境^④间的文化差异逐渐体现，当原有行为无法和现有文化情境匹配时，就会出现制度不耦合的现象，如媒体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水土不服”现象。在公司行为和异文化情境的制度耦合中，平台原有的行为逻辑会逐步调适，这是因为文化的动态调适作用。文化作为一种规范管理人们的行为，同时也作为价值观传达了一个群体关于事情应该怎样的信念，每种独立的文化都会适应一种特定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因此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⑤如前文所述，共享经济平台运营中面对的是伴随互联网经济兴起的用户，尽管各个用户群体存在内部差异，但同一社会情境的用户共享的是相同的文化。平台的盈利点在于促进双方的交易，其经营策略是引导用户双方持续使用平台并且促进交易产生，这就导致用户更能体验到平台的策略变化。因此，用户体验不仅能反映企业文化，还能分析平台行为。

传统公司在跨国经营时以人事任用等因素来衡量跨国经营情况。^⑥但平台交易的内容是房屋使用权，平台需要围绕用户设定经营策略，如验证用户身份、引导用户正确使用平台等。在这种经营模式下，虽然地区内部存在差异性，但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仍然具备合理性，因为国家内部特定的制度、社会历史和社会化的教育过程决定其成员会共享文化特征。^⑦平台跨国经营首先会受到法律法规（正式制度）的约束，而围绕用户设定的策略更能体现出文化的形塑作用，因此，要从用户出发，分析影响用户的使用，进而影响到平台经营策略的变量。在本文中，主要指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社会中的普遍信任程度、个人自主性的高低以及人们社会交往中的关系取向这四个文化变量。

首先，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影响平台如何进行最基本的功能设定和内容获取，比如平台设定的用户使用手册和隐私使用规范，用户和平台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划分等问题。相较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中社会成员对于自我隐私的感知较弱。^⑧其次，共享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供需双方间的信任。^⑨在共享住房中，信任不具有特定对象，而是对陌生人的信任，即社会普遍层面的信任，这种信任会影响平台构建房东、房客和自身的信任。再次，平台中参与交易的是用户，房东需要专业的经营知识增加订

^① Kulwant Singh, “The Limited Relevance of Culture to Strateg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4, no.4, 2007.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60-73.

^③ David Dequech, “Cognitive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37, no.2, 2003.

^④ 在企业管理的文献中，通常称之为母国和东道国。

^⑤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2-81页。

^⑥ 毛蕴诗、汪建成：《在华跨国公司战略选择与经营策略问题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⑦ Geert Hofstede,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o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14, no.2, 1983.

^⑧ 王樱洁：《个人信息保护行为的制度基础探析》，《探求》2022年第3期。

^⑨ Russell Belk, “You are What You Can Access: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Onlin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67, no.8, 2014.

单，因此交易过程需要个人自主性。这也代表着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消费者会对更看重定制化和个人化的感知价值判断（即用户在访问网站时，与页面产生的互动和一种偏好的用户体验）。^① 定制化、个人化的感知价值判断就是用户能根据自我能力的差异性在网站实现不同的个人价值。具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个人更能实现个人价值。^② 因此，平台经营中很重要的是培育房东的经营能力。最后，用户不仅能进入平台的线上关系网络，还能链接自己的线下关系网。在平台的经营中平台需要利用人们的关系取向来增加用户粘性。伴随圈子文化的兴起，网络社群作为新型的社会结构被共享经济塑造，这是在弱关系上建造强关系的过程。^③

三、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变与不变”

（一）完全转变的后台审核行为

平台交易的内容是房屋使用权，平台需审核房东提供的房源信息来保证房屋真实性。2018年，平台中国区负责人表示，仅在中国区需要人工审核每一个新发布的房源，在此之前并非如此。据14号房东表示仅需跟着A平台指引上传房屋信息和图片，房源立即上线完成。但她表示B平台^④会让客户经理实地审核过房源才能成功上线。

后台审核行为既可以通过纯计算机技术，也可以通过人工审核方式实现，但只采用技术实现的后台审核比人工审核力度更弱。房东同时在两个平台上传房源，在A平台仅需要电脑自动比对照片与描述的真实性即可发布，而B平台则需要等待人工实地走访审核，导致平台需要投入更多的交易成本。A平台在美国上传房源的程序亦是如此，可见其后台审核行为和原属地保持一致。但A平台进入中国三年后就宣布以人工方式审核房源，说明社会中普遍的信任程度影响平台审核政策——据全球世界观第六次调查，中国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程度是87.6%，美国人是64.4%，即美国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程度较高于中国，导致A平台在原本信任程度较高的文化情境中的后台审核行为，无法在低信任文化情境中堵住机会主义的漏洞（这是制度不耦合的结果），因此A平台完全改变自己原有的后台审核行为，开始和B平台一样人工审核房源。

（二）移植不变的系统设定行为

平台交易基于互联网线上操作。平台需要进行基本的系统设定，如针对用户的隐私政策、服务声明，以及平台为保证用户不脱离平台进行交易而开发的线上聊天窗口（通过设定关键词等技术手段实现）。

两个平台呈现用户隐私政策的方式有差别，A平台在技术上运用了页面强调，给予用户拒绝，拒绝后依旧可浏览网页的系统设定，但B平台如不勾选“同意隐私声明”则无法继续使用。这种差异性所体现的是文化情境的差异性。虽然这两种方式对于平台设定是非常细微的差异，但对于用户的体验却完全不同。A平台让受访者感受到的用户体验是：平台尊重用户的隐私并具有完善的流程和制度来保护用户的隐私，同时每个人拥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30号受访者表示，B平台的用户却面临“不授权不给使用”的体验。在预定房源前，用户可在平台沟通房源信息，联络方式等敏感信息会被屏蔽，而且会提示屏蔽是为双方安全交易，但B平台并未设置安全交易的提示信息，笔者不论向对方发送任何与联络方式有关的消息，在打字后点击发送的结果是一片空白，即网页不会弹出任何提示劝阻用户的操作，但对系统进行了不能发送的设置。这两个平台对于个人隐私和权利的处理方式都是和原有文化情境耦合的。西方社

^① Jan-Benedict E. M. Steenkamp and Inge Geyskens, “How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Perceived Value of Web Site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70, no.3, 2006.

^② Schimmack Ulrich, Radhakrishnan Phanikiran, et al., “Culture,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tegrating Process Models of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82, no.4, 2002.

^③ 杨舸：《信息链接、技术嵌入与网络效应：共享经济下的社会网络》，《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④ B平台是2012年在中国成立的本土住房共享平台，与A平台一样是以盈利为目的住房共享平台。这两个平台符合案例选择中最相似案例的标准，即除了原有文化情境不同，其他方面都较为相似。[美]约翰·吉尔林：《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黄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8页。

会强调每个人都要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个人隐私和安全会被给予更多重视，但东方社会的文化中个体的义务是多过于权利的。^①

据本文调查，A 平台在系统设定行为中采取移植的模式将原属地行为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异文化情境，可见其平台原有的文化倾向就是保护个人隐私权利。但这种强势的整合模式往往会遭到异文化情境的反抗而造成运营漏洞。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就发现了漏洞，小白能用隐晦的话语让房客和他进行私下交易，而小贾则利用拥有不同层级用户信息的客服团队帮助自己删除差评。

(三) 融合之中的运营指导和价值主张行为

平台需要辅助房东成为专业的运营者，辅助房客熟练预订房源。其中就涉及客服的作用，A 平台客服从单纯转发文章链接、到加上人性化描述、再到致电回复用户问题，其态度明显转变，但网页寻找客服的路径依旧较 B 平台更为繁琐。

A 平台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后台数据，同时赋予房东自主权去决定房源的可预订性、价格、流程和要求，从而让房东能自主把握房源出租情况。A 平台作为中介，让房东最大化发挥个人价值和能动性，如果房东想增加房源的交易量，就会努力使自己的房源受到平台推荐。这个过程通过平台对房东的引导完成——首先平台会设定房源呈现规则，即用户在搜索房源时的排序方式——房源排名靠前的房源拥有更多的机会被房客预订。房东无法控制排序，但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后台数据优化房源信息，以争取更靠前的位置和展示量。但这并非最大化平台利益的方式，22 号从业者表示如果平台能够全方位接管房源就会节省人力成本，提高预订量。12 号受访者表示 A 平台则是更多引导房东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促进交易，可见并非如 22 号从业者所说。A 平台为房东提供数据、技术和方法，引导房东自己经营；B 平台通过收取服务费的方式代劳房东的工作。二者的差异除了体现在是否提供配套的服务链条来替代房东的角色之外，还有平台提供的人员支持，这主要包括平台的线上和线下服务支持力度。和 B 平台相比，A 平台客服更鼓励用户自己寻找解决方案；而 B 平台不仅有 24 小时线上客服，还有线下的客服经理一对一指导。毫无疑问，后者意味着平台增加了交易成本。

这两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个体在社会交往的倾向是更具自主性还是依赖性。^② 由于 A 平台赋权过多，导致以往被培养了习惯的“懒”房东们无法适应 A 平台的操作方式，进而引发了用户间的摩擦，导致客户投诉剧增。在 2018 年左右，A 平台开始调整运营策略，虽然仍旧不代理房东任务，但它在中国单独开发了房东学院培训房东，即 A 平台运营策略的调整是跨国经营行为和异文化情境的一种融合。价值主张行为是平台为建立自身定位所采取的行为，正如 32 号受访者（从业者）描述，这种对平台的印象主要会影响用户使用平台的体验。

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建构虚拟社区和用户具有强烈加入的意愿是该社区持续运转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平台从其评价体系和宣传话语建构社区。首先，A 平台是双向盲评机制，因此用户能真实地评论房源。其次，对比宣传标语和图片，B 平台的宣传标语强调诚信和安全交易，并且呈现多种安全保证方式，但 A 平台呈现的是由旅行地当地人为旅客提供的体验活动。可见，B 平台的定位是安全交易，而 A 平台的定位是社交。两个平台的价值主张和其原有的文化情境相互耦合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家人到朋友再到陌生人，其关系的强度依次降低。为进一步加深对文化在社交网络中影响社会关系形成的认识，需要探索文化取向与关系强度间的关系。第二，用户使用平台意愿和文化情境密切相关。西方社会中共享经济的兴起动因不仅包括共享意愿的发达、个体拓展社会关系的需求，还包括个体对于平台构建的社区共同体的参与欲望，1 号受访者表示 A 平台和酒店相比，优势在于会面对不同喜好的房东。同时，他表示相较于中国人，欧美人更愿意和房东多交往。由于价值主张受文化情境的影响，A 平台会采取拓展

^① 郑杭生：《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时间·竞争·隐私》，《中国软科学》1994 年第 2 期。

^② 翟学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弱关系的关系取向来构建社交社区，而纵观其进入中国市场后的行为变迁，可以说是采取融合模式，即在保证自己原有产品定位的同时，结合异文化情境的情况进行部分转变。虽然仍旧强调平台的社交属性，但在后期平台也开始和本地安全系统对接，确保其基本的安全性。从现象上看，A 平台最初的房源数量不如新兴的 B 平台，但从文化逻辑上看，异文化情境和 A 平台坚持的社交取向制度耦合效应较低。

四、结论与讨论

上文呈现了 A 平台在进入异文化情境后的经营策略调整，这并非完全基于理性算计，更多地则和文化情境相耦合，其策略包括系统设定、后台审核、价值主张和运营指导四种行为，均能体现不同文化情境变量的影响，进而影响用户体验。本文认为平台行为嵌入在不同的文化变量中，这些文化变量在中国的情境中具有不同强度的文化约束力和刚性程度，平台行为和异文化情境的制度再耦合要通过其行为的改变来实现，而行为的改变这件事情取决于异文化情境中不同文化变量的刚性和约束力的强弱之分（表 1）。文化约束力是指文化对平台的行为所发挥的约束作用的大小，而刚性程度是指文化的独特性或不易改变的程度。嵌入在都较强的文化中的行为，必须发生行为的转变才能实现制度再耦合，而嵌入在二者都较弱的文化中的行为可以直接将原属地的行为逻辑移植到现有文化情境中实现耦合。但嵌入在只要约束力和刚性程度任意一方是较弱的平台行为，就可以采用融合的行为逻辑来部分改变，这样可以保证交易成本不会突然增加以影响收益，也能缓慢适应异文化情境。

以 A 平台为例，本文分析其行为在进入异文化情境后的变化。第一，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这类行为是原属地坚持的核心价值，在原有的文化情境中刚性较强。相比之下，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个人隐私边界较窄，此类行为文化约束力较弱。因此系统设定可直接以移植的方式来向异文化情境输出价值主张。第二，从中国对陌生人较低的信任情境出发，这一变量的文化刚性和约束力均较强，A 平台的行为如不发生改变会形成文化漏洞，从而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后台审核行为必须完全转变才能杜绝钻漏洞的现象。相较于原本的后台技术审核，这种行为的转换是经过低信任文化调适的结果。第三，运营策略的调整势必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不论是文化刚性还是文化约束力，只要有一方的作用力较弱，平台仍然会保留原有的部分行为方式，即行为融合。熟人关系是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基本法则，人们相互的义务和责任是彼此维持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内容，因此，在这个维度上文化的刚性是较强的。反之，个人自主性的刚性程度则较弱，平台发展初期占有市场的有效方式是扩充房源数量，在这种过程中 B 平台能代理房东的角色因而急速扩张，而平台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如何依靠房东的能力展现房源的独特性是平台无法代理的，可见房东个人的自主性是随着平台规模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在这个维度上的文化刚性则较弱。最后，本文认为制度再耦合是动态的过程，行为的改变是在受到文化约束之下所做出的选择，这个文化的调适是一个程度加强的过程。以人工审核房源为例，2020 年笔者上线的新房源仅仅显示要等待平台审核后才会上线，可见人工审核是发生在技术的后台。所以平台行为转变是渐进的——一旦平台发现现有行为依旧无法和文化情境再次耦合，就会加强这种行为转变的程度，进而增强制度耦合效应。

表 1 行为的再耦合方式

		文化约束力	
		弱	强
文化刚性	弱	行为移植	行为融合
	强	行为融合	行为转换

责任编辑：王冰 许磊

家暴网络新闻的叙事呈现与性别偏向

——基于网络媒体“杀妻”案件报道的样本分析^{*}

商 瀑

[摘要]家暴案件是家庭内部矛盾的变异形态，而“杀妻”行为则是这一家事关系彻底恶化的极端表现。一则家暴犯罪新闻的框架，通常涵盖一手资料来源、文章标题、人物评介、家暴史、疾病史、语气词等多项指标，将这些要素作用于新浪网和腾讯新闻网2015—2020年“杀妻”案件报道，可以总结出该类新闻中的叙事呈现和性别偏向。网络媒体惯用“直接策略”“间接策略”“折衷策略”“中立策略”“强化策略”五种叙事方式呈现两性形象，输出对受害女性的看法，因此有必要了解家暴网络新闻的叙事逻辑，引导舆论，形成有效干预。

[关键词]家庭暴力 男权社会 两性形象 两性关系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3.8;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68-05

近年来，妇女权益日益受到重视。一方面，女性由此得到许多自由发展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她们境遇的显著改善给男权主义文化带来了挑战，部分男性倾向于使用暴力来维系对伴侣的身份控制，使得家庭内部问题升级为“杀妻”案件。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清晰地反映在网络媒体对“杀妻”案件的报道中，这一现象也揭露出媒体对于女性当事人的刻板印象。学界认为，需要特别留意新闻报道与恶性家暴案件防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公众通常是借助网络媒体来了解案情，在这一过程中，新闻报道往往占据着先入为主的地位，并对公众认知与反应施加了巨大影响。^①因此分析家暴网络新闻的叙事特点、语言组织策略及框架，同时介入其传播路径，也就成为引导舆论和形成干预措施的前置环节，这对于规范网络媒体叙事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家暴犯罪新闻的基本框架

新闻框架是指新闻作品的组织结构和总体设计。网络媒体利用新闻框架，呈现事件的前因后果，凸显报道的特定内涵，并借此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新闻框架的选择是主笔编辑感知事物后所产生的独到见解，他们有意识地建构一个新闻框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故事的某一方面，也有最大化新闻传播效果的考量，因而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挑选新闻框架时，通常需要评估故事可能蕴含的传播价值，其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了故事能否被报道、在什么时机下报道以及如何报道，当故事越不寻常，一则新闻报道就越有机会扩大传播效果。与普通的社会事件相比，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大量的故事线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网络空间中数据安全治理生态构建研究”(20YJC820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商瀑，广东警官学院新型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30)。

① 唐观英：《“李阳家暴事件”媒体话语空间的“家暴”叙事》，《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3期。

以致此类事件具有充足的叙事空间，其中，“杀妻”案更是因叠加了犯罪人对家庭伦理底线的突破，从而提高了社会借“媒体展示”促“教育警示”的可能性。

一起刑事案件通常由何事、何人、何时、何地、何情等多个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影响着案件的故事性，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人物描述比事件陈述更具有弹性，也更容易营造出代入感，引发读者的共鸣，所以网络媒体普遍关心案件中的人物背景，而非案情本身。媒体对“杀妻”案件当事人背景与阅历的偏爱，往往是新闻编辑过分追求新闻传播力所产生的结果。刻画人物形象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无论是为了博取社会同情，还是借此引导舆论予以谴责，描述“杀妻”案件所用到的语言在塑造公众认知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同一案件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可以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当网络媒体以新闻话语区别对待家庭案件当事人时，犯罪报道中的描述性语言也就构成了对特定群体的身份歧视。在“杀妻”案件的网络报道中，语言与框架共同担负着故事的传播任务，语言塑造了读者的认知，而框架则将这一认知上升为内心认同。

美国学者布洛克（Bullock）认为，目前“杀妻”案件报道有两个特点：一是新闻编辑热衷于将“杀妻”案和其他类型的凶杀案件作类比，以割裂“杀妻”行为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联，回避男性是否存在家暴史与家暴倾向的故事背景；二是在引用警方或其他刑事司法机关提供的案情材料时，编辑为了最大程度地提升网络新闻的权威性，故意忽略官方文本中的认知局限。作为“杀妻”案件报道必不可少的两个分析指标——“事件背景”与“资料来源”，被布洛克视为传统新闻框架的重要补充，她将此类案件报道的新闻框架细分为新闻标题、案件诱因、故事背景、参考资料、当事人的健康状况以及叙事语气6部分。^①本文主要基于布洛克的框架定义来解构“杀妻”案件网络报道，其中，第一层次是指一手资料的来源；第二层次是指新闻标题的选择；第三层次包括案件归因（施害人与受害人的责任分配）、案件背景回顾（是否提及男性的家暴史与家暴倾向）、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生理、心理和病理问题）；第四层次是指新闻编辑讲述故事时所用的语气（同情、感叹、谴责）。

表1 新闻报道关键词语列表

序号	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1	法院	11	懒惰	21	性格温和	31	疾病
2	警方	12	无正当职业	22	温和	32	残疾
3	判决书	13	不讲道理	23	漂亮	33	心理问题
4	官方公众号	14	好逸恶劳	24	有爱心	34	刑满释放人员
5	官方微博	15	好赌	25	常年打工	35	吸毒人员
6	知情人士	16	性子急	26	懂事	36	第三者
7	固执	17	有暴力倾向	27	孝顺	37	有脾气
8	滥情	18	偏激	28	有责任感	38	暴躁
9	贪财	19	爱喝酒	29	有暴力倾向	39	不接受道歉
10	爱慕虚荣	20	单纯	30	家庭暴力	40	啊、哎、呀

二、研究方法、文本选择与材料收集

有关“杀妻”案件的新闻研究，一般采用个案分析、词频分析、问卷调查、叙事研究、框架分析等方法。框架理论、叙事研究以及话语分析是其中最常见的方法，通过分析报道文本的框架和挖掘其中的语词信息，研究者可以了解到主笔编辑是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伯格（Berg）指出，话语分析法的优势明显，它能完整呈现某个较长时期内社会现象的变迁趋势，当我们意图刻画出一个时间段，甚至是跨世纪的女性媒体形象时，话语分析就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借助话语分析法，可以同时挖

^① Cathy Ferrand Bullock, “Framing Domestic Violence Fatalities: Coverage by Utah Newspapers”,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vol.30, no.1, 2007.

掘出新闻报道中的隐性与显性内容，缩减研究所需成本。^①因此，对于一项有关“杀妻”案件新闻报道的研究工作而言，假若样本量较大、跨越周期较长且报道文本的多元化程度较高，那么在框架理论与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闻话语分析，就是一个可靠的研究方法。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关于“杀妻”案件媒体报道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报纸文章，纸质刊物的收集难度决定了研究者对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是基于某一个特别年份的小样本。^②目前，历时性呈现媒体笔下两性形象和叙事策略的成果依旧稀少，且其分析样本也仅限于域外媒体的公开报道。本文以国内网络媒体“新浪网”和“腾讯新闻网”2015—2020年刊载的“杀妻”案件报道作为研究样本，由于两家网络媒体均将其分散在生活、家庭、法治等多个版块，因此检索方式采取全文范围内的关键词查询。首先，以“杀妻”为关键词，在新浪网和腾讯新闻网进行主题搜索，时间范围选取2015—2020年，得到3134篇文本；其次，将网络新闻来源划分为特约记者撰稿、群众爆料和转载，并根据网络新闻形式，过滤视频新闻和图片新闻，筛选出特约稿（新浪网8篇，腾讯新闻网46篇）、爆料稿（新浪网5篇，腾讯新闻网42篇）、转载稿（新浪网5篇，腾讯新闻网61篇）共计167篇报道；最后，对照表1的条目，记录样本报道中的关键信息，统计出这些描述性文字所出现的频率。基于布洛克对杀妻案件报道的要素拆分，此类网络新闻样本的观测项目包括：案件信息的出处、文章标题、人物评价、家暴史、疾病史和语气词。

三、样本描述与话语分析

在案件信息的原始出处上，材料来源的比例结构是判断新闻报道客观与否的关键指标，相对于非官方来源信息，由于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所发布的报道价值密度更高、发文机构更为权威（n=84），因此更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同。例如在湖南新化郭某杀妻案件报道中，腾讯网将一手资料来源笼统地描述为“知情人士”，并对基本案情的转述少之又少，相比之下，警方后续发布的悬赏公告则呈现出更多的案件细节、更清晰的故事脉络。在新闻标题的拟定上，网络报道通常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实题的单独使用，其主要特点是直接亮明新闻事实；二是虚题与实题的搭配使用，即作者依托实题，评述事件意义、提出要求或表达愿望（n=38），此类标题集中体现了新闻报道的情感走向。例如在2019年卢某杀妻案件报道中，文章标题就包含了“亲友希望法院判其死刑”“不接受道歉”等字眼。

在指责杀妻案件的受害人时，网络报道会使用负面形容词和消极的身份标签以凸显案发原因（n=34），诸如固执、滥情、贪财、爱慕虚荣等。例如在2013年江苏李某杀妻案件报道中，媒体对受害人的评价词就包含了“懒惰”“无正当职业”“不讲道理”“好逸恶劳”等，甚至在2018年苏州吴江区靳某杀妻案中，受害女性被贴上了“赌徒”的标签。在归责于施害人时，常见词汇包括“性子急”“有暴力倾向”“偏激”“爱喝酒”“好赌”等（n=40）。例如在2017年甘肃玉门张某某杀妻案件的网络报道中，犯罪人张某某是一个有着“直、拧、野、独”脾气的继子和赌徒，而且文中多处评价其爱钻牛角尖。在结果归咎于受害者时，为了完成对女方的话语补偿，编辑会转而使用“单纯”“性格温和”“漂亮”“有爱心”等词语来调节文章的措辞（n=4）。例如在2015年2月浙江嘉兴男子杀妻碎尸案中，当媒体将杀妻行为的发生归因于女方的小脾气时，又在文末补充道，受害女性素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在结果归咎于施害人时，为了减轻男方的责任，媒体又会使用“常年打工”“努力挣钱”“懂事”“孝顺”“有责任感”等词语，将其塑造成一个肯吃苦且有孝心的人（n=9）。在陈述家庭暴力背景时，网络媒体视其为情感宣泄的靶标，利用新闻报道将男性家暴史和杀妻案件串联起来，为事后归罪提供有力佐证（n=11）。

除个人性格、生活习惯以及身份标签外，网络媒体还会将疾病因素作为家庭问题的解释工具，受害人的心理与生理疾病被当作是双方共同责任的理由，而施害者糟糕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素质却成为男方逃避罪刑的借口（n=14）。语气词是表达作者情感偏向的重要标志，新闻传播方常常用之来建构、调节与

① Bruce L. Ber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Allyn & Bacon, 2001, pp.258-259.

② Michele Lloyd and Shula Ramon, “Smoke and Mirrors: U.K. Newspaper Representa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23, no.1, 2016.

受众的交际距离。^①作为一类虚词，语气词带有一定的言语功能，在新闻报道中担负着价值引导的任务，^②读者凭借对语气词的理解与判断，能够快速识别文稿话语间的情感信息（n=3）。

四、叙事呈现与性别偏见

资料来源与新闻标题作为两性形象叙事的策略性开端，深刻影响着新闻话题的整体走向，因为在杀妻案件中，受害者通常或重伤或死亡，她们很难再为自己的遭遇发声，在这一情况下，媒体不得不引用警方的侦查结论及施害人的具结陈述，当网络新闻的资料来源于官方时，新闻标题的立场较为中立，若一手资料出自加害人之口，则其立场会发生转向，从而有利于男方。

在语言方面，攻击女性的形容词和负面标签散见于多篇新闻报道，将案发原因归咎于女性的滥情与贪财，已成为媒体的习惯性表达。男性作为杀妻案件的直接施害方，受媒体指责的次数多于女性，较为多见的指责是男性有不良嗜好和易怒性格（n=40）。在对待受害人时，有4篇文章转换过评价立场，媒体通过隐喻的方式先行把女方认定为主要责任人，随后又将她们描绘成有思想、敢拼搏、友好慈善的新时代女性；当归因于施暴者时，更多的网络报道在严厉指责涉事男性后，又将他们粉饰成吃苦耐劳、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在家暴史方面，述说这一故事背景将为杀妻案件的发生提供一个明确、可循证的线索，有助于公众厘清责任分配时的混乱关系，例如部分新闻会谈到女方因害怕报复而选择不告发或者是不起诉，披露了女方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事实。在疾病史方面，虽然男女双方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对案情的发展产生同等重要的影响，但对于主笔编辑而言，在新闻报道中记录不同的疾病史，能产生差异化的叙事效果：其一，叙述男性的生理疾病史和心理疾病史，可构成负面评价的阻却事由；其二，记述女性的生理疾病情况和心理疾病情况，能将社会公众对案发原因的注意力从当事人的性格缺陷和不良生活习惯转移到无关个人过错的患病事实上。在语气词方面，合理发挥其情绪表达功能，可折射出涉事双方在新闻报道中的人物画像，包括女方惨遭不幸后生发的悲戚晚景以及男性施暴后产生的“坏男人”形象。

极端家暴案件新闻的性别偏见暗藏于叙事呈现背后，并发挥着舆论引导与价值评判的作用。^③一方面，网络媒体为极端家暴涉事双方提供了披露感情裂痕和弹性叙事的空间。另一方面，持有不同立场的新闻编辑，采用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实现个人情感的网络输出，主要有五种策略。一是为了满足受众阅览偏好而采用的直接策略。包括拟定一个有倾向性的新闻标题，进而将案发原因归咎于某一方，抑或者使用消极形容词来描述主要责任人，并为其贴上负面标签。例如2015年7月南阳卧龙区男子持枪杀妻案报道中，施害人不仅在性格上被描述为固执、急躁以及乖戾，而且在人物介绍时，身负“吸毒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两种标签。对于受害女性，网络新闻则倾向于使用“任性”“脾气暴躁”等贬义词来揭示案件发生原因，并将悲剧的产生归咎为女方的择偶不善。例如在2016年沈阳刘某杀妻案件新闻报道中，媒体编辑就多次使用“脾气大”“性子急”来解释案发起因。二是为了增强情感表达细腻度而采取的间接策略。重点在于使用积极的形容词来描述某一方，并为其贴上正面标签，进而实现对另一方的批评。其中，包括帮助被害女性树立正面形象，以实现对施害人更严厉的批判，或是通过赞颂男方的途径来实现对受害女性的侧面指责。例如在大庆张某杀妻案中，媒体根据采访所得到的消息，将男方描述为同事好友眼中的老实人，造成受众对另一方形象的高度误解。与此同时，无论是灵活运用语气词，还是回溯家暴史，都会给网络报道中的两性形象带来间接影响，其主要功能表现为对新闻情感的推动以及对传统女性标签的固化。三是为了隐藏自己立场而采取的折衷策略。其所基于的原则是夫妻同等责任，

^① 李小凤：《语气词：调节交际距离的人际手段——电视有声语言的显性特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② 翁玉莲、郭欣荣：《功能语气词在新闻评论话语中的选择趋向》，《新闻界》2011年第5期。

^③ Anzhelika Dosenko and Olga Khamedova, “Crime and Gend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Ukrainian Pres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vol.8, no3, 2021.

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对男性杀妻行为严厉指责后，转而进行的正面形象补充；二是针对女方形象的评价话语，媒体所用到的描述性词句会在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之间来回跳跃，既有褒奖，也有贬损。但这种平均主义的原则对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施暴男性）而言，变相地减轻了责任，而对于受害女性而言，隐性地加重了义务和要求。四是基于故事特殊情节而采取的中立策略。主要是指媒体将发案原因归咎于一些客观情况，诸如夫妻双方是否患有心理疾病、某一方是否因身体问题而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等，此类特殊因素都会以中立性的措词表述出来。站在这一视角向外界报道案发细节和情境，一方面，能保证社会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杀妻案件始末；另一方面，其所透露的深层信号是案件责任的全部转移。施害男性作为应受刑事处罚的一方，会因此树立“悲惨形象”而成为值得同情的人，当事女性作为直接受害人，反而失去了道德上的支持。五是为了提升网络新闻可信度而采取的强化策略。其核心内容是网络媒体对新闻报道一手资料来源的特殊注明。例如在2020年杭州许某利杀妻碎尸案件报道中，媒体一再重申新闻消息源自于官方机构，其资料出处具有权威性。这一叙事策略不仅为当事媒体开辟了一个回应社会质疑的解释通道，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新闻受众对文章品质的肯定和认可。

五、结论

网络媒体强化了公众对新闻的认同感，塑造着公众看法及群体感知，尤其在家庭暴力的社会化控制和处理中，该类功能的影响更为显著。作为人们了解案件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报道不仅改变着公众对事物的理解，而且公众的普遍反应被纳入到政策制定中进行考量，从这一点上看，家暴犯罪新闻的叙事策略，在政策制定和司法判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网络媒体的话语策略还具有明显的情感取向，通过凸显细小问题、虚构部分事实的方式，引导公众关注，完成流量吸引。然而，名誉、声望及人格具有财产性，国家法律明文禁止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的各类行为，对于法益侵害较为严重的，涉案者将受到刑法处罚。然而，一则家暴网络新闻在遭遇质疑和调查后，涉事媒体仍然可以针对这些不利情况发动二次宣传，以迫使政府作出让步或者司法作出妥协，基于此，有必要提前掌握网络媒体的叙事逻辑，了解在哪些方面需要作出改变，哪些干预措施能够起到预防效果，以引导公众超越媒体的偏见。

责任编辑：许磊

(上接第62页)

美国对东北亚地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支点分量。当“威权”政治体制进入复杂曲折的社会政治转型时期，民主政治发展往往是不稳定的。但针对蒙古国这类“小而美”的“巩固型民主国家”开展援助活动，若受援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时，美国便能以最小的精力和代价，发挥民主援助效果的最大化，对中俄施加“政治压力”。

从长远来看，美国将蒙古国作为其东北亚地区民主“前哨”和战略支点的战略不会改变，“民主援助”作为一种花费不大但颇有“效果”的政策工具，美国仍会延用。如今美国正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国家和意识形态对手，希望组建民主联盟来获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华竞争优势。^①美国在中俄的战略腹地推动蒙古国“民主化”，不仅给中国带来地缘政治风险，更是从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对中国构成长期、潜在的隐忧。因此，在考虑推进中蒙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同时，中国还应及时研判美国在对蒙古国进行“民主援助”过程中给本区域内国家“外溢”意识形态风险，并做好必要防范和应对。

责任编辑：许磊 王冰

^①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2021年11月2日。

新《证券法》下市场操纵行为规制的 实证检视与完善^{*}

汪青松 张汉成

[摘要]我国关于市场操纵行为的规制范式经历了系列变更，新《证券法》构建了对市场操纵行为类型界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制范式。通过对2015—2021年证监会发布的117份生效行政处罚文书进行模块化解构编码发现，在我国监管实践中，市场操纵行为认定面临着主观意图和客观结果的争议，且在违法行为精准类化上亦存在问题。通过对该系列问题的制度归因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立法规定既未能清晰界定市场操纵行为概念外延，亦未能实现对市场操纵类型内核的有效界分。在明晰上述问题及制度成因的基础上，尝试在理论层面引入整体的要件分析框架和实证层面筛选类型的同时，明确类型构成要件，以此作为制度完善进路。

[关键词]市场操纵 规制范式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073-07

市场操纵行为作为证券欺诈行为的典型表现之一，会扭曲证券价格和交易量，掩盖市场真实供需关系，严重破坏了公平有序的资本市场发展秩序。长期以来，其一直是证券执法的工作重点之一。新《证券法》对现行市场操纵的法律规制提出新要求。已有研究多着眼于对特定类型的市场操纵行为进行要件解构或理论剖析，^①缺乏从实证角度对市场操纵行为宏观类型规制的研究。本文采用量化实证方法就中国证监会在2015—2021年度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作出的117份生效行政处罚书进行分析。结合新《证券法》规定，通过实证要件构造检视，以期为后续新《证券法》修订或证监会市场操纵行为内部指引的更新提供制度供给意见，实现对市场操纵违法行为的周延性规制。

一、我国关于市场操纵行为规制范式的演进

(一) 证券市场萌芽发展期：概括界定为主的规制范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萌芽发展期主要是自其初建到渐成规模，以1990年12月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为初建标志到1998年12月《证券法》审议通过。为了应对操纵行为对市场造成的危害，我国依次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1990年和1991年分别出台的《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经济特区证券管理暂行办法》虽未单独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但在证券交易活动的禁止行为中均有所涉及。1993年和1996年分别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关于禁止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

*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科技赋能金融创新的行为规制研究”(21SKJD030)及2021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新证券法下操纵市场手段的类型化研究”(CYB211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汪青松，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汉成，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1120)。

① 汤欣、高海涛：《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研究——行政处罚案例的视角》，《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在针对信息型操纵予以专类规定的基础上对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进行了初步的抽象概念界定。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证券市场操纵行为分类体系雏形初现，其舍弃了信息型操纵专类规定，将分类体系凝练确定为四大类型：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操纵、洗售操纵、其他操纵方式，在定义描述部分保留了目的性阐述。因市场操纵初现，类型化趋势不显著，主要采取的是以概括界定为主的规制范式。

（二）证券市场规范发展期：类型界定为主的规制范式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期主要是以1998年《证券法》颁布到2005年《证券法》修订为标志。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市场操纵行为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主体上逐渐倾向于两个或两个机构以上的联合操纵行为，在手段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操纵手段，而是通过信息操纵结合交易操纵方式逐渐成为市场操纵违法行为常态，如在此期间发生的亿安科技案及中科创业案等都是个中典型。^①市场操纵的识别难度渐次增加，2005年《证券法》修订相较此前而言主要是将操纵证券交易量纳入了连续交易操纵的认定要件范围，并且将目的性描述去除，彻底舍弃抽取同类项的定义描述法，演进为以类型界定为主的规制范式。

（三）证券市场融通发展期：类型界定细化的规制范式

证券市场融通发展期主要指2005年《证券法》修订至今，在此期间市场操纵行为呈现出了与以往所不同的特征。在操纵结果上，不再强调最终实现操纵市场影响价量的非法目的。在操纵形式上，呈现出隐蔽性及跨域性发展，如伪装成内幕信息者通过频繁申报和撤单诱使其他投资者入市追涨杀跌的虚假申报操纵以及跨市场操纵。^②在操纵技术上，新型技术频出，如智能投顾对市场信息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③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操纵的复杂性。因此新《证券法》修订为了回应上述实践趋势，对原有的市场操纵手段分类体系主要进行了两方面变更。在体系的共性层面进行了要件的变更：奠定了操纵市场行为从“结果犯”到“行为犯”的变更基调。具体而言，修订后的新《证券法》第五十五条，对于操纵行为规定“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两种模式皆可。^④在体系的个性层面增加了实践中的常见类型：在原有的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操纵、洗售以及“其他”操纵类型的基础上，新增“虚假申报操纵”“蛊惑交易操纵”“抢帽子交易操纵”以及“跨市场操纵”四项操纵类型，确立了类型界定细化的市场操纵规制范式。^⑤该类型界定细化的规制范式相较以往而言，对主观过错要件和客观损害事实要件采取了可选择式的立法路径，通过类型细化突出强调了违法行为要件。^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范围的同时，亦可能带来相应的认定难题。

二、我国市场操纵行为规制要件构造的实证检视

（一）实证检视的路径说明

因行政处罚文书为文本材料，为方便后续量化统计分析，本文对讨论主体操纵市场行为相关处罚文书内容进行识别编码，^⑦在此基础上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归类分析。关于操纵行为的归类认定，本文基于现有法律法规、理论文献及实证研究归纳，对行政处罚文书中认定的市场操纵行为构建了三级指标，采取多层次递进认定的方法。在涉及市场操纵行为的归类认定时，优先考虑一级指标，当一级指标没有提及或无法确定时比照二级指标，一二级指标都无法判定时，最后再比照三级指标。一级指标主要来源于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二级指标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第

^① 桂敏杰：《证券法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② 王萍：《证券交易与监管法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

^③ 邢会强、银丹妮：《智能投顾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构建》，《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 徐文鸣、张玉美：《新〈证券法〉、程序化交易和市场操纵规制》，《财经法学》2020年第3期。

^⑤ 张民安：《“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抑或“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辨——行为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条件的称谓》，《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

^⑥ 彭冰：《魔鬼隐藏在细节中：证券法大修中的小条款》，《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相关处罚文书是指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27日期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77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与市场操纵行为直接相关的117份行政处罚文书。

三十四条、三十七条、四十条、四十四条、四十七条，三级指标主要来源于现有行政处罚文书中的特定行为词汇，如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先建仓、再荐股、后卖出、反向交易等。举例而言，首先比照一级指标，如果处罚书中提及认定依据为 2005 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项，则该操纵市场必定涉及利用资金、持股、信息优势连续交易操纵，当处罚书中没有提及一级指标时比照二级指标，如认定提及《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第四十条，则对应判断为虚假申报操纵，一二级指标都没有提及时，最后再看三级指标，如在认定中提及尾市拉抬，则一般涉及尾市交易操纵。

（二）实证检视的问题揭示

1. 行为认定面临主观意图、客观结果争议。通过上述规制范式分析可知，新《证券法》在市场操纵行为主观故意和客观损害事实层面主要采取了可选择式的立法路径，认定路径上呈现出二元路径：违法行为 + 损害结果或者是违法行为 + 主观意图，只要符合其一便可认定为市场操纵。但在实证检视中，我们通过对以往数据的梳理可知，仅仅是拓展了认定路径的规制范式改革，欠缺对行为认定要件的体系框架重构，无益于解决现有争议。

在主观意图方面，从既往的行政处罚当事人申辩理由中可以窥见当事人对没有主观故意的申辩强调。在 117 例行政处罚案例中有 78 例的当事人提出了申辩，其中有 47 例的当事人都会以没有主观故意做辩解，而相应的证监会认定亦会对此进行回应考察，可见主观故意已成为市场操纵违法行为认定的核心，但是此前立法却始终没有予以回应，一直以来规范层面对动机判断要件的忽略，不符合市场操纵认定实践。而此次修法亦仅仅是将意图当作可择要件，既没有对主观故意做必然性设置，也欠缺对故意内涵的具体解读，并不能解决证券实践执法中存在的主观故意申辩争议。

在客观结果方面，实践中操纵市场的行为人并非一定会获得结果层面的违法营利，亦有部分操纵者在操纵市场后得到的结果是亏损。在 117 例行政处罚中有 18 例的操纵者操纵结果为亏损，最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对市场操纵结果亏损与否的无区别处罚表明，损害结果并不等同于市场操纵结果，当事人操纵结果仅仅影响处罚的方式，如有盈利则结果为没收盈利 + 处罚，如亏损则结果为处罚。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对此申辩，认为自己市场操纵结果亏损，不应受到行政处罚。现实行政部门的执法立场其实恰恰相反，但新《证券法》并没有对此问题予以厘清，对损害结果要件继续延用此前规定，在影响价量的基础上，将其设置为选择性要件，亦未对其进行内涵解读与体系认定重构，而是通过扩大认定范围路径的方法予以回避该特定要件争议。

2. 行为认定时常面临违法行为精准化难题。在个案实证层面，频频引入兜底条款中的其他操纵手段予以认定，该做法已引起市场不适乃至当事人申辩，如有当事人申辩提及我国尚未对《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作出解释，该规定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①此外还有当事人认为以《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认定当事人构成市场操纵缺乏法律依据，该条文中的“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含义有待明确。^②在量化实证层面，117 例行政处罚中有 67 例，过半数的案例都引用了兜底条款，即原《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原《证券法》在类型化规制层面具有明显的立法滞后性，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司法机关仅能依据兜底条款来应对现实中已复杂多样的操纵行为，引发了大量争议。无论是个案实证层面当事人对原《证券法》兜底条款适用的不满，还是量化实证层面对于兜底条款的频繁引用，都表明了在证券市场操纵的行为认定时已面临违法行为精准化难题。

新《证券法》对客观违法行为要件的变更主要是对行为类型进行了扩展，但具体扩展仅作了数量上的变更，虽相较以往而言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兜底条款的应用，但欠缺对客观违法行为类型精确的划分依据与逻辑，依旧无法回应精细化执法需求。

三、新《证券法》市场操纵行为规制问题的归因分析

^①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任良成）》〔2015〕85号。

^②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海通金投资有限公司、刘璟）》〔2018〕71号。

我国市场操纵行为规制一直存在着“选择性”和“运动化”的不良态势。^①其根源在于现行法律规定欠缺合理明晰的规制逻辑体系，执法部门在运用现有规定时难以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违法认定和类型区分，面临认定困难和认定不精准问题，因而时常出现根据相同政策而执法不同的倾向。具体立法归因体现为新《证券法》规定的市场操纵行为与合法行为边界模糊，市场操纵行为类型内部界分不合理的立法困境。

（一）概念外延边界：市场操纵行为界限的模糊困境

因我国采取彻底的“列举+兜底”的方式，导致虽有学界对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的探讨及对其定义的各式讨论，但在法律规范定义层面却欠缺原则性的统一要件认定。^②因此仅比照细分类型要件，容易陷入与合法行为无法区分的困境，执法机关对市场操纵行为存在认定困难的局面，在认定过程中面临较大争议。^③实践中亦凸显出此困境，当事人多以此作为申辩理由，在117例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申辩案例数为78例，其中以客观行为是正常商业行为作为申辩理由的有36例。主要体现为以行为为正常市场交易行为申辩和以行为为合法商业管理行为申辩，如主张市值管理、正常信息披露等。

1. 市场操纵行为与市场交易行为边界重叠。以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申辩是最为常见的申辩理由，也是现有市场操纵行为界限被诟病的主要领域。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与正常市场交易行为难以区分的不仅是市场操纵行为规制中的某一类型，而几乎与各种类型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界限问题。例如对于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当事人可申辩自己没有拉抬股价的故意，经过研究而买入具有基本面支持，因为在建仓时发现股票价格异动，为了不错失机会而买；^④对于虚假申报操纵，可申辩申报后撤单是因为不看好个股的后续走势；^⑤对于连续交易操纵，可申辩是基于真实投资目的的短线买卖或者以博取短线差价为目的的投机行为并非操纵行为，^⑥部分案例中可见抗辩称连续交易投资股票的行为是正常的投资获利行为，是建立在对上市公司充分调研和综合利好分析的前提下理性的决策；^⑦对于洗售操纵，可申辩是因股价波动而改变申报方向后发生不同账户之间成交的情况，并非刻意为之。^⑧通过上述当事人申辩理由列举可知，核心点均为申辩自己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而证监会却以市场股票交易量或者价格波动的结果验证倒推其行为存在操纵，属于结果归罪，^⑨众多被处罚者认为自己仅是不幸的“羔羊”，时运不济被选中处理以稳定市场动荡带来的股市不安情绪。

2. 市场操纵行为与商业管理行为区分受限。现行部分商业管理行为因涉及公司内部管理，具有商业秘密性。管理的过程、结果若非特定调查，外人无法获得确切信息，二者之间常常处于交融状态，难以判断究竟是合法的商业管理行为还是非法的市场操纵行为。就市值管理而言，新增的“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与上市公司直接相关，其实也就是市值管理里面一种常见的违法行为。^⑩在现有案例中，证监会与当事人之间也基于市值管理的方式存在歧义，当事人通常会申辩其为合法的市值管理，只不过在正常的市值管理过程中，存在个别信息披露违规问题，并不至于构成操纵市场。^⑪但究竟只是市值管理过程中所附带的行为涉及违规，还是市值管理就是为了市场操纵

① 董安生、郑小敏等：《我国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现状、反思与进路》，《法学家》2005年第1期。

② 张小妮、张宝山：《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界定与规制比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③ 钟维：《欺诈理论与期货市场操纵二元规制体系》，《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④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刘长鸿、冯文渊）》（[2015]58号）。

⑤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赵晨）》（[2016]111号）。

⑥ 汤欣：《操纵市场行为的界定与〈证券法〉的修改建议》，《中国金融》2004年第19期。

⑦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黄信铭、谢冠华、陈因国、黄正中、朱辉、庄德智）》（[2016]61号）。

⑧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朱康军）》（[2017]39号）。

⑨ 萧鑫：《证券做市交易与市场操纵的界分》，《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

⑩ 《市值管理，还是操纵市场？》，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995781084197923&wfr=spider&for=pc>，2021年5月17日。

⑪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蝶彩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谢风华、阙文斌）》（[2017]80号）。

服务，二者之间常常难以区分。就公司信息披露而言，除了超持股比例未披露等有明确披露要求的内容信息以及歪曲篡改披露内容之外，其他诸如披露信息的节点、选择板块合理与否均难以界定。在此过程中是否属于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亦难以区分。^①当事人往往以披露内容事件真实，属于上市公司正常的信息披露作为申辩理由，^②而公司对真实信息的选择性披露以及节点性披露并不存在统一客观的判断标准，更多是基于公司内部管理运营需求决策事宜。

（二）类型内核维度：市场操纵行为类型的界分缺陷

通过实证梳理可知，目前实践中广泛存在着复合型市场操纵的现象，^③一份行政处罚文书会复合两种、三种甚至四种以上的市场操纵手段，据实证统计，仅使用一种操纵手段的有 27 案，复合两种操纵手段的有 51 案，复合三种操纵手段的有 30 案，复合四种及以上的有 9 案。虽然部分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操纵隐秘性需求增强，当事人的确使用了多种手段进行市场操纵，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客观市场操纵行为类型的界分缺陷倒逼了复合型操纵的频发，对市场操纵行为的精准认定提出了挑战。主要体现在：其一，现存分类欠缺更新，已经明显少见但仍旧占据法定分类一席之地；其二，类型划分之间存在竞合现象，没有真正独立区分，导致同一行为同时构成两种市场操纵手段类型。而这两方面也正是新《证券法》下市场操纵行为类型的主要界分缺陷，阻碍了市场操纵行为的精准认定。

1. 市场操纵行为界分与监管实践存在错位。约定交易操纵类别规制已落后于证券市场操纵规制实际需求。就约定交易操纵而言，其从 2005 年起即被规定为市场操纵的法定行为类别，但随着时间发展以及操纵隐秘性需求增加，已逐渐落后于市场实践需要。随着交易模式的迭代更新，可预见的是其发生频率只会越来越低。基于约定交易操纵需要与他人进行配合就约定事宜进行证券交易的基本特征，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有二：其一，与他人配合的缺点在于隐秘性欠缺，被监管部门执法查明的风险大为上升；其二，因为现行代理式操纵的发展，当事人可以以培育代理人的方式扩展自己的控制账户进行相互交易也即是洗售操纵，进而实现就原来的需要与相对人进行协商约定的交易策略。实证可得，在 117 例操纵市场行为的行政处罚中，约定操纵仅有 2 例，逐渐萎缩，而洗售操纵却有 64 例，仅次于常见的连续交易操纵数量。对约定交易操纵类别的规定，已与市场操纵的监管实践产生错位。

跨市场操纵行为不兼容于现行新《证券法》市场操纵行为的类型规制体系。跨市场操纵行为作为本次新《证券法》改革新增的市场操纵类别，是指操纵的行为和结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直接价格影响关系的市场的操纵形式。^④一方面，该种操纵类别与现有新《证券法》规定的其他操纵市场行为类别并不在同一维度，其更倾向于是一种操纵的现象而非操纵细化类型，现有其他市场操纵行为的分类依据是行为人操纵市场时所运用的手段，其都可归属于单一市场操纵领域，而跨市场操纵的判别标准更倾向于操纵行为和结果所涉及的市场范围，涉及多个市场。^⑤另一方面，从实证中也可得到验证，现行公布的 117 个案例中，仅有 1 例跨市场操纵案例的发生，数量稀少，且关键是此前市场操纵行为规制的立法路径均有内部指引作为前指向导，即现有所知的市场操纵类别具体定义及构成要件都在内部指引中有相应规定，只不过是待市场条件成熟，再依次纳入证券法律规制范畴。而跨市场操纵是目前在内部指引中暂未出现过的类型，直接引入新《证券法》规制，并不符合新《证券法》关于市场操纵手段的稳健立法进路。^⑥

2. 市场操纵行为界分存在类“竞合”现象。新《证券法》市场操纵行为分类中部分存在类“竞合”

^① 杨松、石启龙：《市场操纵本质的新认知及监管理制创新》，《江西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

^②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阜兴集团、朱一栋、李卫卫、郑卫星、宋骏捷）》([2018] 77 号)。

^③ 陈晨：《证券市场信息型操纵认定难点及监管对策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7 年第 8 期。

^④ 谢杰：《跨市场操纵的经济机理与法律规制》，《证券市场导报》2015 年第 12 期。

^⑤ 钟维：《跨市场操纵的行为模式与法律规制》，《法学家》2018 年第 3 期。

^⑥ 李珍、夏中宝：《新〈证券法〉中操纵市场条款修订的得失评析》，《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 年第 7 期。

现象，当特定操纵出现时，类“竞合”的操纵现象会使一种行为同时触发两种操纵类型，不利于分类规制目标的实现。新增的蛊惑交易操纵与原有的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操纵之间存在重叠地带，^①通过实证个案筛查可知，^②目前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侧重人为操纵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时点，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的情形，而该控制披露的内容和节点以及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与蛊惑交易的核心认定行为存在完全重叠。另一方面，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操纵中有公布信息后连续交易的行为认定指标要求，^③但与此同时，蛊惑交易也并非仅有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还会存在发布上述信息后利用交易进而获利，如在何思模蛊惑交易操纵市场被处罚一案中，^④证监会认定其存在控制利润分配及高送转预案提案的提出并公告的时间，待股价上涨后随即将之前利用朱某账户买入的“易事特”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易事特”卖出获利行为。因此，二者的认定存在中间重叠地带。

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以及尾市交易操纵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⑤通过上述类案实证呈现，我们已经得知该两类操纵行为发生频数均较为靠前，按行为多发、类型规制的规律，该两操纵类型本应引进新《证券法》进行明确规定，或许正是因为两种行为本身之间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才暂时没有纳入特定类型规制范畴。但基于实践需求，后续在概念界清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纳入的需要。现存的无法对二者进行区分的问题势必影响后续类型的扩展，内部指引对其二者的构成要件论述并无法将其截然区分，呈现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当行为符合尾市操纵认定时，其必然是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但是当一行为是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时却并不必然是尾市操纵。

四、新《证券法》市场操纵行为规制的完善进路

现行《证券法》市场操纵行为在要件构造上面临的认定困难和认定不精准问题，可归因为两个方面。在概念外延层面，基本前提定义欠缺的情况下，市场操纵整体要件分析框架亦无法构建，导致在实践执法中，为了绕开对市场操纵的整体认定，我国执法部门都是采取将市场操纵拆分为若干行为，再对行为进行认定的方法，^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认定难题。在类型内核层面，现有对市场操纵的相关类型研究更多是一种“始于抽象且终于抽象”的自我循环。欠缺实证分析，无法真正对实践中的市场操纵违法样态进行体系化的梳理归纳，也就无法进一步对现有类型的认定指标进行实时修改矫正，难以实现精准类型认定目标。明确其根本原因后，需要从理论指引层面引入整体的要件分析框架以及实证检视基础上，明确定实践类型及构成具体指标的双层路径予以改革完善。

(一) 引入整体的要件分析框架

在理论指引层面，可参照欧盟相应立法的体系化思维，通过框架性规定、实施细则与指南三级立法，在市场操纵认定规则方面构建以市场操纵定义为核心、市场操纵征兆为辅助、公认市场惯例为例外的多层次法律体系。^⑦具体到我国实际情况，主要欠缺的是框架性规定和市场操纵定义核心。因此建议引入整体的要件分析框架，在类型化认定的前端引入要件分析框架，予以规范认定要件概括。由“列举+兜底式”分类体系向“概括+列举+兜底式”分类体系转变。^⑧具体而言，主要是为了针对性解决现有类型界分外部与合法行为界限模糊问题。通过引入抽象的前端要件分析框架，一方面实现判别路径的层次化，首先判别一种行为是否符合要件分析框架，^⑨构成操纵行为，其次再进一步判别具体属于哪一类别

^① 商浩文：《论信息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司法认定路径——以 2019 年“两高”最新司法解释切入》，《法学》2020 年第 5 期。

^②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鲜言）》([2017]29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蝶彩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谢风华、阙文斌）》([2017]8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永邦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朱德洪、杨绍东、冯越峰）》([2016]32号)。

^③ 郑彧：《从“结果主义”转向“行为主义”——论连续交易型市场操纵的认定》，《证券法苑》2019年第1期。

^④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何思模）》([2018]36号)。

^⑤ 郑佳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法律认定标准的实证研究与再审视》，《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⑥ 叶林：《证券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

^⑦ 刘春彦、林义涌：《欧盟反市场操纵制度的变革与启示》，《德国研究》2021年第1期。

^⑧ 李晓珊：《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⑨ 张超、甘培忠：《市场操纵的规范解构和分析框架维度构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操纵行为。另一方面实现判别方式的要件化，对市场操纵进行统一定义概括，在定义中涵盖统一的主观动机、客观行为、结果呈现描述，确定体系化的主观+行为+结果抽象认定标准。^①

对三要件的判定标准，需要明确主观是前提、行为是必要、结果供参考的认定准则。必须要有主观故意作为前提，^②因为如果不采纳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考察，将会模糊操纵行为与正常的合法行为的边界，不利于证券市场自由发展，^③非故意的正常交易行为引起的市场波动不应受到追责。在主观故意的认定方法上，一方面，可以实行异常交易推定下的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异常交易行为判断当事人有操纵故意，需要当事人进行申辩推翻，否则可从异常交易行为推定故意的成立，这早有实证支持。^④另一方面，直接言辞证据例如证监会明确获取到的双方合谋操纵聊天记录以及强烈的操纵动机亦理所应当成为推定故意的认定方法。另外，行为是必要的需求要件，无论是基于主观故意的倒推判断途径还是基于主观心理不归罪原则的共识，客观行为的存在对于市场操纵的认定都必不可少。至于影响结果则更多是作为处罚幅度的考量要件存在，并不能决定市场操纵行为的存在与否，这在个案中也已得到佐证，^⑤如当事人提出申辩交易造成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结果很小，属于股票价格自然波动，不符合操纵行为“结果要件”被驳回。

（二）明确实践类型及构成具体指标

首先，针对市场操纵行为部分分类与监管实践产生错位的问题，需要明确构建的操纵市场手段分类规制体系应该是动态演变的体系，应当纳入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市场操纵手段类型，也应允许曾经存在的市场操纵手段在不再高发且慢慢消亡时退出分类规制体系，回归到其他手段的统一规制当中。根据这一动态演变的体系要求，后续针对性的修法完善应该是将约定交易操纵与跨市场操纵从现有法定规制类别剔除，约定交易操纵正在逐步走向消亡，跨市场操纵类型尚未经过实践验证，且不符现有分类标准。其次，针对市场操纵手段部分分类存在类“竞合”的问题归因，应当在删改分类的基础上重构各自的认定指标。对于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操纵条款可以考虑予以删除，保留利用资金和持股优势的连续交易操纵即可，避免了和新增的蛊惑交易操纵之间的竞合混乱。至于对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以及尾市交易操纵则可以采取将尾市交易操纵并入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的做法，^⑥与此同时明确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包含开盘、盘中以及尾市操纵等细分亚型，类似于现有的连续交易操纵有利用资金优势与利用持股优势两种亚型。最后，对于现存规定的类型体系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指标，以解决此前阶段只有定义描述而无指标描述的困境。^⑦在行政处罚认定中，证监会对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多以指标短词的形式锁定，缺乏对应指标已饱受诟病，如当事人申辩时指出证监会将《证券法》中未明确规定“操纵开盘价”“日内反向交易”等认定为操纵市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⑧因此，需进一步明确各市场操纵行为对应认定指标。上述完善措施，在现有立法路径下可通过重新制定内部指引的形式予以实现。颁布于2007年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已于2020年被废止，亟待根据现有新《证券法》行为类型化规制，重构内部指引具体内容。后续应限定特定年限对此前行政处罚文书采实证范式的研究方法予以解构分析，为内部指引的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支撑。

责任编辑：王冰

① 冒智桥：《虚假申报操纵市场认定规则探究——以阮某诉证监会行政处罚案为例》，《法律适用》2019年第18期。

② 蔡奕：《证券市场监管执法的前沿问题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页。

③ 郑佳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法律认定标准的实证研究与再审视》，《政法论丛》2016年第5期。

④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赵晨）》([2016]111号)中异常交易行为被推断故意，当事人申辩成功，认定为正常交易行为；《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刘坚）》([2018]108号)中异常交易行为被推断故意，当事人没有申辩成功，被认定市场操纵。

⑤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吕乐、陈志龙）》([2019]125号)。

⑥ 彭冰主编：《规训资本市场：证券违法行为处罚研究（2016）》，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86页。

⑦ 汤欣、高海涛：《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研究——行政处罚案例的视角》，《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⑧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唐汉博、王涛）》([2017]21号)。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理论逻辑、 国际借鉴与实践路径探究^{*}

郭跃文 刘佳宁 李 霞

[摘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窗口”“试验田”作用、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国家战略所需，也是以金融开放创设跨区域合作典范、以制度协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湾区所向。本文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等维度，分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同时，在对世界湾区城市金融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金融枢纽的战略构想，即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枢纽 理论逻辑 国际借鉴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80-07

一、前言

透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世界级湾区必然是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的高地，必须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支撑。从2017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战略目标的提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正式颁布，五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经济实力、竞争力显著增强。它已经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新发展的生动实践。《规划纲要》清晰定位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形成国际金融枢纽。这一定位有着“天然”的必然性、特殊性和使命性。“必然性”体现在，世界级湾区往往具有高度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生态系统完善，金融市场发达，既包括了深圳、广州等国内金融重镇，也涵盖了香港、澳门国际金融市场，是国际和国内资本流动与市场化配

*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基金2022年度常规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本流动的多维识别、长效预警与协同监管研究”(GD22CYJ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跃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特约研究员；刘佳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霞(通讯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高级经济师(广东广州，510635)。

置的枢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全球有影响力的金融总部及金融平台的集聚地，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国际金融枢纽的基础条件。“特殊性”体现在，金融开放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既要内外平衡发展，又要稳健推进。这就要求有一个战略窗口，既能把国际国内市场链接起来，又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世界宣布：“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可以为实验推广国家开放政策提供战略缓冲。“使命性”体现在，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通过打造国际金融枢纽，可有效整合湾区经济地理空间，借助金融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国家赋予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使命。因此，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形成机理和实践路径，兼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逻辑

（一）国际金融枢纽的概念界定

枢纽指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枢纽经济可以理解为一个资源聚流型的网络化中心，以优化发展要素时空配置为目标，以集聚和辐射为手段，通过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来全面提升发展能级，是一种综合性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吴海瑾，2018）。^①国际金融枢纽是一个崭新的概念，理论界关于其内涵和外延方面的探讨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解读国际金融枢纽的内涵，“国际”与“枢纽”是破题点。“国际”指国际金融枢纽要国际化，广泛吸收集聚国际金融要素，使得金融辐射能级和金融开放水平空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国际领先；“枢纽”指国际金融枢纽要形成资源的网络化中心，以枢纽内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重镇为节点，通过点线面立体融合成为高效联动、多面互补的庞大金融有机网络。

通过对“国际”与“枢纽”概念的内涵解读，基于金融地理及金融功能研究视角，本文将国际金融枢纽界定为金融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平台完善、金融监管协调高效、金融运行制度完备、金融开放能级较高、金融交易频繁迅速的多核有机网络和“生态循环系统”。金融枢纽内存在多个核心，各核心之间制度相近、资源共享、发展协同，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要素就能通过金融中枢集聚、适配、调节，渐进式实现动态平衡。

（二）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机理

拥有国际金融中心是建成国际金融枢纽的前提基础，两者在发展上互相促进。在金融地域运动中，不同城市逐渐演进为金融支点、金融增长极、区域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等，分别处于不同的金融层级，发挥各自的金融功能。当某地区存在多个相互联系的不同金融等级结构形成的空间网络体系（包括单极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若干金融支点和增长极构成的多维金融腹地），就形成了国际金融枢纽。从理论视角解析国际金融枢纽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中心不断集聚的金融要素逐步呈现负外部性特征，这可以通过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得到解释；第二阶段，金融中心要保持较高的运行效率，必然要不断优化金融结构，周边地区也要吸收和承接不同特征的金融资产、要素，从而推动金融行业的深度分工；第三阶段，社会大分工可以提升金融运行专业化程度，但仍需要不同层级的区域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从单核放射状的国际金融中心演化形成多核放射网络状的国际金融枢纽。

1.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倒逼金融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反映了不断集聚的要素与产出之间的效应关系。当技术水平等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要素在低水平阶段能够快速推进产出供给，但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边际产出会发生递减效应。金融集聚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金融要素的不断积累又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资本的逐利特征以及金融运动理论透视出金融资源会向高利润的空间与行业转移，通过推动金融资源在广度和深度上的集聚形成金融中心。相对非中心地区，在国际性金融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资源的流动更为频繁，金融信息的传递也更为敏捷，金融制度的运行亦更为高效。早期的金融集聚确实

^① 吴海瑾：《在发展枢纽经济中培育新动能》，《群众》2018年第15期。

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但随着资金、人才、技术和相关组织机构的快速集聚，金融中心随之出现交通拥堵、地租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专业化供给不足、恶意竞争等问题，金融资源的集聚给金融中心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日益严峻。这进一步导致金融资本在统筹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周边地区的资源不再无序地挤入金融中心，而会重新审视进入金融中心的利弊。权衡之下，具有竞争优势的金融机构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组织存在更强的进入动机，而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金融资源则会更多选择向周边地区扩散。

2. 社会分工理论推动周边区域金融活动专业化、金融产品丰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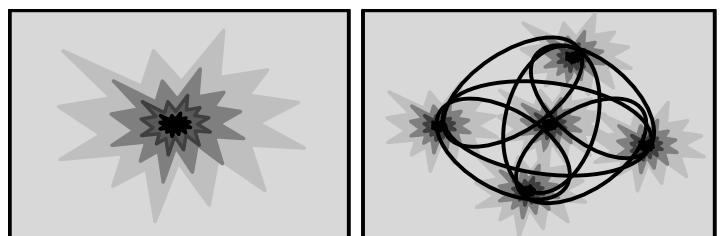
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交流和贸易变得更为频繁，社会分工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社会大分工，^①都与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存在密切关联，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深入和细化。

在日新月异的金融环境中，频繁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为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不断吸引生产要素向金融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集聚。由此，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愈加个性化、多元化，从事金融交易的主体也更加庞大，这为诱发社会专业化分工奠定了基础。为了追求边际效应最大化，核心地区只保留和吸引具备比较优势的主要金融要素，并走向专业发展道路，其他与核心地区发展定位关联不甚密切的要素则向周边的次中心地区转移，形成多元化布局。与此同时，核心区周边的次中心地区具有网络化的交通链接和较低的成本压力，具有更强的吸纳能力，既可以较好地承接核心地区过剩的金融资源，也通过不断吸引非比较优势资源在次中心地区的集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拉近次中心地区与核心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同次中心地区在资源禀赋、发展环境和执行制度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在承接金融资源对象上各有侧重，最终使得金融活动在区域的分工更趋细致化。核心地区和次中心地区的分工协同，共同推进区域金融活动向高级化、独立化、专业化演进。

3. 多核心理论推进金融中心协同发展并渐进演化为国际金融枢纽。

多核心理论产生于 1945 年。提出者哈里斯和厄尔曼认为，大城市的形成并非是单一核心城市发展 的结果，而是由具有不同功能、相互联系的若干个核心地区共同组成（见图 1）。

随着社会分工与专业发展的进一步推进，金融核心区与次中心区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事实上，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不同能级金融中心逐渐摒弃传统的竞争与挤压方式，转而采用交流与合作



方式来开展金融活动。各金融中心的联系日趋紧密，尤其是地理位置靠近的金融中心之间因具有更强的密接性，呈现组团式发展局面，有利于维护和激发相邻金融中心的利益最大化。在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中，多核心理论暗示着在城市群体系内，多核之间的协同合作将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网络体系，即金融信息集散地、知识溢出地和金融创新地。这些体系承担着国际金融资源控制中心和资本枢纽的职能，并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冲击，确保内部的金融安全，借助独特的空间结构、运行机制、规模等级和功能作用，在全球金融地域系统中展现出强大的综合竞争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77-185 页。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生产力提高将游牧部落从其余民族中分离出来，进入农业社会的过程，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即原始社会晚期），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成为一个专门的生产部门，它产生于奴隶社会萌芽之时。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奴隶社会时期商人阶层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商人阶层集聚地成为城市，其工商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水平、艺术水平相较于其他地区明显提高，这也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国际借鉴

本文从开放和创新角度,基于供给—需求理论,以伦敦智库Z/YEN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为参照,^①对比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其形成的动力机制,观察其金融发展变迁轨迹(见图2),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提供发展模式借鉴。

(一) 旧金山湾区: 市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型是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增长产生一定金融需求,金融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也随之发生演进(高洪民,2009)。^②世界主要湾区的形成历程,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自然过程(孙国茂,2013)。^③“金融为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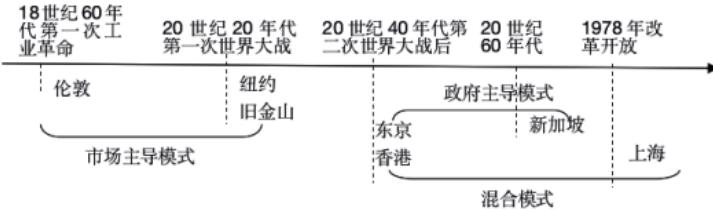


图2 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时间轴

经济服务”的本源属性,决定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中心的形成遵循“生产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张——产生金融需求(结算、融资等)——建立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形成”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即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气候条件等先天禀赋的加持下,商业、人口、贸易等向金融中心所在地集聚,引发存储、贷款、汇兑等交易需求,催生金融机构产生和集聚,自然形成金融中心。市场主导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周光友等,2011),^④旧金山湾区是其典型代表。旧金山湾区以强大的全球创新中心、全球最发达的风险投资中心带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二) 东京湾区: 政府引导模式

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中心相对应,政府引导型金融中心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京湾区遵循典型的以政府引导为主、市场自然选择为辅的发展模式(张云等,2007)。^⑤东京在日本政府适时推进经济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战略中,创新金融工具,建立高效运转的金融系统,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潘英丽等,2010)。^⑥其形成的关键,是通过富有竞争力的政策环境和制度支撑,使金融中心尽早跨入“自维持发展阶段”(孙国茂等,2013)。在政府引导模式下,政府部门利用现有政策制度、区位条件、资源分布、经济实力、产业特色、创新环境等比较优势,突破已有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锁定(尤瑟夫·凯西斯,2011; Porteous, 1999; Arthur, 1998),^{⑦⑧⑨}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引领、升级金融基础设施功能、优化金融发展运营环境、完善配套服务项目等措施,借助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持续引导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其发展遵循“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政府设计规划——金融制度改革——刺激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完善——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径。

(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混合驱动模式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展是宏观政策引领和市场主导有机融合推进的典范,主要表现在政府引导、市场需求和金融创新三大核心要素的合力支撑上(李刚、高洪民,2020)。^⑩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① 包括纽约、伦敦、上海、香港、新加坡、北京、东京、深圳、法兰克福、苏黎世、旧金山。

② 高洪民:《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崛起与沪港竞合关系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③ 孙国茂、范跃进:《金融中心的本质、功能与路径选择》,《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④ 周光友、罗素梅:《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比较及启示》,《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第1期。

⑤ 张云、孙桂芳、程丽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和条件及对上海的启示》,《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9期。

⑥ 潘英丽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

⑦ 尤瑟夫·凯西斯(Youssef Cassis):《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陈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⑧ D. J. Porteou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entres: Location, 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R. L. Martin eds., *Money and the Space Econom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9, pp.95-114.

⑨ W. B. Arthur, *Urban Systems and 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 Cities and Their Vital Syst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8.

⑩ 李刚、高洪民:《当代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决定因素与上海的对策》,《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按照演化经济学理论和“供给—需求”理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金融地域运动、城市分工协作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与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协同发力（高长春，2007；张望，2008；杨咸月等，2005；余秀荣，2009），^{①②③④}并互为补充以形成持续性的累计循环效应（孙国茂等，2013）。在混合模式“双轮驱动”下，政府机制通过战略规划确定金融中心的发展愿景和建设目标，以系统的政策措施培育并引导金融机构聚集，对金融产业运行进行控制与动态调节；市场机制则根植于经济贸易发展所产生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技术与产品创新、金融风险规避等综合因素推动金融中心的形成。

四、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依托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国内大循环吸引国际资源要素，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资源要素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综合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也必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布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为着眼点，遵循“区域性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轨迹，以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为动力源，以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为突破口，以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为支撑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使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全力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显著提升其在全球金融板块的竞争力（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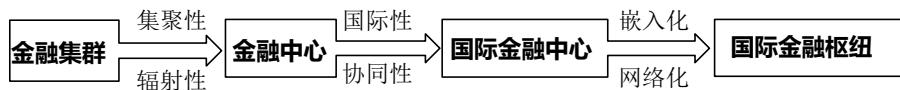


图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发展构想

（一）要素集聚和辐射带动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动力源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集聚就是经济活动的“集群过程”，并通过某种循环逻辑不断创造并维持此类集聚。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已展现出显著的比较优势，可依托现有金融要素资源与地域条件不断协调、配置、组合，吸引不同框架下的金融市场、金融规则以及金融人才、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突破地理限制，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循环流通和扩散。同时，枢纽内部各地区借助立体化的空间联系，结合自身的规模经济进一步赋能技术创新、衍生新的资源吸附，由此形成“集聚—扩散—集聚”的连锁效应。辐射带动指的是利用金融资源集聚联通的中心节点，形成具有强大经济能量的辐射源，通过金融媒介向外围扩散影响，促进更广领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进步，实现对特定范围的金融渗透和引导的过程。大湾区依托现有金融中心、核心城市，可通过金融要素的集聚辐射，有力黏合区域相互依存关系，扩展建立成熟、健全的金融地域系统，形成由散点化发展到若干单体的金融增长极，再到以几个区域性的准金融中心为支撑的金融一体化格局。

（二）对外开放和协同联动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突破口

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战略格局和视野的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关键，是以积极对接国际规则、承接更多国际业务为出发点，通过将高价值金融信息转化为金融资产的定价依据，将“货币引力中心”转化为“货币控制中心”，主导金融规则的制定，确立金融资产的定价，搭建多维国际资

① 高长春：《战略金融 国际金融中心生存报告》，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② 张望：《金融争霸：当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风险和监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 杨咸月、何光辉：《城市群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整合》，《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余秀荣：《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辽宁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本流动平台，建成全球金融资源的控制中心、国际财富的再分配中心、国际风险分配和再分配中心，在国际社会上掌握更高的的话语权和掌控力。协同发展是指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共赢效果。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其核心体现在作为全球金融要素汇聚的中心节点，内部的若干核心城市在竞争中成长、在合作中共赢。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制度和相关政策法规不断衔接融合（许传华等，2017），^①各种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制度和政策背景下的金融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统筹，并建立和维持某种既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促进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突破口在于“融”和“通”，通过推动内部各城市间的金融分工协作与功能互补，支持核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打造统一的金融服务平台（白鹤祥，2019），^②放大发展共振效应，以金融发展一体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综合嵌入和生态网络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支撑点

综合嵌入是指在打造国际金融枢纽的过程中，通过集聚、创新、协同、辐射等功能的发挥，实现金融要素与区域优势资源的多边关系性及结构性嵌入。借助内生力量和外源力量的共同作用，国际金融枢纽最终将进入螺旋式生长模式，并实现由单核放射状向多核放射状演进，发展成为集金融开放、金融创新、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若干子枢纽于一体的“巨无霸”“全家福”式的一体多面综合型金融枢纽，避免单一金融业态发展迭代后引致的枢纽经济“外强中干”和“脱实向虚”现象。从全球金融要素流动转移来看，不同金融要素的汇集会时刻产生交易记录、信息披露、产品设计、管理更新等新的金融信息，而集中的金融机构能进一步扩散有效信息、深化机构交流（孙国茂等，2013）。嵌入和网络化发展，将纵深推进金融集聚和开放联动，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信息传导效应、创新引领效应同频，提升金融发展质量，推动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突破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混合驱动发展模式、动态演进的发展路径，以打造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实现金融体系国际化、规则标准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4个“国际化”为着眼点。以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构筑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动力引擎，打造具备鲜明湾区特征、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之路，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湾区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明确发展定位，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枢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在“新兴+转轨”重要时期，金融领域既具发展中国家利率管制、资本管制等金融安排特色（刘红忠等，2015；程碧波等，2018；徐宁等，2020），^{③④⑤}又具传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关系（李礼等，2006；孟宪春等，2020）。^{⑥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在尊重发展现实和市场选择的前提下，站在港澳地区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大局以及“双区”“前海现代服务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打造具备鲜明湾区特征的国际金融枢纽。其中国特色和湾区特征就体现在，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紧密切合湾区实体经济发展特色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精准度、坚持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开放与创新中推进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探索打造具备湾区特色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路，最终实现与上海国际金融中

① 许传华等：《湖北建成全国碳金融中心的宏观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年第15期。

② 白鹤祥：《推动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中国金融》2019年第19期。

③ 刘红忠、杨小海、韩永超：《再论中国资本管制有效性》，《世界经济文汇》2015年第6期。

④ 程碧波、刘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及中国应对方略》，《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9期。

⑤ 徐宁、丁一兵、张勇：《利率管制、LPR与完全市场化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对比与实证检验》，《南方经济》2020年第5期。

⑥ 李礼、齐寅峰、李胜坤：《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基于调查问卷的比较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⑦ 孟宪春、张屹山、张鹤、冯叶：《预算软约束、宏观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管理世界》2020年第8期。

心的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

（二）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混合驱动发展模式，推进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特殊性和使命性，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应充分借鉴“市场主导型”和“政府引导型”金融中心的经验做法，以“需求主导和供给引导相互作用”的混合驱动型模式为着力点，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协同发力，推进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尽早跨入“自维持发展阶段”。一方面，借助市场主导，以湾区内外经贸的纵深合作激发产业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需求，催生金融机构集聚和服务能级提升，以市场供需动态调整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助力国际金融枢纽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政策环境、高效运转的运行架构，升级金融基础设施功能，完善金融发展运营环境，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或低端锁定，推进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产生持续循环效应。

（三）坚持动态递进的发展路径，实现由区域金融枢纽到国际金融枢纽的升级演进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一项不断适应外部形势与环境变化的复杂系统工程，应沿着“服务于直接腹地、腹地外更大区域、整个国家范围、邻近国家和政治属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实现从区域枢纽到国际枢纽的演进升级。要通过充分发挥枢纽地区“聚、疏、留、流”价值功能，使国际金融枢纽实现实由传统要素联通中心向资源配置组织中心转变，提高经济要素的时空配置效率。适度参照伦敦、上海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路径，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和通盘谋划，以子枢纽为载体，系统性推进金融科技枢纽、金融开放枢纽、绿色金融枢纽、资本流动监管枢纽等各类子枢纽平台建设，最终实现由单一枢纽到“1+N”综合枢纽的转型升级。

（四）打造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提升国际金融枢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开放性是世界几大顶级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的共同特征，体现在：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及世界先进的结算和支付系统，资金的来源和去向覆盖全球、层次多元；充当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者、规则制定者和纠纷裁量者的角色，拥有国际领先的金融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拥有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与实施的话语权以及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权。由此来看，打造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关键，必须要在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上做文章，围绕打造“一个平衡稳健的金融开放格局”，深度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规则标准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促进金融总部资源、平台资源、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在大湾区聚集，促进全球金融市场联通、规则相通、产品互认、资金高效配置，大幅提升国际金融枢纽的金融集聚力、辐射力、影响力。

（五）以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和科技赋能，构筑国际金融枢纽发展的动力引擎

金融创新的产生、传播、扩散、再创新，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能级提升的动力来源。从国际发展趋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及风险管理深度融合，金融科技创新和应用的生态圈正在催生新型“智能经济”形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充分借鉴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持续构建以金融科技为支撑、金融创新改革为动力的生态系统（刘海瑞等，2018）。^①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借助金融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等突破，持续优化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社会融资结构，实现金融改革创新对标国际湾区；另一方面，打造国际化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平台，以大规模应用场景为驱动，以大型金融机构为龙头，建成具有国际湾区水准的世界级金融科技“创新工厂”，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经营模式、场景应用、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机制等，促进金融发展提质增效，提升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责任编辑：张超

^① 刘海瑞、成春林：《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基于动力、过程、结果维度的研究》，《南方金融》2018年第7期。

高铁开通、市场可达性与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

卢昂荻 花泽苏

[摘要]采用多期 DID 等模型检验市场可达性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由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可达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相较于非中心城市的企业,可达性上升对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产品质量影响更为显著,即高质量出口产品聚集于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构造成本最小的伪高铁网络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仍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空间分布强化效应主要由非国有和高生产率企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和高竞争行业样本驱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由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可达性提升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城市劳动力就业强化了城市间产品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关键词]产品质量 空间分布 高铁开通 市场可达性 最小生成树

[中图分类号] F532;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87-10

推进大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有利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实现优势互补,开展分工协作,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益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自 2008 年后加速推进“八纵八横”城际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网络建设,降低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在此背景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市场可达性变化对企业产品质量决策以及城市间产品质量分布格局的影响,对切实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关于高铁的研究多从企业活动以及地区就业等视角进行考察,^{①②③④}而与本文最相近的一支则是研究高铁对企业出口活动影响的文献。高铁的快速扩张降低贸易成本,为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市场可达性(Market Access)。^⑤市场可达性衡量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难度,本文基于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10301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卢昂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讲师;花泽苏(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① Yatang Lin, “Travel Costs and Urban Specialization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System”,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98, 2017, pp.98-123.

② 马光荣、程小萌等:《交通基础设施如何促进资本流动——基于高铁开通和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0 年第 6 期。

③ 吴群锋、刘冲等:《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市场可达性视角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5 期。

④ Douglas Hanley, Jiancheng Li, Mingqin Wu, “High-Speed Railways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93, 2022, p.103717.

⑤ 唐宜红、俞峰等:《中国高铁、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研究》,《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Donaldson 和 Hornbeck (2016) 的研究框架, 测算了高铁开通带来的市场可达性变化。^① 产品质量的提升是我国破除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关键, 祝树金和李思敏 (2020) 发现高铁开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但未从市场可达性角度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也未研究其分工效应。^② 此外, 国际贸易领域以往多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问题, 近年来不少文献开始关注国家在同一产品内部的质量分工, 发现存在高收入国家生产或出口更高质量产品的现象, 并且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角度解释此现象。^{③④} 但以上分析框架都是研究国家间产品质量的分工模式, 鲜有考察出口产品质量在一国内部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Dingel (2017) 虽然使用美国通勤区间贸易数据实证估计了母国效应 (需求侧) 和要素禀赋 (供给侧) 对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其理论框架仍是国际贸易模型。^⑤ 李方静和张静 (2018) 则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 实证检验了母国效应和要素禀赋对我国城市间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⑥ 作为影响地区间交通和交流成本的重要基础设施, 高铁建设既有可能通过提升城市收入水平以扩大本地居民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 也有可能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和削弱匹配成本以降低高质量投入要素的价格。此外, 相较于非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有高收入居民以及优势要素禀赋集聚的特征。因此, 高铁建设及市场可达性提升对城市间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究竟如何, 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评估。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本文从区域经济学视角拓展国际贸易领域关于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研究, 将研究框架放至一国之内, 研究要素跨区域流动的背景下高铁建设对城市间不同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二是由于各城市高铁开通时间不一致, 本文采取多期双重差分 (Time-Vary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下文简称“多期 DID”) 模型以及多期三重差分 (Time-Vary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下文简称“多期 DDD”) 模型评估高铁开通的产品质量升级以及空间分布强化效应, 并且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构造成本最小的伪高铁网络作为工具变量, 有效缓解了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 三是本文结合高铁网络矢量数据以及 ArcGIS Origin-Destination (下文简称“OD”) 成本分析法构造城市市场可达性指标, 系统检验高铁建设引致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产品质量及其在城市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为交通基础设施如何有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直接且新颖的微观证据。

一、理论假说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缩短资本、劳动力等多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时间, 提高城市交通可达性, 并且能够降低本地企业获得中间品和劳动力的成本以及产品外销运费, 提升城市市场可达性, 使得城市加速融入国际贸易网络。高铁开通并不直接显著影响货物运输成本, 主要提升的是全社会客运周转量, 但高铁建设释放了公路和普通铁路的货运资源, 从而间接降低了产品运输成本。^⑦ 此外, 高铁开通有效节约买卖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 提升买卖双方的搜寻匹配效率。^⑧ 劳动力流动频率因高铁开通而增加, 信息扩散加速, 买方企业以更低的信息成本在贸易网络中获取高质量中间品, 卖方企业以更低的

① Dave Donaldson, Richard Hornbeck,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Market Access’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1, no.2, 2016, pp.799-858.

② 祝树金、李思敏:《高铁开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宏观质量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Amit Khandelwal, “The Long and Short (of) Quality Ladd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7, no.4, 2010, pp.1450-1476.

④ Pablo Fajgelbaum, 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A Linder Hypothesi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2, no.1, 2015, pp.83-121.

⑤ Jonathan I. Dingel, “The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Specializ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4, no.4, 2017, pp.1551-1582.

⑥ 李方静、张静:《探究城市质量分工源泉——要素禀赋与本土市场效应》,《世界经济文汇》2018年第5期。

⑦ 孙浦阳、张甜甜等:《关税传导、国内运输成本与零售价格——基于高铁建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⑧ Andrew B. Bernard, Andreas Moxnes, Yukiko U. Saito, “Produ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7, no.2, 2019, pp.639-688.

信息成本达成对外销售合约。总体上，贸易信息成本的降低使得企业更有能力选用更高质量的投入品，从而推动最终产品质量升级。关于产品需求扩张，高铁开通拓展企业产品销售市场，增加企业接入高收入地区市场的可能性，高收入地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更高，从而对产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推动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由此，本文提出了假说1。

假说1：高铁开通降低城市间交通成本，增加市场可达性，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现有文献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解释了产品质量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一是供给侧因素——要素禀赋。根据经典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中心城市拥有更便宜的高质量中间品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中心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更高。区域经济学领域的文献在研究集聚效应时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往往集中在中心城市，^①因为受益于知识溢出的高生产率以及生存的高成本权衡，高生产率企业更有能力选择在中心城市落址，并且中心城市竞争激烈导致低生产率企业被淘汰。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使用高品质投入品，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二是需求侧因素——母国效应。Linder (1961) 认为产品的本地需求会导致对商品生产的投资，从而推动产品出口。^② Fajgelbaum et al. (2015) 深入论证拥有更多高收入消费者的国家对更高质量产品有更大的需求，位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更有动力进行高质量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从而专注于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高铁开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将同时对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来源造成影响。在供给侧方面，高铁开通后中心城市基于初始城市禀赋吸引到更多的高质量中间品和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增加还有可能降低生产投入价格。同时，高质量中间品和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升本地企业的生产率，集聚效应强化中心城市的要素禀赋，吸引高生产率企业落址，综合提升企业生产产品质量。在需求侧方面，高铁开通后中心城市企业的市场可达性进一步提升。企业与企业的时空联系被压缩，产品的流通更为便利，高铁开通使得跨城市消费也变得更加便利。产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对企业的营业收入有正向影响，同时也会提升城市整体收入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了假说2。

假说2：高铁开通及其引致的市场可达性变化使得高质量出口产品向中心城市聚集，即相对于非中心城市企业，中心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高铁开通之后将得到更大提升。

二、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本文选取2000—2013年中国高铁建设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发展引致的交通成本下降对城市间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一)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因各城市开通高铁的时间不同，本文采取多期DID模型来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quality_{fit} = \alpha_0 + \alpha_1 HSR_{it} + \Gamma' \mathbf{X}_{fi} + \Phi' \mathbf{X}_{it} + \delta_f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1)$$

其中， f 表示企业， i 表示企业所在城市， t 表示所在年份。被解释变量 $quality_{fit}$ 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核心解释变量 HSR_{it} 表示企业所在城市 i 在 t 年是否已经开通高铁。 \mathbf{X}_{fi} 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 ($lnSize_{fi}$)、成立时间 ($lnAge_{fi}$) 和职工人数 ($lnEmp_{fi}$)； \mathbf{X}_{it} 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户籍人口 ($lnPOP_{it}$) 和GDP ($lnGDP_{it}$)，控制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 δ_f 是企业固定效应； η_i 是城市固定效应； γ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_{fit} 是随机误差项。

此外，本文检验了由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可达性提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识别策略及关键自变量与(1)式相同：

$$quality_{fit} = \beta_0 + \beta_1 lnMA_{it} + \Gamma' \mathbf{X}_{fi} + \Phi' \mathbf{X}_{it} + \delta_f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2)$$

^① Cecile Gaubert, "Firm Sorting and Agglome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8, no.11, 2018, pp.3117-3153.

^② Staffan Burenstam Linder, *An Essay 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61, p.142.

进一步地,为检验高铁开通对区域间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和(2)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主要自变量和中心城市的交乘项,采用多期DDD模型进行分析:

$$quality_{fit} = \alpha_0 + \alpha_1 HSR_{it} + \alpha_2 HSR_{it} \times Capital_i + \Gamma' X_{fit} + \Phi' X_{it} + \delta_f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3)$$

$$quality_{fit} = \beta_0 + \beta_1 lnMA_{it} + \beta_2 lnMA_{it} \times Capital_i + \Gamma' X_{fit} + \Phi' X_{it} + \delta_f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4)$$

其中, $Capital_i$ 表示是否是中心城市,即直辖市或省会城市。

本文的因变量 $quality_{fit}$ 为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现有关于产品质量的估计主要有单位价值法和需求函数估计法。单位价值法以产品单位价格表征质量,影响产品价格的因素众多,较高价格产品未必有高质量。需求函数估计法假设若同一产品的单位价格相同,则市场份额越大的产品,其产品质量越高。本文借鉴 Khandelwal et al. (2013),采用主流的需求函数估计法测度产品质量,对消费者产品需求函数做如下假设:^①

$$x_{fhjt} = q_{fhjt} \left(\frac{p_{fhjt}}{P_{hjt}} \right)^{\sigma} \left(\frac{Y_{hjt}}{P_{hjt}} \right) \quad (5)$$

其中, q_{fhjt} 代表企业 f 在年份 t 对 j 国的出口产品 h 的质量, x_{fhjt} 代表企业 f 在年份 t 对 j 国的出口产品 h 的数量, σ 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P_{hjt} 为出口目的地国的价格指数, Y_{hjt} 为市场规模。本文使用 CPI 价格指数对出口价值进行平减。

在实证研究中,将该需求函数取对数可得:

$$\ln(x_{fhjt}) = D_{hjt} - \sigma \ln(p_{fhjt}) + \varepsilon_{fhjt} \quad (6)$$

其中, $D_{hjt} = \ln Y_{hjt} + (\sigma-1) \ln P_{hjt}$, 在实证回归中将其分解为出口目的地国一年份固定效应 D_{jt} 以及产品固定效应 D_h 。本文使用 Broda 和 Weinstein (2006) 估计的分行业产品间替代弹性值,^② 将替代弹性带入式(6),使用最小二乘回归, q_{fhjt} 可通过残差项推断, $\ln(\hat{q}_{fhjt}) = \hat{\varepsilon}_{fhjt}$ 。

计算得到的同一企业不同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直接比较其大小是无意义的,故本文首先对 HS6 分位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以产品占企业出口额之比为权重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③

关于市场可达性指标的构造,本文参考 Donaldson 和 Hornbeck (2016) 以及 Baum-Snow et al. (2016),^④ 构建如下城市一年份层面的市场可达性指标:

$$MA_{it} = \sum_{i' \neq i} \tau_{ii't}^{-\theta} POP_{i't} \quad (7)$$

$$\tau_{ii't} = 1 + \rho \left(Time_{ii't} \right)^{0.8} \quad (8)$$

其中, $POP_{i't}$ 为城市 i' 在 t 年的户籍人口数,代表了城市的市场规模, $\tau_{ii't}$ 代表城市 i 到 i' 在 t 年的冰山贸易成本。 $Time_{ii't}$ 为产品在 t 年从城市 i' 运输到城市 i 的最短运输时间,基于其他交通方式矢量数据和每一年的高铁线路矢量数据,本文运用 ArcGIS 中的 OD 成本矩阵功能计算得到城市间的最短运输时间。 θ 为贸易弹性,参考过往文献 (Donaldson 和 Hornbeck, 2016; Baum-Snow et al., 2016),令 $\theta=8.22$,参数 $\rho=0.008$ 。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① Amit K. Khandelwal, Peter K. Schott, Shang-Jin Wei,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3, no.6, 2013, pp.2169-2195.

② Christian Broda, David E. Weinste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1, no.2, 2006, pp.541-585.

③ 施炳展:《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④ Nathaniel Baum-Snow, J. Vernon Henderson, Matthew A. Turner, Qinghua Zhang, Loren Brandt, “Highways, Market Access and Urban Growth in China”, *Spati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No.C-89114-CHN-1, 2016.

本文使用到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一是交通数据。城市高铁开通数据整理自 CNRDS 数据库。关于构造市场可达性指标所需的交通矢量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仅采用了 2010 年的公路和普通铁路矢量数据，数据来自 Baum-Snow et al. (2016)。计算得到的市场可达性指标变化由高铁的扩张驱动，这一估计最大化解决了公路和普通铁路建设可能对回归结果引起偏误的问题。二是工业企业生产及出口数据。计算产品质量所需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本文参考 Brandt et al. (2012) 的序贯识别方法构建了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库，^① 并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及异常值，参考田巍和余森杰 (2013) 的方法逐年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② 三是城市经济发展数据。地级市层面的户籍人口和 GDP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1—2014)》和司尔亚司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四是地形地理数据。构造工具变量所需的地形地理数据来自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的数字高程数据 SRTM 3 (精度为 90M)。本文最终样本共有 533606 个观测值，包含 149818 家企业，涉及 229 个地级市。

三、实证结果

(一) 基准模型回归

在这一部分，本文首先检验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表 1 为基准回归结果，(1) — (2) 列为城市是否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3) — (4) 列反映了对应的市场可达性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第 (2) 和 (4) 列为考虑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以第 (2) 和 (4) 列的结果为准，HSR 的系数为 0.002，这意味着相较于未开通高铁的情况，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了 0.2%；lnMA 的系数为

表 1 高铁开通、市场可达性与产品质量

	(1)	(2)	(3)	(4)	(5)	(6)	(7)	(8)
HSR	0.003***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HSR × Capital					0.002** (0.001)	0.003*** (0.001)		
lnMA			0.023*** (0.007)	0.022*** (0.007)			0.016** (0.007)	0.014* (0.007)
lnMA × Capital							0.032*** (0.008)	0.036*** (0.008)
lnSize		0.004*** (0.0003)		0.004*** (0.0003)		0.004*** (0.0003)		0.004*** (0.0003)
lnAge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lnEmp		0.003*** (0.0002)		0.003*** (0.0003)		0.003*** (0.0003)		0.003*** (0.0003)
lnPOP		0.021*** (0.006)		0.021*** (0.006)		0.021*** (0.006)		0.022*** (0.006)
lnGDP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_cons	0.492*** (0.0002)	0.284*** (0.055)	0.238*** (0.080)	0.041 (0.095)	0.492*** (0.0002)	0.280*** (0.055)	0.225*** (0.080)	0.018 (0.096)
Firm FE; City FE;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Adj.R ²	0.6707	0.6712	0.6706	0.6711	0.6707	0.6712	0.6707	0.6712

注：括号里是稳健聚类 (企业层面) 的标准误值；*、**、***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① Loren Brandt,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Yifan Zhang,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7, no.2, 2012, pp.339-351.

^② 田巍、余森杰：《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 年第 1 期。

0.022, 这意味着市场可达性每提升 10% 将带来产品质量 22% 的提升。假说 1 成立。

进一步, 本文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间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 主要自变量为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与是否为中心城市的交乘项, 即 $HSR \times Capital$ 和 $lnMA \times Capital$, 选择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的理由是行政级别是较为外生的划分。(5)—(6)列为高铁对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7)—(8)列反映了对应的市场可达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第(6)和(8)列为考虑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HSR \times Capital$ 和 $lnMA \times Capital$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后, 中心城市的产品质量提升更高。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推动了高质量产品向中心城市聚集, 中心城市的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形成了中心城市生产更高质量出口产品的空间分布格局。假说 2 得以验证。

(二) 事件分析法

本文探究高铁开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采取了多期 DID 估计方法, 开通高铁和未开通高铁企业的出口质量平行趋势是进行多期 DID 估计的前提。为检验这一平行趋势, 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高铁开通的前项与后项哑变量:

$$quality_{fit} = \alpha_0 + \sum_{m=1}^{10} \alpha_m PreHSR_{i,t-m} + \sum_{n=0}^{10} \alpha_n PostHSR_{i,t+n} + \Gamma' \mathbf{X}_{fit} + \Phi' \mathbf{X}_{it} + \delta_f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fit} \quad (12)$$

其中, $PreHSR_{i,t-m}$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是否为第一次开通高铁的第 m 期的前项, $PostHSR_{i,t+n}$ 表示第 n 期的滞后项, 分别用于检验开通前和开通后的效应。图 1 为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事件分析法结果。可以看出, 高铁开通前对企业出口没有正向显著影响,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不存在预期效应, 高铁开通 1 年以后,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三) 内生性问题与处理

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企业产品质量更高, 这些城市往往可能更早接入高铁网络, 故以高铁开通时间作为政策冲击存在一定内生性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首先在识别中控制了企业、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避免企业、城市特征以及时间趋势导致的估计偏差。为进一步解决其他遗漏变量以及测量误差问题, 本文参考 Faber (2014) 和唐宜红等 (2019) 构造交通基础设施工具变量的方法,^① 运用 ArcGIS 中成本路径分析算法构建了满足最小地理开发成本的伪高铁网络。本文从高程地图中提取各栅格单元的水文、坡度和起伏度等自然地理信息后计算高铁的地理开发成本, 然后在给定靶点城市 (中心城市) 的情况下, 得到依据“地理开发成本最低”原则生成的路径网络, 再生成各地级市是否“该”开通高铁 ($pseudo_HSR$) 的虚拟变量。由于此工具变量不随时间变化, 本文选取样本最后一期即 2013 年进行回归,^② 将 $pseudo_HSR$ 作为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的工具变量, 用 $pseudo_HSR$ 与中心城市的交乘项作为原交乘项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表 2 汇报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Kleibergen—Paap F 检验值均远大于 10, 表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2)和(4)列中的交乘项显著为正, 表明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提高深化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 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四) 稳健性分析

本文从变更指标和筛选样本的角度进行了多次稳健性分析, 结论均与基准结果相一致。首先, 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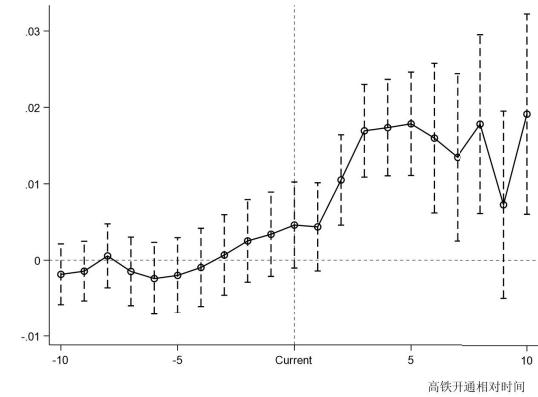


图 1 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事件分析法结果

^① Benjamin Faber, “Trade Integra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Trunk Highway Syst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81, no.3, 2014, pp.1046-1070.

^② 张梦婷、俞峰等:《高铁网络、市场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5期。

表2 伪高铁网络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HSR	0.034*** (0.010)	0.013 (0.011)		
HSR × Capital		0.010*** (0.002)		
lnMA			0.162*** (0.046)	0.047 (0.039)
lnMA × Capital				0.001*** (0.0001)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N	67298	67298	67298	67298
Kleibergen—Paap F statistic	1308.851	475.520	2006.869	1516.414

更产品质量的测度，更换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σ 。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产品质量指标用 Q1 表示，对 σ 的估计一般介于 5 和 10 之间，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考虑了 $\sigma=5$ 和 $\sigma=10$ 的情况，得到了新的产品质量指标，用 Q2 和 Q3 表示。其次，变更市场可达性的测度。基准回归中市场可达性指标采用人口规模作为市场规模的表征，这里采用城市 GDP 衡量市场规模。此外，本文还调整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 Rauch (1999) 的分类，将产品分为同质性商品和差异化商品，^① 同质性商品质量差异小，本文重点关注的区域间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在同质性商品上可能得不到很多体现，故删除产品层面的同质性商品重新计算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表 3 中 (6) — (7) 列为回归结果。

表3 稳健性检验

	更换因变量指标				Q1	删除同质性商品	
	Q2	Q3	Q2	Q3		Q1	Q1
	(1)	(2)	(3)	(4)		(5)	(6)
HSR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HSR × Capital	0.002***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lnMA			0.010 (0.007)	0.010 (0.007)			-0.002 (0.008)
lnMA × Capital			0.031*** (0.007)	0.028*** (0.007)			0.032*** (0.008)
lnMA ^{gdp}					0.003 (0.006)		
lnMA ^{gdp} × Capital					0.004*** (0.001)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FE; City FE;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86712	436138	436138
Adj.R ²	0.6979	0.7233	0.6979	0.7233	0.6712	0.6761	0.6761

四、机制研究

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产品质量决策不仅取决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活动，还直接受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地区间能否充分流动，对企业产品质量决策以及城市间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进一步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流通角度分析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对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作用机制。

(一) 企业融资约束

^① James E. Rauch, "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48, no.1, 1999, pp.7-35.

企业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内部资源分配,^{①②}当企业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支持时,在研发及中间品质量方面的决策可能会受到影响,使得出口产品质量下降。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③选取企业负债资产比作为企业融资约束指标,取对数后作为因变量检验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变化对企业融资情况的影响。表4中(1)—(2)列为回归结果,HSR和 $HSR \times Capital$ 以及 $lnMA$ 和 $lnMA \times Capital$ 均显著为负,表明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上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且中心城市的企业融资约束下降更多。

(二) 城市劳动力资源匹配

从产品质量需求侧因素分析,城市劳动力资源匹配越好,就业和收入水平越高,本地需求对出口产品质量发挥越积极作用。本文用城市就业人口与面积之比表征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水平。表4中(3)—(4)列为回归结果,HSR和 $HSR \times Capital$ 以及 $lnMA$ 和 $lnMA \times Capital$ 均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增加城市的就业密度,并且中心城市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对城市就业密度上升作用更大。

表4 高铁开通、市场可达性与产品质量空间分布的机制分析

	融资约束		就业密度	
	(1)	(2)	(3)	(4)
HSR	-0.036*** (0.004)		0.026*** (0.001)	
$HSR \times Capital$	-0.038*** (0.006)		0.022** (0.001)	
$lnMA$		-0.272*** (0.050)		0.050*** (0.013)
$lnMA \times Capital$		-0.352*** (0.050)		0.434*** (0.009)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Firm FE; City FE;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N	485766	485766	463834	463834
Adj.R ²	0.6238	0.6236	0.9969	0.9969

五、异质性分析

为了深入理解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与区域间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因果关系,本文将分两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一) 企业层面

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从企业所有权和生产率差异角度展开,表5为回归结果。在企业所有权方面,国有企业存在一些特殊性,和国内市场的外部关联不是很强。^④我们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有控股情况变量划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只有非国有企业的回归中,HSR和 $HSR \times Capital$ 以及 $lnMA$ 和 $lnMA \times Capital$ 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非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空间分布强化效应更为显著。

在生产率方面,生产效率对企业产品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存在异质性的原因是各企业的生产率不同,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支付生产较高质量产品所需要的高成本,从而其出口产品质量更高。^⑤本文将企业的人均工业产值作为生产率的代理指标,按照每年企业生产率中位数划分高、低生产率企业。在高生产率企业的回归中, $HSR \times Capital$ 和 $lnMA \times Capital$ 的系数均显著;在低生产率

① Rosario Crinò, Laura Ogliari, "Financial Imperfections,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04, 2017, pp.63-84.

② 魏浩、张宇鹏:《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世界经济》2020年第6期。

③ 余静文、惠天宇等:《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统计研究》2021年第4期。

④ 王定星:《企业异质性、市场化与生产率分布》,《统计研究》2016年第8期。

⑤ 施炳展、邵文波:《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及其决定因素——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微观视角》,《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企业的回归中, $HSR \times Capital$ 的系数不显著, 表明高铁开通带来的空间分布强化效应在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

表 5 企业产权以及生产率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生产率企业		低生产率企业	
	(1)	(2)	(3)	(4)	(5)	(6)	(7)	(8)
HSR	-0.005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HSR \times Capital$	0.0003 (0.007)		0.004*** (0.001)		0.005*** (0.001)		0.001 (0.001)	
lnMA		-0.108* (0.061)		0.015** (0.007)		0.025** (0.012)		-0.004 (0.010)
$lnMA \times Capital$			0.010 (0.046)		0.043*** (0.008)		0.058*** (0.012)	0.023** (0.012)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FE; City FE;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7262	17262	468114	468114	213497	213497	237534	237534
Adj.R ²	0.6322	0.6322	0.6732	0.6732	0.666	0.666	0.687	0.687

(二) 行业层面

行业层面的异质性从行业要素密集型和市场竞争程度角度展开, 表 6 为回归结果。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利润率低与附加值低的特征, 并且行业内不同企业间产品的相似度较高, 产品质量差异相对较小。本文在三位制造业行业代码层面, 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高于单位资产雇员数中值的行业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行业。^① 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回归中, $HSR \times Capital$ 和 $lnMA \times Capital$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 6 行业要素密集型和市场竞争异质性分析

	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高竞争行业		低竞争行业	
	(1)	(2)	(3)	(4)	(5)	(6)	(7)	(8)
HSR	0.003*** (0.001)		0.0004 (0.001)		-0.0002 (0.001)		0.004*** (0.001)	
$HSR \times Capital$	0.001 (0.002)		0.003** (0.001)		0.005*** (0.001)		0.0002 (0.002)	
lnMA		0.001 (0.010)		0.025** (0.011)		0.007 (0.010)		0.016 (0.012)
$lnMA \times Capital$		0.029** (0.013)		0.035*** (0.011)		0.057*** (0.011)		0.010 (0.013)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FE; City FE;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10453	210453	263498	263498	262791	262791	189288	189288
Adj.R ²	0.6941	0.6941	0.6592	0.6592	0.6646	0.6647	0.6974	0.6973

市场竞争越激烈, 企业之间为了争夺市场而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压力越大, 越有利于产品质量升级。采用 HHI 指数测量行业市场集中度, HHI 值越小, 行业竞争程度越高。高低竞争程度行业的划分同样用当年行业层面 HHI 中位数值作为标准。在高竞争行业的回归中, $HSR \times Capital$ 和 $lnMA \times Capital$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低竞争行业可能因为产品同质性高, 在受到冲击后产品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并不明显。

^① 潘红波、陈世来:《〈劳动合同法〉、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需求函数质量估计法计算了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将我国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城市间交通成本下降带来的市场可达性提升对区域间出口产品质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有助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并且高质量出口产品聚集于中心城市的空间分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事件分析法检验高铁带来的质量提升不存在预期效应，本文进一步采用最小生成树算法构造的工具变量、调整指标及更换样本进行检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第二，高铁开通及其带来的市场可达性提升有助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与匹配，市场可达性提升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城市劳动力就业水平，使得中心城市企业产品质量的升级幅度更大。第三，高铁开通及市场可达性提升对产品质量空间分布强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和高竞争程度行业更为明显。

区域间的市场分割不利于劳动力、资本以及知识等生产要素在经济系统中流向更有效率的地点，并且将地方政府拖入以邻为壑和产业布局重复的过度竞争困境，阻碍国内市场规模效应的发挥以及区域间协同发展。本文的分析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切入，为通过市场一体化、打通国内大循环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启示意义：一方面，基于过往高铁建设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可观性，政府应积极推进“新基建”以进一步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新基建”中既包括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这样的显著降低有形生产要素流通壁垒的基础设施，也包括5G、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幅释放无形生产要素流通带来的经济发展活力。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在整体层面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生产要素总报酬，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应注重协同发展。中心城市的优势禀赋在市场可达性提升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以点带面，通过知识溢出以及产业转移带动非中心城市发展。相应地，非中心城市需要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积极加深和中心城市的合作，共同探索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及分工。

责任编辑：张超

人工智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与机制识别

——基于中国“机器换人”的实证检验^{*}

韩永辉 刘洋 王贤彬

[摘要]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框架,本文主要探讨人工智能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效果及劳动力市场传导机制,并结合2012—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盟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效促进了我国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其中在劳动力稀缺且资本要素较富裕的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生产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使地区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转型;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向生活性服务业转移,但并未实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步提升;在东北地区,人工智能改善地区劳动生产率,但就业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且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引发工资水平下降问题,抑制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由此,各地区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实现不同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共同打造国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人工智能 经济增长 区域异质性 创造性破坏

[中图分类号] F421; F062.4;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097-08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掀起人工智能革命浪潮,以“机器换人”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应用成为各个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抢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要生产方式之一。^{①②}尤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经济生产和信息交换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云端化进一步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动力和多元的应用场景。近年,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陆续颁布《中国制造2025》《新一代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873041、72073037)、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A1515011814、2022B151502000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和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2022年度特别委托项目(GD22TWCXGC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洋(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广东广州,510420);王贤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① 本文参考 Brynjolfsson 和 McAfee (2014) 与 Prettner 等 (2016、2020), 将“机器换人”定义为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利用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控制或流水线等设备等取代劳动力的一种智能化生产方式。

② A. Abeliansky, E. Algur, D. Bloom, K. Prettner, “The Future of Work: Meeting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Demographic Change and Automa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159, no.3, 2020, pp.285-306.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培育壮大智能经济。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下，各地方政府密切跟进，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力推智能化生产方式变革。

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类。人工智能“乐观派”认为，随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机器换人”有效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提升经济运转效率，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将大幅提高，原本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劳动潜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将充分释放，从供给侧增加经济总产出。^① 孙早和侯玉琳（2021）利用200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工业智能化有效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升级，人工智能成为支撑我国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② 但人工智能“悲观派”则更关注其给劳动者或人类本身带来的负面冲击，包括结构性失业、收入下降等福利受损问题。Acemoglu和Restrepo（2017）基于1990—2007年美国数据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数量的增加导致美国就业人口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减少约40万个工作岗位。^③ 进一步地，相较于抗冲击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Schlogl和Sumner（2020）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作性质决定其劳动力更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这将在长期内造成严重失业及国家混乱，进而可能从需求侧抑制经济增长。^④ 王林辉等（2020）以“工业机器人进口+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工业机器人出口”为人工智能的代理变量，分析发现人工智能诱致高、低技术部门劳动收入差距年均扩大0.75%。^⑤ 由此推断，人工智能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结构、要素收入分配具备“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目前文献已探讨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影响，但研究尚存在三点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多从整体视角肯定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但中国地缘辽阔、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各地区是否均适宜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二，较少文献同时关注人工智能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特征，尤其是基于劳动力市场从需求侧考察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及正向促进作用产生的前提条件；第三，以工业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的表征数据已得到学者一致认同，但国内现有人工智能实证研究指标选取尚未有严谨标准，研究易产生较大误差。本文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探讨人工智能对我国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及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效果。相比已有研究，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着眼于我国各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差异，探讨不同地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传导机制的差异，阐释合理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更有利于中国因地制宜和因地施策，立足各地比较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二，以劳动力市场为切入口，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推广对劳动者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构建和验证人工智能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冲击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第三，借鉴Acemoglu和Restrepo（2020）的地区工业机器人识别策略，^⑥ 构造包含260个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丰富中国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数据选择。

二、研究假说与理论机制

（一）基准假说：人工智能、地区异质性与经济增长

因地区自然条件、要素禀赋及倾斜政策等差异性，一个包含多个地区的经济体内部必然会出现经济

① P. Aghion, B. F. Jones, C. I. Jo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② 孙早、侯玉琳：《工业智能化与产业梯度转移：对“雁阵理论”的再检验》，《世界经济》2021年第7期。

③ D. Acemoglu, P. Restrepo, “Secular Stagnation? The Effect of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7, no.5, 2017, pp.174-179.

④ L. Schlogl, A. Sumner, *Disrupted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Springer Nature, 2020.

⑤ 王林辉、胡晟明、董直庆：《人工智能技术会诱致劳动收入不平等吗——模型推演与分类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

⑥ D. Acemoglu, P. Restrepo,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8, no.6, 2020, pp.2188-2244.

发展水平的差异。^①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国家或地区应遵循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和技术结构。^②如果地区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禀赋较为丰裕、资本及技术资源相对贫乏，那么该类经济体较适合发展具有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类产业，反之则更适合发展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各个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既需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依赖于有为政府的调节作用。^③只有顺应市场趋势、符合地方发展特征的产业政策才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地区经济增长。^④

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是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其作用的发挥仍依赖于地区对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⑤根据 Notestein (1945)“人口转变理论”，工业化持续推进将导致经济体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⑥经济发达地区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较发达经济体内部集聚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本及科技创新能力优势明显，能够有效承接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维护和工业应用等。由此，在资本及技术要素丰裕且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大规模进行人工智能投资，能够较好地弥补劳动力缺口，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特征。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经济促进效果，原因在于：第一，人工智能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研发及使用成本均较高，尤其工业机器人的相关零部件仍需从经济发达地区引进。若政府或企业盲目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其资本回报率可能低于发展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等产业，难以创造足够的生产经营利润；第二，物资资本的投入需要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缺乏人力资本的提高与配合，人工智能应用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生产效率；第三，大规模推广人工智能替代地区低技能劳动力，可能导致劳动力失业、外流等现象的产生，劳动者福利受损，未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优势，从而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同一种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应用会因劳动、资本及技术等要素禀赋的不同进而引致差异性的区域经济增长效果，影响经济体内部的发展均衡。由此提出本文第1个研究假说，并以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实证数据加以验证。

假说1：在劳动力稀缺且资本丰裕的地区发展人工智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影响效果则较弱或不显著。

（二）机制假说：劳动生产率、就业结构和劳动收入

熊彼特在“创造性破坏”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在人工智能技术普遍使用的情况下，具备技术或资本优势的微观个体在社会的动态竞争替代过程中得到更高的收益，而另一部分个体可能处于被破坏状态。尤其对于劳动力市场，人工智能将在劳动力要素禀赋制约下通过生产效率、就业结构及收入分配等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1. 劳动生产率效应。人工智能通过提升经济体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本文称之为劳动生产率效应（Labor Productivity Effect）。在劳动力短缺但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地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速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程度，促使企业采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相同或者更多的产品。尤其在生产制造部门，人工智能可以接管重复、危险、不健康的任务，改善劳动力工作质量并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与速度，提升企业利润，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2. 就业产业结构效应。人工智能通过促进制造业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就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水平，

^① B. M. Fleisher, C. Jian, “The Coast-Noncoast Income Gap, Productiv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25, no.2, 1997, pp.220-236.

^②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期。

^③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④ 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⑤ 千春晖、姜宏：《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新特征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财经研究》2022年第5期。

^⑥ F. W. Notestei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Readjustment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2, 1945, pp.94-102.

本文称之为就业产业结构效应 (Employment Industry Structure Effect)。^① 一方面, 地区将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制造业劳动力“虹吸”至生产性服务业重新就业,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主导的态势转型, 带来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② 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主导下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将倒逼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 从社会面上扩大人力资本投资, 刺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然而, 在生产资本及人力资本投入较少的地区, 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 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 被替代的劳动力将难以较好地被吸收至生活或生产性服务业, 这会抑制人工智能的经济促进作用。

3. 劳动收入分配效应。人工智能通过改变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本文称之为收入分配效应 (Labor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劳动者收入高低是影响经济总需求中的消费与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创造出“无限量的人工劳动”, 替代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③ 根据刘易斯 (Lewis, 1954) 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 劳动者供给过剩将导致其实际收入水平过低, 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与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体产出能力下降; 消费及储蓄行为也会受到抑制, 制约经济总需求。但也有学者提出, 人工智能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 与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形成互补效应, 提升企业利润, 通过“技能溢价”提高在岗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④ 促进经济总需求。因此,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地区的劳动力要素禀赋。若地区劳动力要素丰裕, 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低端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 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使得工资总体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 低端劳动者可能持续外流到其他地区, 降低当地总劳动收入, 从需求侧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负向作用。由此提出本文的第2个研究假说。

假说2: 人工智能通过劳动生产率、就业产业结构及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 且传导机制因地区劳动要素禀赋不同呈现异质性。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实证模型

为探讨各地区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

$$gdp_{it} = \beta_0 + \beta_1 robot_{it} + \beta_2 X_{it} + I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和 t 表示地区和年份, gdp_{it} 表示经济增长水平, 在引入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robot_{it}$ 的基础上, 纳入包括人口密度、金融发展程度、政府干预、对外开放、信息技术等控制变量 (X)。 I_i 、 T_t 、 β_0 、 ε_{it} 分别表示地级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常数项和随机扰动项。

(二) 研究数据

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robot_{it}$)。参考 Acemoglu 和 Restrepo (2020) 将行业层面机器人分配到地区层面的做法, 研究以 2012—2019 年中国工业分行业工业机器人数量作为基础, 对我国各地区每万人安装工业机器人的数量即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进行测算, 以表征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程度。具体公式为: $ER_{ct} = \sum_{s \in S} \ell_{cst_0} \left((R_{st} - R_{st_0}) / L_{st_0} \right)$ 。^⑤ 相关数据来源于 IFR 《世界机器人报告 (2020)》《中国人口

^① 本文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两类, 参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 (2015)》,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

^② A. Korinek, J. E. Stiglitz,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orker-Replac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No.24174.

^③ 杨飞、范从来:《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式发展?》,《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余玲铮、魏下海、孙中伟、吴春秀:《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⑤ ER_{ct} 表示第 t 年 c 地区每万人工业机器人使用量, 即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 S 表示制造业, s 表示制造业中某一具体行业。 ℓ_{cst_0} 代表基础年份 t_0 年 c 地区 s 行业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国家 s 行业就业人数比重, 基础年份 t_0 选取机器人应用较少或未使用机器人的年份。 R_{st} 表示第 t 年 s 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量, R_{st_0} 表示 t_0 年工业机器人使用量, L_{st_0} 表示 t_0 年 s 行业总就业人数, $\ell_{cst_0} \left((R_{st} - R_{st_0}) / L_{st_0} \right)$ 表示 c 地区 t 年的 s 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最后, 将制造业所有行业汇总相加, 得到第 t 年 c 地区总体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

普查(2000)》及《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水平(gdp_{it})。在GDP总量、^①人均实际GDP、^②实际GDP增长率、^③等众多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中,人均实际GDP考虑了地区人口数量的差异性,更加充分显示一个国家的居民平均收入以及生活水平,是发展经济学领域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主要核心解释变量每万人中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同样排除了人口数量的差异性。由此选取以2000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GDP作为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并在实际研究中采取对数化形式进行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人口密度(PD),人口密度能够反映人口在一定地区的集聚情况,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数目衡量;金融发展程度(PS),采用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表示;政府干预(GI),采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扣除并不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的科研及教育支出后的数值进行衡量;对外开放(GT),由于地级市的进出口总额数据并未直接公开,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进行加总来获取所需数据;信息技术(ID),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为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参考张英浩等(2022)采用各城市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④基于各变量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东、中、西及东北部共260个城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首先,考察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人均GDP的影响,从表1第2列结果得知,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长0.223%,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时间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东部地区呈现资本密集且劳动要素短缺的要素特征,率先开启了人工智能应用进程。

其次,中部地区解释变量 $robot_{it}$ 的系数同样显著,但影响效果稍弱于东部地区。近年,在“中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中部地区逐步贯通基础设施大通道,吸引资金投入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不断加强。中部地区发展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略晚于东部,但凭借政府有效的产业政策及资金支持,已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当然,总体来看,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仍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工智能的促进效果弱于东部地区。

再次,西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 $robot_{it}$ 的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表明西部地区“机器换人”对经

表1 人工智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gdp _{it}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robot_{it}$	0.223***(0.013)	0.097***(0.034)	0.003(0.028)	0.041*(0.025)	
PD	-1.799***(0.288)	-0.302***(0.086)	-0.703***(0.153)	-1.043***(0.157)	
PS	0.175***(0.041)	0.460***(0.102)	0.560***(0.090)	0.168**(0.073)	
GI	-0.101***(0.025)	-0.089(0.067)	-0.046(0.089)	-0.096***(0.029)	
GT	-0.057***(0.012)	-0.117***(0.027)	-0.034***(0.012)	0.011(0.008)	
ID	-0.002(0.003)	0.031***(0.006)	0.045***(0.005)	0.005(0.005)	
面板组数	86	79	61	34	
观测值	688	632	488	272	
Adj R ²	0.9679	0.9042	0.9038	0.9929	

注:括号内表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值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常数项未报告。下同。

①程名望、贾晓佳、仇焕广:《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②张颖熙、夏杰长:《健康预期寿命提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10期。

③李永友:《省以下多样化放权策略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

④张英浩、汪明峰、刘婷婷:《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地理研究》2022年第7期。

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第一，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较低，并未对工业生产的基础生产方式造成强烈冲击；第二，西部地区整体工业总产值占比相对较低，且“机器换人”应用较高的汽车行业、电子电气行业均占比较低，使得人工智能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相对较低。

最后，东北地区回归系数为 0.041，回归结果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仍然表现为促进机制，但作用效果明显弱于东部、中部，仅分别为东部、中部地区的 18.3% 与 42.2%。东北地区曾经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之一，拥有良好的工业发展基础及工业产业集群，但改革开放以来却逐渐落后，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并不具备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这影响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

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对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呈现促进作用。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人工智能对东部地区的正向促进效果最强，其次是中部、东北地区，人工智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由此验证假说 1。以上结果共同表明人工智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影响效果的异质性。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四种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内生性问题，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属于测算性指标，潜在测量误差可能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模型还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问题，如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可能越高。本文将前沿工业机器人密度冲击 wr_{it} 作为工具变量，^①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第二，引入交通基础设施、人均固定资产存量等更多控制变量，排除其他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干扰。第三，剔除样本中出现频次较少的较高机器人安装密度（即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高于 97.5% 分位数）。第四，采用 Bootstrap 法，基于原始样本对其进行有放回抽样。以上结果均表明人工智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影响效果的异质性，再次验证假说 1。

（三）传导机制分析

为探讨假说 2 中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渠道机制的存在性与合理性，本文借鉴 Hayes (2009) 构建如下递归方程对人工智能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依次进行检验：^②

$$gdp_{it} = \beta_1 robot_{it} + \beta_2 X_{it} + I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M_{it} = \beta_3 robot_{it} + \beta_4 X_{it} + I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gdp_{it} = \beta_5 robot_{it} + \beta_6 M_{it} + \beta_7 X_{it} + I_i + T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M_{it} 表示选取中介变量， X_{it} 表示控制变量，选取变量与式（1）相同。具体地，劳动生产率效应（*LP*）采用各城市年度的实际 GDP 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的比值衡量；就业产业结构效应分别采用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数（*LS*）与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PS*）进行衡量；收入分配效应选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RW*）衡量。^③

1. 劳动生产率效应。表 2 第 3、4 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为 0.104，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人工智能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0.168，低于基础回归系数 0.179，表明东部地区的“机器换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是成立的。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中介分析结果与东部地区类似，均验证了人工智能能够有效提升地区劳动生产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的工业机器人相比于一般性劳动力，具有工作时间长、安全性高、产品质量提升、监管方便等特点，尤其在劳动力密集、劳动强度高、环境特殊的

^① 本文参考 Giuntella and Wang (2019)，利用世界范围内代表机器人技术使用前沿的 9 个欧洲国家或地区工业机器人的平均行业分布水平构造前沿工业机器人密度冲击变量。

^② A. F. Hayes,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76, no.4, 2009, pp.408-420.

^③ 西部地区基准回归不显著，因版面原因省略西部地区的传导机制检验分析。

表2 人工智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准	劳动生产率效应		就业产业结构效应				劳动收入分配效应	
因变量	gdp_{it}	LP	gdp_{it}	LS	gdp_{it}	PS	gdp_{it}	RW	gdp_{it}
东部地区									
$robot_{it}$	0.179*** (0.018)	0.104*** (0.013)	0.168*** (0.019)	0.055*** (0.014)	0.162*** (0.017)	0.035** (0.015)	0.173*** (0.018)	0.086*** (0.020)	0.152*** (0.017)
LP			0.107* (0.067)						
LS					0.300*** (0.046)				
PS							0.143*** (0.043)		
RW									0.317*** (0.031)
中部地区									
$robot_{it}$	0.140*** (0.018)	0.164*** (0.012)	0.037** (0.019)	0.136*** (0.013)	0.082*** (0.018)	0.104*** (0.014)	0.134*** (0.019)	-0.212*** (0.019)	0.202*** (0.018)
LP			0.623*** (0.054)						
LS					0.425*** (0.052)				
PS							0.059 (0.053)		
RW									0.295*** (0.035)
东北地区									
$robot_{it}$	0.132*** (0.020)	0.093*** (0.021)	0.055*** (0.002)	-0.067*** (0.142)	0.135** (0.021)	-0.075*** (0.017)	0.159*** (0.020)	-0.097*** (0.027)	0.146*** (0.021)
LP			0.830*** (0.005)						
LS					0.045 (0.092)				
PS							0.315*** (0.074)		
RW									0.114** (0.048)

行业，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资本逐利及避险的本能驱使企业家加快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这不仅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也降低了外界危机对企业的突发性冲击。尤其在劳动力短缺及资源有限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有利于推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变，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这与我国实行供给侧改革核心目的相一致。

2. 就业产业结构效应。本文将就业产业结构效应分为工业机器人密度对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影响。由表2第5、6列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及中部地区均支持人工智能通过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机制。原因在于：第一，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要求并不像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等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可以较好吸收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可能会吸引更多制造业劳动力，并拉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增长，创造新的就业，即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创造效应”。与东、中部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在东北地区对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的回归系数为-0.067，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回归结果并不支持人工智能促进东北地区生活性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可能原因在于东北地区近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实施“机器换人”只弥补了短缺的劳动力，并未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就业。从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地区人工智能

对生产性劳动力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 0.173，小于基准回归的 0.179。因此，人工智能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增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东部是成立的。对于中部地区，生产性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与东部、中部均不同的是，人工智能对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力增长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0.075。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人数反而减少，表明人工智能导致生产性劳动力外流而抑制经济增长。

3. 收入分配效应。从东部地区回归结果可知，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对实际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 0.086，并在 1% 的水平显著；人均实际 GDP 回归的系数低于基础回归的 0.179，表明东部地区人工智能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机制是成立的。工资上涨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区域和城乡差距缩小，农民工逐渐从跨省流动向本地就业转变，东部沿海地区频繁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东部更多是对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剩余制造业劳动力与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得以提升；二是人工智能引致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进而使工资水平提升。工资收入是消费需求提升的重要来源，只有高工资才能引致高消费，促进内需增加。在中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对实际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 -0.212，并在 1% 的水平显著；对人均实际 GDP 回归的系数为 0.202，高于基础回归的 0.104。结果表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的应用引发劳动力平均工资下降，抑制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导致本地劳动力被替代，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虽然部分劳动力被吸引至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但被替代的中、低技能劳动力被迫从事低于其技能水平的工作，造成劳动能力与工资水平的不匹配。东北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配效应同样表现为“破坏性机制”，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造成劳动力流失，拉低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在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占比依旧偏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基本策略，政府应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使得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匹配，并加大二次分配对基本工资收入的调节作用，才能有效防范人工智能对劳动力收入及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向效应。

综上分析表明：第一，在劳动力短缺且资本要素丰裕的东部地区，人工智能通过提升要素生产率、优化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等方式，促使地区向“创新驱动、内需驱动”转型；第二，在劳动力要素较充足的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及劳动力向生活性服务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并未实现工资水平的同步提升；第三，在劳动力及资本要素均较短缺的东北地区，人工智能目前仍处于“生产驱动”阶段，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创造性效应不显著，对经济增长的破坏性作用机制更为明显，工资水平未得到有效提升，未来应注重技术创新与劳动力收入水平调节，尽可能降低人工智能的负向影响。以上结论验证假说 2。

五、启示与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正确认知人工智能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人工智能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各地区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不同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共同打造国内大循环体系。第二，完善劳动力保障机制，改革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提高劳动力就业质量。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存在不可逆转的替代性，由此带来的短期结构性失业、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需要政府做好相关社会保障服务。同时，实施更高层次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第三，提升教育与科研经费支出，加强劳动力的能力培养。提升社会教育支出，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健全就业培训机制，尤其是投资于难以被工业机器人替代的技能专业，促使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互补，共同促进我国各地区经济高质量与均衡发展。

责任编辑：张超

央行“降准”能释放流动性吗

——现代货币理论的观点^{*}

刘新华 常 银

[摘要]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法定准备金率”调整的政策信号无法真正地释放流动性，原因在于准备金作为一国中央银行的债务，是一国最具清偿力的基础货币，其能否进入经济体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内生需求”。商业银行根据经济体的信贷需求自主地向有偿付能力的借款者提供信贷，贷款的同时创造存款，存款是商业银行的债务，银行债务的清偿需要准备金。商业银行的信贷逻辑为贷款→存款→准备金，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准备金→贷款→存款。可见，准备金的多寡是由经济体内生决定，中央银行无法自由“裁定”准备金的供给规模，其外生设定的“法准率”也无法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因此，央行“降准”就必然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判断缺乏说服力，相反主权政府“量出为入”地加大财政赤字才是精准“净注入”流动性的重要政策选择。

[关键词]准备金 央行“降准” 现代货币理论

[中图分类号] F8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105-07

一、引言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我国经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举步维艰，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倍增。为优化市场融资环境，我国央行连续多次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增速并未因此显著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尽人意。长期以来，存款准备金制度一直被传统理论奉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即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继而控制贷款规模及存款规模。具体来说，央行“降准”能够为商业银行体系释放出流动性，所以中央银行只要“降准”，商业银行就可以获得更多发放贷款的“原材料”，金融机构便能够据此增加其放贷规模，并基于货币乘数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

但根据现有的货币发行制度，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最初只能来自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持有的准备金既表现为其在中央银行账户内的准备金存款，又对应于其自身资产负债表内的流动性资产，而仅仅降低“法准率”这一货币政策“信号”的发出很难推理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就会增加。进一步地，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的内生信贷逻辑，商业银行首先通过贷款创造存款，而后才需寻找准备金以满足储户提现需求，所以“降准”也很难保证商业银行会增加其信贷规模。另外，基于现有“法准率”的滞后或者同期准备金核算方法，商业银行总能想办法来“应付”央行的“法准率”监管要求，即使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学理基础与政策研究”(21A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新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常银，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710100)。

时商业银行的“法准率”没有达标，这也会影响其正常的信贷活动。目前，西方多国已不再采用“法准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本文拟基于现代货币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调节“法准率”以释放流动性的理论逻辑及观点。

二、相关文献述评

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使得各国生产体系停摆，全球贸易萎缩，经济陷入了衰退境地。Stiglitz (2021) 指出疫情的蔓延削弱了企业投资以及生产的能力和意愿，就业市场复苏将会陷入长期停滞。^① 林毅夫 (2020) 认为新冠疫情之下的停工停产将会导致不少国家的经济呈断崖式下跌。^② 张晓晶 (2022) 从金融角度指出，疫情的暴发将会给本就相对偏紧的金融体系流动性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并进一步制约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③ 为应对疫情冲击，西方国家纷纷出台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发展，但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评价却褒贬不一，Bernanke (2020) 认为超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能够改善市场就业环境并刺激经济复苏。^④ Vincent (2021) 指出量化宽松可以通过扩大市场流动性极大地抑制美国的大衰退。^⑤ 但 Ferreira (2022) 通过 VAR 模型检验发现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产出并无显著影响，因此量化宽松并不能持续拉动实体经济的增长。^⑥ 我国央行行长易纲 (2019) 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坚持稳健取向，不应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⑦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常规化的宽松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如中央银行曾连续多次下调金融机构“法准率”以期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汤子隆 (2022) 认为“降准”有利于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并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⑧ 陈彦斌 (2022) 认为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可以改变货币乘数进而放大宏观流动性供给，这对于解决银行流动性缺口具有积极意义。^⑨

Krugman (2013) 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存款来补充准备金，所以“法准率”的降低能够为商业银行释放出更多的准备金，进而减轻金融机构的资金压力并促进其信贷投放。^⑩ 国内金融学者黄达 (2020) 在其权威教科书《金融学》中指出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准备金”来发放贷款，“法准率”的降低能够增加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规模。^⑪ 不难看出，主流研究认为商业银行需要通过努力获取准备金后才能发放贷款，即商业银行仅仅充当“资金掮客”的角色。不同于主流金融理论，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 Wray (2015) 认为货币体现了债权与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非中性的内生变量。^⑫ Bell (2001) 指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即债权债务关系。^⑬ 而基于这样的货币理论也

① J. E. Stiglitz, “The Proper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Market Economy: the Case of the Post-Covid Recovery”,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vol.1, no.3, 2021, p.100004.

② 林毅夫：《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及中国的应对》，《宁波经济（财经视点）》2020年第6期。

③ 张晓晶、张明等：《三重压力下的中国金融发展》，《金融评论》2022年第1期。

④ B. S. Bernanke, “The New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0, no.4, 2020, pp.943-983.

⑤ C. Wei and S. Vincent, “Quantitative Easing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23, no.10, 2021, pp.68-90.

⑥ A. Ferreira-Lopes, et al.,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A Meta -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vol.36, no.1, 2022, pp.235-268.

⑦ 易纲：《坚守币值 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家》2019年第12期。

⑧ 汤子隆、赵丹妮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两区制门限 VECM 模型的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⑨ 陈彦斌、刘哲希等：《稳增长与防风险权衡下的宏观政策——宏观政策评价报告 2022》，《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期。

⑩ P. Krugman, “Economics in the Crisis”, *Notas Economicas*, vol.37, 2013, pp.11-22.

⑪ 黄达、张杰：《金融学》（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5页。

⑫ L. R. Wray, *Modern Money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 Books Press, 2015, p.55.

⑬ S. Bell,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Hierarchy of Mone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5, no.3, 2001, pp.149-163.

存在着不同的银行信贷逻辑。Minsky (1977) 认为企业的贷款行为无非是将自身的“借条”提升为银行“借据”(即银行存款)的过程。^① Lavoie (2014) 指出满足企业贷款需求是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 当筛选出优质的贷款项目时, 商业银行总是能够进行信贷支持。^② Nersisyan (2010) 认为除非央行想要制造一场信贷紧缩和金融危机, 否则商业银行系统对准备金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③

商业银行并不需要准备金来发放贷款, 内生信贷理论的代表人物 Moore (1983) 发现在真实世界中, 商业银行在扩张信用的过程中创造存款(债务), 银行债务需要用更高级别的债务来清偿。^④ Werner (2014) 更尖锐地提出如果银行系统受到惊吓, 不管央行创造多少准备金, 商业银行也不会发放贷款。^⑤ 刘新华等 (2015) 指出经济体的内生信贷需求决定贷款的供给, 银行需要接受经济体的借款请求, 在发行贷款的同时创造存款, 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无法限制银行贷款。^⑥ 贾根良等 (2020) 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系统, 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实践中要被动地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流动性。^⑦

如果从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考核方法来看, Mosler (1995) 作为银行资深从业人员发现, 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存款随着资金的存取而不断变化, 在一天结束之前, 准备金维持期内的平均存款和法定准备金的平均金额都无法确切得知。^⑧ Wray (1998) 发现, 银行存款数据相对于计算法定准备金的时点总是一个历史数据, 加之所有银行不能改变其当前的存款准备金总量, 如果中央银行非要考核商业银行是否满足“法准率”的要求, 那么中央银行必须根据需求提供必要的准备金, 否则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只能低于法定要求。^⑨ 涂荟喙 (2021) 指出, 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核定没有确切的依据, 缺乏统一的模式, 往往需要通过经验判断进行核定。^⑩ 李宏瑾 (2020) 指出, 由于计算和缴存准备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银行在短期内很难准确估计自身的准备金需求, 无法准确预留法定准备金。^⑪ 张姊媛 (2016) 根据我国的情况发现存款准备金考核每日下限误差较高, 金融机构的日间透支行为规定也难以有效监管落实, 所以“法准率”本身的计算方式也使得商业银行有较大的“空子”可钻。^⑫

由上可知, 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法准率”的下调被作为提升市场信心、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政策工具, 但央行的做法能否“如其所愿”还存在很大争论。下文将揭示准备金的本质内涵, 从“法准率”与银行信贷的内在逻辑分析传统理论对“法准率”解读的缺陷, 并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相关论证提出政策建议。

三、债务“金字塔”结构与准备金的本质

以海曼·明斯基 (Minsky) 为代表的现代货币理论基于货币的债务属性认为货币体现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任何个体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即自己的负债), 而关键问题在于其能否得到其他个体或机构的认可和接受。实际上, 现实经济体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不同主体的债务, 不同主体的债务被接受程度

^① H. P. Minsky, “Banking and a Fragile Financi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vol.3, no.4, 1977, pp.16-22.

^② M. Lavoie,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Foundation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p.182.

^③ Y. Nersisyan, L. R. Wray, “Does Excessive Sovereign Debt Really Hurt Growth? A Critique o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by Reinhart and Rogof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rchive*, vol.603, no.6, 2010, pp.233-257.

^④ B. J. Moore, “Unpacking the Post Keynesian Black Box: Bank Lending and the Money Supply”,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5, no.4, 1983, pp.537-556.

^⑤ R. A. Werner, “Can Banks Individually Create Money out of Nothing? ——The Theories and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vol.36, no.12, 2014, pp.1-19.

^⑥ 刘新华、孙欢欢:《商业银行金融理财的“影子金融”本质及其风险演化》,《思想战线》2015年第4期。

^⑦ 贾根良、何增平:《现代货币理论大辩论的主要问题与深层次根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⑧ W. Mosler, *Soft Currency 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1995, p.6.

^⑨ L. R. Wray, *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8, p.208.

^⑩ 涂荟喙:《人民银行存款准备金管理工作探析》,《金融会计》2021年第11期。

^⑪ 李宏瑾:《存款准备金制度起源、功能演进及启示》,《金融讨论》2020年第3期。

^⑫ 张姊媛:《对存款准备金平均法考核意义及存在问题的思考》,《金融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6期。

不同，如果债务被接受的程度和范围越大，那么其权威性也就越高。这样，不同主体的债务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互连接、内生于经济运行的债权债务网络和债务的清偿支付体系。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经济体中大量债务“出身”并不是完全平等，因此这些债务的可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不同部门创造的金融负债可以用债务“金字塔”结构来描述。

如图1所示，在债务金字塔层级中，最底端的是家庭和个人债务，往上依次是企业债务、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务、银行债务，而顶端则是主权国家的债务。主权国家的债务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以及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准备金）。在现实中，由于所有流通货币的唯一出口为中央银行，所以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现金及准备金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主要货币形式，也是最高级别的债务，具有最强的清偿力。具体来说，对于家庭、个人和企业而言，他们的债务可通过银行存款（债务）或者中央银行的现金（债务）来清偿，但银行间的债务清偿则只能通过中央银行货币（债务）来清算，而这其中90%以上的债务需要通过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来清偿，只有极少部分采取现金形式。

按照现有的银行支付清算体系，每家商业银行都会在中央银行的负债方开立准备金存款账户，银行间的债务清偿在这些准备金账户中进行，个人和企业的债务清偿则在其开立的商业银行存款账户中进行。简言之，商业银行是企业和个人的银行，而中央银行则是商业银行和中央政府的银行。商业银行可以从其他银行借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也可以直接从中央银行借入准备金，但无论如何，准备金的唯一出口都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取准备金的具体过程为：商业银行出售其资产（包括票据、债券或者贷款等），中央银行购买这些资产的同时贷记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账户，这样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最具流动性的准备金资产会增加，而其他资产会相应减少。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账户中的准备金存款增加、中央银行资产增加（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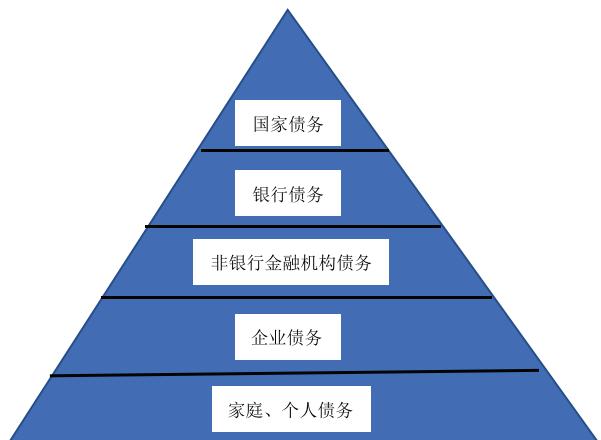


图1 债务金字塔结构

商业银行		中央银行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现金及准备金： +		再贴现票据： +	商业银行准备金： +
商业银行票据： -			

图2 商业银行获得准备金的资产负债表

现代金融体系具有特定支付清算程序，这保障了商业银行能够在需要时可以获得充足的准备金，从而完成银行间以及银行与储户间的债权债务清算，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当“商业银行一”收到一张“商业银行二”开出的支票时，他会要求中央银行借记“商业银行二”的准备金账户，同时贷记自己的准备金账户，现实中这些都是通过电脑操作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商业银行二”的资产将减少（数额等于被借记/减少的准备金），但它的负债（活期支票存款）也将被减少同样的数额（见图3）。同样，当某一储户使用ATM机提取现金时，该银行的资产（库存现金）将会减少，同时该储户的负债（储户的存款）也将减少。因此，无论客户是通过银行间转账（准备金在中央银行的借记或贷记）还是直接提取现金来结算，这些过程都会体现在各银行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的现金及准备金存款账户中。^①

① 因此，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也属于广义的准备金。

也正因如此，一旦银行出现准备金短缺而无法进行债务清偿时，中央银行就会立刻察觉并按需供应准备金。各个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方的准备金存款首先来自中央银行，其主要被用于银行间以及银行和中央银行间的债务清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需求也总能够得到满足。

商业银行一		商业银行二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现金及准备金: +	支票存款: +	现金及准备金: -	支票存款: -
中央银行		资产	
负债		负债	
商业银行一的准备金: +		商业银行二的准备金: -	

图3 银行债权债务的清算过程

正如商业银行使用中央银行的负债（准备金）进行银行间的债务清偿一样，其他企业和个人等则使用银行负债进行他们之间的债务清算。例如，零售商收到来自批发商的货物并承诺在某一特定期限付款，到期时零售商会在其银行账户上开出一张支票用于债务清偿。如果批发商不愿等到到期日才收到货款，他可以折价卖出零售商的负债凭证（通常是商业票据），折价部分实际上是批发商为了提前获得资金而自愿支付的利息。通常，某些金融机构将会以特定的折价来购买这一负债，即票据“贴现”，零售商在到期日将向这些负债的最终持有者进行支付，持有人实际上是从中赚取了利息。当然，这些金融机构在准备金不足时也可以把已经“贴现”的票据进行“再贴现”，从而获得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正如上所说，准备金最初的唯一出口为中央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负债的准备金位于货币“金字塔”结构的顶端，是最具权威性的债务，也是经济体内各种债务清偿的“最后保障”。

四、商业银行的内生信贷及准备金的“内生性”

准备金的本质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准备金的最终供给者。那么，中央银行供给准备金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当经济下行时，中央银行频繁降低“法准率”能否向商业银行释放出准备金并促使商业银行扩大其信贷规模？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决定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数量，并通过货币乘数来调控经济体系内总的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至少在长期来看）又是影响价格的首要因素，这个观点被称为“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的经典，也是现行货币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相继放弃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盯住货币数量的货币政策，但很多研究却认为这是美联储错误使用货币政策的结果。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准备金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决定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经济体内生决定，更进一步地，中央银行对于商业银行“法准率”的考核办法使得商业银行“越来越聪明”，以至于商业银行总能想出办法来绕开金融监管的约束。下面我们将揭开中央银行准备金调控银行信贷的“神秘面纱”。

（一）银行内生信贷与准备金的功能

现实中，中央银行单方面的“流动性注入”（如量化宽松政策）无法刺激银行信贷，原因在于银行贷款决策并非受制于甚至关联于其所持有的准备金数量，银行向信誉优良的借款者提供信贷，在贷款的同时创造存款，而银行存款作为银行的债务需要用更高级别的债务——中央银行准备金来清偿，即贷款→存款→准备金。事实上，银行贷款的本质在于银行通过购买借款者的借据（IOUs）来发行自身的借据（银行存款是银行负债），这一过程的本质其实是将企业的债务升级为银行的债务。根据债务“金字塔”结构，银行债务是普遍可以接受的用于清偿企业间债务的债务，这也是企业向银行融资的“秘密”所在。当借

款者获得银行融资时，其银行存款余额将会增加，而只有当他需要提取银行存款时，银行才需要寻找准备金以确保其债务（银行存款）能够按面值清算。如果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准备金不足，它可能会进一步通过“拉存款”或者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来获取所需的准备金。由于中央银行必须要保证银行间的清算顺利进行，所以银行的准备金需求最终总是能够得到满足。简言之，首先通过贷款创造存款，继而寻找准备金来清偿债务，这是银行信贷的内在逻辑链条。因为银行债务凭证按面值清算，所以中央银行别无选择只能确保银行体系内准备金充足，从而实现“央妈”的职能。

（二）“法准率”的内生决定

商业银行需要准备金进行同业清算、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清算（如支付税收等）、满足储户提现和转账需求。现实中，由于超额准备金利率较低，所以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每个银行都会持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但当银行发现它所持有的准备金超额时，它就会在隔夜拆借市场中拆出；当准备金缺乏时，银行就会在同业市场中借入。值得强调的是，银行体系中总的准备金超额会产生隔夜拆借利率向下的压力，所以中央银行通过观察隔夜拆借利率的浮动便可得到总的准备金变化情况。除非中央银行希望隔夜拆借利率浮动，否则它会立刻介入并相应地提供或者减少准备金的数量以确保其制定的目标利率达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销售其所持有的政府债券来实现这一目标，即公开市场操作（OMO）。公开市场操作使银行体系内的超额准备金被国债（当然还可能有一些其他债券）替换，具体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如下（见图4）：中央银行的负债（准备金）减少，国债购买银行的准备金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国债减少，国债购买银行的银行资产相应增加。银行准备金的减少额与其所持有的国债增加额相等。

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		
资产	负债	资产	负债
国债： -	商业银行准备金： -	现金及准备金： -	
		国债： +	

图4 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当然，中央银行也可以选择改变其所规定的目标利率水平，但关键问题在于只要存在目标利率，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其变化做出反应。更需要说明的是，准备金需求的多寡由经济体内生信贷决定，当企业贷款需求强烈时，银行会相应增加贷款并创造出更多的存款，这就意味着银行需要更多的准备金来清偿其所创造的债务。如果此时经济过热，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规模都在上升，那么市场中的“净准备金”必须由中央银行按需提供，也即准备金供给内生于经济体。中央银行外生设定的“法准率”无法真正地约束商业银行，所以试图通过降低“法准率”来给市场释放流动性并增加银行信贷规模的想法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央银行“降准”是一种政策信号的释放，但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主要依据企业未来现金流偿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能力，而不是所谓看到了货币政策有“宽松”的信号就“欣喜若狂”。相反那些只依据中央银行信号变动而行动的银行家，其“盲目”的信贷行为一定会给未来带来更多的不良贷款和金融风险的累积。因此，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只能遵循价格规则（制定目标利率），数量规则（准备金数量）的调控政策只能是想象中的“美好”。

（三）“法准率”的计算方法与其约束的“乏力”

存款准备金率是一定时期内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占其存款的百分比，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要求在一定的期间内，存款机构平均每天的准备金数量与存款的比例必须等于或者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特殊的时期被称为准备金保有期，而存款的计算主要基于某一特定时期，这个时期叫做准备金计算期。由于每天资金不断地存入和流出银行，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和存款数量在准备金保有期内会时时刻刻地发生变化，这使得准备金的管理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因为不论是一周的平均存款数量或者是平均准备金

数量都只有在营业终了才能确切得知。银行为了满足“法准率”监管的要求，其“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央行监管时期（也就是准备金计算期）持有超额准备金，但这也只有在银行没有满足法定准备金要求的“罚款利率”高于超额准备金利率时，银行才会在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保留出超额准备金。实际上，无论是滞后准备金还是同期准备金计算制度，分母的存款规模总是一个历史数据，因而无法改变，而“法准率”要求能否达标的关键在于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数量。如上所述，如果银行出现准备金短缺，中央银行必须提供他们所缺乏的准备金，否则银行债务将无法偿付，所以现实中银行其实并不会出现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中央银行外生设定的“法准率”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力”非常有限。

此外，如果银行准备金持有量超标，银行间的相互借贷从根本上无法消除超额的净准备金，那么此时中央银行必须通过出售债券才能减少银行体系内的多余准备金，不这样做的结果是隔夜拆借利率立刻下降为零，偏离中央银行的目标利率。中央银行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来吸收超额的准备金，如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准备金是银行的流动性资产，准备金的收益率（利率）很低甚至一些国家的准备金利率为零，因此过高的“法准率”必然减少银行的收益率，这样做的效果较差。

五、主要研究结论

疫情冲击之下，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采取积极的宏观政策来调控经济以保持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准备金作为债务“金字塔”层级中最高级别的债务，唯一的出口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并不需要准备金来发放贷款，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后才需要寻找准备金来清偿债务，因而“法准率”无法外生决定信贷规模和市场流动性。更进一步地，中央银行单方面宣布“降准”并不代表准备金就能进入银行体系，银行需要及时改变信贷行为和准备金持有偏好才有可能实现，但银行的信贷行为来自于经济体的真实需求和复杂的行业背景等，如果企业没有贷款需求或者企业无法满足银行的贷款要求，信贷行为显然无法发生。更糟糕的是，中央银行单方面的“降准”不但无法提供流动性，而且还会给冒险的银行家们一种错误的“政策信号”，即商业银行可以不计后果地加大信贷，因为他们相信中央银行最终一定会“买单”，这对经济的伤害是致命的。

按照现代货币理论，货币政策遵循“价格规则”的调控原则，其并不能给经济体释放流动性，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才能确保准备金的“垂直净供给”。主权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主权政府支出大于收入的结果，当一国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接收者所在银行的存款账户以及该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将会被“贷记”，所以政府赤字支出能够创造银行体系的准备金。经济困难之下，需要具有货币主权的中央政府加大精准的财政支出，摒弃对“量入为出”财政平衡论的迷信，积极“量出为入”，充分实施就业保障计划。这种涵养劳动力的做法不但能够保就业促增长，还可以保持物价稳定，避免经济陷入“滞胀”的恶性循环。

责任编辑：张超

历史学

“建国干部”之困：抗战胜利后 赣籍青年军复员问题探析

何文平 肖 敏

[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制定了诸多青年军复员优待政策，期待复员青年军成为新生政治力量，承负“建国干部”的使命。但从江西的青年军复员实际情况来看，赣籍就学复员青年军优待政策多变，学业并不稳定，就业复员青年军多被分发到乡镇以充实新县制推行后的干部队伍，却时遭排挤。在资源有限而政治生态复杂的基层社会，复员青年军依托青年军通讯组织形成群体力量，借助“建国干部”的特殊身份，上下谋求自身利益，反而成为地方社会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关键词]民国 江西 青年军 复员 基层政权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112-11

青年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一支军队，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征召对象，国民党高层在组建、编练中倾注了大量资源，曾寄望其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政治力量。抗战胜利后，对即将复员的青年军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使其接受宪兵、警察、新县制理论等课程培训。^①复员令下达后，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青年军复员政策，优先保障青年军复员，国民党政权对复员青年军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建国干部”。青年军可以归入抗战史范畴，学界对之已有不少关注，已有的讨论也多基于抗战史视野，主要集中于知识青年军复员实际情况，对是否达到了既定的复员目标，看法却很不一致。多数认为优待复员青年军的原因是兑现承诺，安抚人心，争取舆论的支持。^②从江西省的案例看，在百废待兴、资源匮乏的抗战胜利初期，省政府竭尽所能调动各种资源落实青年军复员，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透露出蒋氏父子的国民党政权试图利用复员青年军，培植所谓的“建国干部”，以充实新县制基础

作者简介 何文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蒋中正电霍揆彰拟订青年军对平面测量与宪兵警察之课目与业务等训练计划》（1945年10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案号：002/070200/00022/110。

^②学界关于青年军的研究多集中在青年军的征召、编练等方面，对青年军的复员多是在文中略有提及，专门研究青年军复员的文章中，台湾学者林武彦《青年军之复员与预干制度》（《复兴岗学报》1986年第37期）一文对青年军复员过程进行了大概的介绍；周倩倩的《抗战胜利后的青年军复员：以江苏为例》（《民国档案》2013年第4期）、刘丽萍的《从军知识青年复员问题研究——以四川为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两文以省为考察对象，梳理了两省的青年军复员情况，指出了其办理复员的成果与困难；黄伟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一文关注青年军复学问题的始末，对青年军就学政策的出台及就学去向、学生管控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陈智理的《1940年代中后期湖北知识青年从军及复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董萍萍的《抗战胜利后湖北省青年军复员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两文对湖北青年军的复员进行了具体讨论，但二者看法并不一致，陈文认为湖北青年军复员困难，各项优待难以实现，导致青年内心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与日俱增，而董文则认为湖北的复员青年军得到了较好的安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和青年军中的形象。

为理由，在基层安插自己的势力，改造地方权势结构，改变基层政治生态，以达到巩固蒋氏王朝的目的。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档案文献，考察赣籍青年军复员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就当时舆论所关心的就学、就业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揭示国民党政权最终走向覆灭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一、“建国干部”之期许

抗战胜利后，复员青年军被赋予了“建国干部”的期望。蒋介石在对青年军复员广播讲话中表示“以后要建国，首先要确立建国的基础，尤其先要建立我们全国知识青年的基础”，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青年军“必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干部”。^①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罗卓英也主张“要发挥复员青年军去推动建国的巨轮，在学校在农村在工厂在边疆在各个建设部门中，无处不需要青年来做干部，做中坚份子”，勉励青年军“个个要做建国英雄、革命干部”。^②蒋经国也认为国家对青年军的期望就是期望“个个成为建国的中坚干部”。^③《中央周刊》甚至鼓吹青年军“是抗战的先锋，今后将是建国的干部，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希望他们尊重这一机会，为新阵地而献身”。^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军复员工作成为抗战胜利后军人复员的重点。

江西省在民国时期有着特殊的地位，抗战时期号称“东南堡垒”。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江西的征兵数逾 100 万人，排在全国第 4 位，^⑤其中征召入伍的青年军数量也颇大，有 6500 多人。^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试图强化在江西的控制力，做好军人复员工作，是江西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江西省政府对青年军的复员非常重视，1946 年 5 月 14 日，江西省成立了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为主任委员，省党部主委陈肇英、支团部干事长詹纯鉴为副主任委员，委员包括省参议会议长，省党部书记长，支团部书记，省府秘书长，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负责人，以及保安副司令、军管区副司令、中正大学校长、省商会理事长等要员。委员会内设总务、辅导、交通、招待等科。同时规定，凡地处交通要道或有复员青年军人在 30 人以上的县，必须设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不设会者由县市政府直接办理。^⑦经费在江西省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结余内开支，由财政厅设法交付各县。

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做好回赣青年军的接待工作，下设 6 个工作组，分别是总务组，办理委员会总务及不属其他各组事宜，由教育厅负责；辅导组，办理青年军就学就业辅导事宜，由社会处、教育厅负责；运输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所需交通运输事宜，由建设厅负责；招待组，办理青年军过境时住宿及代办给养事宜，由教育厅、民政厅、军管区司令部、保安司令部负责；医疗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病患者之衣料转送事宜，由卫生处负责；慰劳组，办理青年军复员时过境欢迎（送）与慰勉事宜，由省党部、青年团、省参议会、省商会负责。^⑧

从分工安排来看，各组工作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1946 年 5 月，有报纸消息披露，赣省复员青年军有 5717 人，^⑨以学校青年居多，在初期的复员接待中，教育厅充当了主要角色。赣籍复员青年军多从水路经九江中转，1946 年 6 月 6 日，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派遣教育厅龚镇藩等前往九江设立招待所，并由九江县长及警察局长兼任该所正副主任。^⑩同时，教育厅厅长程时奎主持召开多次江西省青年军复

^①《青年军开始退伍元首广播训词》，《大同半月刊》1946 年第 12 期，第 13 页。

^②《复员青年军努力的方向》，《广东省政府公报》1946 年“还治复刊”第 24 号，第 3 页。

^③蒋经国：《复员青年军应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为青年军复员周年纪念日写给全体青年军》，《曙光》1947 年新 1 卷第 2 期，第 35 页。

^④《祝青年军复员》，《中央周刊》1946 年第 8 卷第 22 期，第 15 页。

^⑤何友良编：《江西通史民国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23 页。

^⑥赵秀昆：《青年军的组建和消亡》，《军事历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

^⑦《办理青年军复员本省成立委员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5 月 15 日第 3 版。

^⑧《重庆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处长陈诚关于要求抚慰复员青年军的电》附件《江西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组织办法第五条》（1946 年 5 月 13 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095。

^⑨《赣青年军复员决定具体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5 月 20 日第 3 版。

^⑩《省市简讯》，《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员委员会会议，确定招待大纲，要求“毋因招待而骚扰人民”，^① 落实各组具体工作任务，拟定《复员青年军须知》。程时奎也被推举为增设的总干事，^② 强化了教育厅在接待工作中的作用。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政府机构也是想方设法将工作的压力与责任转移到商会等社会组织，如委员会成立不久，南昌市政府就召集本市理发业、沐浴业、码头肩挑业等营业商举行会议，商定各行业在复员青年军抵达南昌市时应如何给予优待的问题。^③ 6月24日下午，第一批复员军的208师江西总队和209师江西大队共2568人，从南京下关中山码头出发，当日到达九江。^④ 25日下午，南昌各界在体育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领导致辞后，还举办露天音乐会和野餐会，并放映电影，^⑤ 国民党政府努力营造出一派新生活气象，以表示对“建国干部”的重视。

二、多变的就学待遇

青年军复员方式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复学就学、复业就业、回籍。赣籍青年军复员志愿与全国青年军复员调查志愿大致相同，就学意愿约占比35%左右，复业就业意愿约占比49%，^⑥ 复业就业志愿人数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⑦

江西省教育厅为青年军返赣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江西就学青年军的分发到校工作相对比较顺利。青年军返赣正值暑假，不能马上进入学校学习，于是，青年军复员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办复学补习班，设在心远、一中等校，班主任由省主席王陵基兼任，副班主任并教育长由教育厅长程时奎兼任，计划接受退伍士兵3000名，两个月期满后，再按照成绩与志愿分发到各校复学。^⑧ 1946年6月10日，省教育厅召集教育界举行动员谈话会，各校校长、各社教机构主管等约40多人到会。会议规划了复员青年军交通住宿、招待准备等事项，规定各校从军青年以原校招待住宿为原则，拟分南昌、吉安、赣县、宜春、上饶5地办理。会上，厅长程时奎号召本省教育界尽量予以复员青年军精神慰劳和物质招待，并特别强调“复学补习班经费需要约一万元，已电中央拨发”，以打消各校长在经费上的顾虑。^⑨

其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青年军就学也制定了一些优待措施，如保留公费待遇、高等考试优待、报到日期宽限等。根据前期的志愿调查，教育部向江西省教育厅及中正大学等大中专学校下发了名册，要求各学校根据名册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即接收入学。对于经甄视或编级实验不及格的复员青年军中的高中毕业学生，教育部也要求收录入学，其不及格科目由学校设法予以补习。^⑩ 1946年8月，江西省教育厅召开专门会议，明确“凡经本厅分发之就学志愿兵，学校均应设法收学”，“嗣后复员志愿兵来省就学，一律分发回原校肄业，原校停办及高初中毕业而院校无相当学校可升入者，分发原籍附近学校”。^⑪ 到1946年10月，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接收复学就学青年军817名，^⑫ 基本做到了应收尽收。总体而言，江西各类学校比较顺利地落实了青年军复学接收任务。然而，抗战胜利初期，生产尚未完全恢复，各种

① 《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

② 《青年军到省决开欢迎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9日第3版。

③ 《复员青年军抵省招待事项经大致决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2日第3版。

④ 《我们回来了》，《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

⑤ 《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

⑥ 《江西省政府关于转青年军二〇八师官兵志愿赴本省复学复业情形令仰遵照的训令》（1946年5月2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3-1-00567-0106。

⑦ 在前期对青年军的复员志愿进行了调查，就业者占45%强，就学占36%强，留营的占13%。龙英：《青年军怎样复员》，《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

⑧ 《本省青年军复学将授予补习教育》，《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6日第3版。

⑨ 《欢迎青年军》，《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11日第3版。

⑩ 《教育部关于电饬凡经甄视或编级实验不及格之青年军退役高中毕业学生仍应收录其不及格科目设法予以补习的代电》（1946年10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8-1-00064-0058。

⑪ 《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抄送青年就学问题会议决议案的代电、笺函》（1946年8月3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30（2）-0022。

⑫ 《江西省政府社教处雇员汇送青年军就学就业名册的电》（1946年10月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68。

复员生在需款，办学经费难以保证，当时报纸消息称，社会上流浪着大批失学失业青年，或因学校奉令停办，或因公费生在暑期期间停止伙食而生活无着，甚至流落街头。^①因为经费困难，复员青年军入学就读的种种待遇也难以兑现到位。

青年军征召之初，蒋介石曾指示，青年军“两年退伍，退伍以后，其正在求学的，可以公费继续求学。”^②据1947年4月统计，江西复学青年军中有公费生238名。^③到1948年公费生又增加到242名。^④在不考虑退学人数的情况下，公费生约占30%。

复学青年军由教育部统筹分发，本属于有保障的群体。因为财政困难，1946年，江西省恳请行政院垫发7、8、9三个月经费，但行政院只批准垫发一个月。^⑤地方财政困难无法缓解，就学青年军的公费待遇难以落实。江西省政府颁布青年军复员优待办法，规定只有从军前享有公费生免费生及奖学金的才能在复员后继续享有。许多复员青年军颇为失望，纷纷向政府申诉，要求享有公费待遇。但江西省教育厅只是以“未奉明文”回答，拒绝复员就学青年军的公费请求。^⑥公费待遇不能兑现，引发了复员青年军对政府甚至社会的不满。南昌一中的复学青年军没有领到公费，到教育厅询问也无结果，还因欠费被学校勒令停膳，落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复学青年军也因此对政府、社会产生很多怨言，公然责问政府“从军优待不说，就说是国中生也应该领公费，况且生对国家和民族至少有点贡献，何以不及常人呢”？甚至抱怨整个社会“乌烟瘴气”。^⑦江西省教育厅屡次向中央请求拨款，但都无下文。1948年，江西省教育厅公开表示“迄今年余之久，未奉汇发公费到厅。”面对各校纷纷催促，省教育厅“委实无法应付”，只得恳请中央“如该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如有公费核发，应请援国中生公费成例，将上年度各月支之款先行汇发”，“若无公费发给，亦请明令示遵，以释群疑而纾困难”。^⑧从中亦可见，复员青年军就学待遇不能落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原因，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即使得到公费待遇的就学青年军也随时面临优待中断的困境。按照战区生享受公费的政策，^⑨青年军从军前是战区生的，自然在复员后享受公费生待遇。随着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开支日益紧张，教育部取消了原战区生公费待遇，1947年后的政策规定家境清寒的就学青年军才可享受公费待遇，并且要出具证件向校方申请。^⑩因教育部经费下拨迟缓，学校多有借故停止就学青年军待遇的举动，^⑪如在浮梁省立德兴中学复学的熊斌等7人，已领到公费待遇，在校上课一年多后，学校却称：“青年军复员之公费优待，虽有公费证件及管理处教育部颁发之各项办法，非正式行文，饬于本月十七日停止用膳”，^⑫导致了熊斌等人生活无着。1948年，教育部又规定自行收入专科以上学校之复员青年军应

①《赣分署救济失学青年》，《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6日第3版。

②《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指示》（1944年10月1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515-516页。

③《江西省教育厅关于续造送退役复学青年军学生何祥济等名册并请将应发膳食提前汇发一遍转给的呈》（1947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59。

④《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本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收容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各学生请求核发公费造册的呈》（1948年），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89。

⑤《教部统筹分发四种复员学生》，《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9月4日第3版。

⑥《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呈青年军复员就学学生可否给予公费乞核示一案的指令》（1946年12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50。

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

⑧《江西省政府教育厅关于据本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收容退役复学青年军申请公费待遇各学生请求核发公费造册的呈》（1948年），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89。

⑨《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行政院公报》1943年第6卷第9期，第9页。

⑩《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

⑪《龙伯豪、卢润、吴庆南关于复学青年军去岁蒙核准公费者是否业经停止恳乞继续救济的呈》（1947年4月14日），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71。

⑫《熊斌、胡怡、何瑛、吴自强关于呈请复学青年军之公费优待办法及学校否认此项优待停止用膳乞予先函学校

缴学宿杂费不予补助。^①对此，省教育厅表示，“在同一学校肄业之青年军复学学生咸抱向隅之叹”，但也无能为力。^②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虽表面极力支持复员青年军就学，但因经费不足，公费政策不得不随时变动，实际上是待遇越来越差，严重影响到复员青年军的学业，甚至生存，所谓的“建国干部”更像是一张“画饼”而已。

三、艰难的就业安插

相比而言，青年军复员就业安置难度更大。国民党政府对此有所预计，在分发工作推进之前也做了些调查摸底工作，以期达到合理的配置结果。1946年5月9日复员令颁布之初，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曾发函江西省政府，告知青年军各师志愿兵复员后“亟须就业者为数甚多”，请江西省府“告知可能安插人数及需要何种人才”。^③江西省青年军复员委员会随即向各机关发送人才需要调查表函，调查摸底。

摸底的结果很不理想。根据调查，省公路局、水利局、统计处、电讯大队、农业院等机关共需人员仅有83人。^④江西省邮政局明确答复青年军复员委员会“现时确不需人手，青年军复员委实无法安置”。^⑤省地质调查所、无线电通讯总队、省电话局、省垦务处、复兴纺织工厂等单位也声称本单位编制用满，没有岗位可以提供。^⑥水利局则表示仅可以提供一个水位观察员的职位。^⑦度量衡检定所虽称需要增加职员，可是没有经费，也无法接收复员青年军。^⑧

一些青年军原有的岗位也被裁撤。如金溪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郝连鹏主动参战，1945年该县农业推广所被裁撤，其家人拿不到应该予以保留的薪金，造成生活困难，郝连鹏自己复员时也无法回到原岗位。^⑨王启汉入伍前服务于财政部派驻安福县税务员办公处，后该处撤销了检查员，原来岗位形同虚设，只得申请另行分派工作。^⑩1946年6月，报纸公开报道说，政府所能提供的优质岗位与复员人数组极不匹配。^⑪

根据江西省政府社教处的统计，到1946年10月初，复员青年军入学就读者817名，就业者1954名，回籍者248名，共计3019名，^⑫仅为复员青年军总人数（5717人）的一半多，其中就业者仅约为复员青

暂维生计以利救济的呈》（1946年11月1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34。

①《教育部关于令知自三十六年度第一学期起凡自行考入专科以上学校之青年军退役学生应缴学宿杂费不予补助令仰知照的训令》（1948年1月3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8-1-00126-0142。

②《江西省教育厅关于续造送退役复学青年军学生何祥济等名册并请将应发膳食提前汇发一遍转给的呈》（1947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359。

③《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关于要求安置复员青年军的电》（1946年5月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122。

④《复员青年军二千人抵省，社会处昨日召开就业座谈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4日第3版。

⑤《为本局人手尚足敷用并奉令停止录用人员青年军复员实无法安置函复查照由》（1946年6月2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2-1-00154-0125。

⑥《奉令以青年军就业一案本年度本所编制全部额满无法安插请鉴核由》（1946年6月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2；《遵令填送需用青年军复员人才数额表请鉴核由》（1946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4；《呈复本局并无参加青年军人员及现在员额已满并无需要何项人才请鉴核由》（1946年6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8；《呈复关于青年军士兵退伍后复学就业一案请鉴核由》（1946年6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0；《复兴纺织工厂关于汇报工作的呈》（1946年6月1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87。

⑦《令青年军士兵退伍后复学就业应妥拟安插一案现将办理情形查案录表呈复鉴核由》（1946年6月1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3。

⑧《江西省度量衡检定所为青年军士兵退伍本所限于经费无法安插呈请鉴核由》（1946年6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435-0292。

⑨《准函以据金溪县呈以前农推所指导员郝连鹏离职入营请求保留原职原俸一案复请查照》（1945年8月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1-00011-0210。

⑩《江西货税局关于王启汉不能复职的通告》（1947年3月19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5-1-00036-0244。

⑪《复员青年军二千人抵省，社会处昨日召开就业座谈会》，《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4日第3版。

⑫《江西省政府社教处雇员汇送青年军就学就业名册的电》（1946年10月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年军总人数的 1/3。

于是，国民党当局将视线转向基层。其时也有人鼓吹“革命事业应该从最下层做起”，青年军“要立志作地方自治员，小学教师”。^①本来，自 1939 年 9 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推行所谓的新县制后，基层行政人员的人数已随之大增，到 1941 年 6 月，江西有 69 个县均按照《江西县政府组织规程及编制预算》改组完毕，县级工作人员增加 1800 人，乡镇一级增加 11710 人。^②但是，新增加的基层干部却并不令人满意。时人批评称，那些乡镇基层干部大部分的能力学识非常浅薄，未经过严格的训练，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地方自治，也不懂地方自治的重要，更不懂“建国必先建乡”的道理。有的乡镇长和乡队副或自卫队的队长，普通常识和法律丝毫不懂，“甚至连自己本身工作岗位都不是很清楚，更谈不到时代的变迁”。^③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也反思“往昔工作缺乏成效，专重在事之处理与设计，而对人之组织与准备则轻忽疏懈，不加注意，以后建设事业更应以人为先”，^④并着手军训实施与干部养成计划，^⑤规定青年军进行统计、调查、测量、社会等科目的训练。^⑥复员青年军中大学专科学生占 20%，中级学校学生占 80%，^⑦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及预备干部训练，补充到乡镇基层，无疑是推行新县制、充实基层干部队伍比较理想的人选。当时有舆论就认为“政治的前线却在百废待举的地方基层”，提出“此次复员的青年，在过去圣战的军事贡献上说，或许还难免有所不及效命之憾，但在目前建国工作的政治前线，却十万火急地等待 10 万新军一起冲杀”。^⑧

志愿从政和从教是当时复员青年军就业的主要选择，208 师求业 1046 人中，从政从教志愿者共 731 人，约占总人数的 70%。^⑨事实上，由于省级机关部门需求十分有限，大部分复员青年军也不得不流向基层。据报纸消息，第一批返赣的 2568 人中有 900 多人担任乡镇工作人员或小学教师，其余按规定送回原服务机构及学校。^⑩即使到基层，就业青年军希望的岗位多是乡长、中小学校长及县级机关职员，而省政府所分发的岗位多集中在乡公所干事、乡保安队、保学教师等最基层的岗位上，^⑪实际分配的结果与青年军的复员志向有相当大的差距。^⑫

根据江西省调整县级待遇后制定的标准，县级人员待遇不得低于省级人员的 50%，乡镇人员待遇不得低于县级人员的 60%。^⑬基层岗位待遇低，与自己的意向又有不小落差，复员青年军就业满意度低，有的甚至干脆抵制不接受，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1946 年上半年，高安县分发复员青年军 37 人，其中乡长 2 人，乡镇队附 19 人，乡干事 8 人，小学教员 6 人，县级机关职员 1 人，职位分发后，复员青年军均坚不受命，请求多派乡长、中小校长、县级机关职员等岗位。^⑭

J046-3-01323-0268。

① 贾亦斌：《青年军是什么》，《曙光》1947 年新 1 卷第 12 期，第 10 页。

② 王次甫：《十年来之江西民政》，载熊式辉编：《赣政十年》，江西省民生印刷第三厂，1941 年，第 5-7 页。

③ 蔡铁轮：《青年军青年担任乡镇干部之意义》，《政治前线》1947 年第 5 期，第 3 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10 月 7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10 月 17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 年 10 月 21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⑦ 《前青年军编练总监罗卓英日前抵苏》，《政治前线》1947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⑧ 何国祥：《欢迎青年军》，《胜流》1946 年第 3 卷第 12 期，第 1 页。

⑨ 《江西省政府关于转青年军二〇八师官兵志愿赴本省复学复业情形令仰遵照的训令》（1946 年 5 月 29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3-1-00567-0106。

⑩ 《复员青年军纷纷就业》，《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6 月 29 日第 3 版。

⑪ 《高安龙起凤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安置情况的电》（1946 年 7 月 2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6-0148。

⑫ 《吴萧亚关于说明至赣复员青年军具体情况的电》（1946 年 5 月 18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104。

⑬ 《调整县级待遇》，《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6 月 2 日第 3 版。

⑭ 《高安龙起凤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安置情况的电》（1946 年 7 月 2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6-0148。

因为待遇等问题，复员青年军与县政府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武力冲突。进贤县长曾电告江西省政府称，各青年军不但不遵令呈验证件，反持众胁迫，不肯解散，“更擅捕保长抵营房，捆缚拷打”，扰乱治安，破坏法纪，“又窜至县府百般敲诈，纵情侮辱，且攫夺职员饭食，迄无稍安”，以致政府“被迫停公”。^①而该县复员青年军却电告青年军管理处与江西省政府，指控进贤县长熊渭拒绝接收，造成“生机断绝，所定一切优待均被吞没”，要求严惩县长。^②当时报纸上还出现了逮捕青年军的报道，以及相关县政府特意公开申明报道与事实不符的消息。^③

同时，大量没有工作安排的复员青年军因生活困顿，纷纷请求救济。1946年9月，青年军管理处颁布了《青年军志愿兵就业人员调查救济办法》。与之前颁布的青年军复员政策相比，《救济办法》承认了复业的困难，对于原机构拒绝接受复员青年军复业的，强调要落实工作；对无法就业的复员青年军则提供入干训团受训、回师、就近参加青年职业训练班等分流途径。^④到1947年1月初，到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登记要求入省训团受训的失学失业复员青年军有100多人。^⑤这些措施只是延缓了青年军复员的进程，并不能切实解决青年军复员就业的实际困难，以致有的人甚至跑到南京再谋出路。1948年9月，国防部下达指令，规定自9月1日起，各地之复员青年军“如未经奉准或征召者，毋庸自动来京，若请求，应由各该区及各地青年军联谊会支分会，汇转本部预备干部局核准”。^⑥可见，青年军复员就业之难，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对于复员青年军的不满，政府应对艰难。提供青年军就业复业的岗位有限，即使是基层岗位也来之不易。1946年以后，为提高基层待遇，各级机构普遍缩编，尤其是县级机构，省政府下令要求县级机构分别轻重予以保留或裁撤，乡镇保之单位因地缩减，人员裁减，县保警队裁去50%。^⑦这种情况下，复员青年军即使被分发下去，政府勉为其难，就业青年军则多是编外待补。1947年嘉兴青职班赣籍农林科学员毕业后，几经交涉被分发到各县农业推广所担任指导员，因县级机构紧缩，编制用足，多数只能以额外指导员身份安插，等待补实，事属临时，无章可循，纷纷电呈省政府，请示薪津待遇问题如何解决。^⑧临时性的安插极不稳定，不少很快遭到免职。复员志愿兵杨世雄向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报告称，“国府改组合并，撤销各级机关，从军青年复职或省府安插均遭裁员，不例其数”，请求另行安插。1947年行政院通令所属各机关，对就业复业之青年军志愿兵应予保障，“以维政府法令之威信”。^⑨当时

①《江西省进贤县政府关于说明复员青年军扰乱该县治安的电》(1946年7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7-0046。

②《进贤县复员青年军关于要求惩办该县县长熊渭的电》(1946年7月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7-0036。

③《为近报载本府逮捕复员青年军一事与事实不敷特声明由》(1947年3月2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2-1-01251-0296。

④《救济青年军管理处订定办法》，《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9月18日第3版。

⑤《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失学失业复员青年军入省训团受训支示的公函》(1947年1月6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6-1-00301(2)-0077。

⑥《各地复员青年军如未经奉准或征召者毋庸赴京希转知由》(1948年9月2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7-039。

⑦《调整县级待遇》，《江西民国日报》1946年6月2日第3版。

⑧《呈为本县农业推广所职员早经依照编制用足至奉派黄邦辉为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其薪俸从何支给乞示遵由》(1947年10月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6；《为奉派徐庭贵为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薪津从何支给据情转请核示由》(1947年10月2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88；《据呈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已任用足额分发黄邦辉薪给如何支给乞示遵等情指令遵照》(1947年1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7；《案据本县农业推广所呈以该所指导员早经派用足额奉派青职班学员刘高密一员月支薪津无法开支请核示等情转请鉴核示遵由》(1947年10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6；《据呈本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员已任用足额分发黄邦辉薪给如何支给乞示遵等情指令遵照》(1947年1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077；《派来本县黄永华究应如何位置薪津如何支给乞示》(1947年10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02-106。

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1946年秋字10，第61页。

紧缩机构情形下，另行安插谈何容易。复员后在宜丰县农业推广所担任指导员的舒惜晖，随机构裁撤被裁，后经预备干部局的干预才被重新安置。^①

勉强得到安置的复员青年军，不少面临排挤压力，也多是无法安心工作。在就业岗位短缺背景下，安插复员青年军，无疑会对原有职位者构成新的威胁，复员青年军经常被视为负担而受到排挤，大多数复员青年军往往成为被裁撤的首选。另一方面，因为紧缩政策，一些有经验的职员离开了，而新安插的复员青年军专业知识不足，实际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开展变得更加困难。这种不良循环一定程度上成为基层政权机构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造成战后青年军复员就业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战后的经济困难。抗战期间，江西损失惨重，据统计，战时财产损失合 1945 年 9 月物价 10.072 亿元，每户平均损失 35.7 万元。战后全省各地纷纷向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申请物资。^② 由于复员物资匮乏，难民遍地，南浔公路沿线人民无屋可住，^③ 大余县出现异常严重粮荒，^④ 赣南各县佃农耕牛缺乏而退佃，业主坐视农田荒芜。^⑤ 百业凋敝，财政支绌，机关普遍紧缩，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据报纸披露，在 1946 年 7 月初南昌市的失业人口就达到了 4 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 20%。失业人员多半为公教人员、编余军官及伪政府之低级职工。^⑥ 在此种情势下，复员青年军的“就业”，很难有根本的保证。

四、复员青年军的组织与身份利用

为加强对复员青年军的控制利用，国民党高层特别注意复员后青年军的组织问题，在全国建立了青年军通讯处。在半年的预备干部训练期间，就已经对高中以上学历青年军进行信息调查，以备建立通讯联络组织。复员令下达之后，青年军通讯处随即建立起来，在苏、浙、皖、赣、鄂、湘、川、粤、陕、黔、豫、甘、晋、冀、辽等省，以及上海、西宁、成都、徐州、福州等地共设立 20 个支处，由青年军通讯处筹备处第三组拟定进度，分别轻重，先后设立。通讯处及各支处开办经费约需 200 万元，先就重要必须成立者请上级核发，未核发前由处垫给，师部所在地不发开办费。^⑦

青年军通讯处的建立与蒋氏父子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蒋氏父子有意将复员青年军打造成为控制基层的力量。一方面，蒋经国及预备干部局经常依托复员青年军联络组织，强化对复员青年军共同意识的培育，如每年举办青年军复员节，进行点阅、演讲活动；举办青年军夏令营，增强交流与主义灌输；以《曙光》《政治前线》等刊物为阵地，宣传联系。蒋经国宣称，复员的志愿兵已经分布在全国各部门以及城市乡村，机构、学校几乎无处不有青年军的踪迹，“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志，坚强的整个的永久的团结起来，勇敢地负起领袖教给我们的建国责任，来报答领袖爱护你们的苦心。”^⑧ 另一方面，各地建立的通讯支处及各级学校建立的通讯小组，可以将复员后分散各处的青年军人比较迅速有效联系起来，复员青年军可以形成一定的群体力量，强有力地表达自身诉求，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有力量与当地政府形成一定程度的抗衡，因而得到复员青年军的欢迎支持，地方青年军通讯组织成立相当迅速。1946 年 6 月 20 日，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函告江西省政府“为加强各省复员青年军官兵之联系与组织起见，

① 《为电请惠予就近安置舒惜晖同志》（1948 年 1 月 10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1-00092 (1)-0007。

② 《吴诚、胡重熙关于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配发各机关物品款项统计的签呈》（1946 年 8 月 6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3-01865-0269。

③ 《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电复关于省参议会邱参议员询问南浔公路附近人民无屋容身荒田甚多应作复村运动救济农民一案嘱查照等由复请查照由》（1946 年 12 月），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7-1-00212-0186。

④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关于准电以大余县粮荒严重异常嘱转饬本署派赴各县之工作队就近办理救济等由电复查照的代电》（1947 年 6 月 13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6-3-02771-0132。

⑤ 《江西省政府关于转知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速办第四区各县牛款的代电》（1946 年 3 月 23 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5-1-00939-0079。

⑥ 《本市失业人数达四万余》，《江西民国日报》1946 年 7 月 5 日第 3 版。

⑦ 《青年军通讯处决设 20 支处积极开展通讯组织工作》，《青年营》1946 年第 3 期，第 2 页。

⑧ 蒋经国：《给全体复员青年军同志一封信》，《嘉兴青年中学校刊》1947 年第 8 期，第 1 页。

先后成立省市青年军通讯支处，主管各该地区之青年军通讯与组织事宜”，以姚秉勋、詹纯鉴为筹备人。^①7月1日，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即成立，8月1日正式办公，借青年团江西支部为办公地，以詹纯鉴为总干事。各县乡的青年军通讯小组在复员青年军分发完成后也纷纷成立。到1947年3月，南昌支处辖区内青年军通讯小组多已成立，少数未成立的地方，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一再电催，要求3月底完成调查、编组，寄送名册。^②

通讯组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下情上达的作用，在推动解决复员青年军一些实际困难方面也可以发挥影响力。如通讯组织一方面帮助就学青年军反映公费落实情况，要求尽快落实，同时也帮助学业有困难的就学青年军争取优惠待遇。^③就学青年军杨则何在校成绩较差，其公费待遇可能受到影响，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向学校发函，声称该同志家境清寒，无力负担学校费用，请求学校破例给予优待继续领取公费。^④对复业、就业、回籍等青年军，通讯处主要帮助反映薪津、优待待遇发放等困难，要求及时、足额发放各项福利。

同时，通讯组织具有对分散的复员青年军实行组织、监控的作用，各县的通讯小组都是被当地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隶属于省市通讯支处管理，可以对内行文及组织内部活动。^⑤复员青年军通过通讯组织紧密联系，可以连通畅达信息，迅速组织人员。如有对外行动的需要，复员青年军一般通过通讯小组发布通告、召开会议、形成决议、共同行动。1947年3月，宜丰县政府在年度考核中将任职为太平乡乡长的复员青年军毛克武免职，青年军通讯小组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在3月29日发布集合通告，通知该县所有复员青年军31日集合县城，表达诉求，3月30日召开通讯小组会议，商议了毛克武被免职的应对方案，并票选了其职位的替补人选。^⑥号令之下，人员集合又快又全，行动相当迅速高效。同时，复员青年军也可以通过通讯小组对内实施一定程度的监控。宜丰县青年军通讯小组曾上报，称该县复员青年军刘绍孔在担任新民乡乡长期间劣迹斑斑，并列举了其具体的劣迹。预备干部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发文江西省政府，要求调查严办。^⑦

依托于通讯组织，复员青年军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意识与利益表达渠道。在各种场合的表述中，复员青年军都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自己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所受的干部训练以及身负的期待，表达自身和“党国”利益的“相依”。就学青年军请求拨发拖欠公费时，就曾强调自己未曾发表愤言，青年军的一切和政府是相互依存的，决不以这些卑法手段挟制政府。^⑧身份强调的背后是利益诉求。他们常以团体的名义向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沟通请求，要求优待或帮助。1946年11月，预备干部局颁发了《各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在学学生奖惩条例》，要求各校实施。但条例颁发后，就学复员青年军一再强调自己是为国从军荒废了学业，反对实行奖惩条例，3个月后，预备干部局发文暂缓实施该

^①《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关于函知青年军通讯支处成立请协助工作的公函》(1946年6月2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52。

^②《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南昌支处关于寄送小组名册及调查表式样的函》(1947年3月1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1-1-00111-0166。

^③《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复员学生刘昌夫、曹履祥关于询问省立鄱中公费优待的报告》(1947年1月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23-0277。

^④《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青年军通讯处南昌支处关于准予杨则何公费继领得公函》(1947年1月3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9-1-00028-0011；《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为电知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学生奖惩办法暂缓实施由》(1947年2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5-0055。

^⑤《江西省兴国县县长王恩荣关于复员青年军可否成立通讯小组或参加社会活动的代电》(1946年8月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23-0238。

^⑥《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

^⑦《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关于青年军刘绍孔治贵省宜丰县新民乡乡长贪污枉法请予严办见复的代电》(1947年8月)，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4-1-00446-0527。

^⑧《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就学青年军梅绍利关于请求提前拨发复学青年军公费的报告》(1947年5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328-0151。

条例。^①

复员青年军在基层工作时，可以通过通讯组织与更高层权威联系在一起，寻求上级支持，以获得与地方势力抗衡的资源。以青年军通讯小组为联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三民主义青年团等成为复员青年军的后盾。战后经济恢复缓慢，国家财政紧张，基层机构一再紧缩，大多数复员青年军被分发到乡镇基层。虽然他们并不满意这样的职位，但国民党统治迅速衰败，社会上到处都是失业人员，失业即面临生活无着困境，复员青年军面对自己被裁撤的命运，首先都是向上级表明自己复员青年军身份，要求政府按照优待办法优先给予保障。当复员青年军因为优待落实或就业问题与当地政府产生龃龉时，也常常是上报通讯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要求一般都能得到组织的回应。上高县政府因为优待谷及分派工作问题与复员青年军产生矛盾，拘禁了复员青年军代表冷国辉，该县复员青年军即以青年军通讯小组名义向上申诉，得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的支持，争取到省政府下令县政府释放了冷国辉。^②

复员青年军多为异地安插就业，作为外来人员，要在当地立足树威，取得权利，不免会与本地原有的势力产生冲突，于是他们往往会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展示自己与外部资源的连接，寻求政治支持。新建朱坊乡乡长和当地势力喻启慧争斗之时，就强调自己的青年军身份，声称自己是“秉持着个人热心服务之精神，仍不惜任何牺牲，参与青年远征军，复员工作由中央分发回江西原籍，由省分发回新建。当时以县级人员额满为患，不得已屈就本乡乡长”，同时也从青年军在工作中和国家政策保持着高度一致性的角度，声明自己是“秉着奉政府法令及贯彻层峰使命，站在民众福利方面，力求乡政基础全健”，指责“本地土劣”喻启慧，有树立新党意图，割据地方权力，结合一班不良分子武霸乡曲，“对于乡政推行工作遇事硬梗，使政府法令不得施行民间，此不独摧残青年军复员，尤其妨害宪政”，“用强暴胁迫得选，县参乡民代表哑忍难言，当职接任之初伊百计逢夤，希冀归化其类”，请求省政府严办喻启慧。^③此例可见，复员青年军的身份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是，这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未必能确保复员青年军的权利，尤其是在基层，有时反而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复员青年军上下都以“建国干部”相标榜，但大多年纪轻，经验浅，无根基，少方法，工作难见成绩。就业的青年军只经过半年的预备干部培训，理论多，实践少，缺乏职业技能和实际工作经验，难以胜任，多有引发地方不满。宜丰县考核 14 个乡镇长，成绩较劣，能力较差者三员停职，其中就有复员青年军。^④玉山县郭寿乡全乡国民学校校长教员蔡世英等 9 名抗战期间从军，战后复员回县，县府以无别项工作可资安插，将郭寿乡全乡国民学校划归复员青年军办理，督学叶崇岗视导后报告称该校各校校长教员“多未能克尽厥职，贻误儿童，殊非浅鲜”。虽有复员青年军在基层担任要职，但并无根基，易受排挤。奉新石溪乡复员青年军胡为工作兢兢业业，并无过错，却无故遭受淘汰，屡次恳请县府另派工作也没有结果。^⑤宜丰县复员青年军刘祖德在双库乡任自卫大队副队长，但新任乡长一来，就殴打威胁，逼其辞职。^⑥

面对外部的压力，复员青年军虽然可以通讯小组为号召，迅速团结，形成群体力量与当地政府直接

^①《为电知专科以上学校青年军学生奖惩办法暂缓实施由》(1947年2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37-1-00255-0055。

^②《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事会关于上高县长拘禁青年军冷国辉案的公函》(1947年3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3936-0012。

^③《江西省兴建县朱坊乡公所关于阻扰青年军复员及破坏政令检举喻启慧罪状呈请鉴核的呈》(1946年11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4-1-00471-0030。

^④《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

^⑤《江西奉新石溪乡复员青年军胡为关于复员后无故遭受淘汰恳乞令饬县府分派工作的呈》(1948年3月11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4404-0123。

^⑥《宜丰复员青年军刘祖德关于曾任自成队乡附等职请饬宜丰县长依法速派工作以维生活的呈》(1949年3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4-1-00199-0256。

对抗，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但也往往会加剧矛盾与撕裂，引发社会冲突。宜丰、万载、高安、婺源等县都有报告青年军群起闹事威胁政府的事件，主要原因就在于青年军不满工作考核，要求保障自己的职位。1946年7月高安县一位青年军乡长因为执行浙赣路土石运输公务不力，被县政府撤职，全县复员青年军迅速集合，到县政府抗议，引发冲突。^①宜丰县复员青年军太平乡毛克武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成绩较劣、能力较差，予以停职。该县复员青年军闻讯后立即以青年军通讯小组的名义对外发布公告，召集该县复员青年军在县城集合。所有复员青年军不惜“废弛职务”，离开工作岗位，集合县城，缮贴紧急通告，召集紧急会议，公然一再向县长威胁要挟，声言不应更调复员青年军太平乡乡长毛克武，要求收回成命，拒绝新委派之转业军官到任。在县政府拒绝了复员青年军的要求后，他们即刻又以青年军通讯小组的名义呈称，如不答应由当地青年军通讯小组组长替代毛克武的职位，复员青年军将会全体辞职。并召开会议决定到4月10日如县政府还没有肯定回复，将采取紧急行动措置手段对付县政府。^②此例中青年军的举动表明，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毛某考核不合格是否公正，而是在意青年军取得的权利与地位不能丢失，已经占据的职位，不能让外人插手，将复员青年军个人权益上升到团体利益去维护。

1947年后，国防部裁减骈枝机构，青年军各通讯机构相应被裁撤。在嘉兴夏令营受训的复员青年军为防止全国青年军失去联络中心，由蒋经国发起组织青年军联谊会，并担任总会主任，各地也相应建立了分会，继续组织联络复员青年军的职能，在蒋经国辞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职务后，各省市与各大学的青年军联谊会仍由他本人直接掌握。^③复员青年军通讯组织存在的时间虽并不长，但通过青年军通讯小组，一方面使分散在基层的复员青年军被组织起来，保持了群体的整体性和行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各种资源匮乏的基层环境中，青年军通讯小组更多的是成为复员青年军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实际上，青年军通讯组织的角色扮演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透露出抗战后国民党统治区基层政权潜伏的危机。

五、结语

青年军曾给国民党当权者带来了乐观的想象，被认为是掌握青年的一个好办法。蒋氏父子以及一些舆论也是寄望复员青年军在基层政权控制方面有所作为，制定种种优待政策，动员上下力量，将他们安插在政权的各层级，借以养成为改造基层政治的所谓“建国干部”，并通过通讯组织牢牢掌控。

但从江西的情况来看，战后经济不振，政府财政困难，机关大量裁撤减员，赣籍青年军复员安置困难重重。复学就学的青年军公费拨付迟缓、政策多变，普遍生活困难，难以安心学业。复业就业的青年军岗位多在乡镇基层，待遇差，又屡遭诟病，受排挤，出现就业后不久就失业的现象。身处困境中的复员青年军，通过当地青年军通讯小组等组织的支持，形成群体力量抗衡，复员青年军群体和地方政府冲突屡见不鲜。肩负所谓“建国干部”期许的复员青年军往往以通讯组织来显露自己的独特身份，依靠特殊的政治资源争取自身权利。通过有意的组织、分插、联系，表面上一个“建国干部”群体虽然形成了，但实际上复员青年军更多是为自己的生活出路而抗争，或是以权力固守自身利益的新一代营利者，甚至产生新的社会撕裂，他们无力也无暇改造基层政治生态，根本谈不上完成所谓的“建国”重任，最终干部俱在，“建国”成空。赣籍青年军复员困境的背后固然有抗战后江西经济社会凋敝，政府资源调控能力不足的客观原因，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国民党政权中新旧之间、派系之间、团体之间的对抗与争夺，造成基层政治生态恶化所带来的必然乱象。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江西省高安县政府关于谨报青年军现任遐龄乡长袁骏德鼓众威胁政府比将撤职经过情形的代电》(1946年8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2。

^②《江西省宜丰县政府关于青年军通讯小组要挟县长案的代电》(1947年4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33-0027。

^③《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

·环境史·

英国军事环境史研究管窥^{*}

贾 琪

[摘要]军事环境史是聚焦于军事而对人与环境间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在英国的发展具有突出的阶段性特点。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地理学者在探究军事环境问题，之后历史学者积极跟进，特别是在2010年以来取得明显进展。从研究对象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二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自然资源，三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景观。相关研究共同推动了以往对军事史、社会史和殖民史等领域的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一方面适应了军事史研究的跨学科需求，另一方面突破了军事环境史理论方法的瓶颈，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军事 环境史 英国 资源 景观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123-10

军事环境史是聚焦于军事而对人与环境间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审视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体现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作为军事史和环境史的交叉领域，军事环境史一方面从人地关系入手，审视军事活动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继承和发展了以往主要聚焦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军事史；另一方面则将军事活动纳入环境史研究视域，探讨除污染和破坏之外，军事活动中体现出的更为多元的人地关系，丰富和完善了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

2000年以来，军事环境史研究在英国初具规模。1995—2021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准会刊《环境与历史》杂志共刊载论文（不含书评）512篇，其中军事环境史15篇，约占3%，作者来自英国（6）、西班牙（1）、葡萄牙（1）、意大利（1）、挪威（1）、美国（2）、加拿大（1）、新西兰（1）和印度（1），^①欧洲学者占2/3，且以英国学者居多。

英国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阶段性特点很突出，从20世纪70年代汤因比不带环境史标签的史学研究，到2020年前后的百花齐放，2000年和2010年是关键节点。在1999年欧洲环境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地理学者在探究军事环境问题，主题围绕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展开，并形成了持久影响。之后历史学者积极跟进，特别是2010年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从研究对象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二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自然资源，三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景观。相关研究共同推动了以往对军事史、社会史和殖民史等领域的研究，成为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

2013年，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卸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②将英国史学巨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战西线战地环境与老兵记忆研究”（18AS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贾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成员（北京，100875）。

① 通过整理《环境与历史》目录得出的结论，<https://www.whpress.co.uk/EH.html>，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0日。

② J. R. McNeill, “President’s Address: Toynbee a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Environment History*, vol.19, no.3. 2014.

阿诺德·汤因比与环境史研究联系起来，指出汤因比对环境的思考，始于其对地理尤其是军事地形的兴趣。这种迷恋伴随汤因比的一生：他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旅行笔记上写满了对路线、关口、城堡等的评论，并曾冒雨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多走了近 20 千米，只为查看公元前 479 年波斯人是否可能绕过塞姆皮雷隘口。汤因比的最后一本书也记载了地形对古代战役结果的影响。虽然当汤因比于 1975 年去世时，“环境史”这个术语刚刚被创造出来，但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位环境史家，他对地形和地理带给人类事务特别是军事活动的影响表现出持久的兴趣。在抽象层面上，他否认环境的重要塑造作用，但在具体案例中，他通常会将环境尤其是气候作为很大的挑战——如果这些挑战不是太弱或太强，或变化得太快，就可能会引发创造性应对。

麦克尼尔所言“汤因比的最后一本书”，即《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该书一方面延续了文明史观对世界历史的认知逻辑，另一方面体现出汤因比对所处冷战时期的现实关怀。汤因比指出生物圈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通过自我调节和维护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人类和生物圈中的所有成分都依赖于其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如果生物圈不再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灭绝。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足以使生物圈变得难以栖身，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自杀性后果。人类对核力量的掌握，使其成为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①

这显然反映了 20 世纪 70 年代风起云涌的环保运动对于这位睿智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并直接源自他对美苏竞相升级核武库、达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过程的观察与警惕。在该书的后续章节中，汤因比还对各国历史上军事与环境的关系有所论述。

首先，在谈及苏美尔文明的诞生时，汤因比指出，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这是对科技与军事、战争与文明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考。^②其次，在谈到中国的战国时代军事技术变化时，汤因比指出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直接目的是方便军事运输，但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他还指出，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 4 世纪末，战车的地位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这些河网水路，日后还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③再次，在文末，汤因比谈到科学技术对于人类事物的双重影响。如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明的炸药相结合，炸弹从天而降，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人类需要保持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已被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所打破，人类有可能自我毁灭。^④

不难看出，汤因比对人地关系的认知和批判都与环境史契合，既体现了其史学素养与思想，也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精神与危机。就本质而言，可以说是没有标签的环境史研究。

人地关系同样是地理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二战后有不少地理学者都在自觉地审视人类对地球面貌的改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W. L. 托马斯 (W. L. Thomas) 主编的《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一书，^⑤由 50 多位英美历史地理学家合作完成，篇幅近 1200 页。可以说，探讨环境、社会与战争间的互动，是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也很善于从事的本业。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由贝特霍尔德·迈耶 (Berthold Meyer) 主编的《环境退化：战争后果与起因》一书出版，^⑥反映了德国生态学与和平学研究者对战争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6、8、15 页。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 46 页。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 193-194、287 页。

^④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第 519、523 页。

^⑤ W. L.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⑥ Berthold Meyer, ed., *Umweltzerstörung: Kriegsfolge und Kriegsursache*, Frankfurt: Suhrkamp, 1992.

与生态危机的关注，提出环境破坏既是战争的原因，也是战争的后果，主张把解决环境危机的各个方面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关键。1993年，英国地理学家、杜伦大学教授伊恩·西蒙斯在《环境史概说》一书中论述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和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揭示了战争与环境间张力不断增强的趋势。西蒙斯认为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尽管有时破坏性很大，但通常也只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短暂影响，并很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其主要痕迹只能在原来提供武器和盔甲的炼铁场、鼓风炉那里找到，也许还可以在战死将士的冤魂那里找到。^①

工业化战争的能量流动异常之大，生态环境影响也远超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在讲述一战期间的堑壕战时，西蒙斯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谨慎分析各方伤亡数字的真伪，探讨战略战术的成败或总结工业化战争的后勤供给特点；没有像哲学家那样分析战争对文明的蹂躏，反思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或追溯战争的根源；也没有像作家或媒体人那样，进行生动的文字描述或影像再现。西蒙斯选取的角度很特别，但对他来说又很自然——他从能量流动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工业化战争机器的强大和残暴：堑壕战的前沿阵地是高能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快速转化为噪音和热量。战场景观变成了充满泥塘的沼泽地带。^②

西蒙斯是较早关注战争与环境关系问题的英国地理学者，这种关注一直持续至今。在与笔者的通信中，他进一步系统评价了这一研究的价值：人类族群间的战争似乎已成为固有的行为特征。在“以战止战”的宣言之后，战争又会爆发。战争有时是族群内的“内战”，有时是族群间的“国际战争”，并总有个文雅的词汇——“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以往我们只考虑到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实更需要考虑人以外的内容：植物、动物、土壤、水和战前准备、战时使用、战后清理的各种资源。环境对战争而言就像件织物，既很精密又容易破损。

其后还有四位英国地理学者写了4篇有关军事环境问题的文章，研究对象涉及水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地理学与军事情报，以及战争期间的流行病等，体现了地理学者对于军事环境问题的多元审视。

1995年，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弗朗西斯·克利弗（Frances Cleaver）在《作为武器的水：津巴布韦恩卡伊地区供水发展史》一文^③中指出，很多对津巴布韦历史和政治的分析都忽视了一种重要资源：水。恩卡伊（Nkayi）地区的数据表明，水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比土地更为重要。在独立前的多年斗争中，水以及如何控制水，一直被作为武器和战术。如在政治活跃的地方，当局拆除供水管道，拒绝派工程人员修复损坏的水井，而去报告水井损坏的居民也常被当作告密者被游击队惩罚甚至杀死。独立后，水仍然是重要资源。为了抵制对水的控制，人们要么在水开发活动中采取不合作运动，要么形成一种尽力省水和分享水的文化，使人们在人为的干旱和水资源稀缺中生存下来，并围绕这种能力构建出团结的氛围。作为从事项目开发和设计的地理学者，克利弗的研究超出了自身专业的范畴，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审视战争与和平，审视特定地区的资源供给、分配与利用，视野和方法具有突出的环境史特点。这也是《环境与历史》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军事环境问题的论文。

1996年，拉夫堡大学地理系的迈克尔·赫弗南（Michael Heffernan）在《地理学、地图学和军事情报：皇家地理学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文^④中指出，一战有个令人不安的特征，即对科技前所未有的动员，军政领导人可以利用科学快速发展的成果，一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揭示了现代技术可怕的破坏力。他注意到三个现象：一是绝大多数英国地理学家积极参战；二是皇家地理学会与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部门紧密联系，制作了一份1:10000的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图，在战时和战后被用作重要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工具；三是在1915年和1916年初协约国内部东线决胜和西线决胜两派的争论中，地理

① I. G. 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28.

② I. G. 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pp.45-46.

③ Frances Cleaver, “Water as a Weapon: The History of Water Supply Development in Nkayi District, Zimbabw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1, no.3, Zimbabwe, 1995.

④ Michael Heffernan,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21, no.3, 1996.

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赫弗南的研究对象并非具体的战役或是军人的经历，而是和平时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的地理学家，并详细回顾了其中一些重要代表在一战中的观念和行动。尽管其着眼点是地理学家，但探讨了科学运用于战争的机制，特别是地理学与战略制定之间的重要关联，对人们认知地理学与军事环境问题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

1999年，诺丁汉大学地理系的马修·S.雷纳（Matthew S. Raynor）和安德鲁·D.克利夫（Andrew D. Cliff）撰文探讨了1895—1898年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过程中的三种传染病（伤寒、天花和黄热病）的空间传播和传播速率。他们发现，在战前定居体系下，传染病与死亡率关联微弱，起义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增加了定居点之间流行病学上的相互依赖，创造出高度整合的疾病活动系统；起义与疾病传播的空间过程加速有关，这与流行病学整合程度的提高相一致；战时流行病的空间演变由敌对行动地点的变化决定——随着起义的发展，中心逐渐从东南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可见军事活动是造成古巴战争与和平时期流行病学经验差异的主要因素。^①这一研究构建了伤寒、天花和黄热病的空间传播模型，与历史学家相比，其定量研究的特点更为突出。2001年，二人继续合作研究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营中伤寒的空间传播和传播速率，依托1904年出版的《关于1898年西班牙战争期间美国军营中伤寒起源和传播的报告》内容，二人通过对89个团的军营进行地理标记，模拟伤寒扩散过程，在原有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分级传播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传染病传播模型——传递扩散模型，而对文本和数字信息的综合分析对疾病传播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价值。^②

这些地理学者的研究在军事环境问题上形成了一定语境，有助于吸引历史学者特别是环境史学者思考同类问题，并有可能发挥自身学科优势，避免结构性叙述、只见数据不见人的弊端。在2009年出版的论文集《战争与环境：现代军事破坏》^③中，有5位欧洲作者，其中英国3位，德国2位，展现了欧洲学者的关注视野与研究逻辑。整体而言，其关注点在于战争进程、战争记忆和战争影响：现代战争对军事资源的利用规模前所未有，武器装备的破坏潜力几乎无限；作战不仅改变了景观和生态系统，也改变了战士的感受和记忆战争的方式；战争的环境后果包括故意的和不可预见的，需要严格调查和分析。

赫尔大学的格雷格·班科夫（Greg Bankoff）强调战争对自然界的影响是不可预见的。通过探究殖民扩张、武装冲突与菲律宾森林之间的联系，班科夫指出热带地区的森林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之相关的社会史。他引用大量殖民地信件、人口统计数据和林业报告，提出只谈战争对森林的影响无法揭示这种关系的复杂性。殖民地时期的菲律宾伐木者大量获取柚木等硬木，不仅摧毁了树木的具体品种，也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削弱了林地生态系统的基础。^④

布里斯托大学的克里斯·皮尔森（Chris Pearson）审视了法国二战老兵的战争记忆。其研究对象是法国东部的韦科尔堡——1944年，法国游击队发动了短暂而血腥的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起义。他采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石碑等文物，用以说明老兵如何将风景如画的高山、峡谷和山涧作为记忆他们反抗的“根据”。然而早在1945年，非官方的开发就威胁着据称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由此，皮尔森强调大部分景观自身都是文化的产物。^⑤

^① Matthew S. Raynor and Andrew D. Cliff,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War and Peace: Cuba and the Insurrection against Spain, 1895-98”,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24, no.3, 1999.

^② Matthew S. Raynor and Andrew D. Cliff, “Epidemic Diffusion Processes in a System of U.S. Military Camps: Transfer Diffusion and the Spread of Typhoid Fever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1898”,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1, no.1, 2001.

^③ Charles Edwin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Greg Bankoff, “Wood for War: The Legacy of Human Conflict on the Forests of the Philippines, 1565-1946”, in Charles E.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⑤ Chris Pearson, “Creating the Natural Fortress: Landscape, Resistance, and Memory in the Vercors, France”, in Charles E.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新汉普郡大学的杰弗里·迪芬多夫 (Jeffry Diefendorf) 探讨了战争对城市地区的影响。他指出, 柏林、考文垂、东京和其他城市遭受的破坏, 成为按现代主义范式恢复城市活力的契机。如柏林和汉堡的城市景观大部分被摧毁, 为战前几十年就有的设计方案提供了白板。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乱七八糟的、现代主义城市的重建, 历史遗迹保存的理想设计与财产权等发生冲突。总之, 尽管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在战后进行了现代主义规划的尝试, 但是炸弹落在哪里, 哪里就有更多更迅速的变化。^①

2014年, 肯特大学的菲利普·斯莱文 (Philip Slavin) 撰文指出, 1296—1328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战争与一系列生态和生物危机同时发生, 特别是加剧了1315—1317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319—1320年的牛疫, 在不列颠岛的战区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②他认为, 战争破坏了可耕地、牧区和森林资源, 切断了当地社区与他们熟悉的生产景观的联系, 由精心管理的耕地、牧场和林地覆盖的数十万英亩土地被毁, 导致了灾难性的粮食短缺和当地社区的大规模贫困, 认为“有机时代”的前工业化社会比现代工业化社会更容易受到战争带来的环境危机的影响, 在战争面前更为脆弱。作者进行了理论反思: “制度主义”观点指责人类和人类制度, “环境主义”理论将责任归咎于自然因素, 但二者都不能独自解释饥荒现象。战争虽占主导地位, 但并非造成环境灾难的唯一因素, 军队毁田、焚烧树木、掠夺家畜的行为, 与生态力量 (如暴雨、寒冷天气、风暴和病原体) 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了作用。

2018年, 利物浦大学的亚历山大·豪尔赫·伯兰 (Alexander Jorge Berland) 和乔治娜·恩菲尔德 (Georgina Endfield) 撰文探讨了美国独立战争给英属西印度群岛带来的危机。^③文章指出, 历史学家对爱国者和效忠派领土之间的贸易禁运, 美国海盗带来的损失, 以及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敌对早已进行了相当详细的研究, 但往往集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虽然有研究强调气候变化使某些地区的农业和生活问题复杂化, 但气候作用却很少受到同等重视。文章探讨了降雨不足对人们生计、财政稳定和政府危机管理造成的影响, 指出连年干旱是造成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安提瓜岛遭受严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的关键原因。然而气候的作用不是唯一和绝对的, 它与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压力下的殖民政权存在动态互动。这一研究将环境与人的作用进行了统筹考察, 避免了经济史研究的狭隘和简单片面的环境决定论。

二、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往往既是战争的起因, 又是支撑战争的物质力量。这早已见诸《历史》《高卢战记》等西方古典史学著述中, 只不过既往研究更多记载了人们对于这些自然资源的追求与利用, 很少涉及由此反映出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影响。森林是英国环境史家非常关注并进行了集中研究的军事资源。

2003年, 剑桥大学A. 约书亚·韦斯特 (A. Joshua West) 以一战之后英美两国的林业政策为研究对象, 撰文探讨了国家安全与林业政策之间的关系。^④他认为, 英美两国林业在一战期间的经历, 直接影响着各自林业政策在战后的发展方向。潜艇战使长期依赖外国木材的英国出现木材危机, 于是林业政策成为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议题。议会1919年采纳林业专业人士的建议通过《林业法》, 主张政府大力参与造林和木材生产, 而这些专业意见在战前是被忽视的, 战时木材危机使林业议程走上国家政策的中心舞台。尽管对美国而言, 像英国那样制定政策的紧迫性并不存在, 但战争影响是存在的: 20世纪20年代, 森林从被忽视的公共土地、农业或许多其他产业的附属品, 变成了联邦、州和工业的共同责任。

韦斯特认为一战并未彻底改变两国关于林业的基本观念, 但它改变了政治环境, 并最终改变了国家

^① Jeffry M. Diefendorf, “Wartime Destruction and the Postwar Cityscape”, in Charles E. Closmann ed.,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Military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Age*.

^② Philip Slavin, “Warfare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British Isl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9, no.3, 2014.

^③ Alexander Jorge Berland, Georgina Endfield, “Drought and Disaster in a Revolutionary Age: Colonial Antigua during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4, no.2, 2018.

^④ A. Joshua West, “Fores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British and American Forestry Policy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8, no.2, 2003.

的态度和政策。战争的环境影响可能首先会让人想起战场破坏的景象：中东沙漠燃烧的油田，东南亚被摧毁的丛林，或者西欧坑坑洼洼的战场，这些是最明显的，但战争经验可能更长久、更深远地影响使用资源的态度和环境政策的方向。韦斯特扩展了对于战争影响的传统认知范围，把战后资源政策也纳入考察视野中，并针对英美两国的林业特点与战争经历进行了对比研究，在视野与方法上都有参考意义。

2006年，克里斯·皮尔森以法国东南部为中心，追溯了二战期间法国森林的历史。^①他指出，森林对维希政权而言不仅是在物质严重短缺时期替代产品的重要来源，也是象征维希保守世界观元素的栖息地。但从1942年末开始，地下抵抗运动开始从维希政权手中夺回这片森林，把它变成反抗和颠覆的空间。德国和意大利的占领挑战了法国对森林的控制，破坏了维希政权在法国的生产动力，并把森林变成了武装冲突的场所。在1944年的战斗中，森林成为军事冲突的地点和受害者——在整个“黑暗的年代”，法国内部的不同派系努力维持对森林的控制，但最终被德意占领军的统治所挫败。

皮尔森认为，尽管二战只是人类破坏法国森林漫长历史的最新一章，但1940—1944年，即森林生命中的一瞬间，给法国森林造成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变化。森林既是生产空间，也是意识形态空间、战斗地点和生态空间。这些本质上冲突的用途和愿景，以及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是森林生态的退化。据估计，有3000万立方米用于建筑和工业的未处理木材被破坏，面积达40万公顷；轰炸、砍伐和弹药爆炸摧毁或使约350万立方米木材无法使用；沿海森林受破坏程度比内陆森林更高。法国战后批准了促进重新造林的立法，1946年9月成立的国家森林基金会（FFN）在其后处理了长期存在的森林退化问题。因此皮尔森提出，要重新思考战争在塑造景观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和军事冲突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2014年，布里斯托大学的蒂姆·科尔（Tim Cole）撰文探讨了纳粹大屠杀中的人与森林的历史，^②认为森林既是物质场所又是纪念景观，既是生活空间又是记忆空间。根据已出版和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对躲藏在中欧和东欧森林里的战争幸存者的采访，他研究了三种主要关系：首先，幸存者将森林视为一个迷失方向的、陌生的、疏远的世界，但也是对森林外更腐败世界的逃避；其次，自然是一种可以利用和适应的东西，因为它扮演着仁慈的角色，但同时也存在不足，需要弥补以便让人在其中生存；第三，适应自然——或者像一些幸存者所说的成为“动物”——既是成功生存的主张，也是一种解释和远离森林中战时行为的方式。虽然幸存者讲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故事，但也讲述了自然为他们谋利的故事。文章通过考察自然在大屠杀及其战后叙述中物质和想象力的复杂形式，探讨了环境史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领域可能做出的贡献，也探讨了种族灭绝的环境史对战争史领域可能做出的贡献。

2019年，纽卡斯尔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斯蒂芬·米尔顿（Frederick Stephen Milton）撰文回顾了一战期间英国野鸟保护者特别是英国最大的野鸟保护机构——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工作，认为“后方”和战争对动物群的影响不应被忽视。^③文章利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期刊和年度报告，以及报纸文章和信件等，展现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如何运用其优势反对羽毛类女帽，继而分析了战争压力给野鸟带来的生存问题：不仅公众不愿再提供鸟食，而且还有更多的饥饿人口瞄准了它们，麻雀等物种也成为确保农业产量而需要消灭的目标。在议会斗争和舆论层面，农业利益集团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文章最后指出，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大批从事鸟类工作的工人，这对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无论如何，其在战争中督促议会和大众媒体改变了对鸟类的看法，坚守了保护鸟类的使命，打了一场“正义的战争”。相对于此前有学者进行的森林政策的研究，这篇文章更加具体，“人”作为一个

^① Chris Pearson, “‘The Age of Wood’: Fuel and Fighting in French Forests, 1940-1944”,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1, no.4, 2006.

^② Tim Cole, “Nature Was Helping Us: Forests, Tre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the Holocau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9, no.4, 2014.

^③ Frederick Stephen Milton, “‘Pursued steadily, quietly, unfalteringly’: The Work of Wild Bird Protectionists in Britain during World War On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5, no.2, 2019.

个鲜活的个体，并未被法律文本和环保行动所代替。

三、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军事景观

景观一直是英国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对军事景观的研究是从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展开的。

2001年，布里斯托大学的约翰·威尔斯（John Wills）以《美国的核景观与非自然的自然》为题，比较了内华达试验场（Nevada Test Site）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这两个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的景观。内华达试验场是核时代的象征，混杂着扭曲的军事建筑、炸出的弹坑和具有放射性的沙漠，是被掠夺和辐射的领土。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则以野生自然和不朽的风景而闻名。威尔斯注意到，这两种曾经长期被认为是极端对立的景观之间，在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尽管所谓的核公园不太可能成为21世纪后期的黄石公园或是约塞米蒂公园，但一些核景观因为稀有动植物而受到赞扬，甚至成为自然保护区。

针对这一现象，威尔斯指出核问题有助于人们理解环境史，特别是在“自然”和“公园”的概念上。公园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荒野意象，即未被人类触及的景观，而核景观由于其公开的军事需求和伴随而来的自然缺乏而令人厌恶；核景观象征着人类统治和控制的危险，而公园则体现了自然纯净、不受文化污染的理想主义理念。然而从废弃的军用车辆到熙熙攘攘的特许商店，人类对核设施和国家公园的影响随处可见。威尔斯强调，“非自然的自然”曾被用于描述黄石公园的地质奇观，如今更适合形容后原子时代的荒野。“非自然的自然”不仅是自相矛盾的短语，而且在如何解释现代地貌上陷入了困境。^① 威尔斯立足英国景观史传统，从人的影响入手找到了废弃核设施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共同属性，为人们理解核时代的战争景观与自然荒野提供了思路。

2010年前后，受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布里斯托大学环境人文中心开展了“20世纪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项目研究，中心成员彼得·科茨（Peter Coates）、蒂姆·科尔、玛丽安娜·达德利（Marianna Dudley）和克里斯·皮尔森等人相继发表了有关军事化景观的成果。

2010年，皮尔森、科茨和科尔主编的论文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②出版，共收录13篇文章，作者来自欧美和新西兰，专业则涉及地理、历史、景观建筑、美术和心理学。从欧洲环境史学者的贡献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界定了军事化景观的属性。三位编者在导论中指出，战争和备战一般发生在户外，如田野、森林、草原、沙漠等环境中，因此军事化是一个需要积极部署和开发各种景观特征的过程，包括地形、植被和气候。同时，军事化又是贯穿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并在其中留下印记的过程，不仅通过景观来运作，也在物理和文化意义上改变或维持着景观。

其次，总结了军事化景观的特点。一方面，军事禁区所占空间远远超过了军事设施本身所需的空间，占用更多的土地是为了安全和保密，由此无意中维持着栖息地，与周围城市化、旅游业和农业景观不同。另一方面，尽管军事化景观可能看起来与它们周围的平民景观截然不同，但又很少是彻底和不再变化的，正如一战堑壕中幸存下来的士兵所回忆的那样，云雀和其他鸟类在炮火中继续歌唱。^③

第三，进行了跨学科的个案研究。达德利以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场为例探讨了军事环保主义。她描述了坦克履带痕和车辙如何形成短暂的池塘，为稀有的仙女虾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同样的景观如果没有人类活动，池塘和仙女虾都会更少，因为虾卵往往是通过牛的行走传播的。在她看来，国防部将仙女虾的存在作为环保主义宣传的例证，体现了索尔兹伯里平原训练场正被“绿化”的事实：一方面是物质层

^① John Wills, “‘Welcome to the Atomic Park’: American Nuclear Landscapes and the ‘Unnaturall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7, no.4, 2001.

^②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London: Continuum, 2010.

^③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Introduction: Beneath the Camouflage: Revealing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面的绿化，军队请自然资源保护专家负责对大片土地进行日常管理，土地的生态价值得到了了解、重视和保护；另一方面是美化，军方用自然景观来改善自身形象，努力将注意力从其他更困难但同样重要的问题上转移开来。其宣传生物活力（如仙女虾）的新闻稿和教育倡议，提供了一种公共叙述，但忽略了军事活动固有的暴力性质。同时，军事指挥官并不总会保护自然，但他们作为环保主义者偶尔会发挥作用。^①

纽卡斯尔大学的蕾切尔·伍德沃德（Rachel Woodward）从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入手，探讨了军事化景观的主要特点。她指出，军事地理无处不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以某种方式被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所触及、塑造和代表。这些景观有许多被笼罩在神秘中，普通民众很难看到。保密和不可见是军事机构的特点，也是许多军事景观的特征。不可见性、保密性和不可知性，有助于军事对空间的控制。军事景观的照片使揭示军事秘密成为可能，军事力量的破坏能力主要表现在平淡无奇的民事活动上，如修建公路、建造建筑物、堆砌土方工程、清除植被等，这些细致的描述和那些在战争摄影中被充分记录下来的、明显且无所不在的军事破坏是不同的。因此，军事景观摄影避免了对军事及其影响的草率判断。这些照片并不是简单地解读为支持或反对军事的声明，它们有种微妙的、有时模棱两可的性质。这种特性很有用，因为它让人质疑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②

这部论文集不仅有美国环境史学者大力参与，也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战争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的提出者之一埃德蒙·拉塞尔为论文集做了后记，认为论文集是军事化景观研究的里程碑，开启了跨学科对话。他总结了论文集的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军事化景观成为自然保护区，是无心插柳之举。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平原和美国的落基山兵工厂，这些军事景观作为自然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相比，拥有更大的生物多样性，原因即在于这三个地点——一个由两支陷入僵局的军队争夺，两个由单一军队控制——都为植物和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或者说，两个极端情况，即高度军事争议和完全没有军事争议，都可以帮助保护栖息地。二是军事化景观的定义，拉塞尔认为有必要把军事化景观的概念扩展到战场和基地之外，重新思考“军用”和“民用”世界之间的关系。高度文明化的景观与高度军事化的景观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军事化和文明化。理解这些至关重要的是历史记忆，因为军事化和文明化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因此拉塞尔建议使用更广泛的军事化景观概念，把军事供应链看作食物链，审视军队与民用、农业和自然系统之间的间接和隐藏的、但绝对必要的联系，理解军事化的区域远远超出了战场和基地，随着供应链的延长，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③

时任《环境史》杂志主编的丽萨·布雷迪认为，论文集帮助阐明了军事实体同其所依托的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围绕军队是作为破坏性力量还是作为军事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者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分析了由军事组织主导的景观的社会文化含义，有助于更为深入和广泛地理解军事化景观，并且对日益发展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有重要的贡献。^④

2011年，科茨等人发表《“保卫国家，保卫自然？”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与军事环境主义》一文，^⑤总结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一书的核心观点。文章指出，军事化景观是被全部或部分动员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质和文化场所。之所以要关注战备地点而非战场，是由于环境史家长期忽略了军事化景观，对战场以外的地方关注较少，而研究和平时期军事化如何改变物质和文化景观

^① Marianna Dudley, “A Fairy Tale of Military Environmentalism: the Geening of Salisbury Plain”,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② Rachel Woodward, “Military Landscapes: The Military Landscape Photography of Ingrid Book and Carina Hedén”,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③ Edmund Russell, “Afterword: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Chris Pearson, Peter Coates, Tim Cole, eds.,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④ Lisa M. Brady, “Militarized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 no.3, 2012.

^⑤ Peter Coates, Tim Cole, Marianna Dudley, Chris Pearson, “Defending Nation, Defending Nature? Militarized Landscapes and Military Environmentalism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6, no.3, 2011.

的，主要是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其工作很有价值，但常常言过其实，且缺少对档案的运用。另一方面，还有些研究者不加批判地声称，从生态角度来看军事活动相对无害（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有利于环境），还有人认为军队有着极差的环境记录，所谓的军事环境主义是纯粹的“绿色粉饰”（green washing）。针对上述现象，作者们指出，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以来军事化景观的环境史，远比上述非此即彼、两极分化的模型复杂得多。

文章还对军事和环境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共有四个存在前后顺序关系的主题：通过驱逐实现军事化景观，然后又引起被驱逐者的抗议；军事环保主义出现，军队既要保护国家又要保护环境；军事化景观中非人类居住者的地位和角色；近来持续存在的平民和军队之间的合作现象。作者分别研究了英国索尔兹伯里、达特穆尔、威尔士等地的军事训练场，法国的拉尔扎克营地和叙普营地，美国的落基山兵工厂和落基平原，比较了四大主题的异同，指出英国走在军事环保主义的前列，国防部在拥挤、狭窄和有争议的地理空间内运作，催生了集约和包罗万象的管理策略。英国军队也在独特的英国文化传统中发挥作用——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乡村牧师吉尔伯特·怀特——对自然界的好奇和对研究的热情。英国这种既有专业人士也有业余爱好者的自然历史传统，比在法国和美国扎根得更深更广。在经验丰富的平民那里，一些英国军官的管理伦理赢得了土地管理价值观的共鸣。

2012年，皮尔森发表了《军事化景观研究：战争与军事化环境的文献综述》一文，^①对有关军事化景观（部分或完全动员以实现军事目标的地点）的既有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估，指出除了公众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外，军事化景观也是地理学、历史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中新兴的研究领域，因而需要围绕共同的主题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

文章分为三个主题：准备战争、战场和后方。作者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军事化和景观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例如军事基地的某些地方可能受到严重污染，但也可能有一些稀有的动植物找到生存空间，还可能是士兵训练、工作和休闲的场所，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失去的家园，以及准自然保护区。此外，军事化景观的某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究，如“军事环保主义”的历史根源，地缘政治和外交的环境维度，以及士兵居住和创造军事化景观的各种方式，战争、种族灭绝和气候之间的联系，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在战场和军事基地环境中的存在和作用等。

总之，军事化景观是平民与军队、士兵与环境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接触、对峙和谈判的场所。它们不同的文化和物质层面属性，也使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富有成效。战争和环境不再可能被视为单独的领域，研究者需要回应战争和景观如何穿越时间和空间相互重现的挑战。而多学科中存在的共同主题，也表明跨学科研究是军事景观的潜在需求。

2014年，科茨发表了《边境、无人区与自然奇境：混乱的人类和平静的地球》一文，^②思考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问题，即人类冲突造成受困扰的人类与不受困扰的自然共存，对这一情况的审视，有可能为自然界其他部分带来益处。他以冷战时期东亚和欧洲的非军事区为例，描绘了人类的“死亡带”如何成为动植物群的“生命带”。边境通常是仅存的未开发土地，各种鸟类和植物因远离农业而获得喘息的机会；该区域以外的领土是不祥的棕色地带和混乱的地球。在军事化景观中，罕见的苔藓占据了放置机枪的废弃混凝土街区，同时有蝙蝠在废弃的地堡和瞭望塔中筑巢。科茨还思考了“回归自然”过程中存在的“抹去”（erasure）现象。如美国科罗拉多州废弃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制造设施，转变为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管理的正式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动植物的仙境，有关人类流离失所、武器制造和残留毒性的令人不快和不安的故事正在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愉快、麻烦更少、新鲜绿色的

^① Chris Pearson, “Researching Militarized Landscap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War and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andscape Research*, vol.37, no.1, 2012.

^② Peter Coates, “Borderland, No-Man’s Land, Nature’s Wonderland: Troubled Humanity and Untroubled Eart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20, no.4, 2014.

叙事。从肮脏和混乱的历史魔爪中解脱出来后，这些臭名昭著的地方通过重新进入纯粹的、闪亮的、显然非历史的自然领域而得到救赎。在他看来，对这种“抹去”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因为对自然的叙述和对历史的叙述并非不相容，保护区未来有望成为包容记忆和多重交叉叙事的空间。

可见，“20世纪英法美三国的军事化景观”项目，对欧美三国的军事活动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具有比较视野的研究，内容不仅涉及森林和山脉等自然景观和众多军事设施等人造景观，也涉及这些景观在历史时空中的变迁，以及人们对于这些变迁的理解与记忆。作者广泛运用地理学和生物学知识进行军事史和社会史审视，把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项目结束后，达德利在布里斯托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本科生课程“战场之外”（*Beyond the Battlefield*），探讨了河流、石油、有毒物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军事史意义，实现了军事环境史科研与教学的相互促进。

四、结论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英国的军事环境史学者为这一领域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凸显了学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价值。

首先，适应了军事史研究的跨学科需求。跨学科研究是军事史的必然要求。军事活动涉及战时与和平时期的方方面面，此类涉及人类社会诸方面的综合问题，仅从历史学的角度不仅难以回答，甚至都难以认识问题的性质，使得跨越学科疆界成为必然选择。因而有学者指出，“广义的军事史既包括战争和陆、海、空作战方式的历史，也包括了以下各种历史研究：各类军事人员、军事机构，以及它们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文化形态的各种交叉，这些构成了军事史研究的重点或命题。这也意味着，最好的军事史研究必然跨越抽象的学科疆界，尽可能地使对过去的认识更为丰富和丰满。”^①

从英国军事环境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理学、人类学、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关注点出发，对历史上的军事环境问题进行了跨学科探讨。这无疑是对传统军事史的继承与发展，使人们对战争的起因、作战的展开和战争的影响等问题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论文集《军事化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13位作者中不仅有人来自地理学和历史学专业，还有人来自建筑、美术和心理学专业，一起对军事化景观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

其次，突破了军事环境史理论方法瓶颈。美国环境史家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er）曾探讨过战争环境史的任务与面临的困难：全面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是战争环境史的中心任务，研究者会面临诸多困难和困扰——要理解战争及其导致的自然世界的变化，需要考察其与人类历史主要趋势之间的系统联系，如人口波动、人畜共患的流行病等，由此出现诸多反命题——某些情况下战争减轻了人对自然的压力，一些物种得到暂时的恢复与繁荣；政府在战后往往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力度；战争的环境影响会因生态系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外，由于群体性暴力贯穿于人类历史，因而区分战争和生产生活造成的环境影响是很困难的。^②

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者并未将视野局限在战争本身，时空也未局限在战争期间与战场环境，而是统筹考虑，降低了时间节点不清晰、空间范围不明确给研究带来的障碍。正因为与环境之关系的独立审视难以进行，战争环境史才在日后的广义的“军事环境史”，这对于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是极大的推动。当然，英国的军事环境史研究总体上缺少区域国别视野，过于关注具体社群和具体物种的研究，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没有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需要继续发展和突破之处。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Stephen Morillo, Michael F. Pavkovic, *What is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p.3-5.

② R. P. Tucke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the Natural World”, in R. P. Tucker and E. P. Russell, eds., *Natural Enemy, Natural All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 Corvall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5-16.

从监督调查到协同治理： 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史演进^{*}

施 雾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展开监督调查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英国和瑞典分别颁布的饲用抗生素禁用法令的影响下，欧美国家抗生素饲用监管进入立法规制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普遍开始通过制定法规或出台政策的方式治理抗生素不当使用问题，且更加注重跨部门乃至跨国界的合作，饲用抗生素监管进入协同治理阶段。近年来，欧盟的监管举措初见成效。研究欧美国家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史演进，可为我们借鉴经验、规避风险，从而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抗生素饲用监管体系提供某种参照。

[关键词]抗生素饲用 监管 美国 欧盟

[中图分类号] K5；K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2-0133-10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美畜牧业对抗生素加以普遍应用，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程随之逐步展开。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已形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分别以监督调查、立法规制和协同治理为主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美国家的监管道路呈现出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多样化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抗生素饲用监管发展路径的多重视角。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抗生素监管政策与历史演进两方面，涉及欧美主要国家加强抗生素监管的原因、举措和意义，以及对相关国家抗生素监管政策法规和机构设置等问题的探析。^①国内学界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美有机农业的发展历程与现实启示”(22BS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施雾，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

①在抗生素监管政策方面，英国政府部门于1969年发布抗生素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美国政府部门于1972年发布动物饲料中抗生素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两份报告都提出了加强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建议；2001年，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第22号环境问题报告的相关章节探讨了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历程中的某些重要节点。在抗生素监管的历史演进方面，《斯旺之歌：英国畜牧生产中的抗生素监管》一文追溯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斯旺报告》出台的背景与后续影响；《限制抗菌药物在食用动物中的使用：欧洲的经验》一文总结了欧洲相关国家禁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科学依据、历史活动与长远目标；《减少抗生素在家畜中的使用：丹麦如何应对耐药性》一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丹麦在抗生素饲用监管领域的具体举措，并简要对比了美国和丹麦的不同做法。上述相关研究成果见：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9; 1972 FDA Task Force,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vailable upon Request to Bureau of Veterinary Medicine, FDA, 5600 Fishers Lane, Rockville, MD 20852; [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Claas Kirchhelle, “Swann Song: Antibiotic Regulation in British Livestock Production (1953-2006)”,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92, no.2 (Summer 2018), pp.317-351; Carol Cogliani, Herman Goossens and Christina Greko, “Restricting

曾基于多种学科视角对欧美抗生素监管举措与机构设置进行过探讨。^①目前国内外学界在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政策与历史研究方面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人类有意识地开发和利用抗生素的历史较短，关于抗生素监管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其一，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各国监管举措的内容，对其发展演进历史的研究较为缺乏，在历时性研究方面有待加强；其二，现有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多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而饲用抗生素监管却是一个国际性议题，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待加强；其三，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总体历史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现有研究尚未对此深入总结，在阶段性分析方面有待加强。

因而，本文拟选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欧洲部分代表性国家、欧盟和美国的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史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厘清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史脉络并总结其阶段性特征。以此为参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抗生素饲用监管政策。

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监督调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生素在英美两国畜牧业中的应用得以迅速推广，欧美抗生素饲用的监管历程随之起步。美国和英国的农场主为缓解密集养殖带来的禽畜传染病风险，在动物饲料中添加大量抗生素，从而酿成抗生素耐药性的隐患。两国在这一时期都出现过在牛奶中检出抗生素残留物质的食品安全事件，并且促成对抗生素饲用的初步监管。出于维护食品安全和防止抗生素耐药性的目的，英国和美国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开展监督调查活动。

1953 年以前，英国的抗生素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该国 1947 年《青霉素法案》(Penicillin Act) 中禁止销售除人类医疗和兽医用途外的抗生素的规定，^②相当于依靠兽医的职业操守行使抗生素饲用监管职能。1953 年，英国解除对饲料进口的限制和定量配给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专注于畜牧业生产。^③同年，英国颁布《(防止滥用) 医疗物质法案》[Therapeutic Substances (Prevention of Misuse) Act, TSA]，^④允许在动物饲料中加入低剂量的青霉素和金霉素。^⑤由此，抗生素饲用在英国合法化。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公众与抗生素饲用问题距离最近、接触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可能就是牛奶制品的消费了。牛奶在英美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可供饮用，通常还是制作其他食品的原料。20 世纪 60 年代初，依据《食品与药品法》(Food and Drug Act) 的规定，英国实行针对牛奶中的抗生素的有限检测。1965 年，英国牛奶销售委员会 (the Milk Marketing Board) 和牛奶分销中心委员会 (the Central Milk Distributive Committee) 开始要求乳品公司每月检测牛奶中的抗生素和其他不良物质。^⑥

1968 年 5 月，英国卫生部联合农业、渔业和食品部门委派一联合委员会，调查畜牧业和兽医学领域的抗生素使用情况。同年，《药品法案》(Medicine Act) 在抗生素饲用问题上取代了 1953 年《(防止滥用) 医疗物质法案》的相关规定。^⑦1969 年初发生的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加重了委员会肩负的压力。这

Antimicrobial Use in Food Animals: Lessons from Europe”, *Microbe*, vol.6, no.6, 2011, pp.274-279; Sharon Levy, “Reduced Antibiotic Use in Livestock: How Denmark Tackled Resistanc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122, no.6 (June 2014), pp. A160-A165.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医学和法学领域。其中，杨景勋较早将美国防止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举措介绍到国内；宋华琳认为应借鉴国外药品监管的“预防原则”，并重视科学不确定性因素在监管中的意义；张苗苗等介绍了负责管理欧盟兽用抗菌药耐药性的主要机构和管理举措。上述相关研究成果见：杨景勋：《美国抗击病原菌对抗生素耐药的一些策略和措施》，《中国药物警戒》2004 年第 2 期；宋华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当代法学》2010 年第 2 期；张苗苗等：《欧盟兽用抗菌药耐药性管理概述》，《中国兽药杂志》2013 年第 2 期。

② R. Braude,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in Great Britai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vol.46, no.5, 1978, p.1425; S-1.1(1)(a), Penicillin Act 1947 (18th July 1947), <https://vlex.co.uk/vid/penicillin-act-1947-808113441>, 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9 日。

③ John Mart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British Farming since 193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p.75-85.

④ “Royal Assent”,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53/jul/14/royal-assent#S5CV0517P0_19530714_HOC_278, 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9 日。

⑤ Claas Kirchhelle, “Swann Song: Antibiotic Regulation in British Livestock Production (1953-2006)”, p.322.

⑥ “News in Brief”, *The Times*, Sep 27, 1965, p.14; “Milk Board Fined in Test Case”, *The Times*, Sep 30, 1967, p.2.

⑦ R. Braude,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in Great Britain”, p.1427.

年春季发生了被称为“曼彻斯特悲剧”的事件，英国曼彻斯特的两家医院中有30名婴儿不幸死于耐药菌感染引起的肠胃炎。^①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样的事件并非首次发生，而是之前类似悲剧的重演。^②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众舆论进一步加剧，促使联合委员会较快取得共识，于1969年11月公布《畜牧业和兽医行业中抗生素使用联合委员会报告》(下文简称《斯旺报告》)。在报告中，委员会呼吁禁止青霉素和四环素类药品的生长促进剂用途，并建议在畜牧业中凭处方使用磺胺类药和硝基呋喃。^③这份报告为英国和其他国家颁布抗生素饲用监管法令提供了科学支撑，在抗生素饲用监管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前，美国对兽药的监管普遍比较宽松，当时的政府和相关行业组织缺少监管或指导抗生素饲用的权力。较长一段时间内，兽药的安全性证明由制造商提供，而非监管部门出具。1906年起，用于动物的食品和药品被纳入《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s Act)的监管之下。1927年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 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首次雇佣兽医，主要负责评估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否如该产品所声称的那样具有营养和治疗作用。1938年，美国颁布《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制造商首次被要求在销售新药品之前提供产品的安全性证明，兽药监管主要受到该法案第505节的新药品条款和第507节的抗生素条款的约束。^④根据该法案的授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有衡量药品安全性的权力，却没有衡量药品有效性的权力。^⑤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制药公司工作人员通过试验得出在饲料中添加低剂量的抗生素可以促进禽畜生长的结论，并将科研结论迅速转化为商业实践。^⑥从那时起，部分种类的抗生素就有了饲料添加剂的用途。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抗生素饲用监管几乎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到1951年时，“关于适当管理和分销抗生素的法律几乎无法限制非专业人士的使用”。^⑦尽管农场主通常在牲畜生病或感染时“会首先求助于兽医”，“但他们也经常从饲料商店购买药品，在20世纪50年代初抗生素被掺入动物口粮以后更是如此。”^⑧1951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联邦公报》中宣布多种抗生素被允许加入饲料，金霉素、青霉素、杆菌肽、链霉素、双氢链霉素和氯霉素都在许可之列。^⑨由此，已经在美国存在的抗生素饲用合法化。

195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分管兽药的分支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确定兽药的安全性，该机构在1959年升格为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辖的独立部门。^⑩不过，当时仍存在“多种原因使得

① “Action Sought on Antibiotics after Babies’ Deaths”, *The Times*, April 14, 1969, p.2.

② Robert Bud, *Penicillin: Triumph and Trag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78-181, 转引自Claas Kirchhelle, “Swann Song: Antibiotic Regulation in British Livestock Production (1953-2006)”, p.340.

③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p.46.

④ “CVM Milestones”,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ttps://www.fda.gov/media/156600/download>, 访问时间：2022年5月29日。

⑤ [美]威廉·罗森：《抗生素的故事——一颗改变人类命运的药丸》，陈小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19页。

⑥ 参见施雱：《从生产困境到生态困境：二战以来美国畜牧业抗生素饲用的缘起与影响》，《世界历史》2018年第5期。

⑦ Kendra Smith-Howard, “Healing Animals in an Antibiotic Age: Veterinary Drug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Crisis, 1945-1970”,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58, no.3 (July 2017), p.727.

⑧ Kendra Smith-Howard, “Healing Animals in an Antibiotic Age: Veterinary Drug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Crisis, 1945-1970”, p.731.

⑨ Claas Kirchhelle, *Pyrrhic Progress: The History of Antibiotics in Anglo-American Food Produc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0, p.57.

⑩ “CVM Milestones”, <https://www.fda.gov/media/156600/download>, 访问时间：2022年5月29日。

抗生素在农业中不受管制地被广泛使用”的问题。^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农场主在饲用抗生素的获得与使用上拥有较多自由，因此，美国也遇到抗生素残留物质危害食品安全的问题。医学专家的观点提示人们，在每天消费的肉制品和奶制品中有可能潜藏着过敏原，还有可能含有某种致癌物。^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曾撰文告知读者食品中的抗生素残留物质的危害，特别提到肉制品和奶制品中的青霉素残留物质可能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③

1959年11月发生的“蔓越莓恐慌”事件^④（cranberry scare）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加重视对于抗生素残留物质的检测。在对被除草剂污染的蔓越莓采取监管之后，该局为了恢复消费者的信心，进而“宣布要更加严格地检测抗生素残留物质”。^⑤加之市场上销售的禽畜产品中不断出现抗生素残留问题，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兽药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管理。

1962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修正案的通过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权限有了质的飞跃。^⑥ 1965年9月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兽医处（Bureau of Veterinary Medicine），以确保禽畜的可食用部分不含有害药物残留。1968年，该局提议严格限制治疗动物疾病的注射用抗生素。^⑦但在1969年，该局却不再坚持其关于限制注射用抗生素在牲畜中使用的提议，转而提出在畜牧业中实行30天抗生素“禁用期”的要求。^⑧在当时将这一规程应用于养殖业，对于降低肉制品中的抗生素残留物质和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立法规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应用遭到更多质疑，欧美抗生素监管进入立法规制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先后通过立法禁止将某些或所有抗生素用作生长促进剂。其中，英国率先禁止了对部分种类抗生素的饲用，瑞典则成为首个禁用抗菌剂生长促进剂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监管机构曾试图提出禁用法案，但最终未能获得国会批准。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斯旺报告》迅速获得英国政府认可。1971年，英国政府部门采纳报告中的部分建议，^⑨撤销对青霉素和四环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授权，^⑩从而结束了英国“抗生素监管的自由放任时代”。^⑪ 1972—1974年，一些欧洲国家纷纷撤销了对青霉素、链霉素和四环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授

^① Kendra Smith-Howard, “Healing Animals in an Antibiotic Age: Veterinary Drugs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Crisis, 1945-1970”, p.741.

^② “Laboratory Simulates Damage by Radi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1954-1959)*, Dec 12, 1957, p.A3.

^③ Dr. Theodore R. Van Dellen, “How to Keep Well”,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1954-1959)*, Aug 7, 1958, p.C20.

^④ 1959年11月9日，美国联邦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阿瑟·弗莱明（Arthur S. Flemming）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警告消费者，大意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今日敦促不再继续销售1958—1959年产自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蔓越莓和蔓越莓制品，理由是它们可能含有除草剂氨基三唑（aminotriazole）的残留物质，这种除草剂被证明可导致实验用大鼠患甲状腺癌，等等。由于其时恰逢感恩节前，蔓越莓酱是美国感恩节餐桌上具有节日象征意义的食物之一，因而该起食品安全事件在美国引发极大恐慌。这次事件对蔓越莓产业、食品安全立法和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的观念都产生了影响。

^⑤ Kendra Smith-Howard, “Antibiotics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Purifying Milk and Protecting Health in the Postwar Era”,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84, no.3 (Summer 2010), p.341.

^⑥ 宋华琳：《美国1962年药品法修正案的形成史》，《中国处方药》2007年第5期。

^⑦ “FDA Plans Curbs on Injectable Antibiotics for Animals; Fears Human Health Hazard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 12, 1968, p.5.

^⑧ “FDA Eases Proposed Rules on Antibiotics in Food Animals, Modifies Ad Restrict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1969, p.6.

^⑨ Nancy K. Eskridge, “Are Antibiotics Endangered Resources?”, *BioScience*, vol. 28, no.4 (Apr. 1978), p.252.

^⑩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p.45; Leonard Amey, “Three Antibiotics Banned from Animal Food”, *The Times*, Nov 21, 1969, p.2.

^⑪ Claas Kirchhelle, “Swann Song: Antibiotic Regulation in British Livestock Production (1953-2006)”, p.345.

权。^①

瑞典是最先明令禁止在畜牧业中使用抗菌剂生长促进剂的国家。1986年，该国颁布抗菌剂生长促进剂的禁用令，这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饲用抗生素监管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丹麦、英国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随后才禁止畜牧业使用抗菌剂生长促进剂。^②

早在1980年，瑞典官方就开始收集农业中的抗菌剂使用数据，^③但最先提出制定监管法规要求的却是该国的农场主组织。1980年，瑞典国内一篇新闻报道指出，该国“每年给健康的猪饲喂30吨之多的抗菌物质”，由此引发了公众辩论。^④瑞典民众震惊于这些动物被“长期、大量添加饲用抗生素药品”，于是“纷纷向养猪业提出了质询，并对肉品食用安全表示不满”。^⑤次年，为恢复养猪业在瑞典民众心目中的信誉，瑞典农场主联盟“建议制定新的法规，限制并控制抗生素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⑥瑞典农场主此举既是为了回应公众舆论压力，也是因为担心持续使用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会有损消费者对农业的信任。尽管争论不断，最终在农场主的反复敦促下，瑞典农业部起草了新的饲料法案。^⑦

1985年9月，瑞典议会审批通过《饲料法》，于1986年1月正式生效。^⑧其中规定“只有根据兽医处方才能在饲料中使用抗生素和化学治疗物质，并且只有以疾病的预防、减轻和治疗为目的时，才允许使用”。^⑨此后，瑞典农场主只能凭兽医处方在禽畜养殖中使用抗生素。禁令取得了明显效果，瑞典抗菌剂总消费量从1985年的约50吨降至1996年的20吨；^⑩用于动物的抗生素活性物质的销量从平均45吨降低至2009年的约15吨。^⑪

从1970年4月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斯旺报告》的启发，曾经成立工作组调查饲用抗生素问题，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限制抗生素饲用的决定。1972年1月，该局发布调查报告《动物饲料中的抗生素》，对此次调查的背景、内容和结论做简要说明，并就抗生素饲用监管提出建议。^⑫1972年2月，时任局长查尔斯·爱德华兹（Charles C. Edwards）申请增加禁止将四环素、链霉素、双氢链霉素、磺胺类药和青霉素用于饲用的法律条款，^⑬但这次尝试并未成功。

1977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议禁止对四环素和青霉素的饲用。^⑭尽管彼时该机构已积累了

① Carol Cogliani, Herman Goossens and Christina Greko, “Restricting Antimicrobial Use in Food Animals: Lessons from Europe”, p.274.

② Carol Cogliani, Herman Goossens and Christina Greko, “Restricting Antimicrobial Use in Food Animals: Lessons from Europe”, p.274.

③ Carol Cogliani, Herman Goossens and Christina Greko, “Restricting Antimicrobial Use in Food Animals: Lessons from Europe”, p.274.

④ Johan Inbör:《发展畜牧业的“瑞典模式”》，《饲料广角》2000年第16期。

⑤ 张明峰：《瑞典的绿色养猪业》，《世界农业》2001年第5期。

⑥ [瑞典]拉斯埃里克·埃德基、[丹]克努兹·博尔热·佩德森：《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剂：与常识的对抗》，[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张明峰：《瑞典的绿色养猪业》，《世界农业》2001年第5期。

⑦ Johan Inbör:《发展畜牧业的“瑞典模式”》，《饲料广角》2000年第16期。

⑧ [瑞典]拉斯埃里克·埃德基、[丹]克努兹·博尔热·佩德森：《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剂：与常识的对抗》，[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第193页。

⑨ Johan Inbör:《发展畜牧业的“瑞典模式”》，《饲料广角》2000年第16期。

⑩ [瑞典]拉斯埃里克·埃德基、[丹]克努兹·博尔热·佩德森：《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剂：与常识的对抗》，[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第193页。

⑪ Carol Cogliani, Herman Goossens and Christina Greko, “Restricting Antimicrobial Use in Food Animals: Lessons from Europe”, p.276.

⑫ 1972 FDA Task Force,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s: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p.3-10.

⑬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1 CFR Part 135] Antibiotic and Sulfonamide Drugs in Animal Feeds: Proposed Statement of Policy”, *Federal Register*, vol.37, no.21 (Tuesday, February 1, 1972), p.2445.

⑭ FDA, “Withdrawal of Notices of Opportunity for a Hearing; Penicillin and Tetracycline Used in Animal Feed”, *Federal Register*, vol.76, no.246 (Dec. 22, 2011), pp.79697-79701.

更多证据，却依然在立法上遇到阻力。先是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生产者、研发者公开表示抗议，^①随后又遭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反对。该委员会在1978年7月起草的决议中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这一提议，除非该局能提供更加完备的证据证明抗生素添加剂造成危害的程度。^②可是，当该局提供证明数据后，国会方面却不再有下文。由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只得暂时搁置提议，^③直到2012年该问题才被重新提上议程。^④

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赢得总统大选，开启了一个对管制充满强烈敌意的时代”，^⑤美国的抗生素饲用监管在化学品监管政策整体衰退的背景下遭到弱化。不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因坚持相对严格的新药品审批程序，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避免了抗生素阿伏帕星（avoparcin）在该国的饲用。^⑥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协同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治理抗生素的不当使用问题，欧美国家普遍实行比较严格的监管法规或政策，坚持审慎使用抗生素的原则，并积极开展跨部门乃至跨国界的合作。北欧的丹麦、瑞典和受其政策影响的欧盟开始改革抗生素监管政策，成为推动变革的新生力量。这一时期，欧美国家越来越注重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治理抗生素的不当使用，部门间合作、政府部门与专业人士间合作的趋势都有所加强。为更好地服务抗生素监管工作，欧盟和美国分别成立了抗菌剂耐药性监控系统，旨在促进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抗生素使用数据。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一些研究者相继发现在人类患者和食用动物（food animals）中存在抗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VRE），表明细菌耐药性问题更加严重。^⑦当时在动物中发现这种耐药菌既不合常理，也是一种危险信号。由于万古霉素（vancomycin）对人类医疗的重要作用，它并未被批准用于治疗动物感染。即便在人类医疗领域，通常仅当其他更为常见的抗生素对细菌感染无效时才会考虑使用这种药物。在动物体内发现对万古霉素耐药的细菌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经过科学家的分析，与万古霉素同属糖肽类且化学结构相似的抗生素阿伏帕星成为了怀疑对象。事实上，作为万古霉素在饲用抗生素中的对应物的阿伏帕星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欧洲畜牧业中被长期用作生长促进剂。^⑧

1995年3月，丹麦农场主组织与饲料行业达成一致，自愿停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阿伏帕星，以减轻耐药菌的传播。1995年5月20日，丹麦首先实行针对阿伏帕星的禁令，并向欧盟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报告这一决定。随后，挪威于1995年6月，德国于1996年1月先后采取禁用政策。欧盟委员会于1996年12月通过禁令。^⑨1997年4月1日，欧盟禁令正式生效，从而

① Nancy K. Eskridge, “Are Antibiotics Endangered Resources?”, *BioScience*, vol.28, no.4 (Apr.1978), pp.250-251.

② 参见 Nancy K. Eskridge, “Feed Additive Controversy: Congress Stops FDA from Restricting Use of Antibiotics”, *BioScience*, vol.28, no.9, Future of Biological N2 Fixation (Sep. 1978), pp.557-559; Cristine Russell, “Research Links Human Illness, Livestock Drug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 6, 1984, p.A12.

③ 参见 Nancy K. Eskridge, “Feed Additive Controversy: Congress Stops FDA from Restricting Use of Antibiotics”, pp.557-559.

④ Gardiner Harris, “U. S. Tightens Rules on Antibiotics Use for Livestock”,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4/12/us/antibiotics-for-livestock-will-require-prescription-fda-says.html?_r=1&emc=eta1, 访问时间：2018年4月12日。

⑤ Nancy Langston, *Toxic Bodies: Hormone Disruptors and the Legacy of D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3.

⑥ 由于具有潜在致癌性，阿伏帕星在美国没有获得销售许可。参见 L. Clifford McDonald, Matthew J. Kuehnert, Fred C. Tenover, and William R. Jarvis,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Outside the Health-Care Setting: Prevalence, Sources, and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vol.3, no.3 (July-September 1997), p.313.

⑦ Janice Bates, Zoe Jordens, J. B. Selkon, “Evidence for an Animal Origin of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The Lancet*, vol.342 (August 21, 1993), p.490.

⑧ Sharon Levy, “Reduced Antibiotic Use in Livestock: How Denmark Tackled Resistance”, p. A162.

⑨ [瑞典]拉斯埃里克·埃德基、[丹]克努兹·博尔热·佩德森：《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剂：与常识的对抗》，[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中心译，第193、194、195页。

在所有成员国停用阿伏帕星。

随后，欧盟国家逐步实行对其他种类抗菌剂生长促进剂的禁用或限用政策。1998年1月，丹麦全面禁止维吉霉素（virginiamycin）的抗菌剂生长促进剂用途；1998年2月，丹麦养牛业和养鸡业自愿停用所有的抗菌剂生长促进剂，养猪业也对育肥猪停用所有的抗菌剂生长促进剂。^①

1998年12月14日，欧盟农业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Agriculture Ministers）投票通过一项禁令，决定从次年7月1日起停止将维吉霉素、螺旋霉素、泰乐菌素磷酸盐和杆菌肽锌这四种常见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用于家禽和猪的饲料，^②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对此表示赞成。^③1999年7月，欧盟公布首份关于兽医治疗用抗菌剂耐药性风险评估报告，其中提出在兽医领域慎用抗菌剂的指导性意见。^④2000年1月，丹麦把抗菌剂的使用限制于治疗用途之内，只有家禽业仍然被允许使用的抗球虫剂（anticoccidials）除外。^⑤

2000年，欧洲药品局兽用药品委员会提出《通过兽药审批控制抗菌剂耐药性的风险管理战略计划》，从具体措施层面细化了抗菌剂监管方法。^⑥继而，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01年实施一项欧盟战略，旨在防止抗生素耐药性对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健康造成威胁。2003年，欧盟决定在2006年初以前停用所有的抗菌剂生长促进剂。^⑦

2006年1月1日起，欧洲食品安全局实行欧盟范围内的禁令，全面禁止将抗生素加入促进动物生长的饲料中。^⑧同年，欧洲药品局发布《兽用药品委员会2006—2010年抗菌剂战略计划和抗菌剂活性现状报告》。^⑨2006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专家前往立陶宛、匈牙利、荷兰和法国进行调研，以评估抗菌剂耐药情况。^⑩

2007年1月1日起，欧盟范围内所有的兽药只能作为处方药销售和使用。2007年1月，欧洲药品局兽用药品委员会颁布《修订后的抗菌产品特性概要指南》，将审慎使用原则列入抗菌产品使用注意事项中。^⑪2008年11月，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起组织首届“欧洲抗生素意识日”（the European

① J. J. Dibner and J. D. Richards, “Antibiotic Growth Promoters in Agriculture: History and Mode of Action”, *Poultry Science*, vol.84, 2005, p.635.

② EMEA/CVMP/342/99-Final,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ssociated with Therapeutic Use of Veterinary Medicines, 14 July 1999,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report/antibiotic-resistance-european-union-associated-therapeutic-use-veterinary-medicines-report_en.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7日；Frank M. Aarestrup, DVM, PhD; Vibeke F. Jensen, DVM, PhD; Hanne-Dorthe Emborg, DVM, PhD; Erik Jacobsen, MS; Henrik C. Wegener, PhD, “Changes in the Use of Antimicrobials and the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of Swine Farms in Denmark”, *AJVR*, vol.71, no.7 (July 2010), p.727; [瑞典]拉斯埃里克·埃德基、[丹]克努兹·博尔热·佩德森：《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剂：与常识的对抗》，[丹]波尔·哈勒莫斯主编：《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通则》，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中心译，第196页。

③ Charles Bremner in Brussels and Michael Hornsby, “Europe Puts Ban on Farm Antibiotics”, *The Times*, Dec 15, 1998.

④ 张苗苗等：《欧盟兽用抗菌药耐药性管理概述》，《中国兽药杂志》2013年第2期。

⑤ J. J. Dibner and J. D. Richards, “Antibiotic Growth Promoters in Agriculture: History and Mode of Action”, p.635.

⑥ EMEA/CVMP/818/99-Final, A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c Plan for Controll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hrough the Authorisation of Veterinary Medicines,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other/risk-management-strategic-plan-controlling-antimicrobial-resistance-through-authorisation-veterinary_en.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7日。

⑦ Frank M. Aarestrup, DVM, PhD; Vibeke F. Jensen, DVM, PhD; Hanne-Dorthe Emborg, DVM, PhD; Erik Jacobsen, MS; Henrik C. Wegener, PhD, “Changes in the Use of Antimicrobials and the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of Swine Farms in Denmark”, p.727.

⑧ Mike Wade, “Farm Antibiotic Link to Disease Risk in Humans Is Condemned as Naive”, *The Times*, Jan 5, 2012, p.3.

⑨ EMEA/CVMP/353297/2005, CVMP Strategy on Antimicrobials 2006-2010 and Status Report on Activities on Antimicrobials,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report/committee-medicinal-products-veterinary-use-strategy-antimicrobials-2006-2010-status-report_en.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7日。

⑩ “Timeline: ECDC 15 Years”, <https://www.ecdc.europa.eu/en/about-us/what-we-do/timeline-ecdc-15-years>,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日。

⑪ EMEA/CVMP/SAGAM/383441/2005-CONSULTATION, Revised Guideline on the SPC for Antimicrobial Products, https://www.ema.europa.eu/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draft-revised-guideline-spc-antimicrobial-products_en.pdf, 访问时间：2021年12月7日。

Antibiotic Awareness Day, EAAD) 活动。^① 该活动于每年 11 月 18 日举行，旨在增进对于抗生素耐药性公共卫生风险的认知与提高审慎使用抗生素重要性的公众意识。^② 2011 年 7 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11 年欧盟关于来自人类、动物和食品的人畜共患病细菌和指示菌的抗菌剂耐药性的总结报告》(The European Union Summary Report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Zoonotic and Indicator Bacteria from Humans, Animals and Food in 2011)，^③ 表明欧盟开始重视人畜共患病细菌的抗菌剂耐药性问题。

2020 年 5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农场到餐叉战略”(Farm to Fork Strategy)，^④ “设定到 2030 年将养殖动物和水产养殖中的抗菌剂使用量降低 50% 的目标”。^⑤ 欧洲议会于 2021 年 10 月通过该战略，使之上升为正式法律。^⑥ 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举行，最终“决议以 452 票赞成、 170 票反对、 76 票弃权获得通过”。^⑦ 这预示着欧盟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严格的标准，进一步限制成员国畜牧业的抗生素总体用量。

同时期的美国则以相对和缓的节奏推进抗生素饲用监管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兽医药中心制定审慎使用抗生素原则，并在对畜牧业的宣传和指导下贯彻该原则，^⑧ 进而在 21 世纪初正式提出审慎使用抗生素的要求。^⑨ 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重视部门间合作的重要性，于 1996 年设立全国抗菌剂耐药性监控系统 (Nation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Monitoring System, NARMS)。^⑩ 1999 年，美国抗菌剂耐药性部门间工作组 (the U.S.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成立，于 2001 年公布了《减轻抗菌剂耐药性的公共卫生行动计划》(Public Health Action Plan to Comba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⑪ 作为美国抗生素饲用的主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实现高效的风险评估与管理为重要目标，并于 2003 年 10 月在该局第 152 号《行业指南》中以书面形式提出风险评估程序。^⑫

不过，美国的抗生素饲用监管之路仍然前途未卜。1999 年和 2005 年，环保和健康团体曾两度请

① “Timeline: ECDC 15 Years”, <https://www.ecdc.europa.eu/en/about-us/what-we-do/timeline-ecdc-15-years>,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② “About”, <https://antibiotic.ecdc.europa.eu/en/about>,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③ “Timeline: ECDC 15 Years”, <https://www.ecdc.europa.eu/en/about-us/what-we-do/timeline-ecdc-15-years>,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④ https://www.ecd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en,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⑤ DANMAP Steering Committee, “Editorial”, in Helle Korsgaard, Johanne Ellis-Iversen, Ute Wolff Sønksen, Sissel Skovgaard, et al., eds., *DANMAP 2019 -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Occurre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Bacteria from Food Animals, Food and Humans in Denmark*, October 2020, ISSN 1600-2032, p.7.

⑥ “EC to Propose Farm-To-Fork Strategy as Formal Legislation”, *Oils and Fats International*, 29th November, 2021, <https://www.ofimagazine.com/news/ec-to-propose-farm-to-fork-strategy-as-formal-legislation>,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⑦ “New EU Farm to Fork Strategy to Make Our Food Healthier and More Sustainabl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11014IPR14914/new-eu-farm-to-fork-strategy-to-make-our-food-healthier-and-more-sustainable>,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Sitting of 18-10-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plenary/en/vod.html?mode=chapter&vodLangue=EN&vodId=33aa1884-3e56-d6e8-eb58-184507c67f2c&date=20211018#>, 访问时间：2021 年 12 月 2 日。

⑧ FDA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FDA Veterinarian*, vol.13, no.4, July/August 1998, p.1.

⑨ FDA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The Judicious Use of Antimicrobials for Beef Producers*, Rockville, MD: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gust 2002, p.1.

⑩ FDA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An Approach for Establishing Threshold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in Food-Producing Animals: A Discussion Document*, Rockville, MD: FDA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December 19, 2000, p.7.

⑪ 参见“Statement of Bernadette Dunham, Director,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2010-H161-2 Testimony no.1*, September 25, 2008, Washington: U.S. GPO, 2009, pp.18-19.

⑫ Division of Human Food Safety, Office of New Animal Drug Evaluation,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Guidance for Industry: Evaluating the Safety of Antimicrobial New Animal Drugs with Regard to Their Microbiological Effects on Bacteria of Human Health Concern*, Rockville, MD: FDA Center for Veterinary Medicine, 2003, p.3.

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跟进其 1977 年的提议并将禁令扩展至其他种类的抗生素，^①却无济于事。针对抗生素监管和耐药菌蔓延的情况，美国曾有国会议员试图通过立法解决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来自上纽约州选区的众议员路易斯·斯劳特 (Louise Slaughter, 1929—2018) 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选区的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 (Dianne Feinstein) 曾分别提交《医用抗生素保护法案》(Preservation of Antibiotics for Medical Treatment Act, H. R. 1150) 和《预防抗生素耐药性法案》(Preven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Act, S. 1256) 议案，^②但均未进入国会审议阶段。

近年来，欧盟和美国的抗生素饲用监管活动同国际组织发起的遏制耐药菌活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并积极参与推动国际和国家层面遏制耐药菌行动计划。对于抗生素监管全球意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遏制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的逐步展开相互呼应。^③为响应 2016 年联合国大会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政治宣言，联合国抗生素耐药性机构间协调小组 (the UN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Group on antibiotic resistance) 应运而生，该小组于 2019 年 4 月发布报告，提出一系列减轻抗生素耐药性的建议。^④2015 年 10 月 22 日，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抗菌剂耐药性和使用监测系统 (Glob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Use Surveillance System, GLASS)，系统自 2017 年 1 月以来已公布多份监测文件。^⑤从 2015 年起，瑞典公共卫生局 (the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 作为世卫组织遏制抗生素耐药性的一个合作中心参与该系统的监测工作。^⑥欧洲还即将启动动物病原体抗生素耐药性监测网络。^⑦

从近期可获得的监测数据来看，欧洲和全球层面的兽用抗生素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欧洲药品局对兽用抗菌药物消费量的监测报告指出，在提供了所有相关年份监测数据的 25 个欧洲国家，2011—2020 年间的兽用抗生素总体销量呈下降趋势。2020 年，这 25 个国家的兽用抗菌剂总销量比 2011 年降低 43.2%。^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the 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则报告了全球层面兽用抗菌剂销量的下降趋势。^⑨此外，欧盟食用动物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也有一定的好转。欧洲食品安全局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虽然反映出欧盟食用动物中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依然存在，但某些特定种类的抗生素耐药性已呈现减轻迹象。研究进行期间，欧盟多国与英国的食用动物和食品中“能产生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和头孢菌素酶的大肠杆菌的流行”出现了“统计上的显著下降趋势”。^⑩相关

^① NRDC, “Superbug Suit: Groups Sue FDA over Risky Use of Human Antibiotics in Animal Feed [press release]”, Washington, DC: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25 May 2011, <https://www.nrdc.org/media/2011/110525>, 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16 日。

^② Louise & Bob Slaughter Fund, “Louise Slaughter”, <https://www.louiseandbob.org/about>, 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S.1256—Prevent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Act, 113th Congress (2013-2014), <https://www.congress.gov/113/bills/s1256/BILLS-113s1256is.pdf>, 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20 日。

^③ Johan Carlson, Ann Lindberg, “Preface”, in Olov Aspevall and Vendela Wiener, Oskar Nilsson and Märít Pringle eds., *Swedres-Svart 2019: Sales of Antibiotics and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Sweden*, Solna/Uppsala: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 and National Veterinary, 2019, p.3.

^④ Johan Carlson, Jens Mattsson, “Preface”, in Olov Aspevall and Ulrica Dohnhammar, Oskar Nilsson and Märít Pringle eds., *Swedres-Svart 2018: Consumption of Antibiotics and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Sweden*, Solna/Uppsala: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 and National Veterinary Institute, 2018, p.3.

^⑤ “Glob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Use Surveillance System (GLASS)”, <https://www.who.int/initiatives/glass>, 访问时间：2022 年 5 月 29 日。

^⑥ Johan Carlson, Ann Lindberg, “Preface”, in Olov Aspevall and Vendela Wiener, Oskar Nilsson and Märít Pringle eds., *Swedres-Svart 2019: Sales of Antibiotics and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Sweden*, p.3.

^⑦ Johan Carlson, Ann Lindberg, “Preface”, in *Swedres-Svart 2020: Sales of Antibiotics and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Sweden*, Solna/Uppsala: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 and National Veterinary Institute, 2020, p.3.

^⑧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Sales of Veterinary Antimicrobial Agents in 31 European Countries in 2019 and 2020: Trends from 2010 to 2020, Eleventh ESVAC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pp.46-47.

^⑨ Johan Carlson, Ann Lindberg, “Preface”, in *Swedres-Svart 2020: Sales of Antibiotics and Occurrence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Sweden*, Solna/Uppsala: 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 and National Veterinary Institute, 2020, p.3.

^⑩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European Union Summary Report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Zoonotic and Indicator Bacteria from Humans, Animals and Food in 2019-2020”, *EFSA Journal*, vol.20, 2022, p.3.

监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欧盟实行的抗生素饲用监管法规和政策初见成效。

四、结语

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历程如一面斑驳的透镜，反映了人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实行抗生素饲用监管的多种尝试，并映射出对于现实问题的某种启示。如前所述，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欧美抗生素饲用监管主要经历了监督调查、立法规制和协同治理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三个阶段的相关政策不仅前后相继、各有侧重，且层层深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以英国、美国、瑞典、丹麦等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美部分国家在不同阶段分别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监管先例。尽管欧美国家抗生素饲用监管历程的起步有先后之别，在各阶段发挥示范效应的国家也有所更替，但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发展方向却趋于相似，多以减少乃至杜绝抗生素饲用为目标，并以遏制耐药菌传播和保护抗生素有效性为宗旨。

欧美抗生素监管的力度虽不断加强，但世界仍面临遏制耐药菌的艰巨任务。人类与细菌长久以来同属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相对而言，人工合成抗生素则是20世纪的新事物。人类虽可利用抗生素在短期内有效抑制病原菌，但后者为了生存却会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变化。抗生素饲用相当于给细菌制造了一个充满抗生素的环境，促使其产生更广泛的耐药性。一旦形成多重耐药菌大范围传播的局面，将对人类的健康和存续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进一步加强抗生素饲用监管的时期。分阶段地认识欧美国家抗生素饲用监管历程，可为我们提供更加具体的历史参照。若能从相关历史的演进中借鉴经验、规避风险，将有助于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抗生素饲用监管体系。

责任编辑：郭秀文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

——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戴伟华

[摘要]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关键词]文人词产生 唱和 《渔歌》 《忆江南》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143-09

词以及文人词如何形成,大致有两种思考径路,一是就文学语言自身来探讨,这一方式有如讨论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起源一样,在汉语成句的结构形式中去寻找句式字数的相似性;二是从文学发生学角度去探讨,而词作为音乐之辞,可以在音乐关系中探讨其乐与语结合的形式。如从词和音乐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早期文人词的唱和,已完成独立于音乐而存在的固定词式,后世谓之“词谱”。早期文人词唱和,张志和等人《渔歌》唱和、白居易与刘禹锡《忆江南》唱和,应是文献可稽的最早唱和,前者在中日唱和比较中得到确定,后者有明确的文字记录。而《渔歌》《忆江南》唱和经过辨析,或可成为解决文人词产生的经典案例,甚至说可以成为文人词独立于音乐而存在的确证。《渔歌》《忆江南》事实上存在着互证的关系,都是讨论同一问题,即文人词的产生。《渔歌》唱和已有专文论述,^①但大要处于此尚须补充和强调。

一、《忆江南》唱和与《渔歌》唱和题义互证

早期的文人以词唱和,隐含一个事实:文人词已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并形成后世的所谓“词谱”。因为,音乐的旋律不能制约或者说不能精确制约词的句式、词句字数、词段长短,文人在以文字唱和时才能保证同一曲调下严格不易的固定形式。在没有考证出所谓张志和五首《渔歌》实为五人的唱和词之前,白居易与刘禹锡《忆江南》唱和被视为文人词的第一次唱和,不过现在可以被认定为第二次唱和。这样的唱和在探讨文人词发生期格式形成并固定下来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

作者简介 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语言服务研究中心教授(广东 广州, 510006)。

① 戴伟华:《中日文献互证的理路和方法——张志和与白居易〈渔歌〉一首考》,《学术研究》2022年第2期。

《渔歌》形式要点，每首末句第五字用同一字“不”。联系到大历《状江南》唱和，诗题原有“每句须一物形状”，结合日本《渔歌》初词题目“每歌用‘带’字”，这一限定性唱和形式要求，虽被日人误解为一人之作，但为张志和等人唱和原有“每歌用‘不’字”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材料。考察日人《渔歌》作品，可知是严格模仿传入的张志和等人《渔歌》形式的。因此，可以据日人仿作还原张志和等人唱和的原题。太上天皇（在祚）《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带字），五首末句分别为：“求鱼不得带风吹”“桃花春水带浪游”“往来无定带落潮”“浩荡飘飄带沧波”“食罢酣歌带月行”；公主《杂言奉和渔家二首》（每歌用“送”字），二首末句分别为：“不欲荣华送吾真”“潭里闲歌送太平”；滋贞主五首末句分别为：“掣音远去入江还”“芳菲雾后入花洲”“山嵒吹送入单衿”“孤竿钓影入春溪”“不罢长歌入晓声”，循例《渔歌》可补“每歌用‘不’字”的规定性文字。

张志和等五首与嵯峨天皇五首对照见表1。嵯峨天皇除“心自放，常狎鸥”外，对仗皆可。据嵯峨天皇题，张志和等人唱和原题应为《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不字）或《渔歌五首》（每歌用不字）。这样能清楚看到当时传入日本《渔歌》五首的真实面貌。据此，不难完成《渔歌》的“词谱”。《渔歌》每首五句，每歌末句第五字用同一个字，三、四两句为3字句，且对仗。可否这样理解：有了《渔歌》唱和形态的还原，有了以文字词唱和的规定，对早期文人在一词调下以“词谱”创作，即“以词和词”就会有清楚的认识。通过两个具体唱和案例分析，可知唱和在词的生成中起到关键作用。试想，如果缺少日本严格模仿的格式记录，也无以重新还原张志和五人唱和面貌；因为有了张志和五人唱和的还原，才进一步推论出自白居易和刘禹锡唱和的文字谱性质。

表1 《渔歌》张志和等五首与嵯峨天皇五首对照

作者	张志和等	嵯峨天皇
词题	《渔歌》	《杂言渔歌五首》（每歌用带字）
格式：每歌尾句第5字同	斜风细雨不须归 长江白浪不曾忧 反着荷衣不叹穷 醉泊渔船不觉寒 乐在风波不用仙	求鱼不得带风吹 桃花春水带浪游 往来无定带落潮 浩荡飘飄带沧波 食罢酣歌带月行
格式：3、4两句为3字句，且对仗	青箬笠，绿蓑衣 能纵棹，惯乘流 江上雪，浦边风 枫叶落，荻花干 钓车子，掘头船	乘春兴，无厌时 心自放，常狎鸥 烟波客，钓舟遥 闲酌醉，独棹歌 鲈鱼脍，莼菜羹

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原注：“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①注有两层意思：一曲调名《谢秋娘》，这是音乐范畴；二文字式为“每首五句”，这是文学范畴。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原注明确了曲、词之分。作为文字词，曲调只是文人词写作的音乐来源，与文学创作已无关系，“每首五句”才是文人词创作的格式。而刘禹锡《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正是白词注的原版加注，“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忆江南曲拍”乃“曲”之事也；“为句”乃“每首五句”，乃词之事也。“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含义已在对应着“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如果按照以乐定辞是无法完成词的写作的。通常语境下，刘禹锡和白居易《忆江南》词，题名应是《和乐天忆江南》，超出常题以外的文字，都是对原作者的交代说明，即和者有与原作稍异或不同之处，否则原作者不能理解和者的写作意图。至少可以说，文人唱和即便应曲而作，也已经是按文字格式进行，音乐不会制约词的结构，而只要与文字格式相差一字也不能视之为和词。后人不明格式，或失去了唱和的规定，会有与初词的违格存在，如不遵循《渔歌》尾句的规定用字。

如果综合《渔歌》和《忆江南》文本信息，不难完成二词的“词谱”。《渔歌》每首五句，每歌末句用“某”字；《忆江南》每首五句，3、4两句为对仗律句。题目求简明，在新文学样式出现之初，任何

①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98页。

说明都具有认识文体样式的价值；在文人唱和中，任何文字说明都是对写作格式的规定。《渔歌》《忆江南》具有说明性性质的题目，恰恰证明作为早期文人词唱和的说明只是针对文字，这也表明唱和与音乐无关。而《渔歌》《忆江南》中“每歌用不字”“每首五句”等是对唱和文字格式的要求和限定。可以确定的是，《渔歌》《忆江南》初词是在唱和中产生的，其格式也是在唱和中确定的。

二、白居易首唱“山寺月中寻桂子”不在“春词”中

白居易开成二年（837）在东都，作《忆江南》以回忆江南生活，刘禹锡时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和词二首。此前刘禹锡大和五年（831）为苏州刺史，和白居易有一样的为官江南的经历，白居易在《忆江南》中写到苏州吴娃，而刘禹锡在《忆江南》名下唱和，却无江南描写。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人还有《春深》组诗唱和，刘禹锡亦无江南描写。^①

传世白、刘《忆江南》唱和中，有一疑问未解。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而刘禹锡和词是二首，对应白居易首唱，刘和词似缺少一首，遂推断可能是遗逸一首。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如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②刘禹锡《忆江南》二首如下：“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笑亦含嚬。”^③白居易《忆江南》三首中，写春天的只有二首，其中“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不是春词，是秋词，三秋桂子、八月观潮都是秋景。刘禹锡二首被《全唐诗》收录时，题名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中唐词作甚少有题目的，这一题名当为注释，作特别的说明。因此题名中的“春词”二字，说明有写作针对性。依《全唐诗》载录，白居易《忆江南》三首，“春词”有两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和“江南忆，其次忆吴宫”。“春词”和“秋词”在刘禹锡诗中区分清晰，“春词”写春天，如《和乐天春词》诗云：“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④此一作张籍诗，题为《春词》。刘禹锡有《秋词》二首，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⑤两首“秋词”均写秋景秋情。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依刘、白二集编次，诗开成三年夏在洛阳作。忆江南：曲名。……《乐府诗集》卷八二作《忆江南二首》，此为其二。白居易原诗为三首，疑刘诗或有遗逸。”^⑥如果结合刘禹锡诗题中“春词”二字，不难发现，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应为两首，而白词“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刘禹锡和诗范围之内。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而“春词”两首，“秋词”一首，刘仅和“春词”二首，未有遗逸。

三、刘所和白“春词”版本及题名之异

刘禹锡《忆江南》主要有三种版本，四部丛刊影宋《刘梦得文集》之《外集》卷四，题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止录“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⑦《外集》为宋敏求编辑，是最早著录。其后，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后，是刘禹锡“同前二首”，^⑧即刘禹锡《忆江南》二首，相较本集，少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诗题。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应当

① 戴伟华：《白居易、刘禹锡“春深”唱和诗中的江南与长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第2598-2599页。

③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55页。

④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2页。

⑤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六，第349页。

⑥ [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187-1188页。

⑦ [唐]刘禹锡：《刘梦得文集》之《外集》卷四，四部丛刊影宋本。

⑧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二，第1155页。

看到过刘禹锡集，至少看到过原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题的“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后又搜集到刘禹锡另一首《忆江南》“春过也，共惜艳阳年”。按照《乐府诗集》编辑体例，一般将同人同调作品放置在一起，与前面白居易《忆江南》题名一致。遗憾的是，郭茂倩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变成《忆江南》时，并未将删削的“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在题解中保存。郭茂倩将二词并置是体例一致的要求，显示出严谨的编辑作风，但作为《乐府诗集》专题作品的汇集，没有在题解中加以说明“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与音乐关联的“曲拍”等内容，实在是一大失误。《全唐诗》当据《乐府诗集》，将二词并置一处，统合于《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题下。

从版本流传过程看，据宋本《外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当为一首，即“春去也，多谢洛城人”。而据《乐府诗集》，刘禹锡创作《忆江南》共二首，但未以“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为题，说明编者所见刘禹锡两首《忆江南》，并非同时之作，合录一起，故题以《忆江南》，而略去宋本“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编纂者这样做，是想保留刘词传本异题的真实面貌。但从刘白唱和的内容看，刘禹锡两首《忆江南》亦如白居易三首《忆江南》，有自己的连贯性，并非异时异地之作，是不可拆分的。现存白居易三首《忆江南》是前后相连的一组作品，第一首“能不忆江南”，引出下面两首“最忆是杭州”和“其次忆吴宫”，即后两首“最忆”“其次忆”是第一首“忆江南”内容的分写。这三首词是一个整体。因此，刘禹锡所见白居易《忆江南》确为三首，故在题目中标明“春词”二字，将“秋词”一首剔除在外。就刘所和二首“春词”而言，《外集》题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一首，在内容上与白居易“春词”远，而与《乐府诗集》补收“春过也，共惜艳阳年”一首近。因为，刘词“无辞竹叶醉樽前”正呼应白词“吴酒一杯春竹叶”，只不过呼应白居易“忆江南”的“春词”内容，却把“忆江南”主题换为“共惜艳阳年”了。

刘禹锡和词两首也是自成体系，具有连贯性。“春过也，共惜艳阳年”一首谓不必总是眷恋着江南春天，“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谓且珍惜春天刚过的洛阳景象，显示出两首词的情感联系。那么，如何解释《外集》《乐府诗集》以及《全唐诗》的载录与题名之异呢？若从古人书写角度分析，会有答案。刘禹锡“春过也”“春去也”当先后相次书写，书写后发现和词与原唱有不符之处，故再作说明。主要有两点，一是原唱有三首，仅和了两首春词；二是原唱内容应为“忆江南”，而自己和调名所示内容不同，写了洛阳。这样，书写时在两首词后再补充注释“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就解决了问题。而宋敏求所收一首，因注释与“春去也”一词相连，遂移作题名。《乐府诗集》所得为另纸，“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①具体流传著录情形未必如此，而过程当大致如是。

宋本《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题名保留意义重要，“春词”区别了“秋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区别了白词“忆江南”调名、内容一致的写法。另外，宋本题名对理解曲、词关系意义重大。郭茂倩题名省略，并不意味着对“依曲拍为句”刻意忽视，而是疏忽所致。刘禹锡本可以《和乐天忆江南》为题，何以添加“春词”“曲拍”等字？一般情况下，题目以简为要，不得已时必添加注释，后人误注释为题目内容者甚多。因此，有必要去探求刘禹锡题目中的本义。“春词”“曲拍”数字可视为写作《忆江南》的补充说明，题目中的“春词”不仅和“秋词”作了区分，而且在内容上以“春词”暗换了“忆江南”，故刘词可不写江南，只写与春天相关的情景即可；在形式上依《忆江南》曲拍，与内容可以疏离，即格式为《忆江南》句式，内容未必写“忆江南”。从使用“曲拍”一词指形式，说明时人尚未找到一个词的内容与文字形式属于共生状态而又专指形式的专名。不过“曲拍”一词指形式特点差强人意，曲拍在初词创作中指以节奏为主的曲子节拍，而文字依调自由填写字数，一旦字数、句段确定下来，再和其词者，在名义上是依曲填词，而在实际创作中是依初词定好的字数、句段来写，可以理解为依文字格式安排字句，字数、句段是不能有一丝不同的。试想，如果刘、白二人同时听曲，各自完成配曲的“词”，

^① 王国维：《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观堂集林》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23页。

结果在文字、句段上不会一致，因曲子只能引导作者去写内容，而不能限制字数、句段的安排。只有刘禹锡看到白居易《忆江南》文字形式时，以相同的字数、段落去和，才能完全一致。这时，首次为曲配词的作品已具有了后世“词谱”的功能。因此，所谓“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者，不能理解为依音乐曲调的节奏填词，而应理解为依《忆江南》文字节拍填词，即依词填词，而“曲拍”的意义在于说明初词是由乐产生的词，这样就和以词就乐的声诗区别开了。

四、调名与音乐及“词谱”

《乐府诗集》云：“《忆江南》三首，白居易。一曰《望江南》。《乐府杂录》曰：‘《望江南》本名《谢秋娘》，李德裕镇浙西，为妾谢秋娘所制。后改为《望江南》。’”^①《乐府诗集》引《乐府杂录》的解释是正确的，一些民间曲调的创制，初无调名，而以演唱者命名，以别于其他曲调名，通常以演唱者名字命名的曲调名为曲子初名。后因演唱时有了文词，而文词一般为演唱服务对象制作，或由演唱者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要求临时编成的内容，而重新命名。故以演唱者命名的《谢秋娘》修改为以演唱服务对象内容命名的《望江南》，白居易也会以内容来修改曲调的名称，以符合词在兴起阶段曲调名和内容基本一致的要求，“忆江南”的内容不能以《望江南》命名，而要以《忆江南》命名。从无词的《谢秋娘》到有词的《望江南》，已暗含了文字固定的“词谱”，即固定的文字谱出现了，这一有序的传承和使用应在一个系统中完成，也就是说，有了文字的固定格式后，在这一稳定的传习系统中必须以相同的文字格式来唱和。尽管《望江南》词的文字已失传，但从刘禹锡和白居易《忆江南》文字严格对应中可知，他们的唱和已与文字格式完全对应，而不是最初依音乐曲调填词了。

王灼《碧鸡漫志》卷五：“《望江南》……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吕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两段，盖近世曲子无单遍者。然卫公为谢秋娘作此曲，已出两名。乐天又名以《忆江南》，又名以《谢秋娘》。近世又取乐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尝叹世间有改易错乱误人者，是也。”^②王灼的表述没有《乐府杂录》精确，“乐天又名以《忆江南》，又名以《谢秋娘》”，似乎在说，白居易的《忆江南》又可以称为《谢秋娘》。王灼担心“世间有改易错乱误人者”，他自己因命名叙述顺序的改变，已易使人产生误解。但王灼语是有意义的。其一，据段安节《乐府杂录》，始曲名《谢秋娘》的曲调，其基本旋律一直未有改变，且皆属南吕宫，只是从唐代的单遍衍为两遍。其二，近世取乐天首句以名《江南好》，符合调名改变以应内容的要求，如作者本在江南而描写江南，即不可称自己是“忆江南”，而说“江南好”便契合曲调名和内容的一致，这和音乐形态无关。其三，存世的《忆江南》或《江南好》，文字格式相同，说明近世变唐代的单遍为两段，曲子对文字词没有影响。因为有重要的记录，《谢秋娘》《望江南》《忆江南》《江南好》成了理解曲子词之词、乐关系的范例。

依曲拍为句，非按音乐节奏填词，而是按照白居易词的文字句式和词。^③唐声诗中大量齐言诗是用不同曲调演唱的，换句话说，齐言的诗可以适应不同曲调的演唱，因此，音乐的曲子对歌辞的要求非常宽松，可以说，音乐对歌辞没有制约力。所谓依调填词，无法造成歌辞的相同和一致，只有依词填词，才有曲子词的固定文词格式形成。因以曲子词的辞式相和，才形成了以后固定文词格式的所谓词谱，词谱的产生昭示着词乐的分离，即配乐只是意味着联系，并没有以乐定词的形式要求。如此看来，白居易和刘禹锡《忆江南》一类的依词和词，在词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当和词的文字格式与原唱完全一致时，实际的词谱已经形成。所以，词调失传后，仍然可以“词牌”为制约写作出相同文词格式的词。其实，如《渔歌》张志和、颜真卿等文字同式相和，已经说明在词的发展史上，词的演唱和文学创作应该分而论之，首唱的意义在于文词与音乐发生联系，依词和词的意义则在于和音乐脱离而促成了词谱的完成。刘禹锡“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自注，一方面说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说

①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二，第1155页。

② [宋]王灼：《碧鸡漫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③ 戴伟华、张之为：《唐宋词曲关系新探——曲调、曲辞、词谱阶段性区分的意义》，《音乐研究》2013年第2期。

明词的写作如何脱离音乐而独立为一种文学体裁。它是由白居易根据某一曲调创作长短句，也可以是白居易据某人已写作的格式和其文字词创作长短句，刘禹锡再依文字词式唱和，形成不能改易的《忆江南》词式。如果出现《渔歌》有异于张、颜体，《忆江南》有异于白、刘体的另一系统，即其他人依《渔歌》《忆江南》音乐调式写成齐言体，都是可能而且合理的，所谓“蹋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①一旦确立了曲子词的文词格式，依词和词，就一定不能更改格式，符合“调同词亦同”的写作要求。

北宋人对此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在追和《渔父词》的过程中，戏用《鹧鸪天》曲调去创作文字词《浣溪沙·渔父》，结果发现《鹧鸪天》作为音乐的曲调较长，而《浣溪沙·渔父》字数又较少，难以配合，遂造成“语少声多”的矛盾。《乐府雅词》卷中徐师川《浣溪沙》《鹧鸪天》词跋云：“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乃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箎言：‘《渔父词》以《鹧鸪天》歌之，甚协律，恨语少声多耳。’因以宪宗画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足前后数句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元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②黄庭坚只能在张志和词作基础上添加内容。这一则记载对了解词、乐配合很有启发。第一，不同调式之间是可以互换演唱的。这种互换表演有实际意义，一首词和一首诗可以用不同曲调演唱，以丰富演唱技巧，吸引听众，愉悦心情。第二，曲调与文字之间的配合要大致相合，相合意味着曲调长短与歌辞字数大致相近，如用《鹧鸪天》曲调唱《浣溪沙·渔父》则“语少声多”。第三，“协律”与“语声”不同。“协律”是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宋人提出文人之词与器乐演奏曲调配合的“协律”问题，李清照词论中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③于此，大致可知李清照“协律”的具体内容，但黄庭坚所说“协律”未必如李清照所言，两者还是有粗言与细言的差异的。粗言的“协律”只是要求词的语言、语句、语段的分布安排，即如唐人用各种曲调演唱五绝、七言一样，相互配合即可。因此，将《渔父》词安排进《鹧鸪天》曲调是可以演唱的，谓之“甚协律”，但《鹧鸪天》调长而《浣溪沙·渔父》词少，势必要把《浣溪沙·渔父》词略作疏散才能安排进《鹧鸪天》调中，具体说，二词中“自庇一身青箬笠”与“青箬笠，绿蓑衣”相差一字，在词乐安排上基本一致，而“青箬笠，绿蓑衣”中间以标点分开，只是文字上的要求，与曲段并无多少关系。这样，以九个字段的《鹧鸪天》唱六个字段的《浣溪沙·渔父》时，必须把六字段的《浣溪沙·渔父》延长至九个字段，去适应《鹧鸪天》的乐调长度。这在演唱中比较容易实现，至于以哪一段旋律为一乐段，歌唱者可能有不同的处理，乐、词配合是不难的，这样可以做到“协律”或“甚协律”。然而，无论从歌唱者还是从听歌者角度看，毕竟被人听熟了的《鹧鸪天》曲、词结构改变了，一般人都可以发现“语少声多”。

实际上，在乐、词配合的初始阶段，乐、词并不固定。如果没有共同的唱和背景，乐、词的配合是自由的；只有产生了固定的文词格式，通常是唱和，如张志和等人的《渔歌》唱和、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唱和，所谓词谱就产生了。这种“词谱”在以后创作中被遵循，如果文辞句段、字数与此相异者则非《渔歌》《忆江南》词式。无论是“旗亭赌唱”，^④还是周德华善唱《杨柳词》，^⑤以及刘禹锡《杨柳枝》《竹枝词》《浪淘沙》，调虽不同而唱词或作词却是五、七言的齐言诗，这都证明音乐曲调与唱

①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七《纥那曲词二首》，第364页。

② [宋]曾慥辑：《乐府雅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③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李易安评》，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2页。

④ 事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王之涣》，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48页。

⑤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6页。

词的松散关系。严格说，这一类唱词只是音乐的“诗”，而张志和《渔歌》唱和、刘禹锡“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唱和才使词和诗有了差异，从而形成文字写作要求的“词谱”。黄文吉《唱和与词体的兴衰》一文对唱和与词体的关系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①另外，诗与词在作者看来还是有不同的。如刘禹锡《纥那曲词二首》后附注：“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伏缘播在乐章，今附于卷末。”^②因为是“播在乐章”，故“先不入集”而“附于卷末”，这应不是作者在区分雅俗，也不是区分入乐与否，而是在区分文体。因此，刘禹锡两首《忆江南》并未入正集，其中“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由宋敏求收入《外集》，题为“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而“春过也，共惜艳阳年”一首则为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始和“春去也，多谢洛城人”一首并置一处，题为《忆江南》。

五、王国维评论《忆江南》的是与非

《忆江南》历来颇受重视，王国维曾论及《忆江南》云：“上虞罗氏藏唐写本《春秋后语》，有背记凡八条……末有词三阙：前二阙不著调名，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后一阙则《菩萨蛮》也。案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伎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考德裕镇浙西在长庆四年，至太和三年入朝，凡六年。嗣是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皇甫松并为此词，白词名《忆江南》，见《长庆后集》卷三，乃太和八九年问所作。刘词有‘多谢洛城人’语，必居洛阳时作，殆与白词同时作。温、皇甫二词，则又在其后。……考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有《望江南》《菩萨蛮》二调……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赞皇首填此词，刘、白诸公相继而作；《菩萨蛮》则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绹曾令温庭筠撰，密进之。故《乐府杂录》与《杜阳杂编》遂以此二词之创作，傅之德裕与宣宗。语虽失实，然其风行实始于此。此背记书于咸通间，距太和末廿余年，距大中不过数年，已有此二调。虽别字声病满纸皆是，可见沙州一隅，自大中内属后，又颇接中原最新之文化也。”^③

这一段话有如下意义。其一，敦煌卷有《忆江南》，可见此词流传很广。其二，敦煌所录抄原无词调名，但据文字格式可断为《忆江南》，即“观其句法，知为《望江南》”。换言之，可据文字推断词调名，说明此调已有固定不易之文词格式，不需要借助音乐调式来识别。进一步说，此词调已是依词填词，而非初词在配合音乐曲子而作的所谓“依调填词”。其三，《教坊记》载《望江南》是曲调，而非词式，“据此则《望江南》《菩萨蛮》二词，开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赞皇首填此词，刘、白诸公相继而作”一句，有表述错误。开元教坊“有《望江南》《菩萨蛮》二调”，而非“二词”，词是在李德裕镇浙西时为亡伎谢秋娘所撰，段安节讲得很清楚，谢秋娘歌此调，故名《谢秋娘》，此调也，非词也。后撰词始有内容，据内容而改词调名为《望江南》。“因赞皇首填此词”与“为亡伎谢秋娘所撰”，不能混为一谈。如从《乐府杂录》，则为谢秋娘撰词。《谢秋娘》，曲也；《望江南》，曲子词也。

六、刘禹锡和词与白居易首唱内容情感诸方面的偏离

和题《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有两层意思，一是“和乐天春词”，一是“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或许有人认为题中“春词”有可能指白居易《春词》。^④白居易《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斜倚栏干臂鹦鹉，思量何事不回头？”^⑤除了前引刘禹锡《和乐天春词》和作外，元稹亦有《春词》：“山翠湖光似欲流，蛙声鸟思却堪愁。西施颜色今何在？但看春风百草头”。^⑥从押韵看，元稹《春词》也应是和作。关于题中“春词”有可能指白居易《春词》这一说法不能轻易排除，但明显有不合理处。

^① 黄文吉：《唱和与词体的兴衰》，《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集刊》第1期，1996年，第37-54页。

^②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七，第364页。

^③ 王国维：《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观堂集林》卷二一，第1023-1025页。

^④ 赵惠俊：《闻歌而和：唐宋词体唱和的文本形态与唱和形态的扩容》，《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⑤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五，第2017页。

^⑥ [唐]元稹：《元稹集（修订本）》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7页。

第一，白、刘唱和应是在同一种诗体下进行，而以诗唱和词则不常见，白、刘《忆江南》唱和也已为文学史共识。第二，如果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失传，尚可推测刘禹锡《忆江南》二首是以词和诗的产物，但白词三首俱存，明示刘禹锡分别与白居易以诗、词两种形式进行唱和。以词和诗在中唐尚无其例可证。目前能做的是就现有文献载录进行讨论，白、刘二人《忆江南》唱和，这是本文讨论的前提。

刘禹锡和白居易《忆江南》，是“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的，刘禹锡《忆江南》只是在形式上和白居易词，而偏离了白居易词调、词情、词义合一的创作方法。第一，刘禹锡《忆江南》词调内容与应写内容偏离。忆江南应写记忆中的江南风物、城市景观。白居易《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诗中，多叙苏杭胜事，予尝典二郡，因继和之》，诗云：“江南名郡数苏杭，题写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①诗题和诗应是对“忆江南”的形象定义。其一，写江南，如苏杭胜事；其二，忆江南者有江南生活经历，可以身份有别，如殷尧藩为旅人，而白居易为刺史；其三，有江南经历者都应对江南有深刻记忆，即“犹苦忆”“更难忘”；其四，江南确实能温润人的心灵、激发人的诗情，即“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而刘禹锡则有不同，他有江南生活体验，而没有写江南记忆。第二，刘禹锡《忆江南》所写地点与词调应写地点偏离。词调名明明是“忆江南”，而刘禹锡不写江南，而是写所在的洛阳。第三，情感偏离。白居易词基本情感是“忆”，是对过去江南生活的眷念；而刘禹锡《忆江南》是“惜”，在洛阳与春天道别，珍惜眼前之景。故有人怀疑与《忆江南》情感不符而改词名为《春去也》，《古今词话》曰：“‘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刘宾客词也。一时传唱，乃名为《春去也》曲。”^②《忆江南》唱和，本该出现的江南意象或物事，在刘禹锡词中缺席了，但并非说刘禹锡在长安或洛阳所写诗中都拒绝江南意象。如刘禹锡《送裴处士》诗云：“忆得当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连墙住。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③这一思考又会产生另一论题。

七、小结及余论

乐不能定辞，而因乐之需产生的词并非由乐决定段式、句数和句式。只有因乐唱辞或独立音乐成辞之“辞”出现，而又有重复依辞和辞的文字同式的固定，所谓“词谱”才能约束大家遵守同一格式写作，在创作中无人能突破这一格式。故在作词时，需先立规矩，而且以文字形式告知参与者。《渔歌》《忆江南》即如此。而重复依辞和辞，唱和是最佳形式，因此唱和成了文人词产生定式的重要形式。难点是，因为在文献中很少关于文人词最初的音乐与词的记载，故讨论文人词的产生无法据文献得出结论。而这一难点，在日人和唐人《渔歌》创作互证中得到解决，这一有效方法也帮助解决了《忆江南》“依曲拍为句”之“曲拍”含义所在。前提是这些珍贵材料都是文人创作时，之前为文学活动制定的需要共同遵守不能逾越的文字游戏规矩，而与音乐无关。就此而言，以下几点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从唱和入手，是解决文人词产生的一个途径，但非唯一途径。唱和会有一些设定性限制，而这可以让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状江南》“每句须一物形状”，《渔歌》“每歌用‘某’字”，《忆江南》“每首五句”，这都是明示对参与唱和者设置的游戏规则，参与者必须遵守。唱和规则的制定，本是对现场写作的要求，而这又成了人们讨论词与乐分离以及文人词产生的重要资料。否则，很难接近文人词产生的原初状态。

第二，思考词乐关系，要分层次：乐，即曲子；词，则要考虑如何由配乐之需到文学创作独立之需。《长相思》作者二说，可以理解为曲、词之分，也可以理解为词的特殊形式的“唱和”。白居易词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

^①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六，第2051页。

^② 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历代词人考略》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83页。

^③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八，第379页。

人倚楼。”吴二娘词云：“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鬢鬢云满衣。阳台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①而白居易《寄殷协律(多叙江南旧游)》：“五岁优游同过日，一朝消散似浮云。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吴娘暮雨萧萧曲，自别江南更不闻。”句下原有注“江南吴二娘曲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②据白诗则知，吴二娘善唱《长相思》曲，并依曲唱“暮雨萧萧郎不归”，至于所谓吴二娘词“深画眉”是吴自己所作，还是他人所作，似不能确定。可以确定的是白居易“汴水流”一词完全依照“深画眉”每首八句的文字格式。亦可理解为“深画眉”和“汴水流”是文字词的唱和形式。

第三，词谱的形成。关于词的起源是复杂的问题，但“词谱”形成是绕不开的，最初的文人词唱和必须遵守“词谱”，当然这样的“词谱”有些写在题目中或题注中，有些可以分析唱和作品而归纳出。曲与词的离合在这里得到确认，词是配合音乐产生的，但并不是说音乐能制约文字词的格式。音乐能影响词的内容，如声情。词只有在文字格式重复时才能固定，因此唱和在词体形成阶段有决定性意义。那些单个流传的词，并不能否定有重复词作出现，如后面出现与此相同文字格式，说明创作者使用了文献中首见词的格式。“词谱”脱离音乐后，由于传习路径不同，会出现有相似度而不完全一致的作品，这在“词谱”将成未成之时应被视为常态，但一旦如文人词有唱和的情况出现，固定的“词谱”就不能改变。敦煌词的存在，事实上也为此作了一定的佐证。比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每句字数为77675557式；“自从涉远为游客，乡关迢递千山隔。求官宦一无成，操劳不暂停。路逢寒食节，处处樱花发。携酒步金堤，望乡关双泪垂”，^③为77655556式。而传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④其77555555式为后世共同遵守的词式正体已经是后于敦煌词的定式。

第四，早期文人《渔歌》词唱和，文字格式要求较严，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规定某字必用。但离开这一文人唱和环境，失去了原初的文字说明，也就失去了原初的文字体式。后来很多人模仿《渔歌》，或易名为《渔父》。在传世作品中只有少数作品保留了末句第5字用“不”字，用“不”字的作者有可能见到张志和等人唱和时的规定文字“每歌用不字”，还有可能是在张志和等人创作中归纳出末句同用一字的规律而严格仿效。

第五，音乐与词配合，大致为三类：一类为声诗系统，以齐言为基础；一类为有曲名的系统，齐言格式，如《杨柳枝》《柳枝》《浪淘沙》；一类为长短句系统。由付之歌唱的文字词以七言为大宗，而以杂言为新兴体式，这中间有一条规律：早期文字词大致以唐代大众诗体七言和五言为基础，并时用五、七言诗的对仗杂于其间，而以三言破齐言，《渔歌》《忆江南》以及《长相思》《浣溪沙》的文字格式即如此，而《菩萨蛮》中的6字句式，也可以读为33字句式，如“水面上，秤锤浮”“求官宦，一无成”“望乡关，双泪垂”。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外集卷一，第2949页。按，关于第二首(吴二娘词)，校云：“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又见《全唐诗》卷八九〇《词》二。此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花草粹编》等作白居易词，《吟窗杂录》《古今词统》等作吴二娘词。《本事词》卷上：‘吴二娘，江南名姬也，善歌。白香山守苏时，尝制《长相思》词……吴喜歌之。’曾昭岷等编著《全唐五代词》：‘据此，则词为白居易作而吴二娘歌唱，未知《本事词》有无确据。……究属谁作，尚难断定，姑两存之，俟考。’”

^② [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五，第1995页。

^③ 曾昭岷等编撰：《全唐五代词》正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1、908页。

^④ [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

金锁的隐喻： 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张爱玲的《怨女》

康保成

[摘要]关汉卿《窦娥冤》杂剧采取多层叙事策略，不仅写出了一件由地痞流氓、糊涂官吏等共同制造的冤狱——显型悲剧，还写出了在礼教熏陶下年轻寡妇窦娥只能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一生的无可逃遁的隐型悲剧。明传奇《金锁记》杜撰出一个明智的提刑官和窦娥的丈夫蔡昌宗，《窦娥冤》的双重悲剧被消解。清乾隆年间《缀白裘》选取的六出《金锁记》折子戏，淘汰了蔡昌宗赴考及其与“金锁”相关的情节，是向《窦娥冤》悲剧精神的回归。罗瘿公编剧、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多次赴沪演出，给张爱玲创作同名小说提供了灵感。张爱玲每看京剧必有独到见解，并且常常借题发挥，作为其小说的隐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命运与窦娥相似，小说中的“金锁”，从男童佩戴的护身符被置换为束缚她一生的“黄金的枷锁”。《怨女》中主人公银娣的遭遇，属于每个女性身上都会发生的普通事件。银娣为夫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时“金锁”还原为男童佩戴的护身符，成为传续家族香火的象征。

[关键词]《窦娥冤》 《金锁记》 折子戏 程砚秋 张爱玲

[中图分类号] I2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2-0152-09

一、谁制造了窦娥的悲剧

关汉卿《窦娥冤》杂剧所叙述的窦娥无辜蒙冤的故事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比窦娥还冤”成了人们经常使用的一句熟语。

窦娥被冤杀的悲剧带有偶然因素。赛卢医借了蔡婆的银子不还，还要把前来催债的蔡婆勒死，恰好被张驴儿父子撞见救了下来，逼得蔡婆“引狼入室”。这是第一次偶然。张驴儿要毒死蔡婆霸占窦娥，到药铺买毒药，开药铺的赛卢医有短处捏在别人手上不得不卖毒药给张驴儿。这是第二次偶然。羊肚汤（掺有毒药）做好了，碰巧蔡婆不想吃，让给了张驴儿的父亲，张父吃下后一命呜呼。这是第三次偶然。张驴儿把窦娥告上法庭，又遇上一个糊涂官桃杌，把无辜的窦娥问罪判斩。这是第四次偶然。以往人们把窦娥的冤狱归之于流氓横行、吏治腐败。这方面的原因不能说没有，但光天化日之下遇上流氓无赖，概率应当不高；旧时官吏，也并非个个都是贪官污吏、糊涂懵懂。如果窦娥一开始就遇上包拯那样的清官好官，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稍加勘察便不难判明，窦娥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一个足不出户、无辜善良的年轻女性被判斩，的确是悲剧。^①然而这一悲剧是个体的悲剧，偶然

作者简介 康保成，湖北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①对窦娥悲剧的分析，可参见康保成：《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如果仅仅写了这些，《窦娥冤》充其量算是一部公案剧。然而细究一步，窦娥悲剧的产生其实并不止于被冤杀；窦娥悲剧的制造者，也不仅是张驴儿、桃杌一类的社会渣滓。

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是悲剧的第一个制造者。窦天章是个穷秀才，不幸女儿三岁时妻子亡故。若父女相依为命，父亲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他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功名，一心要“上朝取应”，完全不顾年仅七岁的独生女儿。在陌生的蔡婆家里，小端云哭着说：“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这撕心裂肺的哭叫丝毫没有打动他的“慈父”之心，窦天章头也不回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读书做官，是旧时读书人鱼跃龙门、发迹变泰的唯一出路。他有他的无奈和苦衷，仅在这一点上，窦天章和《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有相似之处。蔡伯喈最后觉悟到“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可是窦天章连这点觉悟都没有。他自己官运亨通，但从未回乡看望过独生女儿。作为肃政廉访使，身着官服与女儿（鬼魂）相见，对比鲜明，悲剧性也更强烈：“唉，我那屈死的儿，则被你痛杀我也！”他只是心痛，但对自己当年抛弃女儿的行为全然不悔。

蔡婆是悲剧的第二个制造者。她放的高利贷，利息高得吓人。窦天章借了她二十两银子，本利该还四十两，无钱归还，又要上朝求取功名，无奈只好把女儿给她做童养媳。赛卢医借了她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二十两，蔡婆屡屡追债，赛卢医才起了杀人之心。当张驴儿父子救了她性命之后，蔡婆经不起恐吓，把张驴儿父子领回家。更可气的是，蔡婆不仅引狼入室，而且还真有招赘张驴儿父亲的念头，祸端由此开启。一惯温顺的窦娥责怪她：“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在公堂上，任凭太守桃杌用尽酷刑，“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窦娥“肉都飞，血淋漓”，但倔强的窦娥依然不肯招供。到桃杌下令“打那婆子”时，窦娥急忙招供：“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蔡婆哭着说：“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杀我也！”可见，蔡婆确是窦娥悲剧的制造者。

窦娥为什么要救蔡婆呢？是由于窦娥孝顺。这是没错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窦娥和蔡婆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婆媳关系，而是情同母女、相依为命的关系。婆媳关系最难相处，但窦娥三岁丧母，寄居到蔡婆家时年仅七岁，所以蔡婆对窦娥生活上的照料乃至抚养都是可想而知的。蔡婆对窦娥说：“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这一对婆媳情同母女。就是这样的感情基础，使得窦娥在婆婆眼看被拷打时毅然“招供”。婆婆的自私、懦弱，窦娥的善良、孝顺，使窦娥走上了断头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窦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推向了毁灭的深渊。王国维说，《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①所以，《窦娥冤》既是社会悲剧，又是性格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窦娥也是自己悲剧的制造者。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窦娥冤》实际上蕴含着显型悲剧因素和隐型悲剧因素。所谓“显型悲剧”，就是由一连串偶发事件造成的悲剧，张驴儿、桃杌，甚至贩卖毒药的赛卢医，“合谋”制造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千古奇冤。这种悲剧，是个体的、偶发的、可以避免、可以昭雪的悲剧。所谓“隐型悲剧”，指的是窦天章、蔡婆，甚至窦娥本人，他们各自从本身的利益、观念或者意愿出发，合乎情理地，甚至自觉自愿地将主人公推向毁灭。《窦娥冤》不仅写了一起冤狱，而且带有浓厚的家庭伦理色彩。窦娥跟丈夫共同生活两年便守寡，与婆婆两代寡妇相依为命。在那个时代里，女人嫁到婆家之后要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这样的命运谁来改变？谁来为之申冤？没有人。而且多数人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窦娥冤》的深刻，正在于挖掘出了人性的复杂。人不是木头，刚烈的窦娥也有着正常人的需求和烦恼。她刚出场时唱道：“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②这两段唱是窦娥秘不示人的内心独白与自我倾诉，是窦娥多重悲剧的重要观察点。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

^② [元]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康保成、李树玲选注：《关汉卿选集（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8、9页。

还是在第一折，张驴儿父子闯入窦娥家，蔡婆无奈欲从了张驴儿之父，也劝窦娥从了张驴儿。窦娥一连唱了四支曲子，讽刺婆婆、奉劝婆婆，语言尖刻犀利，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温顺。“一女不嫁二夫，一马不鞴双鞍”，窦娥的贞节观念如此强烈而执着。最能表现这一点的，是第二折窦娥主唱的【南吕一枝花】套曲：“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百步相随。【梁州第七】”“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纵千随？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则待要百年同墓穴，那里肯千里送寒衣？【贺新郎】”“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骂玉郎】”^①窦娥的观念并不是关汉卿的。只要看看《望江亭》《救风尘》《玉镜台》《金线池》《谢天香》，就可以知道关汉卿的婚姻观和妇女观，他一定不排斥寡妇再嫁。用这么多笔墨写窦娥的贞节，正是为了向读者揭示窦娥的隐型悲剧。长期的伦理道德浸润，已令窦娥把固守贞节当做理所当然。一面是“无尽头”的煎熬，一面是骨子里的认命。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最大的悲剧。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窦娥的被冤杀，却对上面这些表现窦娥内心世界的大段唱词熟视无睹。更容易忽略的是下面这几句唱词：“俺公公撞府冲州，闹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②面对张驴儿的无礼和蔡婆的无奈，窦娥还想到了家里的财产。两代相依为命的寡妇赖以生存的小康之家，就这样白白便宜了张驴儿父子。这是窦娥绝不能忍受的，她要为守护家庭财产而抗争。结果抗争失败，悲剧发生。

二、明传奇《金锁记》对窦娥悲剧的消解与折子戏的逆转

窦娥被无辜判斩是或然而非必然，这一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明传奇《金锁记》就是这样写的。于是，窦娥的悲剧被消解了。

《金锁记》是《窦娥冤》的改编本，有清初抄本传世，《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据以影印。作品写窦天章上京赴试时女儿端云十三岁（不是七岁）。端云的未婚丈夫蔡昌宗幼时“金锁锁项”，在和表弟贾远一同外出游学时被水淹死（其实未死）。蔡婆为儿媳改名窦娥，把儿子的金锁交她佩戴。窦娥在反抗张驴儿的非礼时金锁被张驴儿捡到，张驴儿用金锁到赛卢医开的药铺买了砒霜，张母吃下去毙命，山阳县令胡图把窦娥问成死罪。六月初三，窦娥被押上刑场开刀问斩，此时天降大雪。提刑官汤老爷认为“炎天降雪，必有奇冤”，命令把窦娥“带回收监，听候发落”。窦天章在京城考中了功名，到山阳县巡视，审明冤案。张驴儿越狱出逃，被天雷打死。窦娥的丈夫蔡昌宗并不曾被水淹死，而是命中与东海龙王的三公主有三年姻缘。三年已过，龙女把他送回人间，再往京师赴考。而主考官就是当年和他一同游学的表弟贾远。蔡昌宗中了状元，衣锦还乡，和窦天章、窦娥、蔡婆大团圆。^③

《金锁记》中，提刑官一句“发回重审”，窦娥被冤杀的命运便轻而易举地得以改变。本来，“提刑官”并不是监斩官，一般不会到刑场发号施令。但比起窦娥被冤杀、鬼魂诉冤、窦天章为其昭雪的情节，或许这一改动更容易被接受。相比之下，隐型悲剧不容易改变。《金锁记》煞费苦心地设置了蔡昌宗这个人物，苦心孤诣地对关汉卿的原作进行了如下改动：（1）把端云与父亲分离时的年龄从七岁改为十三岁，这个年龄结婚在旧时代是可以被接受的，同时窦天章抛弃幼女的责任也被大大减轻；（2）把原作中张父改成张母，如此蔡婆就不会有改嫁的念头，窦娥自然也不会讥讽婆婆，性格更显“温顺”；（3）最重要的改动是窦娥的未婚丈夫蔡昌宗及其死而复生情节的设置，由于他的“死”，窦娥成了名义上的“寡妇”，张驴儿才萌生霸占窦娥的念头，张母才会被误杀，窦娥才会被判斩，由于他死而复生，窦娥才得以成为凤冠霞帔的状元夫人；（4）把窦娥和丈夫圆房两年后丈夫病故改为二人从未谋面就传来丈夫溺

① [元]关汉卿：《窦娥冤》，康保成、李树玲选注：《关汉卿选集（修订版）》，第15-19页。

② [元]关汉卿：《窦娥冤》，康保成、李树玲选注：《关汉卿选集（修订版）》，第11页。

③ 参见李复波点校：《金锁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金锁记》的作者，历来有袁于令、叶宪祖二说，点校本题“袁于令撰”。

亡的消息，这样，窦娥就不是真正的寡妇，不存在守节的坚持与煎熬。于是，《窦娥冤》的双重悲剧被消解殆尽。

清乾隆年间，钱德苍编选当时流行的折子戏《缀白裘》，收录昆曲《金锁记》六出：《送女》《探监》《法场》（以上初集卷一），《私祭》（八集卷二），《思饭》《羊肚》（十集卷三）。这六出戏几乎是向《窦娥冤》的逆转和回归。蔡昌宗与贾远赴考的情节，蔡昌宗溺水与龙女成亲的相关场次，全剧末尾大团圆的情节都未入选，就连串起全剧的关键道具“金锁”也不见了踪影，造成《金锁记》剧名名不副实。

若按剧情排序，《送女》选自《金锁记》第六出《从姑》，突出了父女离别的伤感与无奈，其实是《窦娥冤》“楔子”的展开版。《私祭》选自《金锁记》第十二出《私奠》，写窦娥对“亡故”的未婚丈夫进行祭奠。《窦娥冤》没有这一桥段，但《私祭》中窦娥唱词中表达的些许悲凉心境则分明对《窦娥冤》有所借鉴。《思饭》和《羊肚》分别选自第十三出《计贷》、第十七出《误伤》，写张驴儿闯入蔡家，张母被误杀的桥段，与《窦娥冤》第二折情节相符。《探监》选自第二十出《探狱》，《法场》选自第二十三出《赴市》，则是《窦娥冤》第三折的扩充版。尤其《法场》一出，几乎完全袭用了关汉卿的原词。如果仅仅把《缀白裘》中的这六折戏串联起来，到《法场》戛然而止，情节也基本完整，那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悲剧，连窦天章为女儿昭雪的尾巴也不见了。折子戏是中国戏剧从“一剧之本”走向“表演中心”的关键环节，它“消解了传奇的戏剧结构，淡化了原来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改变了剧中角色的主次排序，却强化了冲突和趣味，增添了戏剧效果，突出了演员的表演功力”。^①入选《缀白裘》的《金锁记》折子戏就是如此。整体上不忍卒读的拙劣喜剧，经民间艺人精挑细选，点铁成金，成为影响广泛的悲剧。在此基础上改编的同名京剧，经擅演悲剧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表演，轰动了京沪，也激发了张爱玲的创作灵感。

三、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与张爱玲的《金锁记》小说

1924年4月13日，罗瘿公编剧、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在北京三庆园首演。京剧《金锁记》基本上是将昆曲折子戏的六出戏串联起来，加上极其简短的一头一尾改编而成。虽然将曲牌体改为板腔体需要花费工夫，但基本情节与《缀白裘》所选的六出一致。在1949年以前的日记中，程氏一直称该剧为《金锁记》，直到1949年以后才改称《窦娥冤》。程氏说：“对于人物的身份、成分、相互关系的改变和情节上的变动，我所演出的是较多地参考了明传奇《金锁记》中的人物情节的。”^②从《申报》刊登的广告和剧评可知，从1925年到1943年，程砚秋主演的《金锁记》多次赴沪演出，每次都获得好评。程砚秋之前的名伶胡喜禄、时小福、陈德霖、吴彩霞，和程砚秋同时的顾正秋、黄桂秋、梅兰芳、华慧麟等名伶都擅演《金锁记》，以程砚秋的演出最精彩、最动人。^③

张爱玲此时已出道。1943年11月、12月，小说《金锁记》分上、下在《杂志》月刊发表。几乎与此同时，她还发表了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小说《金锁记》与京剧《金锁记》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端倪。张爱玲酷爱京剧，至少看了几十出流行的京剧，而且每观剧总有独到的见解。她说：“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性外向’那句话。”^④在张爱玲看来，京剧的精华之一，就是“女性外向”。这和现实社会是不相容的。而“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更是张爱玲独特的观剧感受。看过这几出戏的人不少，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唯有张爱玲。张爱玲不是政治家、社会学家，但她用一个女性作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出了

^① 康保成：《“一剧之本”的生成过程与“表演中心”的历史演进》，《文艺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程砚秋撰，程永江整理：《程砚秋自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93页。

^③ 《申报》1941年6月15日第14版刊登谷梅《谈谈〈金锁记〉》一文：“《金锁记》即《六月雪》也。此剧为青衣正工戏，胡喜禄，时小福，陈德霖，吴彩霞，皆以此剧称佳奏。后之四大名旦，莫不演之，程砚秋且以此剧闻名焉。”

^④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京剧与社会舆论的不相容，看出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她说：“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化之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份量。”^①尽管这里没有提到《金锁记》，但她一定是看过这出戏的，京剧给了她创作小说的灵感。在张爱玲看来，父亲的自私无情，丈夫的“溺水而亡”，张驴儿的无耻狡诈，胡图的颟顸愚蠢，婆婆的懦弱善良，这一切对窦娥构成了一把难以挣脱的无形的枷锁。一句话，她关注的不仅是窦娥顷刻间的被冤斩，而是她漫长的一生，而这又是“几千年”来女性难以挣脱的历史宿命。于是，“金锁”的概念被换掉了：一件作为男童保护象征的、佩戴在脖项上的装饰品，被悄悄地置换成了束缚人心的枷锁。

有人提出，“《金锁记》这一题名并非张爱玲对‘黄金的枷锁’的缩写，而是她从袁于令《金锁记》处借来”，“其真正用意在于通过题名构建起小说与窦娥故事之间的互文关系”。^②这话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借用明传奇的剧名是不错的，但在张爱玲的同名小说中，所谓“金锁”确是一把无形的枷锁。无可逃遁的家庭环境，复杂的人性、欲望与情感纠葛，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对主人公曹七巧来说，这一切构成了难以挣脱的枷锁。小说明确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③《金锁记》以倒叙、“闪回”的电影手法，《红楼梦》般的语言风格，难以言说的伦理观念，倾诉了主人公曹七巧及其家庭的彻头彻尾、无可逃遁的悲剧。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④作者笔下的悲剧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曹家的下人们在这个晚上七嘴八舌地议论她们的二奶奶：娘家是开麻油店的，她被哥嫂嫁到富贵的姜家。她父母呢？作者故意留白。无论如何，她缺乏父爱母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嫁到姜家又如何呢？丈夫姜二爷是个残废——天生的软骨症，但乞巧却能生儿育女。这样一来，“话柄儿就多了”，连下人都可以随便戳她的脊梁骨，话说得直白而又尖刻。至于大奶奶玳珍，更可以当面对她打脸，不留半点情面。七巧的极度寂寞与孤独，来自婆婆、姑嫂乃至下人的鄙弃，使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处所。在这个家里，她不能说错半句话。当说到小姑娘云泽的婚事，一句“女大不中留”就惹了祸。“女大不中留”本是一句俗语，窦娥曾用这句话讥讽婆婆。但从七巧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谣言”，惹得云妹妹“大放悲声”。七巧的处境还不如窦娥，但她却不像窦娥那样固守贞节。她挑逗小叔子姜季泽，却遭到了拒绝。七巧哪里知道，姜季泽虽在外面拈花惹草，在“屋里”也不消停，但在七巧面前却是一幅正人君子般的“正经”面目。她只得把失望与羞耻掩藏起来，强装笑容。

乡下的哥嫂来上海看她，却是为了要钱，引得七巧想起“从前的事”：她接触过的另一个男人，即出嫁前开肉铺的朝禄。其实，除了朝禄叫她“曹大姑娘”之外，他们应该没有任何亲密的接触。于是，肉铺的猪肉和她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叠印起来，一切回到了现实。好不容易熬到丈夫去世，姜家三兄弟分家单过，儿女也渐渐长大，那个当年拒绝过她的小叔子姜季泽也找上门来献殷勤。姜季泽的花言巧语几乎令七巧上当，还好，七巧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一试探，果然，这个花花公子想的是她的钱。七巧怒了，连骂带打地把小叔子赶了出去，但心中的失望、痛苦、无助、彷徨，却久久挥之不去：“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跄跄，不住的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⑤与其说曹七巧渴望爱情，还不如说她渴望性，渴望情欲的发泄，这是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需求。但多年的寡居，使得“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朝禄或许是她曾经想象的情欲对象，

①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5页。

② 李清宇：《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④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104页。

⑤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126页。

却一闪即逝，而姜季泽则近在眼前，伸手可及。现在连季泽也被她赶跑了，她亲手毁了她的爱欲。假如七巧“装糊涂”，情欲得到了一时的满足，那又如何呢？结果还不是一样，叔嫂之间的暧昧只能是鬼鬼祟祟，偷鸡摸狗，那是另外一种痛苦。只要七巧不能明媒正娶地改嫁，那结果就只能和窦娥所说的一样：“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

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但儿媳妇芝寿却令她感到诸事不如意。婆媳如天敌，似乎历来如此。七巧最大的嗜好和快感，是向儿子长白打听并公开小两口之间的隐私，这是七巧人老珠黄之后的另一种发泄方式。女儿长安到了嫁人的年龄，和留洋回国的童世舫定了亲，却被七巧百般阻拦，怀疑他们“生米煮成了熟饭”。她撒泼，使性子，“嚷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然而，紧接着这种泼妇骂街式的粗鄙不堪，她又突然向女儿道出了无穷的憋屈与辛酸：“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把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蹋得一个钱也不值！你娘自从嫁到姜家来，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就连你爹，他有什么好处到我身上，我要替他守寡？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儿俩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不承望今日之下，只落得这等的收场！”^①七巧死前，往事再次浸入脑海：“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②这并非奢望，而只是那时一般女性最普通的愿望。然而就连这点起码的愿望，也只能化作她回光返照似的一丝幻影。曹七巧悲剧的典型与深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没有诉讼，并非冤狱，却不可避免。软刀子杀人最可怕。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婚姻就是一切。如果嫁错了人，或者中途成为寡妇，那么，悲剧就发生了。一代一代，周而复始，无限悲凉，无处倾诉，没有尽头。窦娥唱词有云：“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窦娥如此，曹七巧也如此。张爱玲看京剧每有独到见解，小说题名《金锁记》，或许就是她看程砚秋演出后的独特感受。

《申报》自1942年1月27日至2月1日，连续四天在第4版刊登上海“大舞台”演出广告：“名旦程砚秋《金锁记》。”这正是张爱玲迷恋京剧和她创作《金锁记》小说的时间。她所观赏的“几十出京戏”里，应有程砚秋主演的《金锁记》在内。她也许阅读过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拒绝张驴儿的逼婚还有财产上的考量，这与张爱玲小说中曹七巧拒绝姜季泽何其相似。《金锁记》是张爱玲的成名作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傅雷说，《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③夏志清说，“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④令人没有想到，事过多年，张爱玲写作《怨女》，全面解构了《金锁记》的故事。

四、从《金锁记》到《怨女》：悲剧的消解

据王德威研究：“一九四三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五〇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一九五六年扩充为长篇小说 *Pink Tears*。*Pink Tears* 经过六〇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 *The Rouge of the North* 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为什么会这样？张爱玲为什么要把《金锁记》改题为《怨女》？王德威解释说：“我们可以将张爱玲的重写习惯归结为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冲动；藉着一再回到童年创伤的现场，她试图克服创伤所带来的原初震撼。我们也可以将她故事的多个版本解读为她对‘家庭罗曼史’的多重叙述；对过往琐事每一次的改写都是诠释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张爱玲重复叠加的写作也不妨看作是种女性主义诉求，用以挑战父权社会主导的大叙事。”^⑤这种解释之所以不能令人

^①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142页。

^② 张爱玲：《金锁记》，《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146页。

^③ 傅雷：《张爱玲的小说》，原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号，笔名“迅雨”。引自《傅雷散文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67页。

^④ [美]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感时忧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⑤ [美]王德威：《悬崖边的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

满意，是因为这种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完全没有意识到，张爱玲早年以京剧戏名为隐喻所倾诉的悲剧故事，后来被完全解构了。

《怨女》的主人公柴银娣长得漂亮，是“出名的麻油西施”，她是在被小木匠调戏的画面中出场的。还有“对过药店的小刘，高高的个子，长得漂亮”，常常朝银娣“这边看”，二人相互钟情。银娣有外公外婆，住在上海附近乡下，你来我往经常走动。俗话说“隔代亲”，银娣的童年应比七巧快乐得多。银娣被嫁到姚家是个“骗局”，但那不是她哥哥嫂子的错，是媒婆花言巧语骗了他们全家，“她哥哥嫂子大概倒是从来没想到在她身上赚笔钱”。^①反倒时银娣，动不动就和哥哥嫂子大吵大闹。作品中“女大不中留”出自银娣嫂子之口，希望妹子早点嫁人，也是人之常情。

姚家也是大户人家，或许比姜家更显赫。姚二爷虽然也有病，但比姜二爷强多了：“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他们举办了一个热闹的婚礼，三天后姚二爷还陪着银娣风风光光回了门。姜二爷是个“活死人”，姚二爷却时不时和银娣搭话，虽然不是每次都很愉快。关键是，姚二爷肯定是有性能力的，“他抽鸦片是因为哮喘，老太太禁烟，只好偷偷地抽，其实，老太太也知道。结婚以后不免又多抽两筒，希望精力旺盛些。”在姚家，银娣的地位不算高，但也不算低，经常和妯娌们开玩笑，甚至公开和姚老三打情骂俏。丈夫虽然其貌不扬，但有小叔子调情，也可以聊补空虚。更令人瞠目的是，二人竟然在为老太爷做六十岁阴寿时，不顾儿子的嚎哭，在浴佛寺里干起了京戏《玉堂春》“神案底下叙恩情”的勾当。此后二人明铺暗盖，一发不可收拾。分家之后，老三觑着脸来要钱，银娣当场就给他了。她想：“大概要不是真没办法，也不会来找她。他分到的那点当然禁不起他用。”“她摇着头笑，‘只要我有口饭吃，自己人总不好意思不帮忙。’”白花花的五百洋钱，眼睛不眨一下就送了出去。《怨女》对《金锁记》的翻案文章就是这样作的。虽然他们后来还是吵翻了，老三照样娶妾嫖妓，欠了一屁股债，后来生病死了。虽然她知道和老三没名没分不会有结果，想要上吊自尽，但“好死不如恶活，总算给她挺过去了”。^②

银娣的下场，和七巧凄凉地死去完全不同。她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儿子玉熹。银娣像七巧一样公开讲儿子媳妇的秘密，并以此为乐。她照样虐待媳妇、逼死媳妇，也不给儿子娶填房。但儿子的小妾冬梅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说不上儿孙满堂，但起码有后，可以继承姚家的香火。在姚家三房中，“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银娣也产生过幻想，耳边响起过当年小木匠那“大姑娘！大姑娘！”的呼喊声。但一霎时便烟消云散，仿佛一切都没有存在过。比起许多人，比起大房、三房，比起曹七巧，她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但她还是怨气满腹，不然为什么她要自杀？为什么作品题名《怨女》？一切还是缘于当年那场婚姻骗局，让她嫁给了前鸡胸后驼背的姚家二爷。此后便产生了她和小叔子勾搭成奸却不能名正言顺，还有姚老三的不可靠……但这样的“怨”不是悲剧，是女性一生中波澜不惊的生命历程，是一般妇女的必然归宿。曹七巧那“弄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的痛苦消失了，灵与肉的激烈交锋不见了。自然，那把“黄金的枷锁”也不存在了。“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轮得到。”^③

然而“金锁”还是有的，只不过从束缚人心的枷锁置换成戴在男孩脖项上的护身符——一件饰品而已。银娣生了儿子，哥嫂来看她，送的礼盒中有一把“金锁”。这把金锁的来历很蹊跷，不知道是娘家送的，还是婆家原有的，作品写道：“到了晚上关了房门，银娣拿出首饰箱来，把头面包起来，放在她哥哥带来的提篮盒下屉。她嫂子第二天早上拿回家去，下午又回来了。再过了两天，礼送来了，先拿到楼上外间，老太太还没起来。大奶奶三奶奶第一个看见，把金锁在手心里掂着，估有几两重，又批评翡翠锁片颜色太淡，又把绣货翻来翻去细看……‘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本事大，提篮盒拿出拿进，

^① 张爱玲：《怨女》，《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296页。

^② 张爱玲：《怨女》，《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307、325、349、374、354页。

^③ 张爱玲：《怨女》，《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421、409页。

谁晓得装着什么出去？”^①《金锁记》的作者这样写“金锁”不会是偶然的，既然女主人公没有被“枷锁”所困，当然不需要以京剧戏名为隐喻了。但作为男孩护身符的“金锁”的出现也非画蛇添足，它或许是另外一种隐喻，即银娣为姚家传宗接代的隐喻。

在《怨女》中，张爱玲“三句不离京戏”的写作习惯依旧没有改变。作品以小木匠哼着京戏开场。此后至少五六次涉及京戏，还有两次写到“四大名旦”。一次写替他们分家的九老太爷“喜欢捧戏子，四大名旦有一个是他捧起来的”。第二次写姚家办堂会，“四大名旦倒有两个特为从北京来唱这台戏”。^②姚家这台堂会唱得是哪几出戏作者没写，不过四大名旦中有两个同时出场，这种情况倒也不多见。孔在齐《一出〈金锁记〉，爱煞程砚秋》一文，谈到程砚秋、梅兰芳演唱《金锁记》的不同风格，这样说：“《金锁记》就是《六月雪》，故事出自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常常由班底（就是戏院的基本演员）唱的开锣戏，一般只演《探监》的一场……程砚秋唱的是全本，前面许多场子对我来说并不特别动人，到了《探监》，我已经不大耐烦，心想，听腻了的慢板又来了！岂知被程砚秋一唱，感觉简直完全不同。由于我对唱词熟悉，所以他那如泣如诉的唱功真把我听傻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此沉闷而没有什么身段的唱功戏，居然可以如此感人！”……接下来的《法场》是由两个刽子手一边一个夹着双手反绑在背后的窦娥，唱大段反二黄慢板。这段唱词我倒也是熟悉的，因为我从小听惯了家中梅兰芳的唱片。梅兰芳是珠圆玉润、句句送到你的耳中，听了不但舒服，而且令人神往。但是，程砚秋的唱却和梅兰芳不一样。他的嗓子没有梅兰芳的嘹亮，但是唱来婉转凄切，字字令人断肠。他在纤细处让全场观众屏息静气，因此即使声若游丝，却字字令人听得一清二楚；他唱到幽怨处则使人眼睛湿润，人人为窦娥的遭遇一洒同情之泪；他在表示悲愤时忽然声如鹤唳，那股冤气直插入每一个人的心房！”^③孔在齐是曾任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总编辑的沈鉴治的笔名，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跟着父亲看了不少京剧。他看的《金锁记》或许张爱玲也看过，只是她不在作品中说透，而只是以戏名为隐喻，把男孩子佩戴的金锁置换成束缚人心的枷锁；到无须这样做的时候，又悄悄地换了回来。

经过了一个孤苦无依的童年，经过了和胡兰成的情感纠葛，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沧桑，经过了和德国人赖雅的聚散离合，经过了多年的海外旅居，张爱玲早已看透人生，看透世事。窦娥的故事被忘却，早年的激愤荡然无存，顶多留下了一丝惆怅。这是她把悲剧变成正剧的主因。一句话，她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冲动，喷发的火焰变得平淡如水。这是《怨女》远远不及《金锁记》动人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1937年，年仅17岁的张爱玲写了一篇两千字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当时，梅兰芳、杨小楼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早已在各地唱红，当然其他名角也在唱同一出戏。小说忽而戏里，忽而戏外。写戏里时，扮演男女主人公的名角自是气度不凡，而虞姬自刎殉情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但更要紧的是写戏外，是写兵败前夜虞姬的心理活动：“——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幽暗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他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④

张爱玲的写作风格此时已露出端倪，她“三句不离京戏”，借题发挥的写作方式从此启动，直到她

① 张爱玲：《怨女》，《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334页。

② 张爱玲：《怨女》，《怨女：张爱玲小说选集》，第372、386页。

③ 孔在齐：《顾曲集：京剧名伶艺术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0-91页。

④ 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经典作品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75页。

生命终结前还写了《雷峰塔》。张爱玲未免太早熟，小小年纪便从京剧中洞察到人生百态，特别是“预见”到女性的悲剧性归宿。到抗战前，张爱玲以京剧戏名为题的小说还有《金锁记》（1943）、《鸿鸾禧》（1944）、《殷宝滟送花楼会》（1944）、《连环套》（1944）。1950年3月起，张爱玲开始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次年二月连载结束。有学者发现，《十八春》是以京剧《汾河湾》中薛仁贵、柳迎春分别“十八春”的故事，“暗含着对男性自私的责怪怨怼之情”。^①很明显，她从京剧中看到的主要是女性包括她自身的必然归宿，而《金锁记》则是她从戏曲中体悟人生，反躬自身命运的经典之作，之后她再也没能超越自己。有学者提出，“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塑造的曹七巧这一人物，其身世和为人与窦娥相类”，“‘怨天尤人’是《窦娥冤》和小说《金锁记》共通性的核心”。这一见解本来颇有可取之处，但又说“指‘金锁’为‘黄金的枷锁’也不符合常识”，属“望文生义”，^②这就令人费解了。论者显然忽略了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张爱玲的《金锁记》乃至《怨女》的承继、递变、扬弃、再生关系，其中明传奇《金锁记》的折子戏、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金锁记》以及张爱玲本人对京剧的独到见解被置而不顾。这就难免得出不尽合理的结论。

总而言之，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意蕴深厚，不仅写出了一件由地痞流氓、糊涂官吏等共同制造的冤狱，还写出了在礼教熏陶下一般家庭中各类成员的众生相，尤其是深刻地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倾诉出深受礼教影响的年轻寡妇窦娥的心声：她对未来的寡居生活有清醒的认识却只能在苦苦煎熬中度过一生，哪怕有一丝一毫改嫁的念头也是可耻的。冤狱或可避免，但年轻寡妇的悲剧命运以及她的麻木不仁、心如止水却无可改变。明传奇《金锁记》杜撰出一个明智的提刑官和窦娥的丈夫蔡昌宗，《窦娥冤》的双重悲剧——显型悲剧和隐型悲剧都被消解。乾隆年间《缀白裘》选取的六出《金锁记》折子戏，淘汰了蔡昌宗赴考及其与“金锁”相关的情节。这几出在清代中叶经常上演的昆曲折子戏，若串联起来就是情节基本完整的悲剧，是向《窦娥冤》悲剧精神的回归。罗瘿公编剧的京剧《金锁记》就是在这几出昆曲的基础上添头加尾改编而成，由擅演悲剧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主演后，在京沪等地影响巨大。张爱玲最少看过几十出京剧，《金锁记》应为其中之一。张爱玲每看一出京剧必有独到见解，并且常常借题发挥，作为她小说的隐喻。关汉卿的《窦娥冤》，程砚秋主演的《金锁记》，为她写作小说《金锁记》创造曹七巧的形象提供了灵感。曹七巧在欲望与金钱的漩涡里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性格扭曲，虐待儿媳致死，又为难女儿，最终自己也凄凉地死去。小说中的“金锁”，从男童佩戴的护身符，被置换成束缚她一生的“黄金的枷锁”。曹七巧的悲剧与窦娥相似，但二人的处事方式却迥然有异。时过境迁，多年后张爱玲写作《怨女》，情绪归于平淡。主人公银娣的遭遇，属于“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轮得到”普通事件。银娣与小叔子从打情骂俏到勾搭成奸，不仅欲望得到了满足，而且在姚家三房中，“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银娣为夫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时“金锁”再次出现，还原为男童佩戴的护身符，成为传续家族香火的一种象征。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李清秋：《在孤独中吟唱传奇：张爱玲传》，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年，第162页。

② 李清宇：《论张爱玲“以戏为题”的互文叙事——从话剧〈秋海棠〉的启示说起》，《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

现代文学家世研究的可能与方法^{*}

李超杰

[摘要]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家世”在现代文学领域亦具有广阔的理论空间和应用前景。现代文学学科若要进行家世研究，需要“以古为师”，更需适应学科实际予以升级改造。立足于人文互证、实证研究，透过作家家世里层内容，挖掘其对主体先在文化结构和创作心理形成的影响，进而分析动机驱使之下采取的叙事策略、编码原则及价值预设，或可更加深入地接触作家、文本与文学史。将家世作为一扇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窗口，既非历史学范畴的作家家世考古，也无意于宣传所谓的“家世决定论”。这条路径既有意义，也有限度，希望此种思路能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一丝活力。

[关键词]家世史料 主体心理 话语叙事 现代作家 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161-08

近年来，随着“莫言家世考”系列研究的推出，“家世”这一古老议题又成为新热点重返学者视野。所谓“家世”，即以家族血缘谱系为核心，囊括世系分支、祖产家业、家风家训、亲友网络、家世兴衰等，以个体所历所闻为重点，包含所受教育、成员关系、家庭形态、迁徙出游等，向外辐射至环境生态和活动状态，前者是指对家族生存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和文化气候，后者是指“家族成员以不同角色从事的活动及影响，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日常活动、精神生产”。^①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如此重视作家“前史”？首先，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仅是其本人的亲历体验，还必然会受到其先辈影响。这些遗传基因会在个体身上生根、发芽，始终作为一支潜流伴随左右。其次，“家世”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集体意识”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上可扩延至国家，下可缩减为家庭的功能单位，家族不仅建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而且早已内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前提。何况，重视家世自古皆然，“述祖”“寻根”在作家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即便天才式的伟人巨匠，孕育他的除却时代、社会，还有其赖以生存的家族、家庭。发掘此等涵盖丰富社会历史“潜文本”的家世因素在作家身上产生的种种化合反应，既可宏观概览时代风云、社会变迁，又可微观考察家族、家庭之于个体的影响作用。

“家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它与现代文学中的家世研究有何不同？在古代文学学科内部，学者的关注重心多倾向于家世史料考订层面，其深沉凝重的历史感，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效法。现代文学学科要“以古为师”，更要适应学科实际予以升级改造，在掌握庞杂家世史料的基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2批面上资助项目“家世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研究”(2022M7234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超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北京，100872)。

① 张剑：《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础上加强与作家、文本的互动，有“考”有“释”，采用多元化、结构化和动态化的研究方法，^①使之与当下的文化研究、叙事分析相互激发，以形成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

一、现代作家家世的五种类型

家世出身属于进入研究的地基工作，对其予以类型区分是关键一步。现代作家人数众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便显得非常重要。不同的家世出身不仅指向经济水平、道德声望、政治权力等表层区别，背后更潜藏着为人处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差异。这些或显或隐的差异极大程度是由家族所处阶级、阶层决定的，它可用不同标准予以区分。

考察学界在阶级阶层研究领域已有的划分标准，存在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派是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前者以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阶级，后者强调身份认同。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西方式的划分方法不免有些“水土不服”，难以适用中国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分层取决于财富多寡，更取决于权力高下。而权力获取的诸多来源中，文化是非常重要且最被认可的一种，故政治是本位，文化是关键。相较于政治、文化，经济反而处于次要位置。这也是为何社会阶梯上的商贾阶级即便富埒王侯，在士农工商的价值尺度中也属末流，盖因其“受制于王者，财富成为权力的报酬，而不成为权力的根据”。^②此外，传统中国还是一个以“差序格局”组织起来的熟人社会，人们在为人处世时更为重视“关系”，在其运作之下产生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日常权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山、后台、撑腰、来头等。因此，基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笔者认为以“势力”划分家世似乎更为符合研究需要。本文所论“势力”是指以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文化声望三大要素的综合占有程度作为依据，同时兼顾中国社会特有的裙带关系，其中政治权力最为关键。何怀宏曾以“权钱名”的分配作为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指出这三种资源具有“‘溢出’效应的，亦即高于平均水平”。^③这一“溢出”效应同样适用于家世分类中的“势力”概念。

将家世上溯至少三代，以“势力”作为标准，现代作家家世可粗略划分五种类型：高门巨族、地方望族、文化世家、中等之家与寒门之家。

(一) 高门巨族。亦作“高门大族”，指“有权势有地位的家族。也作‘高门大户’‘高门大屋’‘高门大宅’‘高门士族’”。^④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点评凌叔华小说时亦用到“高门钜族”一词，“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钜族的精魂”。^⑤它是指先辈曾在中央机构或地方省级担任高官，享有显赫的政治地位、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备强大的关系网络、形成优良的家学家风的家族。现代作家中，张爱玲、吴祖光、洪深、林徽因、陆小曼、施济美、凌叔华、冰心等皆出身显赫门第。

(二) 地方望族。“望族”一词古人早有论述，指有势力、有名望的家族，而“地方”是对势力覆盖范围的一种限定。何怀宏曾撰文提及“地方豪族”，认为豪族不同于士族，“豪族多依仗武力、群力和财富，而士族则主要凭借文化和突出的个人；豪族扎根于乡里土地，而士族往往最终会闻名并获权于中央”。^⑥本文所论地方望族与地方豪族有些类似，又稍有不同，其涵盖范围并不局限于武质团体，也包括在地方的道、府、县级担任官职，或是凭借土地、财富、武力等扎根地方。沈从文、端木蕻良、丁玲、郭沫若、鲁迅、巴金、王独清、成仿吾、苏青、冯沅君、陈衡哲、许地山、臧克家等作家皆属此类。

^① 所谓多元化，是指史学的视角与心灵的视角相互补充，史料学、社会学的方法与心理学、哲学的方法有机结合，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文本，分析其话语实践与意义生成。所谓结构化，是指在家世研究的过程中抽绎、提炼一些具有稳定性与普遍性的规律，无论是作家家世、创作心理，抑或话语叙事，以期对现有文学认知框架有所补充、拓宽。所谓动态化，是指对作家家世作动态考量而非静止分析，揭示家世变迁、家族兴衰等诸种因素如何影响主体心理及文学创作。

^②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增补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③ 何怀宏：《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④ 陈壁耀主编：《新编成语大词典》，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⑤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1-12页。

^⑥ 何怀宏：《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三)文化世家。在我国文化典籍中,“世家”一词早有所见,词义多有不同。本文所论“世家”取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之义,故“文化世家”是指“文化在家庭、家族中长期积淀,并经过多代人不断赓续、传承而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以家风、家训、家教等文化单元为标志,以家族杰出人物群体为代表的世代相传的家族体系”。^①这种文化精神构成书香门第的内在特质,并形成传承后代的家学家风,不同于前两种家世类型在仕宦、经济等方面的显赫,出身文化世家的子弟相较治国理事,更以治学著称于世。钱锺书、杨绛、陈寅恪、叶公超、冒叔子、宗白华、方令孺等皆出身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

(四)中等之家。本文所论“中等之家”无涉阶级划分,而是指在政治权力方面影响范围较小,声望权威相较世家大族与地方望族难以匹敌,但也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具有文化素养;经济收入处于中等,生活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类似于19世纪末叶以前的“旧中产阶层”,即“由小企业主、小店主等小资产者构成的社会中间层”。^②中国现代作家中出身于中等之家的人数众多,有来自工商业者家庭的穆时英、靳以、冯至,有来自耕读之家的闻一多、陆蠡、田汉,还有来自小有产者家庭的孙犁、罗淑、王鲁彦、潘汉年、茅盾、许钦文、艾青、李金发、巴人、穆木天、汪静之、废名、林海音等。

(五)寒门之家。本文所论“寒门之家”与唐长孺所理解的除门阀贵族之外的士族都是寒门或庶族不同,也同赵翼所说的能够进入中央权力的“南朝寒素多掌机要”有别,它是指在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文化声望皆近于无的阶层,尤指经济收入低于一般水平,自然谈不上拥有强大关系网。但严格说来,现代作家的“寒门”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绝对贫困”。以老舍为例,他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能够获得求学机会也是多亏刘寿绵的资助,后来选择读公费师范亦因家境贫寒,但相较于千千万万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北平贫民,舒家是有祖产的,“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而且“父亲的唯一的无忧无虑的事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③由此可见,所谓“寒门”是一个相对定义,在既定基本标准之外也要考虑到时代、地域等因素。现代作家中像黄谷柳、绿原、彭家煌、彭柏山、洪灵菲、邵子南等皆出身寒微,可以列入寒门之家。

值得注意的是,综合考虑权力、财富、声望和关系的“势力”,在用于家世类型划分时是一个相对判断而非绝对定性。这一标准不过是借以探究作家家世与主体心理、话语实践之间关系的观察视角,它并非唯一且可能存在不足,但对从事家世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阐释角度。何况,类型划分并非家世研究的终极目的,探讨家世出身与创作心理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二、家世出身与创作心理的关系

洪子诚在谈到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时曾说:“理论虽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自身的经历、体验有时更重要。这种经验会渗透在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的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④那么,家世经历作为个体难以摆脱且最为重要的生命体验,它与作家心理结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之间是否存在密切关联?吕西安·戈德曼在考察文学作品、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时,提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⑤换言之,个体所属的社会集团在利益诉求方面存在相同倾向,并由此构成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或精神结构,进而影响个体成员的情感、理智和实践行为。将其延伸至家世研究,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与主体所属集团,更准确的说是家世阶层,二者之间同样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因为每个阶层都有自身相对一致的处世准则、审美品味、理想追求等,这些会综合成为该阶层的集体意识。而个体成员生

① 蒋倩、甘旭扬:《笔耕世业传家风:湖北浠水闻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②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 老舍:《正红旗下》,《老舍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96页。

④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1页。

⑤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活其中势必会受到所属阶层共有“惯习”的影响，反映在创作当中就会生成相对集中的心理特征，进而产生具有一定共性的叙事建构。

以“高门巨族”家世影响下现代作家创作心理与文学实践为例。“珞珈三杰”之一的苏雪林曾评价其密友袁昌英：“她虽没有研究家谱学，对于遗传学说也似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她门第之见很深。某人品性如此优良，是因为他家世贵，某人习惯如此之好，是因为他出身高，都是她常放在口边的话。”^①此言虽有尖酸刻薄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些事实。袁昌英因显赫过人的家庭出身，集才貌于一身的优势，催生强烈的自恋倾向。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严崇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这位外祖母：“1957年以前，她还可以正常教书，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有朋友，也有学生，他们在客厅里高谈阔论，气氛很热烈，而外祖母总是这场聚会的主角。她一举手、一投足都姿态潇洒，充满自信。”^②除此之外，林徽音、冰心、凌叔华、“东吴系”女作家等莫不如是。在主角自恋心理的陶染之下，她们的文学写作显得满足自得、居高临下，散发出浓郁的贵族闺秀之气。林徽因作品《窘》中的少女芝、《模影零篇》中绣绣和钟绿，外形的古典优雅，内在的纯洁崇高，或可视为作家本人的美人自画像。再加上大家族舒缓闲适的生活以及自尊自重的家庭教育，使得这类作家创作心态平和温婉，规避对生活的理性说教和情感臆断的极端性，呈现出一种有利于审美创造的距离感。另外，因家族享有的种种特权极大程度依靠统治政权，此类作家对现存秩序较为拥护，对社会骤变多有不满。她们反对离析破坏，对激进思潮有意疏离，创作也持中庸保守心态，如施济美逃遁于“精神废园”，袁昌英反思“五四”新式恋爱等。不可否认，高门巨族出身的作家并非都以显赫家世自得，其中存在一部分叛逆家世者，且叛逆程度上的深浅之别亦会导致其在阶级、启蒙等话语策略择取上的差异。而踟蹰于认同与叛逆之间的贵族作家也不乏其人，于两难选择间的不同倾向亦会在其文学创作中加以彰显。但无论偏于认同亦或叛逆，她们的创作具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即题材范围局限于家世、家族之内而极少外扩，故事场景也大多是卧室、书房、客厅、花园等私密空间，叙述重心基本围绕“家叙事”展开，所谓“闺阁现实主义”是也。

然而，除却阶层这一要素背后涵盖的家族成员共享资源，同为家世范畴的个体经历亦对文学创作影响极大。戈德曼指出，“作为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而“这些个体中的每一个……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这些趋向大大缺乏有效的连贯”。^③家学家风是诗书传家还是商贾传家，家族发展是蒸蒸日上还是家道中落，家庭信仰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亦或其他，家庭形态是单亲家庭、健全家庭亦或艾青式被寄养农家、凌叔华式一夫多妻等特殊家庭，都会波及创作主体的心理态势和文本特征。郭沫若家族因累世经商，冒险、竞争等商贾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族中子弟，再加上从祖父辈起就与袍哥组织关联密切，使得侠肝义胆的江湖文化也渗透其中。两相融合，郭沫若身上较其他同辈拥有更多躁动不宁、创新进取的匪气，反映在创作中如《棠棣之花》流露的流血牺牲意识、《聂嫈》中以暴制暴的思想倾向等。此外，郭氏家族虽世代经商却希望子孙金榜题名，借助文化冲淡铜臭从此改换门庭，由之产生的“尚儒”心理结合时代主题在作家笔下演化成为爱国情怀，在历史剧《屈原》《虎符》《南冠草》以及诗作《女神》《炉中煤》等皆可一窥。母亲陈淑芬虽不幸早逝，但她生前对儿子“爱”的教育，加上祖母汤淑清、继祖母濮贤娜、姑姑李道漪等家族女眷皆为温良贤淑的知识女性，巴金不由滋生一种恋母情结，构筑的文学世界亦具有恋母强力下的泛女性倾向。艾青的父亲虽然属于维新派的忠实信徒，却无力摆脱宿命意识的支配，算命瞎子的一番胡诌使他初为人父的喜悦即刻为相生相克的恐惧所取代，毫不犹豫地把刚来人世的婴儿送到村子里的一户农家寄养。宽敞舒适、饫甘餍肥的高宅生活与残瓦颓墙、啼饥号寒的穷苦农家，对比实在太强，处于地主、贫农夹缝中的诗人由之形成一种异常矛盾的“中间人”情结。除此之外，成员关系、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家世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主体心理的

① 苏雪林：《记袁昌英女士》，杨静远编选：《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② 严崇：《忆外祖母袁昌英》，杨静远编选：《飞回的孔雀——袁昌英》，第120-121页。

③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第182-183页。

形塑。

在对影响创作主体心理生成的家世因素有所了解之后，对于这一创作心理是否可作类型区分呢？本文为家世研究之便，以创作主体对自身家世所持态度作为依据，将其分为正向认可、负向反叛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矛盾纠结三种类型。这三种态度投射到创作当中，也会相应产生三种效果，即正面强化、负面抑制和“模棱情感”。

“正面强化”是指当创作主体对家世出身持认可态度时，会接受家族“共同体”为自己设计的目标取向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践履。如端木蕻良就对自家家世颇为自豪，还特意解释当时作为“八旗”成员的东北地主是相当有派头的，因为“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做了这社会的重心，有许多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① 正因祖辈的丰功伟绩在前，端木亦想紧跟其后有所成就。1936年为了躲避北平当局对参加学运的学生的抓捕，端木来到了上海，此行坚定了他要征战文坛大干一场的决心。也正是家世出身给予的自信，他才会不认可郑振铎对《科尔沁旗草原》的评判，将不能出版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知名度不够，需要有鲁迅这样的人推荐，所以给对方一连写了八封信。臧克家亦是如此，作为臧家后代，他不愿辱没先人，希望能有一番作为。诗人自述，1926年秋天，他之所以决定和曹星海、臧功郊结伴前往武汉，除了无法忍受张宗昌统治之下的济南空气太过压抑，相反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灯塔，“还有为个人找出路的一点虚荣心。黄埔军校当时的号召力很大，不少青年都奔去投考。从武汉传来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大量招生，受过训练之后，成绩优良的可以当政委；差点的，做政治指导员。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便‘五皮俱全’了（皮靴，皮包，皮裹腿，皮带，皮鞭，号称‘五皮主义’）”。^②

“负面抑制”，或者说是创伤体验，会对作家创作心理产生消极影响。应对策略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种，坚守型，它是指家世经历对个体造成的创伤演变成为一种执念，个体不会放弃原定目标，而是另辟途径加以实现。像沈从文，倘若家世带来的福荫足够长久，他可能只需听从长辈安排就可获取丰裕的生活和体面的地位。但随着家族在湘西的地位一落千丈，曾经那个确信“将相无种”的凤凰人在命运的漩涡中陷入自我怀疑。为了重建“优越”、振兴家世，沈从文在确定将军之志蒙尘后，果断选择弃武从文，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补偿。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现象：沈从文虽在创作中对都市极力针砭，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直未曾离开。金介甫曾问：“你大概觉得城市的生活比乡下的好一点儿？”沈从文没有否认，他不回故土是因为“真正悬空了，回去也不习惯了”。^③ 这种“悬空”，无限接近萨义德所说的“流亡者”情形，即“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非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伤感，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④ 而沈从文之所以成为“流浪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人生目标根本不在湘西而在都市。当初从一个偏远之地走向北京，先是希望考取大学跻身知识阶层，后又通过写作挣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求娶一个名门小姐组建家庭，正是在对家世的回溯中，他规划着自己的人生路径，最终也得偿所愿。第二种，反叛型，它是指个体面对家世经历带来的不悦体验，不是以隐忍的方式消化情绪，而是采取激烈的举措予以反击。萧军的母亲因为抗议丈夫的无端鞭挞，吞食鸦片自杀身亡，将七个月的儿子独留人间。直到很多年后回忆往事，作家依旧无法原谅父亲：“我们父子之间除开因事之外，是从来不作任何交谈的。……再相逢时，也还是彼此感到生疏和某种距离，一般所谓父子之间‘亲切之情’，在我们是不存在的！”^⑤ 几个姑姑同样无法摆脱旧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做了旧式婚姻的祭品。血淋淋的事实使萧军对夫权社会

① 孔海立：《端木蕻良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2页。

② 臧克家：《臧克家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③ 王亚蓉编著：《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8页。

④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页。

⑤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产生逆反心理，创作呈现鲜明的弑夫倾向：一方面在情爱关系的书写上突破传统伦理，具有野性放诞色彩，另一方面颠覆女性软弱依附形象，塑造充满阳刚之气的女性游侠。第三种，疏离型，它是指个体因自身或他人原因，主动或被动地疏离家族，超然态度的背后隐藏些许无奈。以萧红为例，据学者考证，其父张廷举并非面目狰狞、冷漠无情，实为一位开明绅士。她后来与家族亲友断绝往来，独自一人流落异乡，除了原生家庭招致的痛苦，也与其性格偏激执拗存在关联。故有学者提出，“执意要离家出走去闯荡社会，是萧红青春期叛逆心理的表现，而不是她反封建、反传统的意志决绝”。^①但在彼时作家眼里，父亲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狂徒，弑父冲动之下的男性形象也多被阉割、矮化。

“模棱情感”是弗洛伊德在研究迫促迷狂症时建构的一个重要学说。弗洛伊德认为，“凡是情感都是模棱两可的，爱之中隐寓有憎，憎之中也隐寓有爱”。^②其实作家对家世的态度亦然，有些爱、憎并不分明。凌叔华因自小显露出绘画才能，得到父亲特别栽培，除王竹林外，齐白石、陈半丁都曾教她画画，得天独厚的教育条件外加自身天资聪慧，凌叔华在十多个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这种宠爱一直持续到她26岁结婚，居然获得了一座有着99间房舍的宅院的后花园和其中的28间房屋作为陪嫁。凌叔华深知享受的优越待遇来自于家族福荫，所以时刻谨言慎行，唯恐辱没门楣。但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父亲对家事的冷眼旁观，以及众多姐妹的不幸遭际等，又使她渴望挣脱女性传统角色的设定，温婉恬淡的个性之下隐藏着强烈的叛逆意识。据陈小滢讲述，凌叔华不仅对儿媳侍奉公婆之事异常反感，作为母亲亦不合格，“我几乎没有母亲抱我的记忆，只有一次，我记得她说：‘洗小猫猫手’这是她头一次这么亲热地喊我，所以我特别高兴，一直记到现在”。^③与陈西滢间的夫妇情感更是难以表述，早期的相敬如宾、琴瑟和谐不复存在，最后残存的仅是形同陌路的冷淡。一直以来，婚姻制度和父母义务都伴随着严厉的社会制裁，凌叔华对这种潜在惩罚的视若无睹，正是她渴望逃遁家族规训的有力证明。

总而言之，家世既是作家难以摆脱的生命底色，也是形成其心理结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的发源之地。但无论是“模棱情感”、正面强化抑或负面抑制，家世对创作主体产生的影响都不可用非好即坏的两极思维、功利观念进行判断。对待家世，因其既培养了积极的一面，又存在着消极的质素，既催生了奋进的欲望，又拉扯着往下坠落，故凝固的价值认定也许并不适用，以辩证性、生成性的眼光全面考量或不至陷入绝对主义。

三、家世对文学叙事的影响

家世并非影响作家创作的唯一且决定性因素，但对主体心理所起作用不容忽视，这种心理最终会影响到文学，尤其影响到叙事，甚至在某种程度决定作品的审美风貌、精神向度和艺术水准。值得注意的是，家世影响之下的心理情结作用于文学创作时，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力驱动？构成艺术创作的动力系统非常复杂，本文按照叙事动机指向主体内、外之别，将其分为“内倾性动机”与“外倾性动机”。^④作家叙事动机不同，话语实践自然有别。若视文学为交易商品的“稻粱谋者”，可能会选择欲望化的素材以满足人之关于权力、财富与情色之需求；若以写作为游戏、为闲适者，相较形而下的现实生存问题更倾向于形而上的深度思考；若以文学为启蒙、“新民”者，可能会强调国民性的堕落；若以文学为社会革命者，可能会突出体制下的不义与悲剧等。种种不同的创作动机，决定了叙事的迥然相异，这是家世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细究家世作用下的叙事动机投射到话语实践，会产生如下几种影响。

（一）影响对创作题材的筛选。叙事生产中“可讲述”与“不可讲述”的界限，不应封闭于狭隘的文

① 宋剑华：《〈呼兰河传〉：遥望故乡的生命绝唱》，《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派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8-59页。

③ 陈小滢口述，李菁主笔：《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新华月报·天下》2010年第2期。

④ 所谓内倾性动机，是指作家从事文学创作以满足个体内在的情感需求为旨归，而不以获取任何的外在功利为目的。此类作家从事写作多是具有两个目的，一是自我确证，二是自我消遣，尤以后者为主。所谓外倾性动机，是指主体将创作目的指向精神需求之外的世界，或将文学当作认识世界的工具，希望借助创作达到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本质的把握；或将文学当作改造世界的工具，力图通过创作对诸多现象作出评判以使其向更好处发展。

本解读，而应在“超文本”层面考察话语掩藏。基于叙事常规与社会常规的创作筛选，不仅与作家置身其间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而且与家世影响下的写作偏好勾连。比如，出身小有产者家庭的作家极少使用阶级对立的叙事模式，因为一旦引入阶级话语，他们自身就难以摆脱“剥削者”的标签。相反，出于对所属群体的维护，这类作家在创作时会情不自禁地为之申辩。王鲁彦早期叙写浙东农村风土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乡土中国无衣食之忧的小有产者阶层。倘若按照人物的阶级立场去确定他们的品质和行为，这些小有产者大概率会被划到非正义的一方。但出身小康之家的王鲁彦却将自己的同情赋予这群“恶人”，并且调转笔锋对“正义”的贫苦民众流露出一丝不满。还有孙犁，他在创作时极力淡化地主与贫农间的矛盾，在潜意识里甚至有为地主、富农“说好话”之嫌。他并非不知“定成分”在当时是一个敏感问题，在1947年夏天就已跟随工作组在博野县大西章村进行土改试点，亲眼目睹了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些极“左”做法。但作家还是不合时宜地写了《一别十年同口镇》和《秋千》，未尝没有替包括自家在内的富农打抱不平的意思。孙犁的父亲辛苦操劳一辈子终于买了五十亩地，在村北盖了一所新房，牲口棚、草棚、磨棚一应俱全，但这些东西在土改中却成了累赘。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凡是家中有人在外革命的，在划定成分时要有所照顾，但孙犁家还是被划成了富农。孙犁深知家中资产都是父亲辛苦一生的成果，不存在剥削他人的情况，无处发泄的不满最终投射到创作当中，虽然为此遭到批判，但他对自己的阶级立场似乎并无忏悔。

(二) 影响对叙述视角的设置。叙述视角如何设置，涉及“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① 有别于徐玉诺视土匪如恶魔，沈从文对于将为匪当作人生出路的生活选择非但没有批判，似乎颇有些认同，甚至从言语中流露出一种钦羡、向往。叙述视角有别的背后，勾连着作家的家世差异。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县的一个贫苦农家，民国初年该地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作者一家也在受害之列，他的叔叔就在土匪攻打县城时中弹身亡。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底层百姓，徐玉诺显然痛恨土匪的所作所为，幼时躲避匪乱的经历如恶梦缠身，他眼中所见、笔下所写只能是土匪的残暴可怕。然而，沈从文祖父的发迹史却与土匪有着扯不断的纠葛，这就导致他对土匪的认知颇为不同。以深得沈从文赞赏的凤凰匪首龙云飞为例，此人十八九岁便当上土匪，之后又与国民党政权勾结，控制凤凰、麻阳、吉首等县成为官匪，自称苗王。他为了巩固统治，一方面极力挑拨汉、苗居民的关系；另一方面，施以种种可怖刑罚，以暴力震慑百姓。沈从文从20年代就与龙云飞相识，对此人的斑斑劣迹并非毫不知情，但在进行创作时却忽略其身上暴力嗜血的罪恶特性，《湘西·凤凰》中出现的龙云飞堪称一代侠士。

(三) 影响对聚焦对象的选择。聚焦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视觉问题，聚焦选择的背后有时亦与家世相关。当时身处国民革命领导核心的茅盾深知商民运动不如工农运动那么政治正确，但在小说《动摇》中还是对已被视为反革命的小商人予以谅解，反而面对工农运动时态度暧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考虑到茅盾家世，或可明白一二。出身小商人家庭的茅盾深知这一群体生存不易，早在1927年5月工商运动爆发之时，他就撰文指出，“不但是无产的农工群众简直没有生路，即小有资产的工商业者，亦痛苦万状”，并认为“工商业者和工农群众中的革命同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但“工农运动之不免稍带幼稚病”破坏了对革命事业意义重大的工农阶级与工商业者同盟。^② 可以看出，他并不认可将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归咎到小资产阶级为了个人利益而动摇立场，所以在《动摇》中才会表现出对小商人的偏向。在他笔下，店东不仅配合革命工作的开展，也响应号召踊跃加入商民协会，但日益激进的工农运动丝毫没有顾忌小商人们的利益，当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都要丧失殆尽时，他们选择自保与工农运动分道扬镳也在情理之中。

(四) 影响对叙述机制的择取。对“可叙述之事”的筛选、控制固然重要，却也只是一项基本工作，

^①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4-85页。

^② 罗维斯：《绅士阶层与中国现代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133页。

如何将零散无序的材料排列组合，组织成首尾连贯、深具意蕴的文学文本，无疑更见作者功力。如择取启蒙故事者会设置文明/愚昧冲突机制，讲述革命故事者会设置压迫/反抗机制，挖掘人心人性者可能被儒道的善恶奖惩机制、基督的作恶/忏悔机制所贯穿等。不同的机制意味着作家对可取素材的大幅重组、改写，而叙述机制择取的背后有时亦关联到作家家世。比如，按照政治美学中敌/我模式的编码逻辑，作为战斗英雄对立面的土匪极易被政治化、脸谱化和抽象化，尤以十七年文学中的匪色话语最为典型。沈从文并非不知土匪作为一种非理性暴力组织的反动特质，但他却一反惯常做法，借助抗日战争的正义性，重置土匪杀戮行为在道德上的合法性，因为杀戮一旦指向侵略者时，无疑会给“匪式英雄”的产生留下更多闪转腾挪的空间。透过土匪叙事的祛魅操作，家世导致的情感偏好可见一斑。

以上所论是家世之于文学的四层介入，也是家世研究最为重要的落脚点。至此，“家世—心理—叙事”可以构成比较系统的文学分析方法。透过作家家世里层内容，挖掘其对主体先在文化结构和创作心理形成的影响，进而分析动机驱使之下采取的形式策略、编码原则及价值预设，或可更加深入地接触作家、文本与文学史。

四、结语

近年来，史料学转向在当代文学学科内部异军突起并呈爆发之势，且其影响还在持续扩大。究其根源，这一动向与学科意识不断强化、学术研究日趋成熟有关。许多学者也积极调整治学理路，在拓宽史料边际、建构史学方法方面做出多向度尝试。“家世研究”亦可视为对“历史化”研究潮流的一种呼应。但将古典考据学引入现当代学科其实争议颇大。一方面，需要借助历史转向促使学科建设走向成熟。文学研究如果没有丰富史料作为基础，极有可能落入理论的空谈之中，所谓创见常常是理论的逻辑推演或自我循环。另一方面，“以古为师”确实存在一定缺陷，毕竟多数学者专长在“文”而在“史”，如果过于沉迷“史”的阐释而“忘记文学之为艺术”也实属不妥。是以本文所论“家世研究”既要借鉴古典考据学在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方面积累的治学经验，也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外与思想界、评论界有效对话，重视史性事实描述的同时兼顾诗性审美想象。但需注意，“家世研究”既不属于历史学范畴的作家家世考古，文学本身感动人心的力量不容忽略，也并非人们惯常以为的“家世决定论”，所论只是提出一种可能，而无意于借助家世研究再次确证经典作家的优先地位和典范意义，因为家世在发挥效用时无关作家创作成就大小。这种研究模式无疑打破了长期以来“大家”永远享有阅读和讨论的绝对优先地位，让一些不为人所注意但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不知名作家重回学者观照视野。

当前学界倾向于关注文学周边研究，考察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亦即韦勒克所说“外部研究”，即便关涉作家作品也是侧重主体的社会活动身份，在作家“主观内面生活”方面用力稍显不足。^①笔者认为，史料研究不仅可与宏观史学勾连，亦可将其引入主体心态、叙事实践层面。因为创作主体作为客观世界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中介，除却外部语境影响，主体内因亦发挥作用。一旦过多预设外部因素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同一场域下的个体独特性如何展现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文学并非和作家个人生活无关的客观产品，它是一种个人表达，在这背后隐藏着整个人格。基于此，本文所作家世研究希望能够做到内外互动，借助史料相对可靠地复原作家生活环境，走进作为具体的人存在的创作主体之心理，进而在家世天地中拓展文本阐释空间。不可否认，一个研究视角的选取在照亮一部分观点的同时也可能会遮蔽另一部分。这条路径既有意义，也有限度，笔者希望此种思路能为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一丝活力。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邹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共同体的跨域嵌合： 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旨归

许栋梁 陈开举

[摘要]20世纪香港严肃文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审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多维的空间向度，蕴含着重要的共同体意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抗战和解放浪潮中，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殖民空间，充分发挥与内地之间的转渡作用，其间审美文化主要以“南下/北上”跨地移植生产和空间传播的方式，彰显了以国族为旨归的共同体内涵。在20世纪下半叶的都市空间生产与全球化进程中，香港审美文化一方面立足都市文化的媒介生产与消费场域，以“本地化”方式参与了地方性香港作为都市共同体的审美建构，其作为“表征性空间”应该置于与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中展开批判性考察；另一方面则是以武侠文化、影视娱乐、流行音乐等为主流的大众文化浪潮，在朝向内地、面向海外的跨地传播中，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华语文化圈并具有全球意义，成为华人审美共同体的内在建构力量和文化身份标识，也彰显了香港作为“跨域空间”和“拓扑空间”的共同体嵌合作用。

[关键词]香港 审美文化 跨域空间 拓扑空间 审美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2-0169-08

在“九七”回归前的百年历程中，香港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殖民空间，以及作为全球性、国际化的现代都市，构成了其审美文化生产的基本场域，并形成了超越香港本地的空间传播向度。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武侠文化、影视娱乐、流行音乐为主的香港大众文化浪潮在朝向内地、面向海外的跨地传播中，再生产出具有重要国族和全球意义的华语文化空间，从而获得了超越地域的审美共同体内涵。往前回溯，这种基于文化生产和传播空间性的共同体内涵，不仅在审美层面，其在20世纪上半叶香港与内地的命运关联和文脉转渡中，就已然彰显国族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意义。

香港独特之空间性的共同体旨归，是20世纪香港包括严肃文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在内的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重要的内在脉络和突出的历史价值所在。^①对于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深化和拓展香港审美文化的空间研究来进一步廓清。以“空间”为视域审视香港已具有跨学科方法论或范式论意义，在凸

作者简介 许栋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人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阐释学研究院研究员；陈开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420）。

^①本文主要在融合“文学/文化”意义上使用“审美文化”（aesthetic culture）这一范畴，它能够整体体现香港20世纪文学和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要特征，将与文学艺术审美之间存在不同程度亲缘或交互作用机制的文化形态涵括进来，包括通俗文学、大众文化乃至日常活态文化。本文并不致力于做全面考察，而是着重在不同时期抽绎出其中的主要构成或主导形态。该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也颇为复杂，具体可参见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余虹主编：《审美文化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姚文放主编：《审美文化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

显香港作为一个特殊文学与文化空间的层面上，学界也存在着“高度共识”。^①本文在“空间转向”以来所不断开启的理论视域中，考察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多向度、多维度的空间性问题，力求摆脱宽泛的空间论，在其中寻绎通向“共同体”的内在脉络和价值向度，在中华民族复兴和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擘画的当代语境下，探寻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及其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南下/北上”与作为审美文化“生产性”空间的香港

虽地处南海之滨、大陆边陲，香港自古就以中华文明和岭南文化为本根。近代以来，逐步被殖民统治的香港仍以华人为社会主体，但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在贸易港定位和殖民统治下，香港社会发展程度和范围均有限，但至20世纪初已形成中/西、传统/现代交杂的社会文化土壤。在此期间，香港逐渐产生与自身历史和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民主文化，既培育了以王韬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也催生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潮。随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和1900年“庚子之乱”发生，民族危难日益深重而民智渐开，革命浪潮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以陈少白在1899年奉孙中山之命返港并创办刊行《中国日报》为标志，香港在19世纪末拉开了以包括审美文化方式在内，有组织地面向内地传播革命文化的大幕。与这样的时代转折几乎同步的是香港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空间变迁。1898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新界地区，完整意义上的香港由此脱离政治母体，其逐步殖民地化乃是资本主义地理扩张和空间生产的结果。由此，香港审美文化在20世纪一开端，便置身于国族生存空间的关联命运中，形成了横跨半个世纪的主基调。

首先是粤港一体与革命文化的跨地辐射。殖民地化的香港既成为“西风东渐”的桥头堡，也是多方政治和文化势力的交汇地，但其审美文化并不成熟，也并非宣扬维新或鼓吹革命的主要方式。这样的局面在20世纪初因《中国日报》的创办而发生了重要转折。《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是香港第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在辛亥革命前“凡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惟一喉舌”。^②该报尤以十日一刊之《中国旬报》附“鼓吹录”副刊，大量刊发谐文、戏剧以及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曲艺形式“粤讴”，“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③以香港为生产据点，“中国报”超出香港而广泛传播，在20世纪初“推销于粤省各县及海外各埠，异常发达，因之革命思潮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④在《中国日报》首创之下，粤港地区掀起了创办革命报纸、开展文艺宣传的浪潮。《中国日报》著名记者郑贯公在香港创办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皆设有副刊“谐部”，尤其《唯一趣报》(又名《有所谓报》)“专以小品文字辅导社会……销路之广，驾各大报而上之”。^⑤参与了20世纪初香港几乎所有革命报刊的黄世仲(黄小配)于1905年开始，先后在《有所谓报》和《少年报》上刊载《洪秀全演义》，随后由《中国日报》社单本刊行，在粤港地区风行一时，有力推动了革命思想深入民众的跨地传播。从空间来看，香港因殖民地化而获得了弹性的社会空间，容纳了内地和海外汇聚而来的革命文化，但它本身并不是革命的直接目标和革命文化传播的主要对象，而是革命文化向外转渡和辐射的枢纽。这一时期香港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审美文化以“粤港一体”为重要的空间机制，既“北上”直面腐朽的清王朝，也绕道影响海外华人，共同指向现代民族国家之未来。

其次是新旧文化的场域转换与文化政治的空间延宕。辛亥之后，革命文化从原来以香港为枢纽的跨地传播，到纷纷“北上”落地；随之则是前清遗老、旧式文人包括上海“鸳鸯蝴蝶派”等纷纷“南下”避居香港，使得保守文化长期主导了香港的文化空间，内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则受到多方力量的抵制。直至1927年北伐战争推进和鲁迅赴港活动后，以大量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为载体，香港新

① 李浴洋：《重探“香港文学”——陈国球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71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338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534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第70页。

文学在内地的影响下兴起，局面方始扭转。整体而言，新旧文学与文化长期并存所产生的“应合”与“背反”，^①彰显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张力机制。与辛亥革命发生期香港汇聚革命文化而外向辐射的空间特征不同，这样的文化空间凸显了革命之后文化政治在香港的空间延宕，它是内地文化在香港的空间转移与存续，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发生进程中各方博弈的场域：既有港英政府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目的与旧文化势力的勾结，也有倡导国粹以延续民族命脉的立场与革新文学以求民族觉醒新生的主张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同脉络的政治和文化力量，戏剧性地浓缩和汇聚到香港这一内在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的殖民空间中。

再次是抗战烽火中人迁港与文化中心的空间移植。抗战爆发后，大量内地文人作家陆续避居香港，香港不仅成为中国文脉重要的留存地，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再生产与向内地传播的枢纽。一方面，不同风格、流派、立场的文人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南下”香港，可谓由内地向香港的结构性凝缩，而非局部移植。另一方面，由上海等地迁入的报纸纷纷复刊，其中的文艺副刊多由南下文人主持；南下文人也在香港新创报刊和文艺杂志，打造文艺新阵地，由此“香港文坛勃然中兴，成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中心”。^②尤其是上海沦陷之后，这种由“南下”所带动的文化中心迁移，更具有整体性的空间移植特征。包括大批电影人的“南下”，最终促成香港作为“他者”和“替代者”，^③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中心。抗战救亡成为这段时期香港审美文化的主旋律，“民族形式”“抗战文艺”成为具有共同体内涵的审美纽带，南下作家以香港为枢纽汇聚各方，朝向内地、面向世界传播抗日救亡之声，以建构审美共同体的方式保卫民族共同体。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数百位文人和民主人士由东江游击队救援脱险后返回内地，并主要进入大后方，使得原来由内地迁入并已经实现再生产的文脉再次得以延续。由此，在抗战烽火和“救亡”的民族主旋律中，香港作为内地文化的中转枢纽和再生产空间，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复次是解放浪潮中“左/右”文艺的空间转渡。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大量的左翼作家和进步文人先后赴港，将解放区所倡导的大众化、争民主和批判现实、革命战斗的文艺思潮在香港展开跨地生产与传播，使得40年代后期香港成为左翼文化中心。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大量左翼作家和进步文人“北上”，将左翼文化带回解放区，并在随后的解放浪潮中向国统区渗透展开。在“解放区—国统区—香港—解放区—国统区”这样的途径中，左翼文艺思潮完成了一次跌宕起伏的空间之旅，虽然它往往并未真正“落地”并扎根香港本土而是一种“空中延伸”，^④但香港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转渡作用。从总体上看，“作为边缘和过渡空间的香港文坛，一直是内地文化权力博弈的空间”，^⑤新中国成立之初大量右翼文人“南下”，使得香港文化空间中“左”消“右”涨，尤其是冷战格局下由外部力量推动的“绿背文学”“美元文化”等极端形态，激进地表征了政治分野。但同时，“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会有较大的回旋空间”，^⑥而政局变换所带来的文化空间错位，使得香港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文化之方式，超越意识形态而嵌合民族共同体。

综上，20世纪上半叶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主要是地缘空间意义上的，香港因特殊的地缘位置和殖民空间属性，成为国族文化生产与传播、迁徙与移植的枢纽和中介，不同程度地由文化“边陲”和“沙漠”，变成了具有文化辐射力的“中心”和文化再生力的“绿洲”。其间香港审美文化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原生力量和本地形态，但并非显声。从这种空间性来看，香港并非仅是一个静态的、被填

① 黄万华：《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合和背反》，《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

② 赵稀方：《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

③ 罗卡、[澳]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增订版），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

④ 赵稀方：《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学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

⑤ 赵稀方：《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北方论丛》2018年第1期。

⑥ 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31页。

充的空间，或作为其他都市之“可怜的镜像”，^①而是一个功能性显著、具有能动作用的“生产性”空间。这使得香港对于内地而言，成为“在某些时期的孵化器，在另一些时期的推动器”，^②从而在整个现代民族国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空间津渡作用彰显国族共同体意义。

二、审美本地化与都市文化空间的“生产/再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环境，香港与内地在地理空间上逐步隔绝。而数次“逃港”潮则以冲破空间阻碍的剧烈方式，凸显了两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鸿沟，大量的内地移民也推动了香港社会文化生态的重构。随着都市化、全球化和内地改革开放多重进程的叠加，香港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末，香港已从位列“亚洲四小龙”发展到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Nylonkong)，成为具有经济中枢和城市网络节点意义的世界级“全球城市”。由此，香港的殖民色彩被冲淡，呈现出“东方之珠”“东方曼哈顿”“东方好莱坞”的多面都市形象和多重身份标识。由此，20世纪下半叶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基本场域，也从国族空间转向都市空间。这种转向既是渐进的，也是在不同审美文化形态之间的转移。从文学来看，50年代政治话语还在延续，占据文坛主力位置的南下作家“仍然以整个中国为审美的视野”，^③同时香港文学也以“地域性/跨地域性”互补的方式逐步彰显本土特征。^④到了60年代，正如也斯的分析，除了世界和国家民族作为外部因素的渗透交织，很重要的另一面是青年文化、商业文化开始冲击保守和严肃的文化体制，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生态。^⑤随之而来的则是立足都市空间、基于大众传媒场域的文化生产及其跨媒介表征，这也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香港审美文化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与表征机制；其最重要的传播效应，则是在大众审美和文化消费场域中再生产了具有香港本地特征的都市文化空间。

首先，报刊建构了香港雅俗文学生产的媒介空间，构成了一种“实在的文化场域”。^⑥由都市日常文化消费需求所驱动，各类报刊遍地开花，促使“专栏”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艺生产阵地之一，刘以鬯、西西、也斯等香港作家都是专栏的重要写手。“专栏文学”在报刊这一凝聚都市社会意识形态的媒介空间中，与时政、商业、娱乐文化竞争共存，形成了与都市文化整体的结构性互动。尤其是从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到倪匡的“卫斯理”科幻小说等，大多因报刊连载而流行后转向出版发行与影视改编，从而推动通俗文学作为“最具香港性的文化标志”，构成都市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空间”。^⑦

其次，电影实现了从“国语片/粤语片”到“香港电影”的格局转变与身份转换。香港在20世纪初电影发展伊始，便生产了大量符合底层审美趣味的粤语片。20年代开始迁入了不容于内地的武打片，以及“邵氏”前身“天一”等具有旧式审美特征的不同类型国语片。50年代中期，“邵氏”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黄梅调电影，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媒介转换，成为该时期香港国语片的主流。在60、70年代，“邵氏”旗下的古装片，更为广泛地从历史题材和文艺形式中汲取资源，展开丰富的影像生产。关键的转折是随着“嘉禾”等电影公司在70年代的崛起，特别是80年代后，与香港都市空间、社会生活和文化惯习密切相关的“香港电影”进入全盛期，并且在全球化语境下呈现出“东方好莱坞”的空间定位与身份标识。

再次，“无线”(TVB)、“丽的”和“佳视”等电视台在70年代的崛起，不仅引发了香港影视娱乐行业的跨界生产，更在电视普及化的推动下重构了都市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到了80年代香港电视剧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是历史题材剧和武侠改编剧蔚为大观，时常引发万人空巷；另一方面则是展演香港

① 李欧梵：《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读书》1998年第12期。

②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1页。

③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④ 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上编，第252页。

⑤ 也斯：《城与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⑥ 也斯：《香港文化十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⑦ 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2页。

社会百态的现代都市剧不断涌现，逐渐成为港剧主流。到了 90 年代，TVB 制作了大量的律政、刑侦、商战、豪门等题材的电视剧，全方位展示了香港都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种种面相，与“香港电影”共同在影像媒介空间中表征建构了多维立体的“都市香港”。

复次，随着许冠杰等人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发行粤语专辑，香港流行音乐的大幕渐渐拉开，逐步与影视媒介、娱乐行业实现多维融合，构成香港流行文化空间的主阵地。伴随着 80、90 年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影视主题曲蔚然成风，典型如成为香港“城歌”的《狮子山下》，系列经典传唱不衰。此后以“宝丽金”为代表、包括“华星”“华纳”在内的唱片公司勃兴，香港流行音乐工业逐渐成熟，在“谭张争霸”和“四大天王”的全面偶像化、娱乐化浪潮中，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数十载风云榜和华语流行殿堂“红馆”数不清的演唱会中，走向了流行的巅峰，也构成了独具香港都市特色的日常活态文化空间。

由此，以港片、港剧、港乐为主，形成了具有香港本地特征的大众文化浪潮，构成了 20 世纪下半叶香港审美文化的主流。港产、港式、港味则成为标识香港“地方性”特征的审美文化标签。“港产”主要从“香港制造”的生产与实践环节来界定，包括香港文化生产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生产理念和行为实践在内；“港式”则侧重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香港都市特征和社会特点，再现港人包括行为、思维、感知在内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表征范式；“港味”则体现了具有香港文化韵味和审美趣味的感性内涵。三者共同构成了香港大众审美文化本地性的典型内涵，也具有了地方性的共同体意蕴。在香港这一多重历史进程叠加、多方力量交汇、社会文化多元复杂的殖民空间中，大众媒介对于都市“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和都市文化的地方性建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正如阿帕杜莱指出的，大众媒介通向集体性行为，某一群体能够藉此共同想象和感受事物，使得地方性的“情感共同体”成为可能。^①

20 世纪下半叶香港大众审美文化建构的具有本地特征的都市文化空间，要基于生产与传播 / 消费一体的逻辑展开剖析，这构成了超出文化空间本身的“再生产”视角。马克思分析道：“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② 在这样的再生产中，夹杂着政治、经济、社会交织的复杂驱动力，也蕴含着文化空间的生产及其传播 / 消费与社会空间的关联机制，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③ 香港社会空间既在中环高楼、浅水湾别墅、油尖旺街巷和屋邨劏房中，也在异托邦式的九龙城寨与作为“香港少数族裔九龙城寨”的重庆大厦之间；既在关于香港的城市规划、政治擘画和经济版图中，也在关于香港的感知、叙事和想象空间中。从“小说香港”到“影像香港”，从港产、港式到港味，从“东方之珠”的审美建构到“东方好莱坞”的文化身份政治，审美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所形成的空间作为“表征性空间”，以再生产的方式内在地参与了香港社会空间生产。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文化空间“生产 / 再生产”能否建构真正具有本地主体性的都市共同体，需要展开辨析剖层与辩证批判。

第一，要从大众审美表征来看“本地化”中的文化杂合。香港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元，到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至少并存着“8 个可识别的文化系统或亚系统”。^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香港成为多元文化跨域杂合和“世界主义”在地展演的都市空间，香港也以自身为主体与诸文化亚系统之间展开文化糅杂，创新生产了“杂种的本地文化”。^⑤ 这种文化往往以一种“活态”（lived）在场的方式，弥散在香港

^① [美] 阿尔君 · 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1、252 页。

^② [德]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53 页。

^③ 列斐伏尔强调人们不仅在空间之中生产和生活，同时也不断生产“空间”本身；社会空间则包括了“空间实践”“空间之诸表象”和“表征性之诸空间”。参见 [法] 亨利 ·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40、51-52 页。

^④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第 49-50 页。

^⑤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第 50 页。

的日常生活中，其经典形态如杂糅了中式、西式乃至东南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的港式茶餐厅。这种渗透日常的活态文化在以影像为典型的审美表征中，不断地以具象的方式展开传播，被再生产为具有文化身份意义，也中介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景观”。

第二，要从消费主义角度来看大众审美文化。贯穿大众文化传播背后的是基于资本和商业逻辑的审美与文化消费，这种逻辑将香港的影视娱乐行业推向难以企及的高度，并造成了一种独特性的幻象。尤其是媒介化生产与都市性表征相结合，演变成一种景观消费和符号经济。正如德波指出的，景观是对现实生活的分离、逆转和侵蚀、异化，是“人与人之间分离和疏远的表达”，^①都市场域中的大众审美文化既在日常消费的商业逻辑中，也在由资本推动的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标准化、程式化的技术逻辑中，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个性和主体性的本地文化。

第三，要从实用主义源头来看文化主体性和大众审美消费。糅合而成的文化“半唐番”本质上因混杂而缺乏真正“他者”来建构其主体性，从而流于一种表层认同，其背后则是同样驱动着大众审美文化消费的实用主义立场，正如陈冠中的自省：“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②港式茶餐厅所表征的多元文化混杂与港式生活方式的背后，是基于香港日常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实用主义消费逻辑。这种实用主义姿态的源头，则是香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处境，其中除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本地化”融合，还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活机遇与生存挑战。

以上三个层面也是都市共同体悖论之呈现，这种悖论在香港更凸显出张力特征。对香港来说，殖民空间与全球城市相叠加，帝国主义逻辑下的资本主义已然成为其“内在的构成性力量”，使得“个体体验作为一种孤独的、异化的实体，不能与任何的集体性发生真实的、有机的联系”，^③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始终既在族裔/城籍张力中，也在文化/政治张力中。王德威指出，香港“以一个城市的立场，与乡土/国家（country/country）论述展开了近半世纪的拉锯”，^④不止于此，在全球/地方、国族/殖民、传统/都市、现代/后现代这样更为复杂的叠加与嵌套中，香港的共同体所指更为微妙，它在本体/建构、真实/想象等悖论交织中，进行一种多层次的“跨域”。也由于这种复杂与悖论，“跨域”往往成为“错位”乃至激进的“脱嵌”，尤其容易被极端政治和意识形态所裹挟，陷入香港“民族论”和“城邦论”的异化之地。

究其关键，香港身份是多重空间关系中的都市身份（urban-identities）——不管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起枢纽作用的全球城市，还是开放兼容、多元并存的国际都会，香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地理重组和空间生产中，占据了一个由复杂历史因缘而形成的特殊位置。当然，正如陈国球所言：“香港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群人专有的香港，它应当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被看待。”^⑤香港的都市身份需要借由一种“进入—跳出”的路径来往复审度，并揭示其认同向度何在，这也是重审文化主体性张力和都市共同体悖论的吁求。20世纪下半叶香港审美文化超出其本地的跨域传播，为这种审度提供了关键视角。

三、超越都市的审美共同体嵌合

在20世纪沧桑变幻的历史进程和多重复杂的空间关系下，正如也斯指出的，香港并非“一块空地”或“一个空盒子”，也不是“漂浮的能指”，而是各方展开国际性、民族性等宏大叙事的对象；香港文化空间也一直处于“变幻”与“过渡”中，不管是“后殖民”还是“后现代”，都不足以展开清晰而整体

①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6页。

② 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第7页。

③ [印度]艾贾兹·阿赫默德：《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孟登迎译，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④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282页。

⑤ 李浴洋：《重探“香港文学”——陈国球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

的认知与阐释。^①早在20世纪20年代，香港便成为鲁迅思想一个独特的“中介空间”，他既以香港来观照中国，也以中国诠释香港，其中有“不无深刻的片面”，也有“迷失”与“悖论”，^②但实际上折射出的是：香港总被关联到更广更深的认识和感知领域，对于身处香港之外的人来说，总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和感性色彩。典型如大量的南下文人作家多从内地视角来感知和想象香港，从而带有某种程度的“中原心态”。^③然而，20世纪下半叶随着本地审美文化的传播，香港逐渐从一个被动的想象和感知对象或话语和叙事中介，转变成一个以审美方式彰显国族和文化共同体意义的“跨域空间”(translocal space)。这样的空间与上半叶香港作为“生产性”空间异曲同工，但其枢纽、中介、转渡的功能性特征减弱，而是彰显出鲜明的传播主体性并超越了这种主体性，连通和再生产了更深广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空间。

60、70年代的“邵氏”古装片以媒介的方式想象性地建构了原本就几未在香港存在过的文化空间，关联到更深广的历史文化脉络中，既表征并再度联结了以内地移民为主、以中华文化为根的香港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也广泛影响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地区。更典型的是随着报刊连载、著作出版到影视改编的媒介转换，金庸武侠迅速而广泛地在华语文化圈流行，成为华人审美沟通的重要媒介。随后是港片、港剧、港乐的全面流行，对80、90年代的华语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文化的跨地互动中共同建构了超越地域的中华文化空间。与此同时，这样的跨域空间又往往一体两面地向外表征中华文化身份，其中最典型的是“功夫”。随着“嘉禾”等电影公司的崛起，李小龙借助为数不多但影响巨大的功夫片，通过国族和文化的冲突叙事与身份建构——如《精武门》设置为中日之间的冲突，《唐山大兄》和《猛龙过江》分别讲述泰国和意大利华侨的遭遇——将自身演绎为英雄形象，同时也推动“功夫”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而后，随着成龙等人主演的功夫片走向国际市场，以及武侠影像全球传播的推动，“功夫”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身份的经典标识。

由此，借助20世纪下半叶审美文化的媒介生产和跨域传播，香港本身已成为一个真实与想象交织的感性存在。对于身处其外的人来说，香港是一个在地理和媒介中客观存在的空间，是一个感知体验、想象建构和情感投射的空间，也是承载中华文化的身分认同之处。对于深受香港审美文化影响的数代人来说，香港获得某种程度的“地方”意义，成为一个令人熟悉和亲近的情感之地。通过通俗文学、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而感知和建构起来的“感性香港”，成为人们因共享文化记忆和审美经验而展开感性沟通的共同体空间，内在地连通着更深广的国族根脉。由跨域空间运行的“感性香港”，揭示了香港的“拓扑空间”(topological space)内核。如何界定香港的位置，一直牵动着各方的不同立场和空间视角。杜维明等人以“文化中国”为视域扭转香港与大陆之间的边缘/中心关系，周蕾等人则强调香港的“夹缝”“边缘”“过渡”处境。不管是中心/边缘的空间二元论和等级制，还是同样衍生于二元逻辑的混杂式或外位性“第三空间”视角，都不切合香港空间性之要旨。从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来看，它体现了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拓扑学”^④内涵。空间拓扑学认为，具体的某一空间或流动性物体总是身处多重关系和网络结构之中，因此要着重考察它作为其他空间的关联投射和异质同构，所彰显的形变/不变、关联性/跨越性、破坏能力/持续能力等特征，由此揭示其“能在空间化内部以及不同空间化之间发生冲突与断裂时，仍然保持某种连续性和连贯性”。^⑤作为典型的拓扑空间，

① 也斯：《香港文化十论》，第3-5、55-56页。

② 朱崇科：《鲁迅视野中的香港悖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 赵稀方：《小说香港》，第83页。

④ Topology，又译“地志学”“地形学”或“拓扑结构”，最早是指对地形地貌的研究，到近代则指对几何形状及其变形的研究，它具有跨数学、地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超越传统地理/空间观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参见[加]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谢文娟、张顺生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

⑤ [加]罗伯·希尔兹：《空间问题：文化拓扑学和社会空间化》，谢文娟、张顺生译，第192页。

香港总是其他空间的延伸、折叠和映射、嵌套，它历史性地处在从地方到全球的空间关系网络之中，不管是在革命、抗战和内战、冷战时期，还是在都市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同时，香港始终在与不同空间的相互作用和异质同构中保持自身的延续性，从而发挥其空间沟通和跨越作用，以及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空间再生产功能。

由这样的拓扑空间视角反观，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所形成的审美共同体（aesthetic community）理论内涵逐渐清晰：它一方面是解构的，是以审美方式跨域运行的共同体，具有左翼批判理论所揭示的“容纳差异的、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审美共同体内涵，^①“感性香港”在某种程度上能突破地理界限、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彰显了美学作为“元政治”^②的审美共同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建构的，是共享审美内容和经验所形成的，具有情感沟通力和国族、文化凝聚力的共同体空间。获得“地方”意义的“感性香港”不是对象性的审美存在，它是体验化、参与性、生态式的，彰显了“身体、意识、环境的连续统一体都进入了知觉体验普遍的连续性之中”的审美共同体内涵。^③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香港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化在内地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传播，构成了数代人共同的审美文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形塑或影响了他们的情感体验、审美感知与日常生活方式，具有某种“感觉结构”特征。因此，这样的审美共同体既有“华语语系文学”等视野所提出的移动“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的特征，^④更是基于香港作为拓扑空间，在共享和共通意义上涵括更内在、更深层的共同体意蕴。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国族视野下的殖民空间、都市及其社会文化空间、超越都市的感性空间三个维度来展开20世纪香港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阐释。与香港独特之跨域和拓扑空间一体的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指向了共同体的“嵌合”——既是香港以审美文化跨域生产与传播的方式穿越国族、殖民、都市等界线之嵌合，也是审美文化本身跨越和勾连本体与建构、真实与想象等领域之嵌合。这种嵌合正如文化研究中“articulation”这一概念所开示的“表述/连结”双重内涵，是审美文化之于空间生产和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效用。对于当前正在向北规划“北部都会区”新空间的香港而言，在主权回归、政治和法律身份明确地迈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在“全球化/逆全球化”交加、中华民族复兴和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擘画的当代语境下，如何更好地从20世纪审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空间性中获得一种反身认知与实践鉴镜，从而深化其共同体向度，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展开探讨的问题域。

责任编辑：刘青

① 漆飞：《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9页。

② [法]雅克·朗西埃：《思考“歧感”：政治与美学》，谢卓婷译、赖兰兰校，王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7卷第1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4页。

③ [美]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④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Main Abstracts

Data Exploitation and Justice Criticism of Platform Capitalism

Wei Chuanguang 19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data value in the 21st century, Canadian scholar Srnisek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latform capitalism”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production systems relying on digital technology. Platform capitalism includes hidden data exploitation, including data production material deprivation, forced labor and labor alie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ata exploitation, platform capitalism has constructed a labor structure that affects social justice, and imposed and deprived digital labor abstractly, making data exploitation lose its justice. Therefore, the direction of data justice construction must be to solve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data produced by digital users are occupied by the platform capital free of charge, so as to realize data sharing among the whole people. This needs to restrain the powerful endogenous force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that data is manipulated by capital from the source, increase the efforts of state-owned capital and collective capital to build digital platforms, clarify the data ownership of digital workers, and manage the capital platforms with “progressive data sharing authorization” and “data tax payment”.

On Xunzi's Hierarchical Theory of King-Hegemony Discourse

Mao Zhaohui 34

Though both Mencius and Xunzi responded to the theoretic gap of Confucius' king-hegemony discourse, they offered different solutions. Mencius negated the hegemonic way, while Xunzi advocated the kingly way but not rejected the hegemonic way. This disagreement came from their different criteria for good politics. The most fundamental criterion was politician's mind (intention) for Mencius but political performance for Xun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Xunzi did not treat the kingly way and the hegemonic way a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politics but as different levels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s. Meanwhile, standing on a Confucian stance, Xunzi maintained that political performance wa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lection of politician's self-cultivation. In this way, Xunzi constructed hierarchical theory of King-hegemony discourse. This theory mitigat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kingly way and the hegemonic way, and defended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kingly way, henc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of pre-Qin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bandoned the Mount Danxia and Establishment of Biechuan Temple in Early Qing Dynasty

Yang Quan 41

Dangui(Jinshi), a famous monk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anged the pattern in Northern Guangdong and promoted the resurgence of Caodong School by establishing Biechuan Temple.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abandoned the mountain and moved to Mountain Danxia are the precondition of establishing this way-place. Yongmao Li who was former grand coordinators of southern Jiangxi and his brother Chongmao Li bought eastern Renhua county and name it as “Danxia” together due to unable to return to home town. There were plenty of adherents in the mountain at that time. Jinshi used gatha to implore the mountain on the grounds of subsisting of Grandmaster monk Zongbao(Daodu) while Jishun Yao who was known as Yiruo lay Buddhist used the mountain to implore gatha. Chongmao Li who had Buddhist beliefs wrote a document giving up the mountain under Jishun Yao and other people's lobbying at the end of the same year. He also gave the whole Mountain Danxia to Buddhist. The hopelessness of restoring Ming Dynasty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ways to return home were the reasons that the adherences abandoned Danxia. The reasons why Jinshi became a bedesman in Mountain Danxia were that his moral trait,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and political standpoint was recognised by the adherences as well as he was Chongmao Li's colleague.

“The Personal Narration Watched from the Crowd”: The Dynamic Writing, Narrative Therapy and Meaning Production of Cancer Experience on Network

Chen Gang and Wang Qing 51

The paper takes the “Cancer Diary 2017” in the Douban Group and the “Cancer Diary” of Zhihu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akes the concept of “agency” as the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active writing and self narration of the disease experience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online communit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production and self-identity. In the face of cancer pain and physical risk, patients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ease and body, life and society through self narration in cyberspace, rebuild self-identity through active narration, and obtain social support in the online community through self narration,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the network on patients or their families.

Market Access and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Higher-Quality Products

Lu Angdi and Hua Zesu 87

Using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HSR) expansion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market access, which is indu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on the quality specialization across space with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HSR and the HSR-induced market access both exert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rms' product quality. Additionally, such effects are more significant for firms located in central cities, indicating that HSR deepens the specialization pattern of export quality across space. We further employ the least-cost-path-spanning-tree algorithm to construct a pseudo-HSR route for the real HSR routes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alleviate the endogeneity issue. The 2SLS results remain robust. We find such impa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non-state-owned and more productive firms, for skilled-intensive and mor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Mechanism tests show that market access induces quality specialization by relaxing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 employment.

A Glance to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K

Jia Jun 123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which focuses on military affair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UK has prominent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1999, geographers were mainly engaged in exploring military environmental issues; since then, historians have actively followed up,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ce 2010. The study of milita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K has outstan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one hand, it mee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needs of military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it break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ottleneck. By combining thematic and chronological method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thinking on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war, as well as their discussion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ilitarized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thoughts, so as to show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From Surveillance Investigation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Antibiotic Feed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i Pang 133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activities of surveillance and investigation on antibiotic feeding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ban on antibiotic feed additives in the UK and Sweden respectively, the regulatory process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Since the 1990s,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generally begun to regulate the improper use of antibiotic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ions or policie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agency and even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gulation of antibiotic feeding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regulatory initiatives in the EU have achieved preliminary results.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gulation of antibiotic feed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us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avoid the risk,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xisting antibiotic feeding regulation system.

The Possibility and Method of Extraction Research in Modern Literature

Li Chaojie 161

As a common topic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extraction has broad theoretical spac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modern literature. If the modern literature discipline wants to carry on the extraction research, it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past academic experience, but also needs to adapt to the actual subject to upgrad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uthor's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extraction is explored to discuss its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creation psychology, and the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coding principle and value presupposition driven by the motivation is analyzed, so as to have a deeper contact with writers, texts and literary history. Taking the extraction as a window into the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 is neither the archeology of writers' extraction in the category of history, nor the propaganda of the so-called extraction determinism. This path has both meaning and limits. I hope this thought can inject a little vitality into the study of modern literature.